集安抗日斗争史料

方山题

JIANKANGRIDOUZHENGSHILIAO

文史资料选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
集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委 会

序　言

集安市政协主席　韩瑞云

《集安抗日斗争史料》一书，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内外史学界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该书编委会的具体组织实施下，通过广大文史工作者及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今天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市政协献给集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一份珍贵礼物。

集安市座落在长白山脚下，鸭绿江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特别是我国古代北方高句丽地方政权，在此建都长达425年，并作为陪都 239 年，留下了大量的遗存，其中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于 2004 年 7 月 1 日在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集安成为中国第 30 处世界遗产地。

集安还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从甲午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集安一直是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作为抗日斗争的前沿，集安曾是辽宁民众自卫军抗击日寇的主要阵地，也是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集安这块土地上持续 14 年的抗日活动，在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斗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杨靖宇将军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民族英烈们，高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帜，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在集安大地上与日寇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诗篇，为集安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一面镜子。《集安抗日斗争史料》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该书利用大量完整、详实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再现了集安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岁月。它不仅可以资政、存史，也可以团结、育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编辑《集安抗日斗争史料》一书，是政协结合集安实际确定的一项重点工作。该书的出版发行，是在集安市先进文化建设上完成的一项重要工程，是全面贯彻实施集安“文化兴市”战略取得的又一个重大成果。它对推动集安市先进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软实力，加快集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它所给予后人的教益和启示将是绵延不绝、意味深长的。此书的面世，也是对在长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为祖国独立和统一、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的告慰，更能够激励集安人民继承光荣传统，弘扬革命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快推进集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开拓创新，不断前进。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言

抗战风云四十载　民族豪气贯千秋

历 史 图 片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掠夺与扰边事件

民众自卫军奋起抗击日军入侵

抗日联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辽盟与地下党在集安抗日活动

集安人民积极支援抗日斗争

日本侵略集安罪行

抗日斗争历史文献

集安抗日英雄人物

集安抗日斗争大事记

附　录

后　记

抗战风云四十载
民族豪气贯千秋
——集安抗日斗争情况综述

集安（原称辑安，1965 年 3 月 8 日改为集安），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集安，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英雄城市。

中国近代抵御外侮、反击侵略的光辉历史，铭刻着无数英烈英勇斗争的事迹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抗争精神以及不怕牺牲、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集安人民在抵御外国侵略斗争中所展示的顽强精神和英勇斗争事迹，也在这一光辉史册中闪烁着独特的耀眼的光芒。

地处东北边境的集安抗日斗争的历史，与内地相比略有不同，可以追溯到 1904 年。

从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到 1945 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长达 40 多年的历史阶段中，集安一直处于抗日斗争最前沿，不断上演着一幕幕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集安人民面对强虏，揭竿而起，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奋勇保卫自己的家园。从自发反抗日寇劫掠、保护中国人民利益的木把斗争，到有组织的民众自卫军斗争，一直到参与和支援抗联，奋勇斗争，打击侵略，这里的抗日斗争从未间断。这些史实告诉我们，这里是中国最早自发开展人民抗日斗争的地区之一，是东北军民较早实施军警政民总动员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鼎盛时期的根据地，是一个将抗联一路军在 1937 年底到 1938 年上半年中从抗战低潮重新推向高潮的重要斗争基地。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斗争，尤其是抗联的抗日斗争，对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在第二次大战中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断涌动的反帝风云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东北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01 年沙俄借出兵东北的机会，在通化组成伐木制材商团，此后又于次年成立远东林业公司，进一步掠夺鸭绿江沿岸木材资源，并在集安外岔沟驻有军队，以保证对鸭绿江森林资源的垄断掠夺。同样处于列强地位的日本，对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虎视眈眈，并对中国东北觊觎多年，他们不甘心鸭绿江右岸森林资源被沙俄独享，急于在列强对中国东北的利益瓜分中分得一杯羹。地处中朝边境的集安，一直处于这场斗争的漩涡之中。

日军为了实现霸占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一方面早在 1884 年前后就派出大批间谍，进入东北进行社会和资源调查，其中包括对辑安文物古迹的考察；另一方面，自 1902 年始，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侵朝日军和日商在鸭绿江沿岸夺取或低价强购于每年 5 月至 10 月流放的木排；一些韩商也狐假虎威，仗势抢夺。广大排工木把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转瞬间成为强盗的囊中之物。

1904 年 1 月，为争取两国各自在中国的利益，并在中国领土上爆发和进行的日俄战争，将列强对辑安资源的掠夺推向了新的阶段。这种强盗之间的争夺，尤其是日军和日商在鸭绿江辑安段每年几十起到数百起的劫夺木排事件愈演愈烈，使中国木把和排工的损失更加严重。至 1904 年夏，木把和排工已经忍无可忍，数次与劫夺和强号木排的日军、日商发生械斗和武装反抗，参加者有时竟达“数千人”之多，其中 8 月发生的韩民勾结日商伊藤京重带兵强号木植，四、五百名木把聚众抵制的“外岔沟木植事件”是当年多次武装械斗中聚集人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械斗。

1905 年 5 月，日俄在外岔沟一带交战，沙俄军队被赶出了辑安。不久沙俄也在中国东北的这场强盗战争中败北。日俄两国背着中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包括辑安在内的东北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在《附约》中规定，日本在鸭绿江右岸有采伐森林和经营安～奉铁路（今丹东～沈阳线）的权利，并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个条

约。同年，日本人在安东（今丹东）设立军政署和军用木材厂，在辑安外岔沟设兵站司令部，除采伐木材外，还强制收买、收捞江中流放的木材；同时，强迫清政府设立中日合办的木植公司，采伐鸭绿江沿岸木材。

日军军事上的胜利，使其在鸭绿江沿岸的资源掠夺，以及低价强号木材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木把不仅随时被夺木排或低价强买，还有随时丧命之虞。由于很多木把因木排被劫夺或被低价强购，导致家庭衣食无着。日军日商的贪婪残忍，激起了广大木把的愤怒，同时也将他们逼上了与日寇斗争的道路。当年7月17日，200多名木把在关门砬子与强夺其木排的日本人“接仗”，竟致毙死日人6人，捕华人代办、通译等4人，成为1905年鸭绿江木植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反抗。

是年冬，日军无视中国主权，不顾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反对，竟然派人在辑安上羊鱼头占住民房，强设军用木材厂。这为日寇扩大对我资源进行掠夺创造了新的条件。

1906年开江后不到2个月时间，日军木材厂仅在羊鱼头一带就设卡拦截木排万余件，由于超低价强号、强夺，木把义愤填膺。3月27日，五、六百名木把聚集在上羊鱼头日本军用木材厂一带，与日本人理辩。在县知事的斡旋下，日方慑于众怒，不得不有所让步。

1908年，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了《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中日合办鸭绿江森林合同》、《中日采木公司事务章程》等。这些文件规定，中日合办采木公司，可以在鸭绿江右岸帽儿山（今临江）起到安东附近二十四道沟止，距江面干流60里以内采伐森林（名义是合办，但实权掌握在日方手中）。此后的20多年里，鸭绿江右岸200多里宽范围内的原始森林被伐尽，超过原定60里界限的3倍。

木植事件和中国木把的斗争直到1930年的10余年中不断发生，最终伴着鸭绿江沿岸原始森林的枯竭结束了。但他们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已经在群众中深深扎根。成为1908年辑安人民抵制日人强设韩民辑安自治会、驱逐官谷俊介、1928年东边道地区人民支援临江人民拒设日本领事馆斗争，以及此后反击日军过境骚扰和侵略，抗击敌人捕我百姓、杀我边民斗争等反帝斗争风潮的前奏曲。

轰轰烈烈的自卫军运动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铁蹄长驱直入，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大部。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各界人民奋起反抗，掀起反日高潮。黑龙江马占山，吉林丁超、李杜、王德林以及辽西郑桂林、耿继周、金子明，凤城邓铁梅、徐文海等纷纷揭竿而起，率众起事，抗击日寇。受共产党影响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黄宇宙等活动于已被日寇纳入势力范围的东边道各县进行联系，动员各县同赴国难，立即得到响应。

1932年3月21日，各县代表30余人汇集桓仁县开会，组织成立辽宁民众救国分会，分设政治、军事委员会，并设立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决定各县均组建民众自卫军。4月21日，又在桓仁举行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誓师大会（注，辑安当时隶属辽宁省，1954年转隶吉林省）。

集安军民响应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杀敌讨逆、救国救民”号召，组建的由辽宁省公安十三大队（辑安县公安大队）、警察、自卫团、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参加的自卫军，在大会上被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下设三个团，组建的初期共计1 000多人）。并正式任命林振清为司令，李子元为副司令。

第十八路军以岭前沿江一线为重点，分别驻守在岭前岭后。1932年4月底，我自卫军首战外岔沟，将入侵外岔沟的日军击溃，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抗战士气。接着第十八路军又先后组织了县城保卫战、县城攻夺战、辑安战役、石灰窑阻击战、长岗岭伏击战、沿江阻击战、第二次辑安战役、榆树林子袭击战和第二次外岔沟袭击战斗以及临江战役配合作战等著名的战役战斗。民众自卫军十八路军数千将士大义凛然，用鲜血和生命掀起了抗日斗争和反帝高潮，充分展示了他们甘洒热血的关东豪气和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反击日寇的血战史上写下了悲壮辉煌的篇章。

但是，由于民众自卫军成分复杂、内部良莠不齐；日寇内外夹

攻；以及通化城失守后各路自卫军失去了统一指挥等因素，导致辽宁民众自卫军整体衰落，部分路军进关，多数路军星散。其中，辑安十八路军与通化十九路军毅然于10月上旬从濛江一带返回通化、辑安交界红土崖、挠头一带坚持武装斗争。

1932年12月，伪县公署派人对十八路军进行诱降。林振清拒降离队（后进关）；得知被诱降的真实情况后，归途中的自卫军大部分散去，以示抗议。王殿阳等率部分意志坚定的将士及原大刀会会员重返挠头一带继续斗争(余部参加十九路军后于1937年秋加入抗联)；不久原董团一部再次聚义（直到1934年秋再次被敌瓦解）。

轰轰烈烈的自卫军运动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取得期望中的辉煌，但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抵抗运动，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后期集安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英雄业绩和顽强精神已经铭刻在人民心中。

永载史册的抗联壮歌

继辽宁民众自卫军奋起反击日寇侵略的民众抗日高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1932年～1935年冬称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3年秋开始进入辑安活动，开创了集安抗日斗争的新阶段。1934年，集安又成为一军一师的游击区和抗日密营区之一。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一支由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进入抗战前线，按照党的指示，坚持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联合各种反日力量共同抗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在东北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联军首次派人进入集安一带活动，主要是联络民众自卫军、抗日军、绿林武装联合抗日，此后不久即1934年2月21日在三岔子（今属白山）附近召开了有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城墙砬子会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任总指挥。同

年，人民革命军一军独立师自三道沟（时属辑安县，1944 年划入临江）一带逐渐深入到集安县腹地石湖沟、天桥沟、太平沟一带建立起辑安游击区和密营区。

同年 11 月，人民革命军正式成立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辑安成为其一师的主要游击区。

1935 年，杨靖宇等一军领导，根据敌人实施大规模“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和人民革命军边作战边筹集给养，缺乏稳定的后方基地的实际，决定将在辑安、临江一带活动的一师调往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一带开辟新游击区；命二师向北发展，留教导团在临江、通化一带继续开展游击作战，打击敌人；自己亲率一军军部及卫队团于 2 月初进入辑安老岭山区，以一师原密营区为基础，创建一军军部游击根据地。

1935 年 5 月，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在辑安老岭根据地的杨靖宇得知此讯，异常兴奋。但就在此期间，他又得知了一师师长李红光在兴京附近牺牲的噩耗。杨司令不得不将创建稳固的老岭根据地的重任留给几支小分队，自己亲率军部及直属队赶赴兴京。此后南北转战的杨靖宇多次回到辑安老岭秘密根据地，检查和指导根据地建设。此后，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老岭根据地也成为一军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

1936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统一抗日军队建制，废除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军的不同名称，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同志任军长兼政委。

1936 年 3 月，杨靖宇在辑安县组织了二道崴子伏击战，全歼伪奉天骑兵教导团，极大地鼓舞了抗联的士气。同年 6 月，中共南满省委及抗联一、二军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将抗联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同志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同时兼任一军军长、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此时，一路军基本队伍达 6 000 余人，接受一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达到 15 000 余人。会议还将东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同志为省委书记。会议决定：一师主力部队进行西征，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杨靖宇率部分主力向南活动，返回辑安、宽甸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一师西征。至此，辑安老岭抗日秘密根据地又成为

一路军的重要根据地。

杨靖宇率部回到辑安老岭根据地后，遵循党的指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在强大敌人的疯狂围剿、严密封锁、残酷追杀下，指挥部队灵活机动与比自己强大十几倍的敌人进行辗转周旋，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时而拔掉日伪据点，时而袭击伪警察署、所，时而伏击日伪部队，极大地震慑和打击了敌人。

老岭抗日根据地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部队的后方建设提供了稳定秘密的保障基地，也为主力部队的休整提供了可靠保证。1936 年 9 月，由于日伪增加兵力，对宽甸、桓仁、兴京一带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程斌率一师进入辑安老岭根据地休整了 3 个多月，直到 1937 年春才重返宽甸，桓仁一带。

1937 年夏，二军先遣部队毕团进入辑安。杨靖宇命毕团游击于老岭根据地外围，老岭根据地至此成为一路军的核心根据地之一。

到 1938 年春，抗联还在老岭山区秘密抗日根据地的东岔红石砬子一带建立了临时战地医院，在五道沟一带，设立了后方基地，组织了货郎式的流动军械修理所。但因为到 1937 年底，一路军高级干部伤亡较大，部队严重减员，抗日斗争已经陷入低潮。

1938 年，日寇对付抗联的军事行动更加疯狂，他们几乎将其在中国战场上总兵力的一半用于东北战场。年初，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 8 个师团，并有数万人的伪军和警察大队。同年又增加 50 万关东军，汇同各防卫区部队对抗联实行残酷的“铁壁合围”。敌人继续通过频繁、残酷的“治安肃正”和实行“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归屯并户”政策，企图消灭抗联和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为保证东南满抗日旗帜不倒和进一步鼓舞抗联以及人民群众斗争的勇气，杨靖宇改变不在老岭根据地打大仗的既定方针，自 1938 年 3 月至 7 月，先后在辑安境内组织了常家店战斗、老岭隧道袭击战、太平警察署袭击战、双岔河警察所袭击战，以此激励部队和群众的斗志。

1938 年 5 月，魏拯民率一军二师及二军六师、二军警卫旅、教导团等部队与一军军部会师之后，在老岭根据地召开中共南满省委与抗联一路军负责干部联席会议（即辑安著名的老岭高干会议），

并成立一路军总司令部。这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斗争形势，总结了近两年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今后抗日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对推动抗日斗争从低潮重新进入高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杨靖宇、魏拯民在辑安老岭根据地周围联手，又先后组织了袭击阳岔工事区战斗、东岗战斗、家什房战斗、袭击青沟子警察署等重要战斗。

1938年6月下旬，由于敌人扣押程斌母、兄并进行诱降，导致程斌在宽甸一带叛变。一路军的全部机密被敌人掌握，抗联从部队到根据地都遭到重大损失。面对这种严峻局势，南满省委及一路军领导紧急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即第二次老岭高干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撤销西征计划，将现有主力部队分别组成3个方面军，主力向濛江、金川森林地带转移，留下一方面军在辑安坚持斗争。

会后，二军六师、警卫旅撤出辑安，向北转移（不久编为第二方面军）。由一军二师为主组成的第一方面军由曹亚范、伊俊山指挥，留在辑安老岭根据地牵制敌人；杨靖宇率警卫旅暂随一方面军行动。并于8月2日组织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一举将前往搜剿抗联的“满洲剿匪之花”索旅步兵三十二团余部和骑兵四十一团全歼。

同年8月，程斌率警察队和大批日伪军进入辑安山区，配合辑安日伪军破坏抗日根据地，追剿杨靖宇和曹亚范的一方面军。杨靖宇率部与程斌周旋了两个月，于10月中旬率警卫旅以及新成立的少年铁血队向北撤退，在红土崖一带突围，又转进腰营虾蠓沟（今头道镇沿江村）渡江，由西江甸子进入通化境内，向临江转移。叛徒程斌率警察队旋即又被调到临江追剿。

留在辑安的一方面军，在曹亚范等的指挥下在辑安岭前岭后南北转战，后又跳出包围圈，赶到濛江一带与杨靖宇将军汇合。再次回到辑安后，袭击作战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他就率部在辑安组织较大的战斗16次之多。其中一月份袭击东大街部落、激战伪谷麟部队、袭击二道阳岔、袭击新开岭；2月份袭击花甸子、土城子伪警分所；3月袭击日伪曾原部队、伏击刀尖岭尾追之敌、袭击阳岔工事区；4月袭击土窑子；5月袭击横路伪警察分所；8月先后袭击麻线、活龙、榆树林子江口伪警察分所；10月袭击黄柏伪警察分所、袭击榆树林子南岭之敌等。

1939年秋，在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联各军主力部队转移后，日寇在继续对北满和吉东地区实行区域性“讨伐”的同时，再一次将军事“讨伐”重点转向南满，制定了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准备彻底消灭抗联一路军。这次讨伐，日军以野副昌德少将为“讨伐”司令，调集了7.7万兵力，在伪通化、间岛、吉林3省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敌人在冬季利用叛徒程斌、崔胄峰等率警察队对抗联实行跟踪追击，利用大部队铁壁合围。而抗联大部分战士身穿单衣行军作战，有时吃上一顿饭往往要付出几个战士的生命才得以换取。战斗异常频繁，部队陷入极端困境，战争达到空前残酷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路军将士继续战斗，1940年春，一方面军主力陆续撤出辑安，进入森林地带继续斗争。此后其小股部队又多次出入辑安，他们在辑安的战斗一直延续到1941年春。

抗日联军在辑安的斗争活动和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斗、前仆后继、所展示的崇高精神、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壮歌，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史册，永远激励着集安人民。

辑安群众在抗日斗争中，与抗联心连心，采取各种形式支援抗日斗争，有的送子、送丈夫参加抗日联军，有的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联军送枪、送弹药，有的给抗联送情报、送衣物、抢救病伤员，同时秘密地组建了一批救国会、抗日会等抗日组织，为抗联提供情报和给养支持，涌现出众多英烈人物，谱写出无数的光荣史话。

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场战争中，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在东北土地上恣意横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从1931年日寇侵略东北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仅辑安人民就因为战争原因伤亡13 795人，其中直接伤亡5 553人，间接伤亡8 242人。日本投降前的1944年比日本侵占前的1930年，辑安人口下降了5.8%。日本侵略者在辑安掠夺各种矿产资源共97 112吨，粮食309 556吨，林木（伐薪烧碳）25 624吨，原木22 960立方米，抢占土地、毁灭教育文化、盗掘古墓掠走历史文物更是不可计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每个炎黄子孙是永远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该忘记的。

承前启后的抗战新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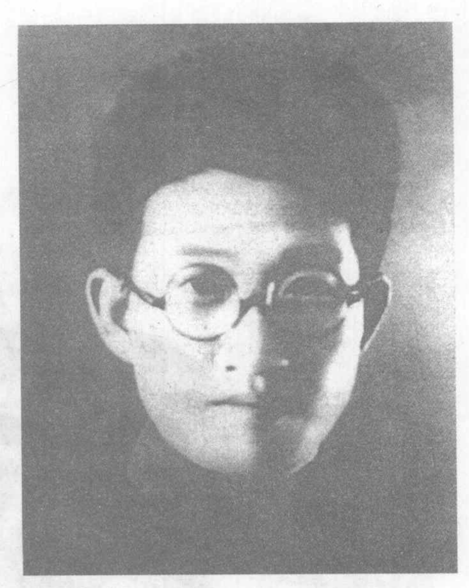
1940年2月，杨靖宇同志在濛江壮烈牺牲，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转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但辑安的抗日斗争烈火并没有熄灭。194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抗日力量，中共胶东区党委派“海外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一批会员，赴东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3年初，中共胶东党组织将在安东（今丹东）任辽宁各界抗日同盟会主任的姚黎明派来辑安，以辑安良民甸子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1944年春，根据党中央给胶东区党委和冀热辽区党委关于要“积极开展敌伪区域内的工作，要切实掌握东北”的紧急电报指示和电报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必然要同我党争夺东北，战后中国内战不可避免，能否确保东北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重要判断，中共胶东区党委为了加强对“辽盟”工作的领导，又陆续派党员干部罗衡、李剑云、刘仁宏等来通化、辑安一带，“组织力量待机暴动，配合反攻”。这些同志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很快建立了中共辽东“特支”和通化分支部、辑安分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辑安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并将辑安确定为武装暴动主力重点和主要爆发点，进行了武装斗争的准备。日本投降期间，地下党组织及时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配合我东北民主联军打击国民党和伪满残余反动势力，为收复辑安，建立新生民主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辑安不断续写的抗日续篇和辑安解放战争的序曲。

集安长达40多年的抗日斗争风云，是继辑安民众抗击沙俄侵略之后奏响的又一部爱国主义乐章，是辑安人民抵御外侮历史中闪光的一页。她讴歌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记录了人民大众在外敌入侵之时从日渐觉醒到勇敢抗争，到奋起自卫的历程。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史反击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缩影，是中国人民民族豪气的聚集。这一顶天立地的历史丰碑将流传万世，永远屹立于白山绿水间和集安大地上。

历 史 图 片



杨靖宇将军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
一军军长兼政委



魏拯民　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兼二军政委



王德泰　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二军军长

革命英烈



唐聚五　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王凤阁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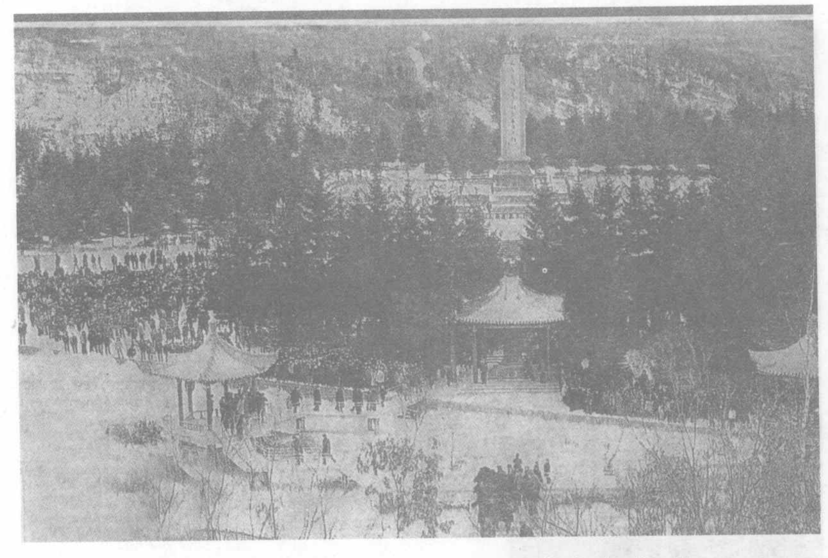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遗容



杨靖宇将军遗体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碑亭



各地群众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参观拜谒。



一九三七年秋魏拯民同志在秘密营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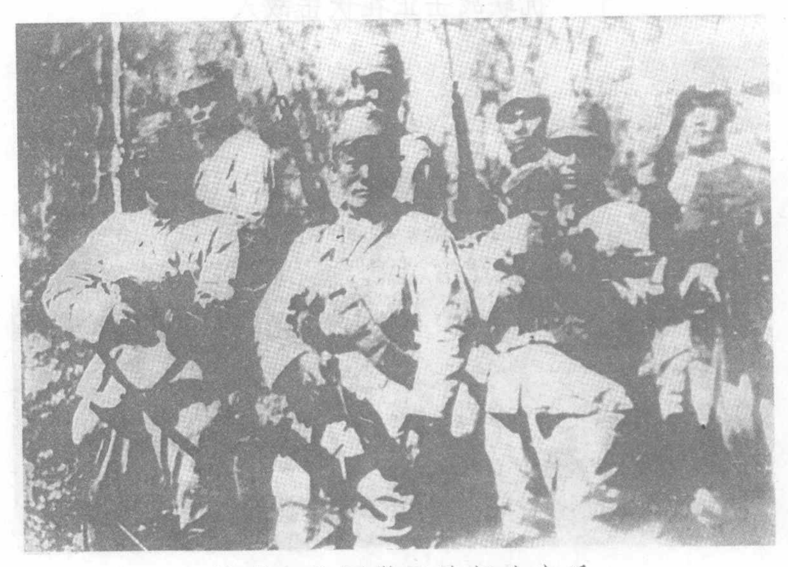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杨靖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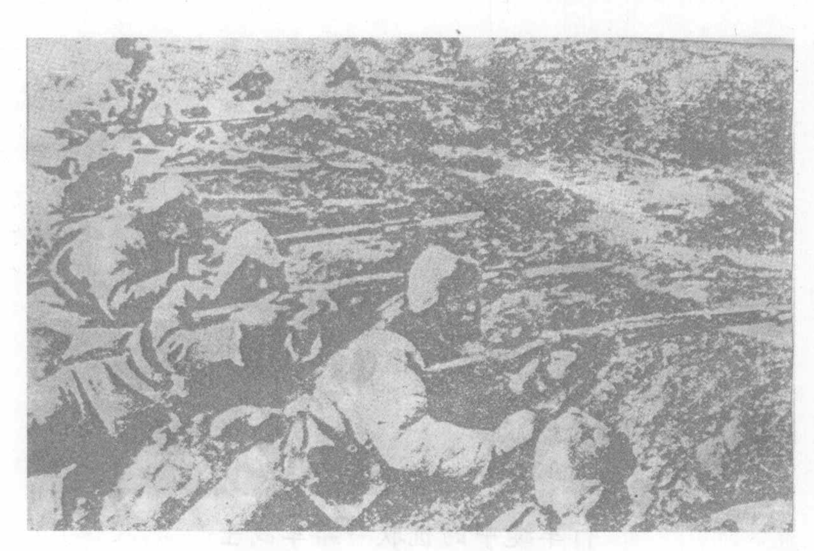
豪气长存



行军途中的抗联一路军战士



抗联一路军警卫旅部分官兵



抗联战士正在伏击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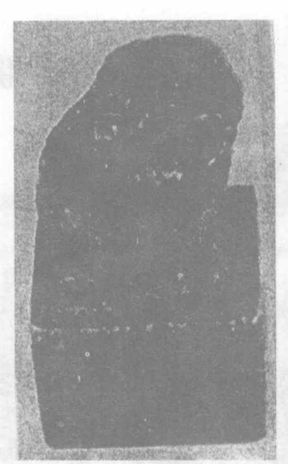
抗联骑兵整装待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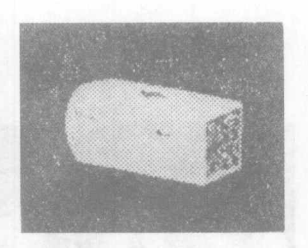


抗联教导旅指战员在苏联时野战演习合影



抗联一路军部分女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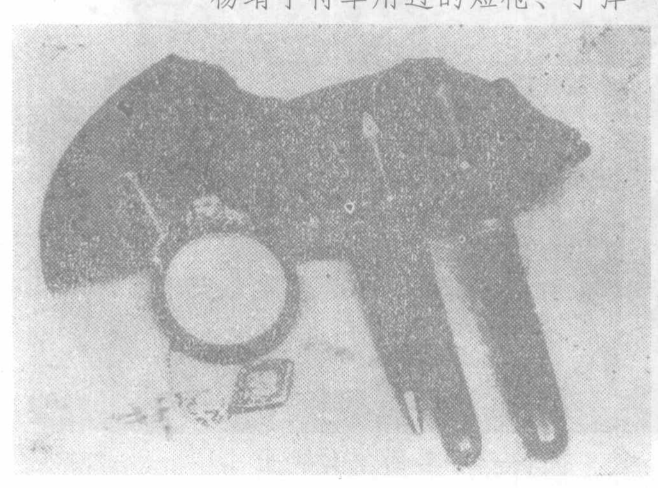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用过的印章、印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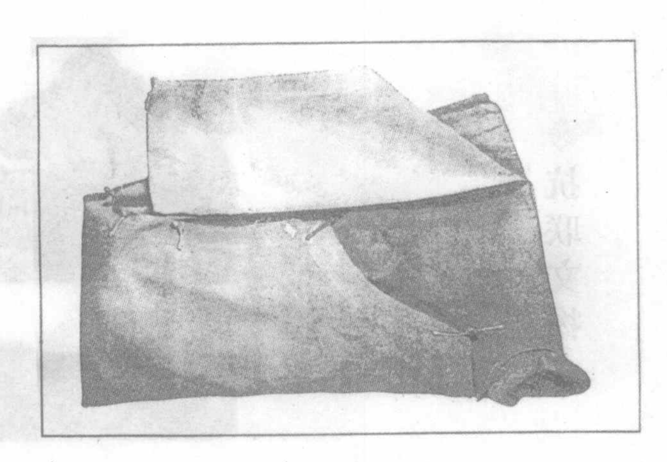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用过的短枪、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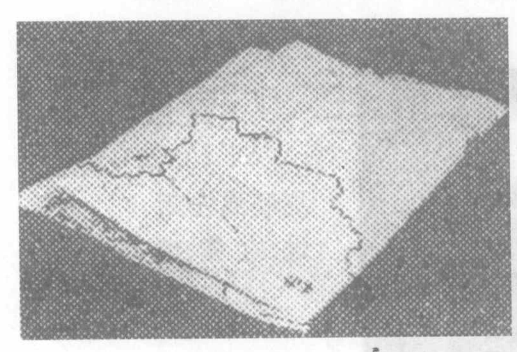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用过的闹钟、钢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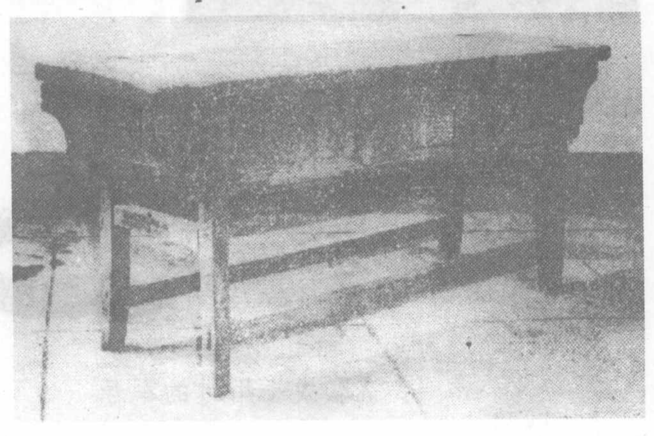
抗联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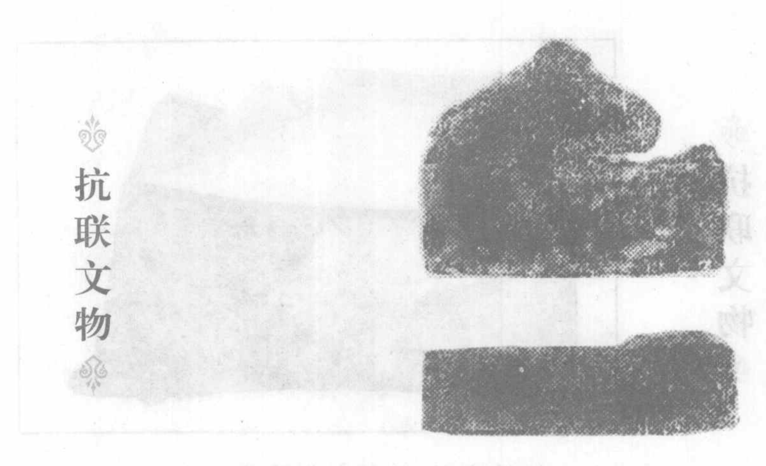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在哈尔滨穿的长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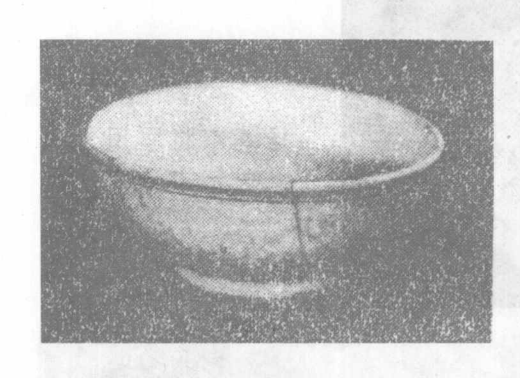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用过的军用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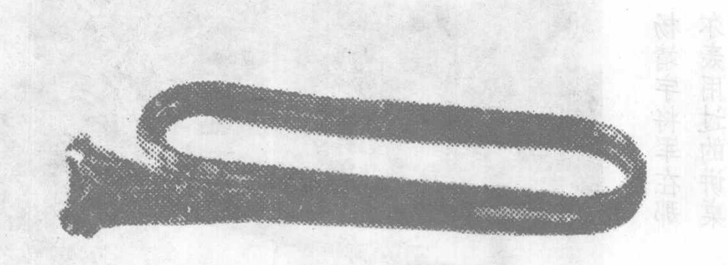
杨靖宇将军在那尔轰用过的讲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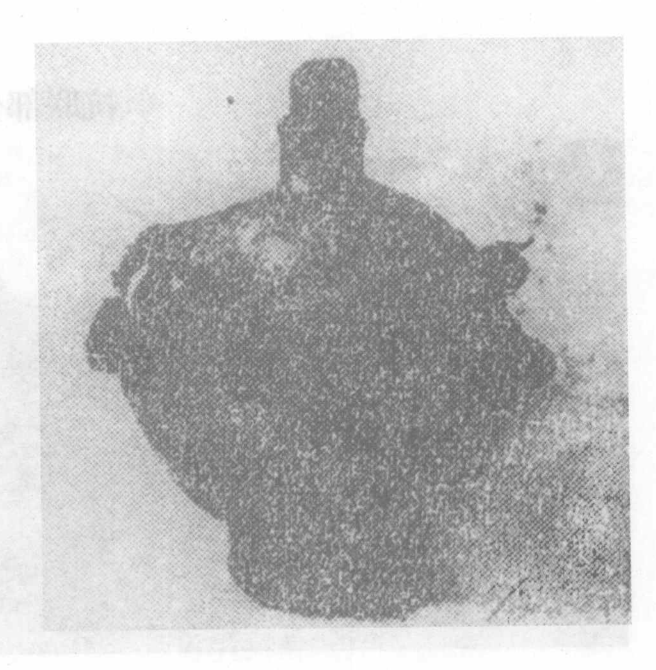
抗联战士用过的火镰、火镰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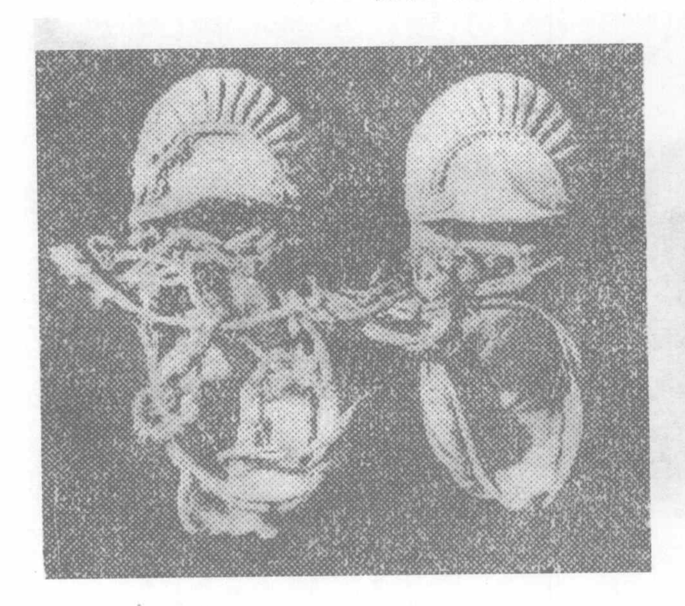
抗联战士用过的瓷碗



抗联战士用过的军号



抗联战士用过的油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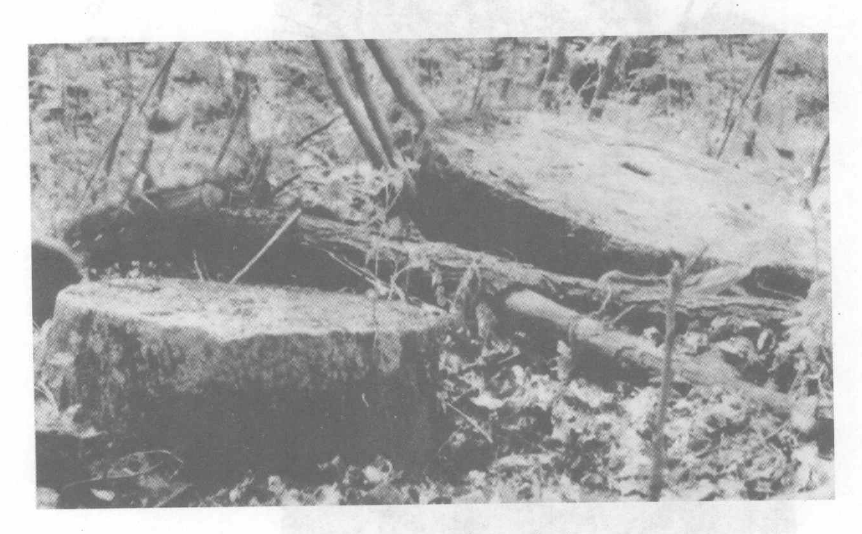
抗联战士穿过的靰鞡



老岭高干会议遗址



一路军司令部成立大会遗址



五女峰碾盘会议遗址



东岔根据地棋盘砣子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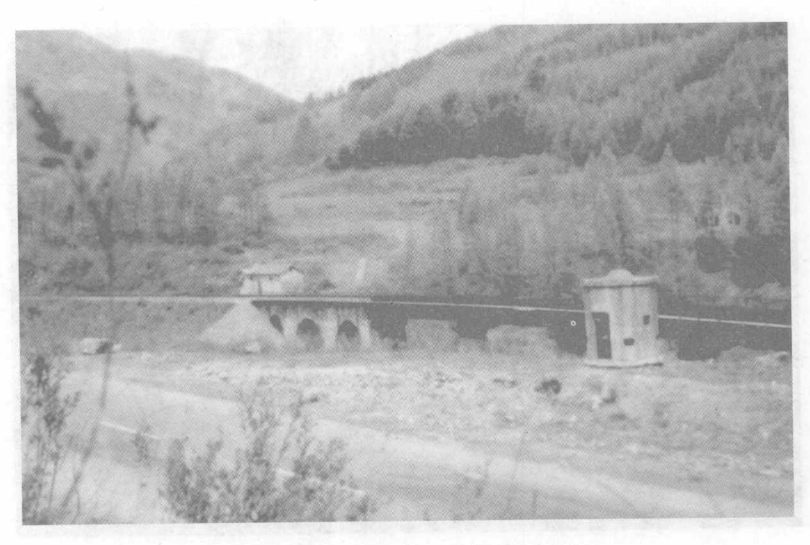
老岭根据地东岔密营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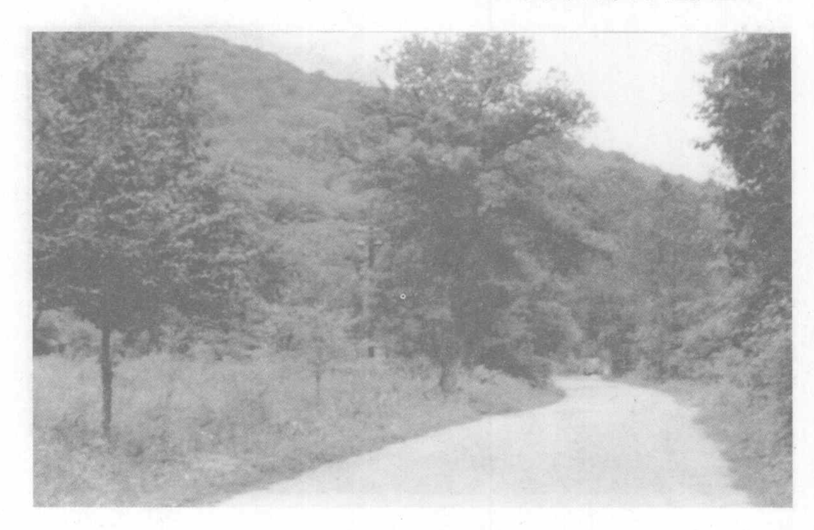
抗联一路军深山密营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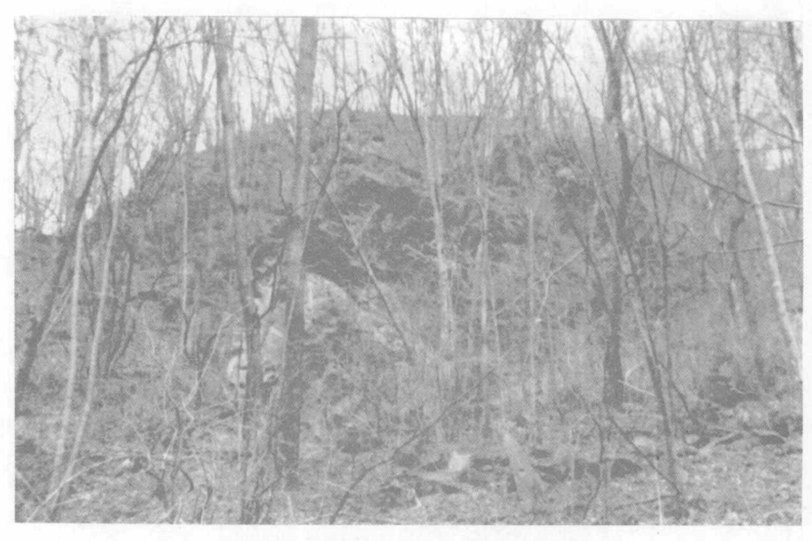
二道崴子战斗遗址



抗联夜袭阳岔工事区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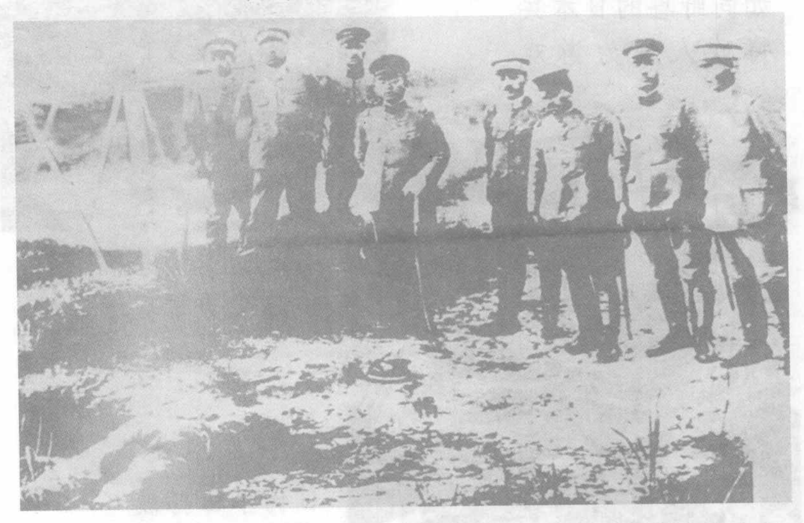
家什房战斗遗址



抗联红石砬子医院遗址



日伪军残忍刺杀抗日义勇军



日军强迫中国无辜百姓穿上日军军服，然后枪杀，以此作为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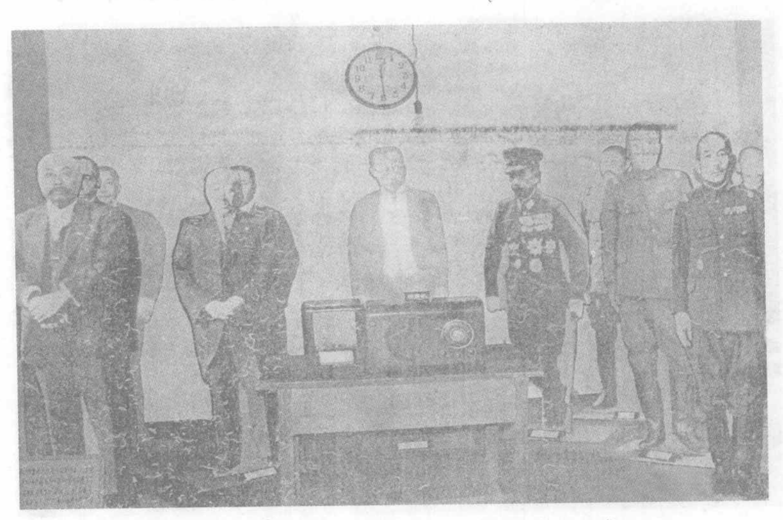


如同野兽的日本兵
将砍人视为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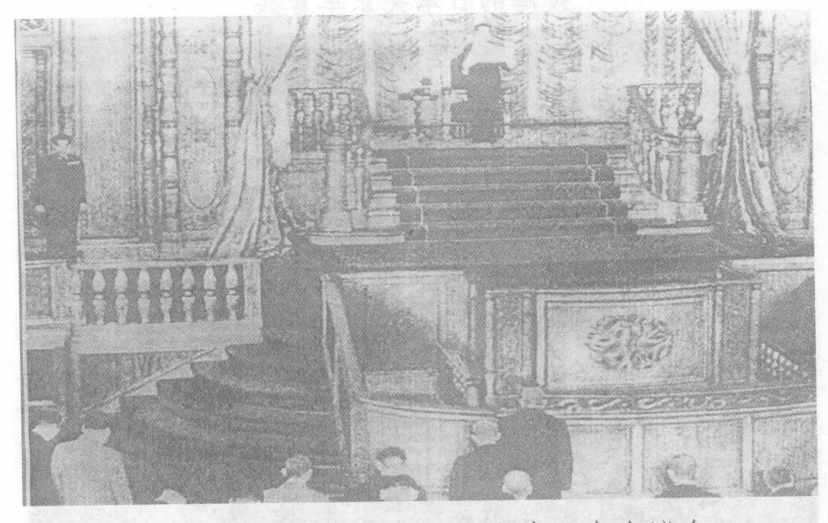


日伪军铡杀抗
日义勇军现场

日伪军毒打被
捕的抗日战士



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诏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向议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

❊ 日伪可耻下场 ❊



投降的日本关东军官兵



日本战犯在接受审判场景

欢庆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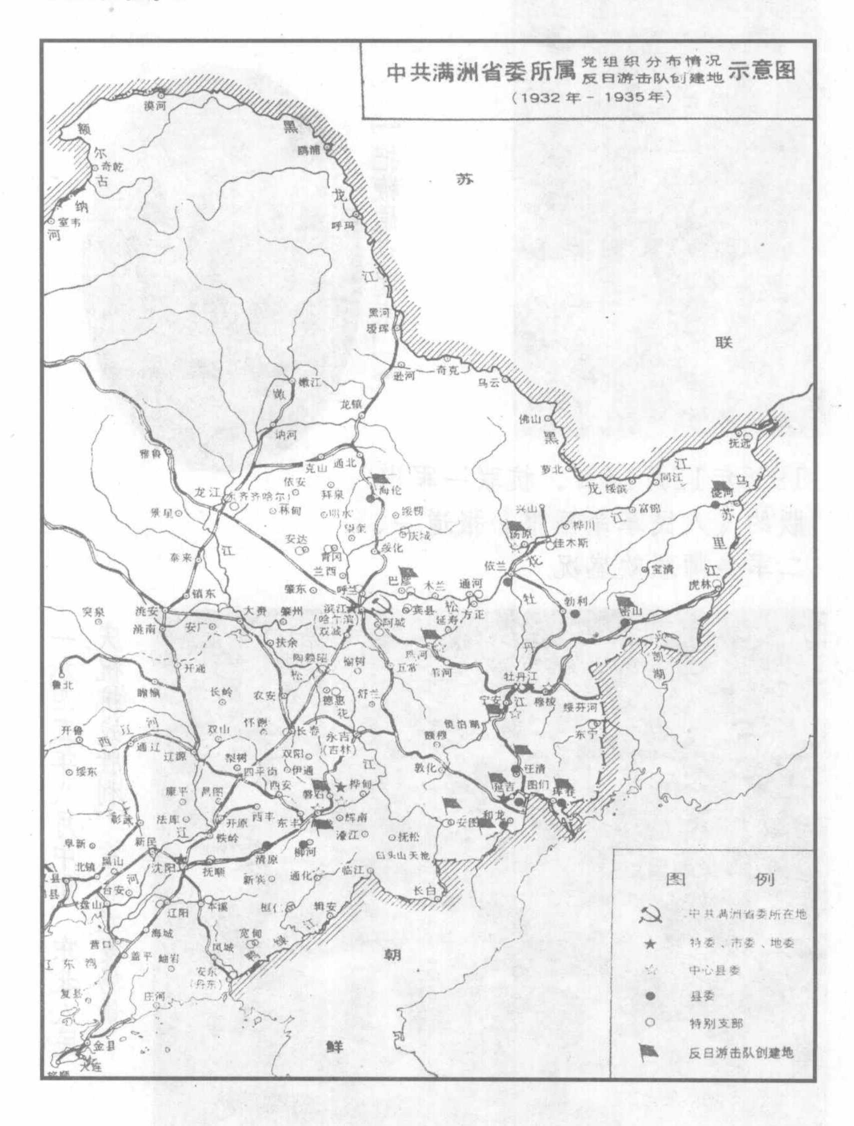
『把鞭炮点起来！』

1935年12月14日，抗联一军出版的《人民革命画报》报道一、二军会师联欢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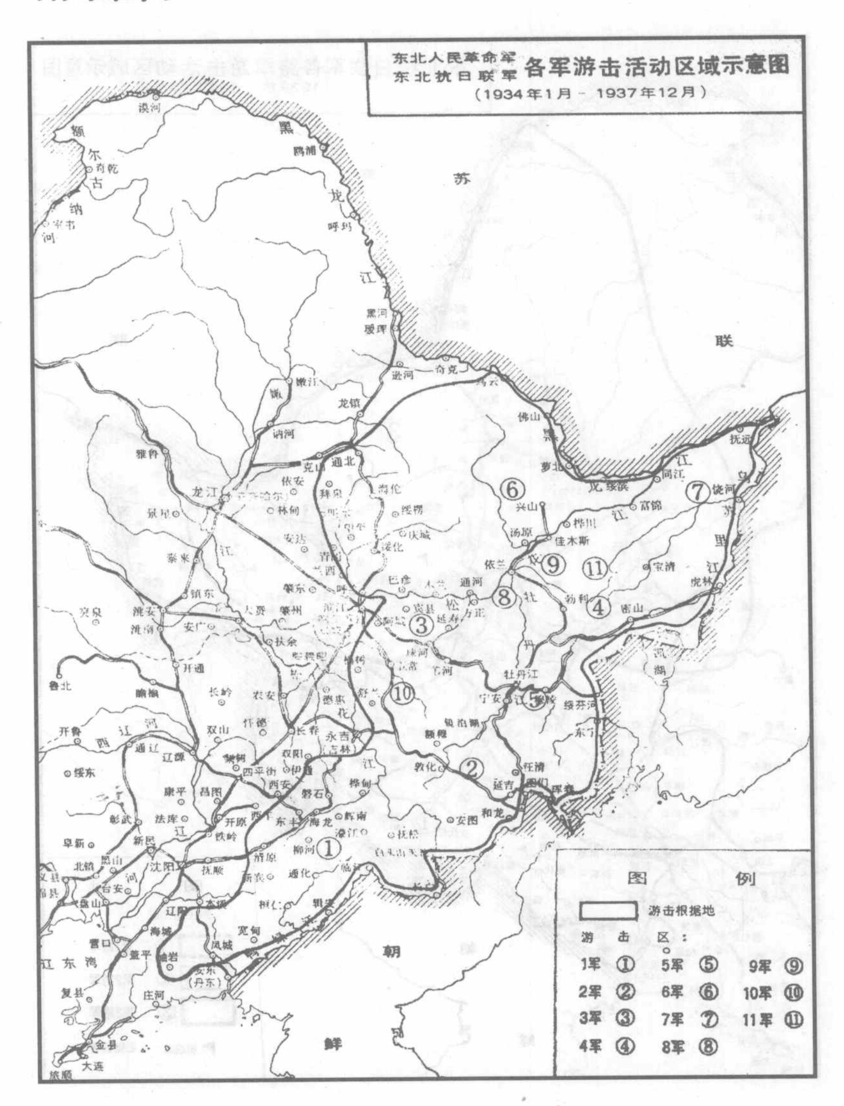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东北人民庆祝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场景。

附录图示



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组织分布情况
反日游击队创建地示意图
(1932年－1935年)
图例
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
特委、市委、地委
中心县委
县委
特别支部
反日游击队创建地

附录图示



东北人民革命军
东北抗日联军
各军游击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4年1月－1937年12月）
图例
游击根据地
游击区：
1军 ①
2军 ②
3军 ③
4军 ④
5军 ⑤
6军 ⑥
7军 ⑦
8军 ⑧
9军 ⑨
10军 ⑩
11军 ⑪
苏
联
朝
鲜

附录图示



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游击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8年－1942年）

图 例

游击活动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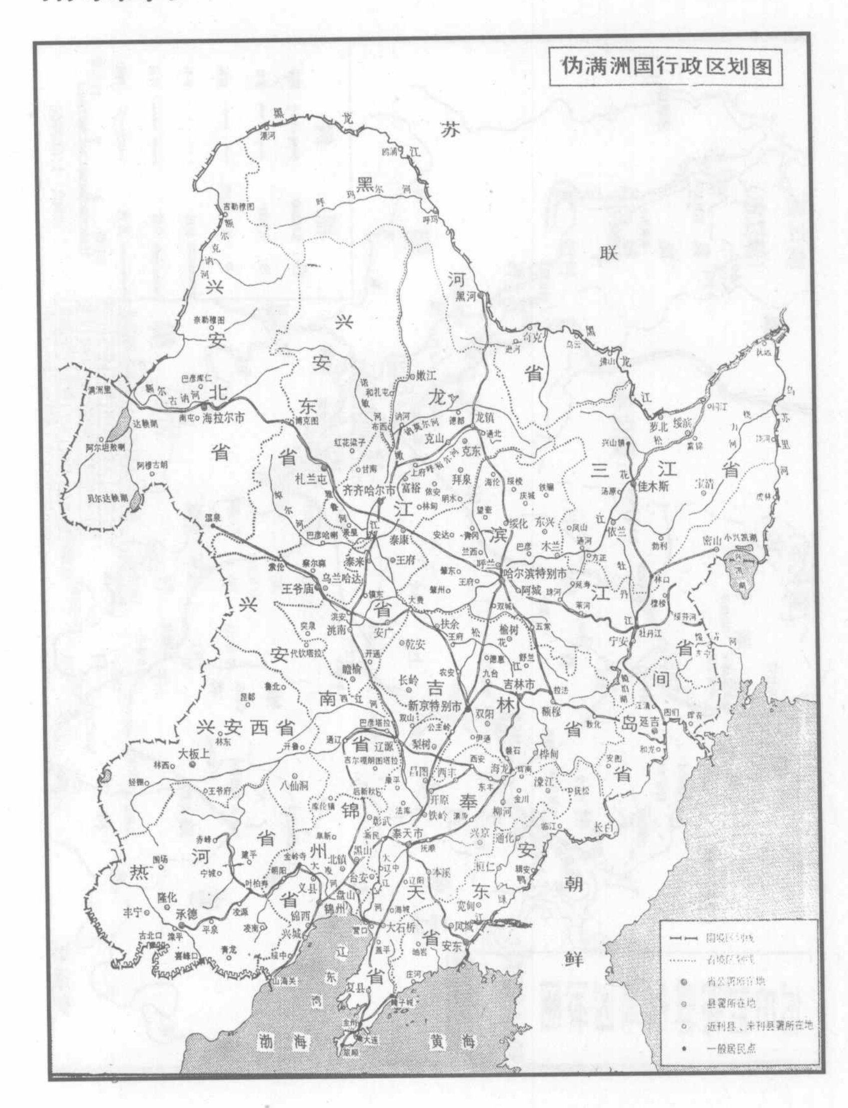
① 第1路军

② 第2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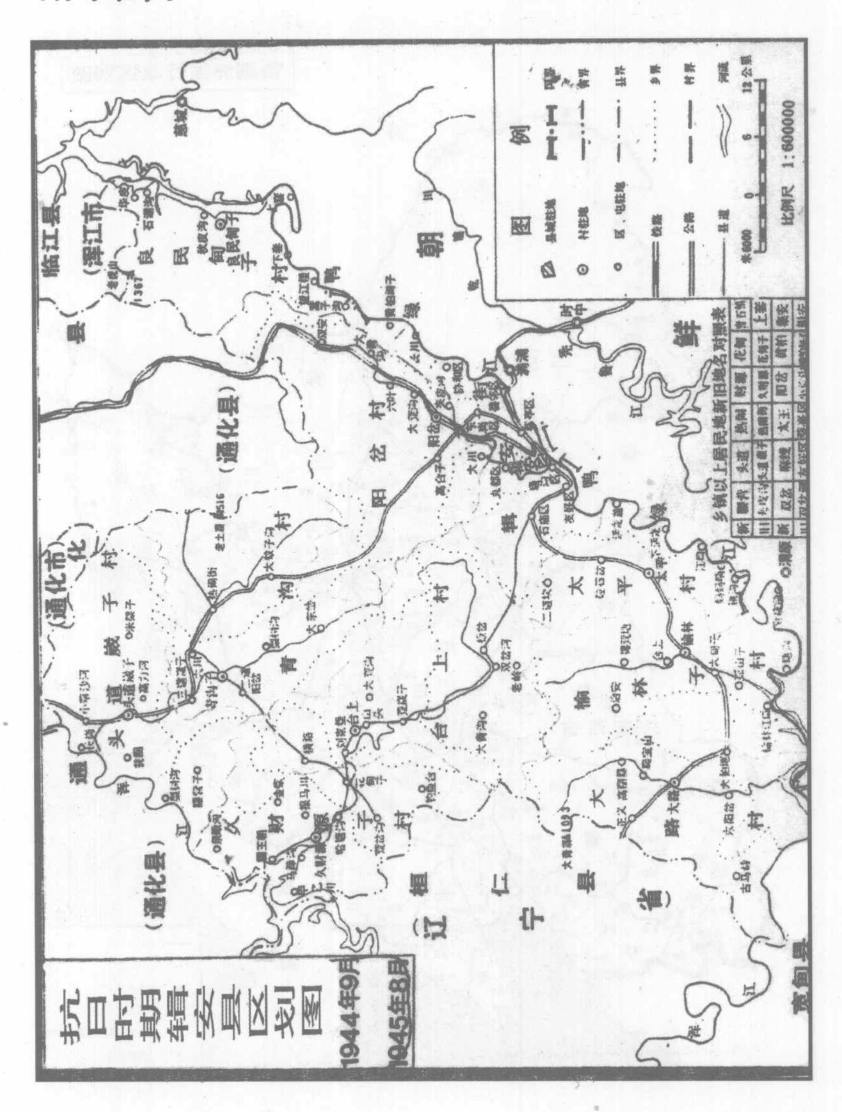
③ 第3路军

朝阳山 主要密营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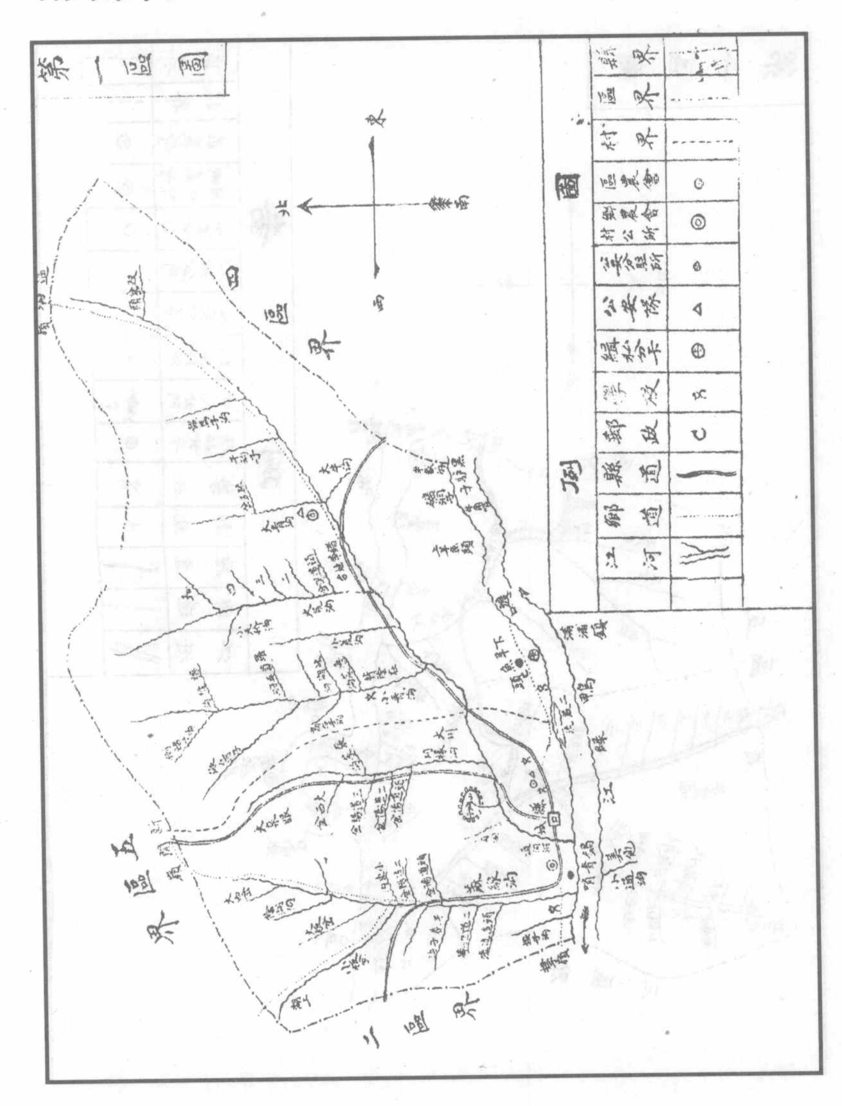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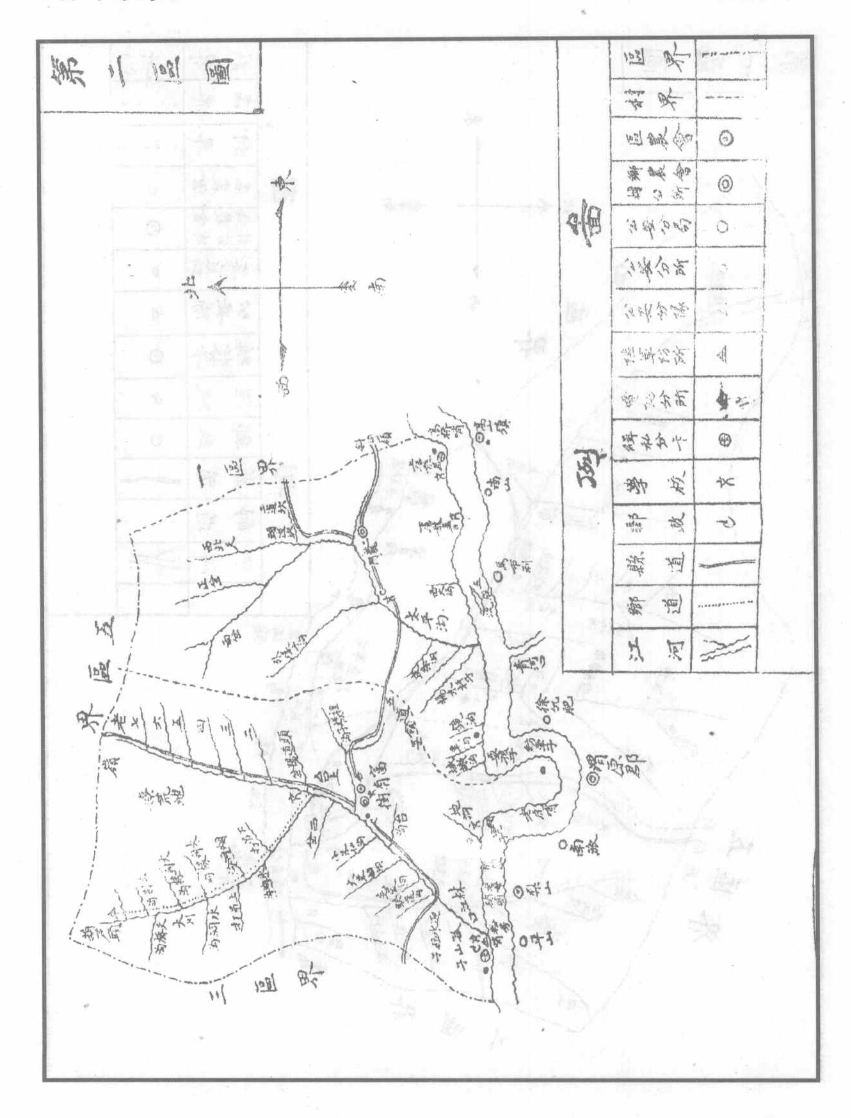


抗日时期辑安县区划图
1944年9月
1945年8月
临江县
（浑江市）
通化市
（通化县）
（通化县）
辽宁省
桓仁县
宽甸县
朝鲜
图例
比例尺 1:600000
乡镇以上居民地新旧地名对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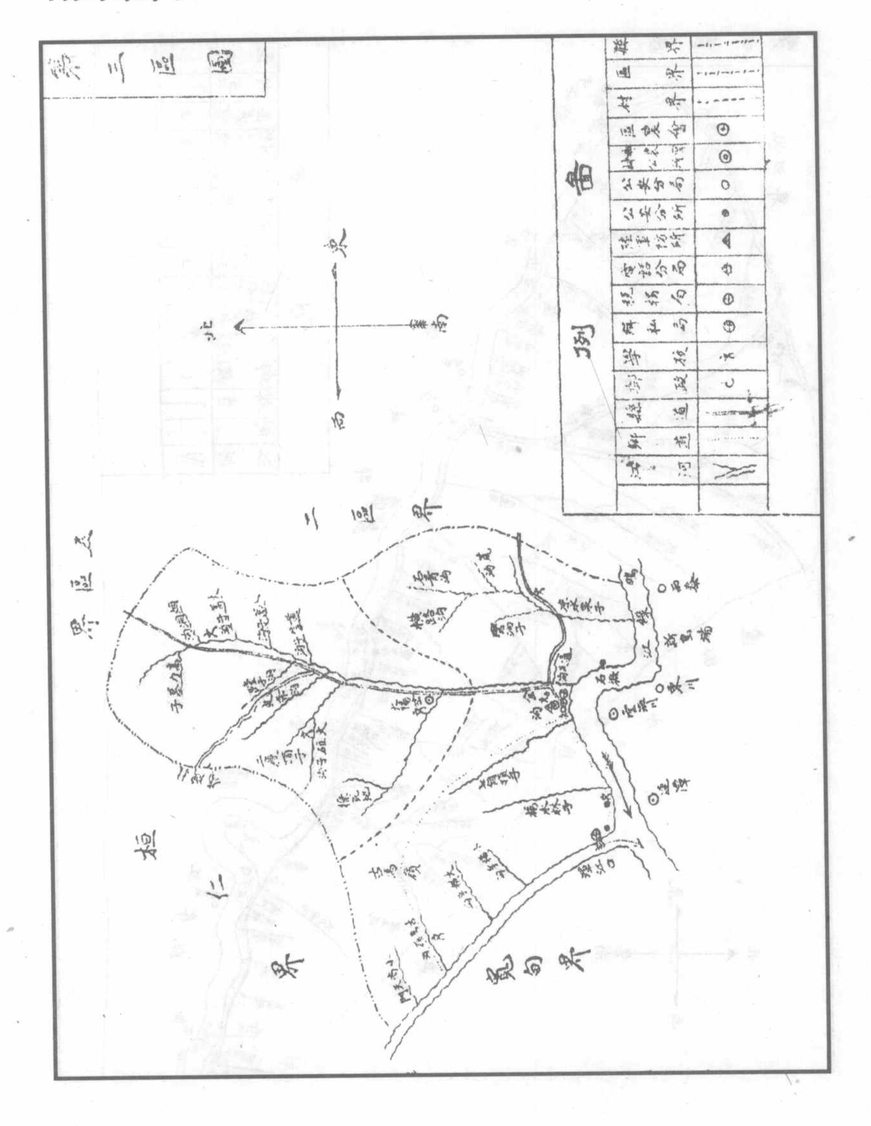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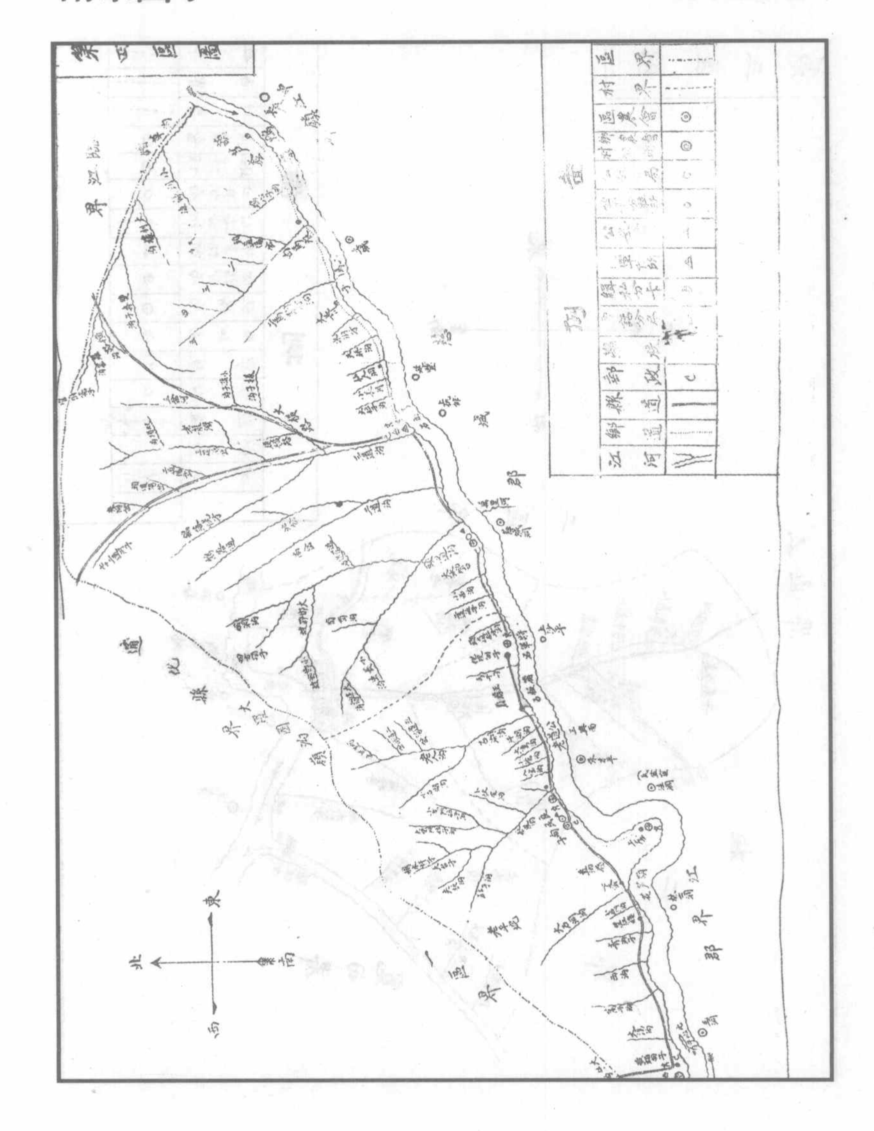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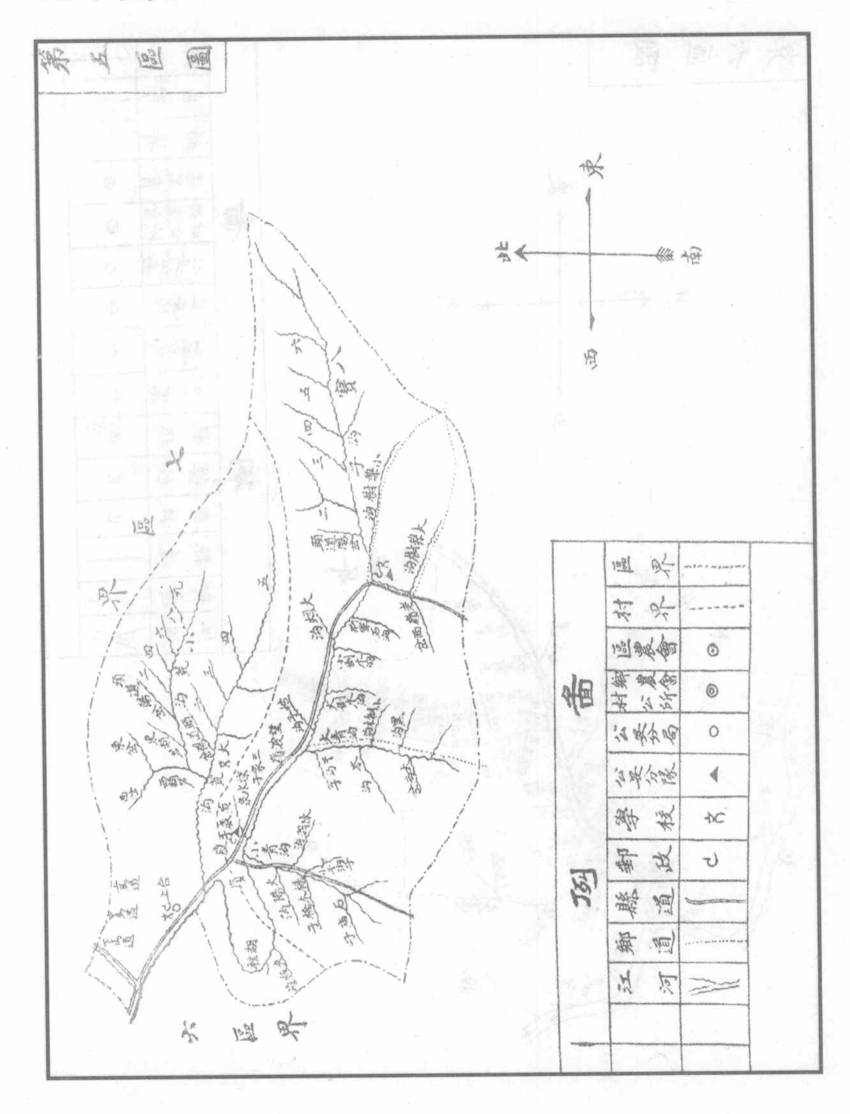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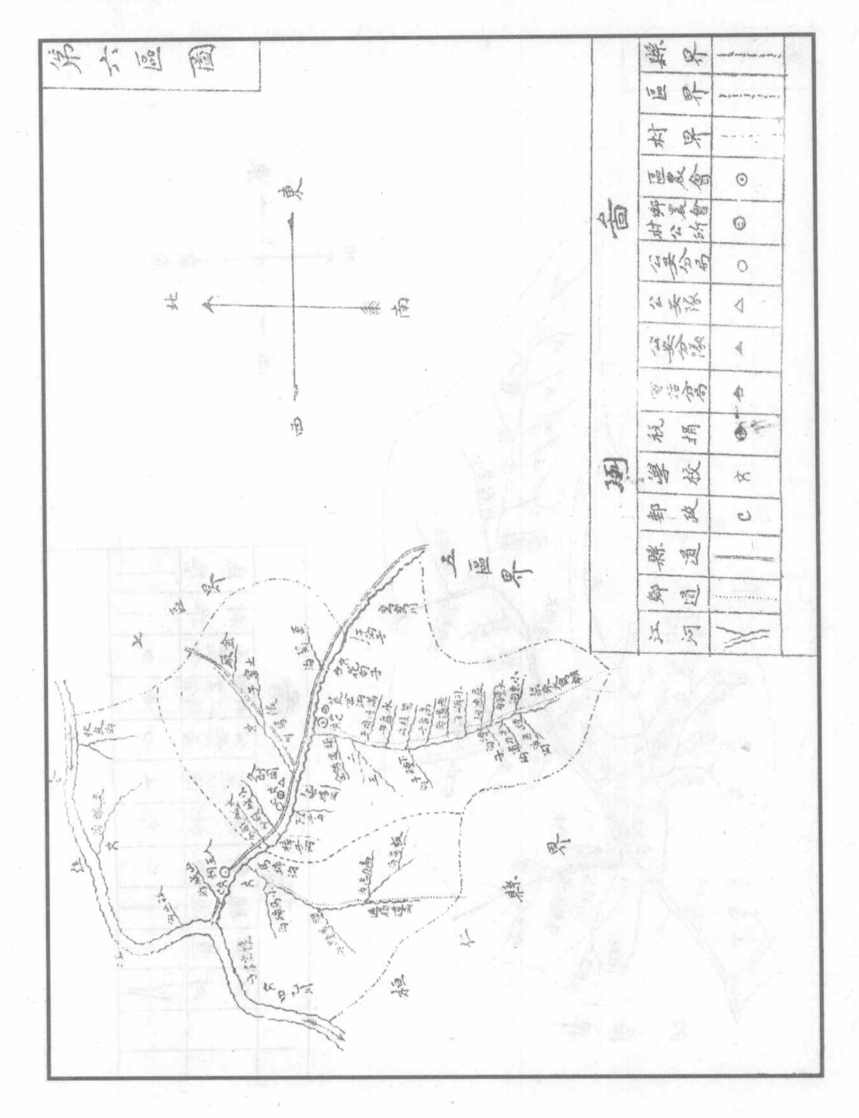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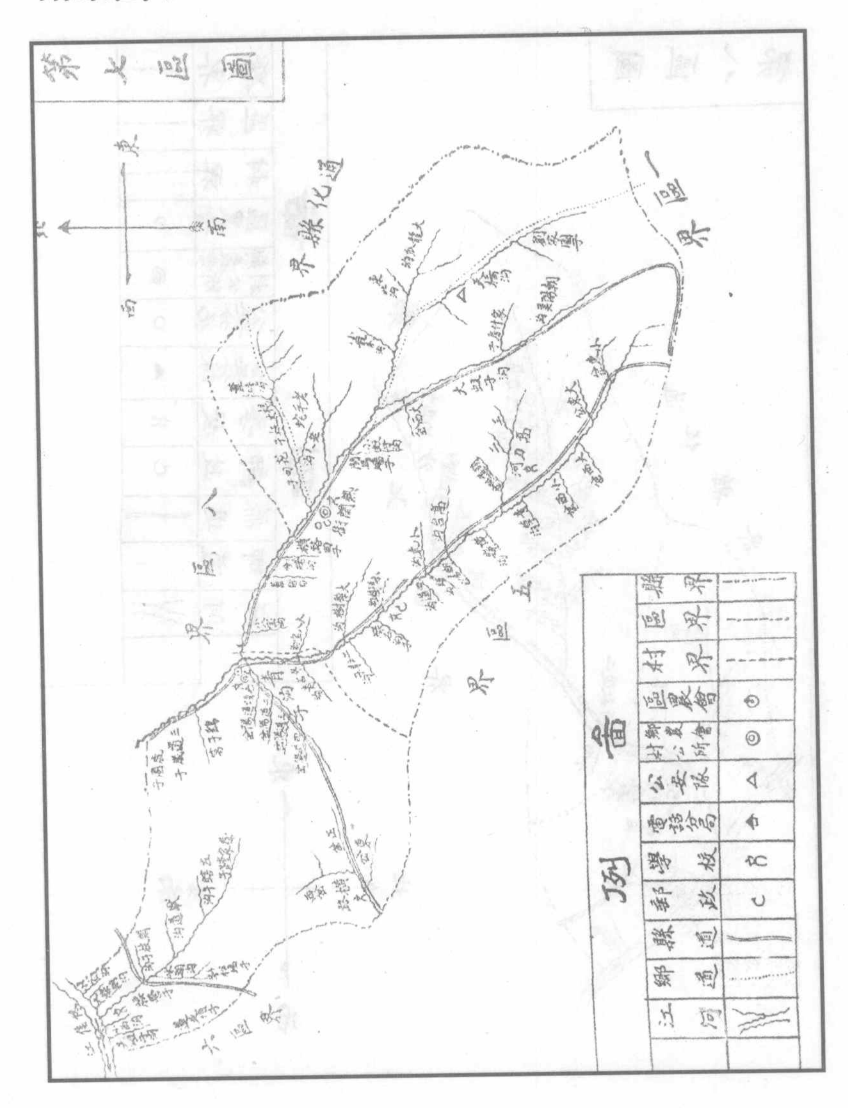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附录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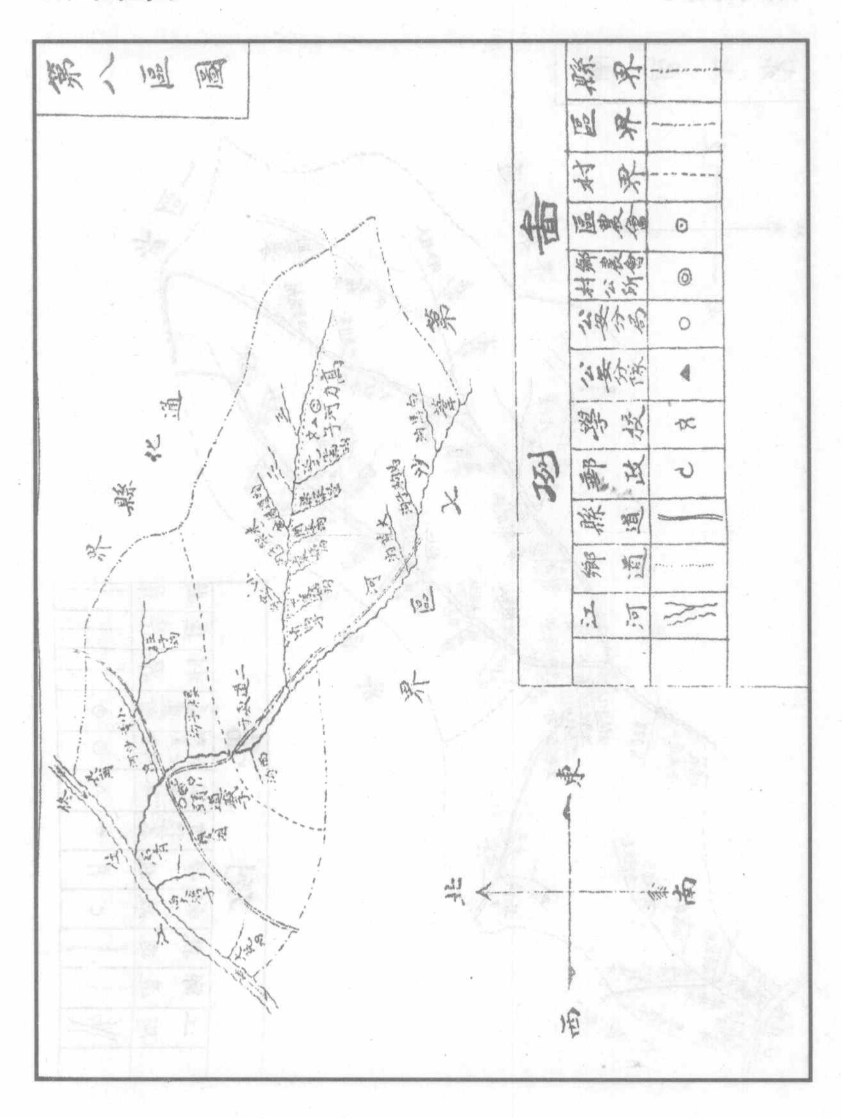


附录图示



第七區圖
北
東
南
西
通化縣界
一區界
八區界
五區界
六區界
圖例
江河
鄉道
縣道
郵政
學校
電話分局
公安隊
村鄉農會所
區農會
村界
區界
縣界

附录图示



“九·一八”事变前
日军掠夺与扰边事件

外岔沟事件

1905年5月上旬，俄兵侵占外岔沟门，侵朝日军由对岸越界，双方交战于外岔沟、皮条沟，俄军败退，日军侵占外岔沟门。

好太王碑事件

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日军联队长小泽德平，率队来辑安（今集安，下同），看到好太王碑如获之宝，要购买送日本博物院。当时县知事吴光国以“民产、官不能主”为由，没有应允，保护了珍贵文物。《商务外交公牍》1907年5月县知事在《上奉天提学使张小浦》一文中记载：“前以知事任辑安，正值日俄衅，军务旁午之际，木把扰攘之秋……。彼时日军五十七联队小泽德平统师临境，骤见扶馀古碑羡为奇货，屡次商购，拟陈日本博物院。知事官以民产，官不能主。似此笨重石件，搬运较难。小泽君曰兵轮重乎抑或石碑重乎？！兵轮沉入海底尚可起出，而此方碑兵力运载呼吸间耳。知事察其用意甚深，答以如爱以碑，仅可先送拓本数张，俟和局大定，访知物主，再行函达。旋以日军退后，盖恐复来取运。知事捐廉购存，为之筑亭保护，名曰‘悦来亭’。”

木植事件

中日木植公司与日本掠夺林木资源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中国东北被沙俄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更不甘

心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利益，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势力向中国东北渗透，企图参与对中国东北地区利益的瓜分。

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爆发。5 月，日军将俄军势力驱除朝鲜，并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日俄两军先后在辽阳、沙河、奉天一带作战，俄军节节败退。而在鸭绿江流域中段的辑安（今集安市）一带，日俄两军则以江为界相持。日军一方面不断袭夺在江中流放的木排，一方面组织日商为日军强号木排，为日军筹集木材，解决战时军需；同时也不断与俄军制造摩擦，袭击俄军和破坏沙俄在辑安一线的独占经济利益，从而引发了多起鸭绿江木植事件。

1905 年初，旅顺落入日军之手。5 月初，战火蔓延到辑安一线。侵朝日军偷渡鸭绿江，与沙俄驻在外岔沟（时为辑安县重要商埠）的军队大战，俄军败退，安东（今丹东）、辑安一线全部被日军划入势力范围。日军在安东设军政署司令部，在辑安外岔沟设兵站司令部，收购、收捞、劫夺木材，自此鸭绿江木植事件发生更为频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程度日趋严重。《最近东三省之说势》载："及日俄战后，日本在安东设置军政署，鸭绿江两岸木材，均以军用为名，强制征收。凡中国人买卖输出，不持军政署许可证，即以偷窃论，按军法从事，采木人不甘受此限制，及结合数千人，与日军格斗，地方官亦无可如何也……。"

对马海峡海战之后，日军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主动提出与沙俄讲和。1905 年 9 月 5 日，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的朴茨茅斯正式签署《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先权；将中国旅顺、大连及附属的领土、水域租借给日本，把长春到旅顺的铁路交给日本，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

1905 年 11 月 2 日，日本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公使内田康哉与清政府派出的军机大臣和硕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瞿鸿保、北洋大臣袁世凯谈判。日方不断施压，逼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给日本的利益。

1905 年 12 月 22 日，庆亲王奕訢等与日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等正式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该条约正约共 3 款，另有附款 12 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

给予日本的各项权利，允许开放东北 16 个城市为商埠；设立中日木植公司，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等等。这个条约的附约第 10 款中规定“设立中日木植公司，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至该地段广狭、年限多寡暨公司如何设立，并一切合办章程，应另立详细合同。”该款还冠冕堂皇地加了“总期中日股东利权均摊”一句，为日本的强盗行径盖上了一层遮羞布。

《条约》签订后，日本军队根本不顾及两国尚未就采伐鸭绿江右岸林木的具体区域、面积、年限以及公司如何设立、具体合办章程的制定等进行谈判的实际，即行抢先下手，组织承包商进入中国境内大肆砍伐。待正式确立允许采伐区域为帽儿山（临江，今白山市）至安东附近的十六道沟附近鸭绿江右岸 60 里内区域时，日军已将鸭绿江支流浑江沿岸的大批巨木良木采伐殆尽，抢先强行外运。

经谈判，中日于 1908 年在安东正式设立中日木植公司。这一公司，名为中日合办，但具体经营及利益分配等实权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国政府只能听命于人，地方政府更是无权过问。此后，大规模的林木采伐遍及鸭绿江右岸并深入到内地达 230 多里，部分地域深入内地近 300 里，远远超过了原定 60 里的允许界限。

1909 年后，由于大批木把逐渐受雇于木植公司，木植事件的起因逐渐由日本强行低价收购、劫夺，变为公司和包工头对木把劳动层层盘剥、虐待工人、蔑视生命而引起的反抗。

中日木植公司主持的毁灭性采伐到 1920 年前后达到了高潮。1929 年，鸭绿江右岸广大地域在此前 200 年的封禁期间形成的原始森林已被采伐尽绝。1930 年前后，各地的木植分公司相继缩小业务经营，部分公司停止业务。但日寇对鸭绿江右岸林木资源的掠夺并未停止。自 1931 年侵占东北后，又开始对这一区域的次生林进行了第二次梳伐，其中辑安县的次生林中较好的木材基本被掏空。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辑安全县仅有石湖沟山顶几百公顷的次生林残存下来。

（佟德才整理）

外岔沟日商强号木植

此事件发生在 1904 年 8 月。辑安县《乡土志》、《商务外交公牍》等书中记载了这次事件的始末。县知事吴光国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上奉天总督赵》呈文中说："……知事旋蒙调署辑安，于上年（1904 年）八月韩民勾串日商伊藤京重，带兵强号木植。木把骤聚四、五百人，绑获韩人六名，携访俄营，意欲假势扰韩。迨知事行抵该处，妥为调度，一面与日员、照会拿禁伊藤，一面派兵招回木把，将韩民分别责惩，解送韩官严办。并给资遣散木把，免再滋事，此韩人肇事了结之情形也……"。

关门砬子事件

此案发生于 1905 年 8 月。据辑安《商务外交公牍》记载：县知事吴光国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上奉天总督赵》文中称："……知事于七月十六日酉刻据总巡王懋忠差人送信，在鸭绿江有人看见木把乘坐木排四张，携带军器顺流下驶等情。知事即面告来差，速回禀知派队弹压，一面饬追赴沿江各保探报。去后，兹于十七日距城西六十里之致和保乡约刘钦材禀称，前奉派勇弹压，地面闻木把四十余名携带军装，昨夜二更时分乘坐木排四张潜渡融和保地方去讫，闻与号木日本接仗，枪毙日人五、六名，获住华人四名，木把受伤四名，此悉大概情形，禀报前来。知事即派官兵哨官张联瀛酌带步兵，前往该保极力弹压，并令查明情形飞速回报。去后又于亥刻据融和保乡飞禀，窃于今日黎明时，忽闻榆树林子江口四里余之老母猪圈（关门砬子）地方枪声不止，派勇探知，木把聚二百余人潜渡该处，与号木日兵接仗。日人有割断缆绳下驶之船，不知去向。抛下艚船二只，物件搜掠已空，木把亦即奔斜沟岭来矣。两造均有受伤，遗下船户丁把头大腿受伤，现抬店中医治伤情。知事查此案，日员强号木植，木把纠众抗拒已分三次禀报在案。并照会日员速行加价商买以息众愤，而该日员不谙民情，置要言于不理，

仍在江中号木下放，逗留距城百里之凉水泉子，巡队骤不及防，以致酿成巨案。惟有一面调齐警察卫勇防守封狱，一面派局长史富春星夜与王总巡懋忠商令酌带弁兵，并饬亲兵巡长崔尧唐随同前去相机剿拿。将肇祸木把并绑去之人、军装、子弹一并交出，余众暂候禀。此叠据乡约禀报后即行布置，以免结党别滋事端之情形也。……”又据知事《上奉天总督赵》一文，可见此次事件的始末。该文说：“……知事于十八日已刻据派出亲兵队哨兵崔尧唐、警察局局长史富春等禀称，奉谕遵即随同总巡督饬兵勇星夜驰赴麻线沟门设卡截拿。约至五更时分，实于木把八、九十人，随带绑人，各持枪械蜂涌而来，随督饬所部迎头痛击，木把亦放枪拒敌，彼此攻打情势危急，木把窜入山林，星分逃逸。击获被绑船户五名，内有通词一名。追剿木把无踪，时在昏夜，不克穷追，理合将击获纪通词、船户等五名一并送案。……当经知事提案鞫讯，据通词纪元茂供称，伊受雇日人，听从大仓洋行，管事加贺美勾串日人擅号木植，致被木把击伤。日人有凫水而逃，有被枪伤身死共有七人，搜去银元等财物，余人逃散。伊与船夥四人均被木把打伤绑带逃走，中途兵救回等语。……”此案经照会日本驻扎我岔沟兵站司令部，行山义一、土井三郎来函，：“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清国辑安县辖地关门砬子忽来暴徒，暗地袭击，惨杀将士数名。其责任在于地方官及巡捕队，两司不能弹压致起别端。从今日为定期，尔两司八天为限，务将暴徒尽数提来一正军法。设若限期不能提来，即由辑安辖地暴徒居处及暴行处，罚金五千元，徵交本兵站司令部……。”日方照会后，县知事《上奉天总督赵》文中说：“知事于八月十日具禀木把纠众起衅后，客军压境，商民求安，缴款议结一案，……知事昨与日员司令部认缴赔款五千元。办结情形应否咨行外务部存案。……”

羊鱼头事件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辑安《商务外交公牍》中县知事《上奉天总督赵》一文，记载了这个事件的始末。该文说：“三月二十七日据县属蕴和保乡约钟万铭面称，羊鱼头一带地方，木工聚众五、

六百人，执持快枪，势欲与日本军用木材厂寻衅等情。当即饬令该约飞速劝阻。去后，又据木材厂日本通译官一重太郎告知前情，日军访确实情，即去调綮军队，并请给护照，以便行路。察其情势慌张，知事即于二十八日力疾单骑至下羊鱼头，谒晤木材厂员退役中佐花坂圆磋商一切。如木植必须军用，尚宜公道给值，免致木工争命。设或强制，则于邦交治安两有窒碍。商议两时之久，彼以小岛大佐在安东木厂出有告示，即系军命不能更改。从权商加运费、每块杂字木料加给一元一角。本字本号仍照一半，军用一半，木主自卖价中十分尚须付给税金一分。再三辩驳置之不理。揆之木工情形势不两立。而知事身任地方，既不敢失睦邻邦，又不忍压制木工，进退两难，计无所出，伏思以上情形前已禀明在案。未奉批示，尤难主意。惟查东三省中日条约第十款允许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另有详细合同，中日股东利权均摊等因。即此，与日员花坂商议，答以将来买卖之，据非我所言军用可比云云。现在知事冒险渡鸭绿江上羊鱼头地方，传见木工会首，所询各情相符。而沿江一带商民恐骇异常，一面出示安民，派兵弹压，一面宣讲时事劝学及国民捐款各报章，与木工人等共听，使知国家艰难，切勿愚鲁酿衅，为患地方。讲毕后，谕饬木工先行解散胁从，然后为之设法办理。木工均愿具情，恳即飞呈帅座迅赐批示。……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四月十四日，县知事照会日本驻羊鱼头木材厂伊藤：“为照会事，前以贵厂占住民房，强用杂木，势恐木工寻衅，已履次劝阻。并上报于奉天将军赵批示，电由安东军政军高山公复称，并无强买木材，妨害流下等事，已将前情照会在案。于十二、三两日贵执事来署面称，韩界自做林筏及杂木三、五日内流下安东县。敝县告知以一月期内听候。奉天将军、贵国军政官命令，韩境杂木究竟如何办理再为照议。贵执事以韩境杂木不应县属干预。查所议韩界本字木筏准其流下外，惟杂字散木现在韩境者，皆为敝国木商私产，不得以强力流下扰我治安。且县官有检查之责任，木筏过境理应提验，分别流止。应请贵厂从长计议，以敦邦交。”又在《上东边道张》文中称：“……前以日本军用木厂张贴告示，强号杂木，属界上羊鱼头一带，木工聚众抗拒势将为难一案，禀奉派员亲临查办，并木材厂派遣员陆军工兵少佐大崎偕同察看各等

因，委员徐鼐奉扎后，于上月十九日束装，二十七日抵到辑安，晤见吴令，先行熟商办法。二十八日大崎少佐与宪兵均到，应将木工连年苦况情形详细辩驳竭力磋商。当荷大崎公慨许，两江杂木概行退还。惟韩境亦有韩人自做之木，即就韩境积存杂木中提给三千件，以示体恤。本字木植酌定，军用十分之三，虽较原定减去二成，究属群情不服。随于二十九日知事等渡江亲至上羊鱼，一面弹压开导，而木工等以地险、人众、晓时不止，再三譬劝，使允先将杂字号放流运下。韩境之木，以韩人做木人少，不应擅给三千件，众势汹汹。决令韩人出价，日军以为格外宽容，不能再改，几欲决裂。知事身任地方，端在治安与木工剀切商定，每件以贱价卖给，众情始解。随应按件由知事酌定洋五角，计三千件需洋银一千五百元，许为代给。一面商请日军给予执照，协同木工在韩界分别认运安东自售。按百件准予军用三十件，酌给价值。所有本字木植一俟运处木工集议，可否半月后前往安东。至日军定章旗帜原因，保护起见，如木工不愿认领，听其自便。以上情形于初二日与木商人等议妥后，会衔出示办理。一面令各木工均即散归，不得复行纠众……。”

由于丧权辱国的清王朝，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对内残酷镇压，引起人民越来越反抗。而地方官宪为维护朝廷的统治，也只为安抚民众，不要粗鲁滋事，或秉承上司旨意办理。正象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四月初一日《辑安县知事吴光国临时白话解劝稿》说的：“尔等砍木头的人，原来是上古时代留名的工艺人。左传上载说，山有木，工则度之。子夏云，百工居肆以成其市。孟子曰，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矣。替你们想起来，士农工商中，派着一行文明的称呼，也能与举人翰林做官的，一样赞美，这不是极体面的人么！为什么不做文明的思想，与古时候名人争一口气？因什么一点儿小事，便要打架饶舌？如今你们，因日本军官兵号木军用，聚众六、七百人，便要械斗，这是粗鲁的运动。自己想想，对得起那称呼么？你们往后，一举一动，总要留点儿名分。替朝廷想一想，我一生吃喝穿戴，那儿来的钱？砍的木头不是国家江山出的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不是国家的余利么！不说报效罢了，你要闹起事来，不是国家的事么！你们跑了，国家能不管么！总要劝说大伙儿，千万不要粗鲁滋事。守分听命，忍耐着，思自强，

学文明，多识字，人人劝学，人人知耻，可就没有人欺了，可就无人说我野蛮了。那时候我们称雄世界，到哪儿没有人敬服？这话你说是不是？木商大众，替我想想前几年因你们木工，借领东本，那儿这么容易？在山中伐木，冬天风雪寒冷，斧声叮叮。夏天江水暴涨，号地呼天，水声汩汩，散了木排，比我自己的钱还痛切。所以在临江县任上，每遇着连阴，浑江、鸭绿江发水，便出告示，禁止人民捞木。严禁高丽穷民，毁损材料。照会高丽国边界各官，准你们认领。高丽兵民，不能渔利，因此怀恨在心。那二十九年高丽兵队，在临江县十八道沟一带，烧毁我们的男女房产，不胜其数。彼时我本官，痛恨心肠，更不能堪。后来结局，议定赔我民人，性命房产各款。设计四次，擒住祸首徐庆发，供出事因木工，我想彼胡匪，能替你们争气出力？三十年我来辑安任上，因外岔沟日本商人，伊藤京重，带领韩人六名，插旗号木。那时候本官拿办韩人，每名责笞五百。一面照会安东军政衙门，拘禁日人伊藤；一面谕令木排积留江岸，外人不能轻取。此不待我说，你们都知道的吓！彼时本官料得日本，如要打胜了俄国，必有假势报复前仇的人，所以予先去安东一遭，与日本官员联络，免得临时吃亏。回来取道鸭绿江，路错冰陷，几乎一命，付之波臣，幸而不死，所以能于上年，为尔等据理力争。关门砬子的衅争，打死那么些人，赔款五千元，能彀和平了结。尔等不想想，我本官为你们受劳苦，为你们任艰险，因什么如此？因什么保护？一系尔等皆系良民，为国家纳税；一系时势艰难，恐你们吃亏，苦而无告，难以谋生。本官不怕死，不爱钱。经纬商民，私心已尽，惟尔等顾全大局。我之劳苦，不算什么。常以我爱尔等之心，爱我。再不可为地方滋事，不可惹出国家奇祸，这就是良民，这就是良民吓。不求你们报答，只望你们安分。良心吓，守分吓。你们受屈的事情，我能替你们争理吓！且听着，且候着，你们真要闹事吓，这就财命没有了。”

边境事件

日人强设辑安警察所

据《东北年鉴》记载，民国七年，日人侵犯我国行政权各案："日人在内地设警察，日本附属地原与租界性质不同，其行政权应归我有，……乃日本于日俄战后，承俄之既得权利，于附属地带，添设日警，本无法律上依据嗣后得寸进尺，于占用地外，即省城与各县亦设置派出所若干处，迭经交涉，迄无结果，兹将现有日本警所地方，另表列出，借观日人侵犯之实况。"

据日本警所一览表记载：辑安于民国 7 年设立警所一个，设警士 2 人。

日人强设辑安自治会

据奉天省公署 1802 号卷《辑安县呈报日人在县境设立自治会管理侨居韩民等情形》附《自治会设立主旨及规约》称："兴京厅辑安县为呈报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二月初六日案，据卑县南路巡警董段书田呈称，为呈报事，窃有日员关谷俊介者，系日本关东总督府陆军通译官，前当日俄交锋时，驻防辑安，后因该队奉调他移，关谷曾经告假游历，如此现查在本城。关帝庙东廓 3 间拟设立自治会，并管理韩民涉讼等事，卑局以其事关日员设会，未敢隐匿，理合将自治会主旨规约照录清册，具交呈报，查该须至呈者，计呈送自治会规约清册一本等情前来，据此查该日员所设自治会，系为管理此间侨居韩民涉讼等事，惟卑县并非通商之处，能否听其照办理合据情呈报。"其自治会《主旨》中称："……今计移位于鸭绿江沿岸之同胞，其数约有 6 万之众，……然终不能自立者，以上无我政府之保护援助下，无我同胞之一致协力，遂无秩序无势

力，……无自卫之途……”并在其拟定的《规约》第三规定：“本会会员居住清国内以韩国人组织之。”其目的就是行使领事馆的权利，管理韩民涉讼等事。又据奉天省公署 187 号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六月初一日，署知县朱淑薪根据奉天行省总督徐、巡抚唐的指令，警局立告关谷俊介等，迅即出境。如不听从，即按照中日通商条约第六条所载，无执照进地者罚办专条办理。去后旋据该警局覆称该日人关谷俊介等，明知违约，理屈词穷，允于日内出境，现于五月二十日带同行装全行搬往鸭绿江韩国松山城去讫。……”

日方越境搜捕独立党

据辽宁省政府 187 号卷《辑安县政府呈辽宁省政府呈为具报鲜人李东秀勾结不逞鲜人扰乱我方情形并请通辑以遏乱萌》：“案据第一组搜查队队长王镜波呈称，案查前车钧令前往各处搜查不逞鲜人，队长遂即带队前往搜查，行至三区古马岭地方，有朝侨十长金东承报称，前充古马岭之百家长李东秀原系独立，后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 年）二月间有日人福岛二一来此搜剿独立，收李东秀投降，彼此结为密约。是年十一月间，李东秀即勾引韩岸不逞之鲜人于寅夜之间，将古马岭商号“吉恒利”抢劫，并将该号赵执事及柜伙二人一并枪毙，携脏逃过韩岸，现居楚山郡（朝鲜）。其部下有不逞之徒二十余名，均系福岛供给专以扰乱我方，其福岛现居辽宁日本领事馆。今于本年古历七月十八日暮时分，突来队长权东勋一名系李东秀之部属，其率朝鲜人七名均佩带武装，携带匣枪二个、八音子六个，黄色衣服黄军帽红带，年约三十左右，将民殴打不堪，并罚小洋二百余元，因无钱立有字据并有保人为证。并有凉水泉子倒须沟门于家铺于古历七月二十日亦该韩匪抢劫，刻间该队已往宽甸界内扰乱各等语，当即取具切结覆……。”

黄柏船夫事件

中华民国六年（1917 年）八月，朝鲜玉洞宪兵驻在所的日本宪兵两名，过江到黄柏甸子衅事，被我船夫杀死。事件发生后，楚山、渭源、江源、厚昌各郡的宪兵和守备队扬言血洗黄柏甸子。出动 400 多人，全副武装越境开赴黄柏甸子。当地警察立即向县警察局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县警察局派人前往黄柏甸子，将守备队请到县里，住在关帝庙内，纠缠三个多月守备队才撤回朝鲜，此案不了了之。

隋殿德事件

据《东北年鉴》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 年）一月三十日午后三时，辑安县良民村隋殿德赶爬犁在我岸江道下行，突来日警一名，继又来二名，向该民开枪，隋殿德中弹，立即身死。朝鲜、日本巡察已违约章，无故杀人，尤属凶暴。迭经安东交涉员提出交涉，但无结果，成为悬案。"

朱仙沟事件

据《东北年鉴》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 年）一月九日夜十一时，日本巡警五、六十人，全副武装，由韩境潜入辑安属朱仙沟附近，枪杀韩人一名，又无端开枪乱射，将甲民褚德胜、甲丁刘日忠、李日荣、王子安等杀死。事后经安东交涉员严重交涉，并无结果。"

李玉琢客店事件

据《东北年鉴》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三日，韩境平安道慈城郡远洞出张所巡察片冈酉松等三名，带同韩人八、九名，越江来至辑安县石湖沟门李玉琢店。因该店住客与韩人口角，该巡察等强将王得功等四名逮捕过江。王得功等意欲奔逃，日警随即开枪，当时将王得功等三名枪毙，将王怀选扎伤。查日警任意逮捕华人，擅加杀害，凶残横暴已达极点。业由安东交涉员提出交涉，但无结果。

若林大尉事件

据日编《通化史话》记载，昭和三年（1928年）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军驻朝鲜国国境守备队若林大尉，从安东坐轮船行至鸭绿江中寻衅滋事，被大刀会射杀。日本守备队遂越境对中国临（江）辑（安）两县江岸地带彻底扫荡。

林土事件

据《奉天交涉署汇报各县厅局事十七年五月交涉案件报告表》中记载："日本林土（韩岸林土地方）警察驻所，于本月十九日（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十九日）早，有匪人五十余名，将该所包围袭击，击毙日警一名，韩人六名，伤韩人七名，并绑韩人五名，掠去大小枪共八支，子弹四百三十粒，携带枪械子弹、人票逃向山里去讫。此案发生当时，即由职县先派巡官荆悦彩、于国忠前往韩岸调查，以凭电报。该日人横不说理，竟将巡官荆悦彩扣留。嗣经复派交涉员周懋凯前往交涉，始将扣留巡官领回。因案关重大，业经报由道宪与驻安日领交涉，现在正调集军警保甲四面兜剿逸匪。该韩岸忽于五月二十八日派出守备队五十余名持械越境，由县属白

马浪进沟至二马驹地方，适遇农民薛志厚、薛志祥兄弟二人种地回家，即被该队枪杀。业经职县照会韩岸警察署严惩放枪凶徒，并正式答复，现未据回复。”此案件未结。

（以上各篇文章均摘自《辑安县志》、政协集安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109-121 页）

支援临江“拒日设领”

支援临江“拒日设领”，是东边道地区乃至全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阴谋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拒日设领”取得胜利的斗争。

继 1908 年原日本关东总督府陆军通译官官谷俊介受命在辑安强设日人“自治会”、“并管理韩民涉讼等事”的图谋失败并被驱逐出境后，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失败，又与 1918 年前后，以“继承沙俄之既得权利”为由，在附属地带添设日本警察，但其在辑安设立自治会、保民会的计划始终未能如愿。

1922 年，日本又以保护“鲜人”为借口，企图在辑安邻县临江县（今白山市）设立保民会，遭到拒绝。随后，日本人又提出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也因临江人民的反对而不得不搁置。

1925 年 8 月，吉田茂任日本驻奉天（今沈阳市）领事后，再次策划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并以朝鲜中江郡为基地，多次派特务进临江搜集情报，用重金收买地方官吏。

1926 年 11 月，日本驻安东（今丹东）领事西泽义征，派日本人渡边（该人曾长期在临江木植分公司工作）在临江购买民房作馆址。

1927 年春，冈田兼一接替西泽义征驻安东领事后，任命日本驻珲春领事分馆主任田中作任安东领事馆副领事，兼临江分馆主任，任命斋藤孙冶为临江分馆警察署长，并命其于 4 月 16 日赴任。

这一消息，激起了临江人民的极大义愤，纷纷要求政府保护主权，据理抵制。全县各界纷纷掀起罢工、罢市、罢课等抗议行动，并组织了赴省请愿团。

临江人民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东边道地区，特别是辑安、长白、抚松、宽甸各县人民的响应。

辑安县民众从 1904 年鸭绿江沿线的木植事件中木把的相互支援起，就同临江人民声气相通。得到日本拟在临江设领，遭到临江人民激烈反对的消息后，于 4 月初开始，先后多次集会，声援临江人民。同年 5 月开始，又和邻近各县一起与临江县建立拒日设领同盟。要求全县各界群众不得接待日本人，不得与日本人接触，不得为日本人提供食宿，不购买日人商品，发现日人不轨，要立即报告。这一行动一直持续达数月之久，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在辑安乃至整个东边道地区成了过街老鼠。

为了对奉天省施压，日本人切断了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连接线，并在中江布置兵力 500 余人相威胁。临江人民得知后，更加义愤填膺，纷纷捐款购置枪炮，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此时，声援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辑安人民，又及时组织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声援团亲赴临江县支援临江人民。不久其他各县代表也纷纷汇聚临江，形成了各县声援拒设领事馆的斗争高潮。

临江人民反对日本设领的斗争，也得到了北京、上海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北京、上海、广州、奉天、吉林等纷纷发表通电；清华、燕京、复旦等大学召开大会声援；《东北日报》、《东三省民报》、《醒世报》等多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支援。

在东边道各县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临江人民拒日设领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8 年 6 月，日本国不得不将田中作召回；1929 年 8 月，日本正式撤销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决定。

（佟德才整理）

民众自卫军奋起

抗击日军入侵



辽宁民众自卫军的组建

唐聚五组织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经过

当年曾经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秘书长的李季的《辽宁东边民众自卫军起义救国详记》一文记载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组建的过程："……三省既陷，马占山乃崛起于龙江，丁超、李杜、王德林等抗于吉林，辽西则郑桂林、耿继周、金子明先后与予则自沈阳至铁岭，向抚顺、清原、海龙趋抚松、长白山而抵临江，过辑安至通化、桓仁、宽甸，奔波于冰天雪窖之中，历说各县之县长公安局长公安大队长与屯住之陆军等，令一体反正。其时乱后政紊，胡匪蜂起，又一路遍抵匪窟，晓以大义，动以真诚，会同纾国难。唯事系肇始，咸疑白面书生，信口鼓惑，多情疑贰。然以国难当头，胥思挽救，亦不反对，故对于反正起义，多唯唯否否，以两可应之。且其时谣诼纷呶，人心惶惑，每到一处，又不知予等为何如人，盘查纂严，危险万分。如在铁岭黄宇宙事泄，曾被倭贼刀刺伤股，仍假做厨役而逃。至临江曾被公安分队长崔天玺殴伤数处，即欲羁押，后被公安局长徐达三查出真象，及誓协反正。至外岔沟子险遭日人毒打，幸巧辩始免。至通化廖骧尘虽赞许，而不纾诚，怀敬鬼神而远之之意，护送至桓仁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处。唐久怀救国之志，虽系初会，一见契合，即与确商进行事宜。先以丝质细布，书空白委若干，秘密联络颁发。同时法库车向辰，亦向吉黑联系丁超、李杜、马占山等以便呼应。而通化王育文、宽甸邹达心，则自大连上岸，至庄河岫岩凤城。此时有邓铁梅者，原任凤城警察所长一已招收四万余人。破凤城后，即占尖山窑龙王庙红旗一带。凤城公安大队长徐文海，亦占大洼与日对抗。王、邹皆亲往接洽。又之宽甸于桓仁抵通化，即联络桓仁之富光圭、杨仲西、孟伯钧、史精一等，分体工作。通化之孙秀岩、姜中天、姜伯魁、张玉琛等，亦为当地自动工作分子，闻讯即互相觅集合。此时已是十二月，适予等第二次抵通化，而通

化李心葵，与河北英若愚，柳河包光虞、任重、韩大光、韦仲达等皆各县先后尽至通化，乃开一秘密会，报告唐团誓欲起义，并讨论一切王、邹、英、包等分向海柳辉长一带，任、韩、韦等向东西丰西安现辽源清原一带，姜中天、李心葵则往新宾本溪一带，各自分带空白委任，分头工作，约两个月后聚于桓仁，予等乃重至桓仁报告一切，其公安局长张宗周、公安大队长郭景珊深相赞许，愿始终臂助。专候联络诸人归来。再定进行方案。唐并遣人一同赴北平与各方接洽，以免冒昧。（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黄宇宙自北平抵沈阳，仍循第一次故道，向东边各处作第三次之工作。此次所至尽识，而诸同人亦多半又来接洽，事较易作。且语以唐团起义，并以空委相示，众知此事非假，乃皆愿听从指挥，专候命令。于二月末至桓仁，历诉一切。唐知事易为，志会盖坚。工作诸人，多先后归来，即在唐处开会报告各处成绩，共联合十余处有枪阶级，每处皆在一千或二千人以上，均委以司令之职，令尽量招收募集，以扩大实力。唐于是毅然起义矣。乃核定名称，原定辽东义勇军，适其时傀儡式伪国出现，乃更为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自卫二字，寇以民众系民众自卫自已生命财产，对国际间，决不发生任何问题。黄宇宙以要公返平，予乃留其处专为秘密办理起义檄牍。

意志既定，专候王育文等归来筹划。适王育文病于通化，稍瘥，即至桓仁核商，定于四月二十一日开会，电令各县派代表届其出席。张宗周郭景珊亦参加，竭力工作，届期到会者有桓仁县长刘铮达，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珊，通化代表杨宇忱，宽甸代表迟柏春，新宾代表孙达，临江代表欧阳英佑，辑安代表王永朴，抚松代表张效骞，辉南代表于远东，凤城代表柳天勋，岫岩代表施德周，与王育文、孙秀岩、李心葵、姜中天、邹达心、富光奎，孟伯钧、姜伯魁、张玉琛，任重、韦仲达，杨仲西、史精一、乃予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组成辽宁民众救国分会，投票公举常务委员五人，为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会内又分政治、军事两委员会，政委会公推王育文为委员长，各县长为委员；军委员公推唐聚五为委员长，各县之公安局长、大队长与其部下之营长及各地绅士等为委员。军委会中设一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举唐聚五为总司令，下辖各路司令及支队，择期誓师大举。闭会后，各代

表俱回原县。孙秀岩与姜伯魁、张玉珊秘回通化砬子沟号召，专待时期。电会宽甸县长秘密通知徐文海、邓铁梅派人前来接洽。在此秘密期间，将一切悉数规定。予则编印各种布告宣言，告民众商人武装同志等书，及就职通电誓师词；镌刻印信，印制凭委与编制表等等。郭景珊与张宗周等所拟之旗式亦妥。

军制表取三三制，路辖三团，团辖三营，营辖三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是一路者，则为支队。议定桓仁公安局长张宗周为副司令兼第五路司令，中校团附唐玉振为第一路司令，抚松常永林为第二路司令，安图李润春为第六路司令，桓仁公安大队长郭景珊为第七路司令，临江公安局长徐达三为第八路司令，东丰卢英环为第九路司令，海龙孙公雨为第十路司令，河北李志珍为第十一路司令，长白文殿甲为第十二路司令，岫岩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司令，西安、辽源谭庆海为第十四路司令，凤城徐文海为第十七路司令，辑安公局长林振清为十八路司令。其他王彤轩、姜中天、盛御风、李月林、钟子臣等为各支队支队司令，一切配备妥协，乃分遣邹达心赴时远岫，徐文海、邓铁梅等处，李心葵赴孙秀岩、王彤轩、李志珍、钟子臣等处，孟伯钧赴林振清、徐达三、文殿甲等处，英若愚赴张连波、孙公雨等处，姜中天赴李连科、常永林等处，李春润处唐励派其亲信之副官徐受先前往，送任命关队与编制表、旗徽、布告、宣言等物。去后各处亦陆续派人前来接洽……于是在南关师范学校体育场搭台扎彩，召集民众，举行就职誓师典礼大会，至四月二十一日，派军警沿街密布，直至会场维持秩序。会场正门，扎松枝为牌楼，额悬纸匾为“誓师起义”四大字，左右分悬“涤荡丑虏、还我河山”八个大字，周围遍贴种种标语。主席台搭于场北向南，台上平悬白布一幅，大书“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十一字。

是日天晴气朗，日丽风和，民众皆扶老携幼，肩摩踪接，争先恐后，奔走若狂，街巷皆满，围会场数匝，尚蜂屯蚁聚，络绎不绝。内有朝鲜人数百，亦前来参加。男女学生，皆手执标语小旗，排队而至。十点钟唐聚五、王育文与予等及各机关各法团各工作人员各职员各县各路代表等莅场。甫至场，即闻掌声大起，欢呼雷动。沿场绕行一周，毕，即登台按照誓师典礼程序，一、宣布开会，即放铁炮三响；二、全体肃立；三、升旗奏乐，是时鼓号齐鸣，音韵悠

扬，青天白日之国旗，徐徐上升，飘荡于阴霾数月忽见晴光之处，民众多有泣不可抑者；四、唱国歌；五、民众救国会授总司令军旗就职，由救国会委员长亲手交与总司令亦答礼如仪；六、率全体民众将士向神坛致祭，全体向天地诸神坛行之鞠躬礼焚香帛燃放鞭炮奏乐毕，总司令唐聚五即宣读誓师词，读罢即率全体将士，向总理遗像行鞠躬礼，主席仍恭读总理遗嘱；八、主席王育文致开会词；九、各机关代表演说，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演说至激烈时，取佩刀削右手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字……礼成散会，民众与学生等随走随呼曰，今日重见青天白日国旗，从此不作亡国奴矣。

（文史委整理）

集安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的组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大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军民的极大愤慨，整个东边道都燃起了抗日的怒火。

1932 年 4 月 21 日，辽宁陆军步兵一团中校团副唐聚五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策动下于桓仁县城南关师范学校体育场，举旗抗日，召开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誓师大会。东边道每个县被编为一个路军。辑安抗日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十八路军。经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任命辑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为司令，原辑安公安大队（即辽宁省第十三大队）副大队长李子元为副司令，县长苏显扬为参议。下设 3 个团，即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五十四团。主要组成是以辽宁第十三大队（即是辑安公安大队）自卫团等，及地方武装和大刀会合编而成。

（文史委整理）

我在辽宁民众自卫军十八路军的经历

我今年 84 岁，家住在太王镇大碑街村。我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凤凰城的东北边防军第一旅第一团一连当过兵。民国十五

年（1926年）回辑安，在家种了几年地。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哥哥辛文忠在区公所当文书，有一天我到区公所去办事，被穿便衣的辽宁省公安第十三大队李（清臣）大队长碰见了，当时我不认识李大队长。我哥哥就当着李大队长的面向我介绍说："这是李大队长！"当场，我就给李大队长敬了个军礼。李大队长便问我哥哥："你弟弟当过兵？"我哥哥回答说："他当过兵"。李大队长接着就以商量口吻对我哥哥说："叫你弟弟到我这儿来当兵吧。"起初我不想干，以后一想生活也没有出路，我就参加了辽宁省公安第十三大队。开始，我在大队部当庶务班长（即军械员），两个月后我给大队长当传达长，下边还有潘云龙等4名传令兵。当时整个辽宁省公安大队，是全省排的，排到辑安县为第十三大队。第十三大队的编制：设有大队部，下设有一个炮中队和三个步兵中队（即三十七中队、三十八中队、三十九中队）。大队长李清臣，大队副李子元，他是荒崴子人，以后搬到霸王朝去了。炮中队长张怀胜，是沈阳炮科毕业的，人们称他为"张炮目"。炮中队有3个分队：一分队长姓宋，三分队长姓王，名字记不清了。二分队长郭长青，也叫"郭炮目"。三十七中队长董作顺，一分队长姓杨，二分队长姓王，三分队长姓于，没记清名字。三十八中队长丛树敏，一分队长辛文厚，就是我；二分队长王阁臣，三分队长邓希武。三十九中队长张善廷，也有3个分队长，都是谁我记不清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月末左右，在大队长李清臣，副大队长李子元和公安局局长林振清的主持下，积极响应唐聚五的"杀敌讨逆，抗日救国"的号召，在辑安以辽宁省公安第十三大队为主，还有公安局的警察和地方武装以及大刀会，改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共编了三个团，即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五十四团。其中五十三团是在这年的七月份以后才编成的。五十二团团长张善廷，外号叫"张轴子"，五十三团团长董作顺，五十四团团长是李子元兼的。我在五十四团二营任四连连长。因为五十四团编有3个营，每个营编有3个连，从一营一、二、三连至二营一连就是四连了。我是上尉连长，中尉副连长李春和。由辽宁第十三大队改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十八路军，推举了辑安县公安局局长林振清为司令，李子元为副司令。改编完之后，我清楚地记得李清臣大队

长就进关去了。在改编当时和以后，我常到司令部去，我跟司令部的人很熟，我是亲身经历十八路军组建到失败全过程，我记起这些人的职务都没有错。

我曾代表辑安民众自卫军到通化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开过会。唐聚五下边的总参谋长张希清，是我的两姨妹夫。在通化那次会上，主要研究军事上的事。当时说有兵工厂，只能制做手榴弹、地雷，没有别的玩艺。地雷象磙子似的埋在地里还得用人来拉才能响。实际也制不了什么武器。

我在民众自卫军五十四团里，参加了两次打土口岭，一次打长岗、一次攻打县城。打这几仗的经过，我还记得很清楚。

（辛文厚口述　李重勤整理）

日军入侵集安　军民奋起抗击

击毙日特

1932年春，当民众自卫军组建起来后，驻朝鲜的日本军队，经常派特务过江来刺探军事情报。当时，辑安县警察局内部的一名科长叫刘云芝当了汉奸，与日本派来侦察情报的特务邢复周（黑山县人）、沈玉清相勾结，透露我民众自卫军的军事情报。日本特务得到情报，准备过江去向日本人禀告时，被我方警察局发现，尾随二人相跟盘问。特务感到不妙，拔腿就跑，被当场击毙。

但是，这一情况被县长苏显扬得知以后，却甚感不安，当即召集商会会长李良斋、农会会长姜宗周等人商议，他说："打死日本特务，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日本关东军已于3月份宣布建立'满洲国'。为此日本也曾几次前来接收辑安的地方政权，我们没交。所以日本人都在江对岸（朝鲜）向我们示威游行，时时寻机借故过江来占领县城。然而，今天我们把日本特务给打死不正是他们借口的理由么，一定会过江来进行交涉。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不出所料，第二天，日本人从朝鲜过江直奔县城。当面质问：为什么打死他们的人？当即就被我们义正言辞的驳了回去。我们说：“我们并没有打死你们的人，打死的是我们中国人（指汉奸特务）。”日本人无可奈何，灰溜溜地撤走了。但是，每天都在江对岸举行游行示威和军事演习，向我岸打枪放炮。重兵压境，看样子随时都有过江来犯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擦拳磨掌。因而，纷纷组织起大刀会、自卫团等群众武装组织，每天加紧操练，准备迎敌。恰好此时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宣告成立，辑安又被编为第十八路军。这是一场及时雨，人们个个欢欣鼓舞，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于是，便欣然加入了第十八路军。

外岔沟伏击战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当时，外岔沟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和通商贸易的繁华集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侵略，控制东边道一带，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侵朝日军早已妄图偷渡鸭绿江攻占外岔沟。1932 年 4 月的一天，民众自卫军得知日军要偷渡过江攻占外岔沟的消息，即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埋伏于外岔沟的沟里，大刀会战士埋伏在外岔沟沟门。当偷渡过江的日军进入夹皮沟门时。民众自卫军大刀会营的战士纵身跃起，手持长矛大刀，杀向敌群，与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大刀会战士越战越猛，杀得敌人狼狈不堪，敌人不得不一面顽抗退到夹皮沟里。当敌人退到夹皮沟里的时候，这里埋伏的两连战士，一声令下，向敌人猛烈射击。霎那间，敌人被砍死、打死 70 余人。这时天已黄昏时分，日军已招架不住民众自卫军的猛烈射击和大刀会战士的砍杀，便慌忙乘船逃回朝鲜对岸。

（原文为迟明发供稿　文史委整理）

保卫县城战斗

1932年5月29日，为了保卫老岭西线，防止日军入侵，民众自卫军司令部把县城内的大刀会战士大部调出，城里只留18名大刀会战士。6月7日晚上，侵朝日军七十七联队和七十八联队的一部计400余人，由满浦过江，从下羊鱼头（今下解放村），经过将军坟、土口子、沿大禹山顶，下到梨树园子一带，准备入侵辑安县城。

6月8日早晨，太阳刚出不高，从朝鲜国土飞过两架双膀的日军飞机，在辑安县城和七星山上空盘旋。同时日军指挥官以旗为号，和驻朝鲜岸的美他里和伐登岛两处侵朝日军上下摆动旗帜互应者。不一会儿，就从上述两处向辑安县城和附近发射200多发炮弹。随后，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披挂铜马夹的日军，依仗大炮的掩护，穷凶极恶地向县城攻来。县城里，头戴红毡帽、腿裹白绑带、胳膊上缠着"抗日救国"袖标的18名大刀会战士，手握长矛大刀，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高喊着杀敌愤怒的吼声，冲出了县城，向进攻到东台子（今三装公司）的日军奔去。与日军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砍杀肉搏战。大刀会战士，象猛虎下山一样冲杀过来，早已领教过称大刀会为"铁人"的日军吓得掉头撤退就往回跑，后边的敌人畏缩不前乱作一团，正在这时，日军架设在五盔坟的机枪和朝鲜边境上的大炮向大刀会战士一齐开火。但无所畏惧的大刀会战士，越杀越猛，杀得敌人嗷嗷直叫，顿时血肉横飞，不大功夫，日军被大刀会战士砍死砍伤20多人。大刀会战士被数十倍的敌人围住，但大刀会战士仍勇猛和敌人厮杀，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下来。剩下的四名大刀会战士冲出重围，在群众掩护下，换了服装，向岭后寻找自己的队伍去了，其余14名大刀会战士壮烈殉国。

（原文为刘崇荣口述、李重勤整理）

第一次攻打县城

当驻防在岭后青沟子的民众自卫军司令部，得知辑安县城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后，全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 1 000 多人，按照司令部攻打县城的命令和部署，立即出发向岭前奔来。从 1932 年 6 月 13 日出发，经过四天的时间，民众自卫军部队陆续到达城北的山城子。6 月 16 日晚，把五十四团迫击炮中队两门炮运到大禹山顶，构筑了炮阵地工事，并布置一个连的兵力控制大禹山制高点。当时的部署是：五十四团，由土口子起，沿大禹山下行，直攻县城东门；五十二团、五十三团由山城子南下，越过城后腰岭，通过开阔地直取北门。对侵占辑安县城的日军形成了包围圈。

6 月 17 日清晨，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司令部发出攻城命令后，大禹山上的迫击炮发出了怒吼，炮弹击中了县城内的日军宿舍（今市委院内）和北城墙的碉堡。在炮火的掩护下，各攻城部队开始攻城，大刀会战士挥舞着长矛大刀冲在前头，快枪队在后面，一边掩护大刀会战士，也一边冲锋，顿时枪炮声和冲锋的喊杀声响成一片。当各攻城队伍，冲杀到接近城墙外的铁丝网和战壕的关键时刻，设在大禹山顶上的迫击炮因有砂眼而爆裂，周排长和 3 名炮手壮烈牺牲。当攻城部队失去炮火掩护时，靠长矛大刀想在敌人猛烈火力下，冲破敌人封锁线已是不可能，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而不得不后撤，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全军退出阵地，返回山城子和岭后。

（原文为迟明发供稿，文史委整理）

石灰窑战斗

在民众自卫军攻城失利后，日军自以为得势，城门开放，可持“通行证”内外通行，城内商号开门营业。日军经常在大碑街（太王村）、麻线、丸都山城一带流动巡逻。在城后腰岭上还建筑一座

钢筋水泥的大碉堡。驻防日军有1个排的兵力，扼守着从长岗入县城的咽喉，严防民众自卫军再次攻打县城。事实上民众自卫军并没有全部撤到岭后去，还有一部分驻守在山城子、二道阳岔和张家沟一带。

1932年6月19日，县城日军守备队得知民众自卫军仍有一部分驻守山城子之后，便集结百余名守备队，向山城子进攻，进行疯狂的“扫荡”。当驻守在山城子的民众自卫军，侦察日军要出城进行“扫荡”的情报后，便立即命令部队爬上石灰窑公路两侧的高山，占据了半截沟和丸都山城的制高点，象把铁钳一样扼守着通向石灰窑的要道。当日军守备队进入民众自卫军的包围圈和射程之后，突然枪声四起，爬上山的群众在铁桶里鸣放鞭炮助战。300多名民众自卫军战士，轮番向来“扫荡”的日军冲锋，山上山下枪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溃败后调头往县城逃跑。敌人撤回县城前，来不及收尸，只好把死尸拖到伊焕珠家附近柴垛跟前，燃起柴禾焚尸。民众自卫军粉碎了日寇在石灰窑的“扫荡”，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原文为李重勤搜集整理）

土口岭上伏击战

日本侵略者占领县城之后，为了扩大侵略范围，又出城向我驻土口岭上的十八路军五十二团二营发起了进攻。

1932年6月12日，侵城日军偷偷向土口岭的我军进犯。当时我率的二营一连和丛树敏带的兵正在土口岭顶。当日军从南江沿经将军坟绕过来向土口岭进攻时，被我们很快打退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于6月22日早晨，从县城调出100名鬼子分两翼向土口岭发起冲锋。从土口岭小道往上进攻的鬼子把机枪架在土口岭山腰上。我们民众自卫军在土口岭上的是我们那个连共140多人，把两门炮安放在土口岭上的一个平台上。当时没有瞄准仪器，“张炮目”就叫我用小旗给摆动，摆动几下就是几个档。我把小旗一摆，“张炮目”就把敌人架设的机枪给炸毁了，机枪射手等5人中当时被炸

倒了4个人，当场炸死了3个，伤了1个，一个逃跑了。敌人的机枪被炸毁，无法掩护冲锋，只好狼狈撤退了。另一路从将军坟方向进犯的日军，见西侧的日军撤退，觉得进攻不利，也只好悄悄撤退了。

（原文为辛文厚口述　李重勤整理）

长岗战斗

在石灰窑反“扫荡”取得胜利之后，民众自卫军撤到岭后八宝沟、蚂蚁河一带，以长岗为前沿阵地，并在长岗的盘道口构筑了工事，在工事前用伐倒的大批树木筑起障碍物，阻击日军入侵岭北。

1932年7月19日，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侵略势力范围，县城360多名日军倾巢出动，兵分3路：一路从石庙子，经阴阳沟，进逼长岗；二路从高台子经绿水河直奔长岗；三路从山城子，经大西岔，正面向长岗硬攻。敌人这次“扫荡”恰遇汛期河水猛涨，日军逼着艄公老廉头一船一船把日军摆渡过了通沟河。

当天上午11点钟左右，日军向长岗发起疯狂了进攻，进行大“扫荡”。当日军进入民众自卫军阵地后，民众自卫军打响了指挥枪，正面和东西两侧山岗上的民众自卫军用前沿堆起的树墙作掩体，一齐开火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伤惨重，日军轮番进攻，都被民众自卫军打了下去，一直没有攻上长岗制高点。战斗持续到天黑时自卫军发起反攻。这时，日军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如不撤出战场，将有陷入敌人重围之危险。于是指挥部下达撤退命令，民众自卫军返回蚂蚁河、青沟子一带。

战斗结束，日军点火焚尸。此战毙敌120人。日军遭到如此严重打击之后，曾一度关闭城门，龟缩城池不敢轻举妄动。

（原文为迟明发供稿，文史委整理）

再次攻打县城

1932年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再次攻打辑安县城。这次接受前次攻城教训，计划和部署较为周密。加强两个连控制制高点，北路和东路攻城部队，还配有数百群众组成的抬枪队、担架队、扛梯队和爬城队参战。

9月14日清晨三点钟，司令部发起攻打县城信号后，大禹山顶的迫击炮发出隆隆的吼声，猛烈地轰击日军的营房和城墙上的碉堡。随后，攻城部队和参战群众，在硝烟弥漫的炮火掩护下，向县城猛杀过来。大禹山上一线的五十四团和大刀会战士，直向县城东北角冲过来。五十三团和部分大刀会战士，从山城子趟过三道河，从北路取县城向北门冲杀过来；东路直扑东门。攻城大刀会战士临危不惧，冲杀在前，后边快枪队掩护大刀会战士也边往前冲。北路攻城部队，杀得更猛。大刀会营长杨凤山带领60多名大刀会战士，直奔北门冲来。杨凤山营长在进攻到城北青纱帐时，中弹受重伤，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杀害。日军见势很猛，就加大了城后腰岭上和城墙上的机枪火力。密集的子弹封锁了去路，使北路攻城部队伤亡很大，也不得不退下来。经过4个小时激战，虽摧毁敌营房，炸平城墙上的碉堡予敌以很大杀伤，但终未攻下县城。

在这次攻打县城战斗中，辽宁民众自卫军将士阵亡600多名，其中在万宝汀一带阵亡200多名，东门外到大禹山根底梨树园子一带阵亡400多名。为抗击日本侵略者，集安优秀儿女英勇献身。事后，在群众收尸和掩埋牺牲的民众自卫军将士时，发现死者的衣服破烂不堪和兜里装有苞米粒子、豆粒和煮熟的土豆等食物，无不悲痛流泪。日伪当局为收买人心，而装扮出一付伪善面目，由辑安乡绅出面，在西门外通沟河套埋尸边上立一石碑，上书“原民众自卫军将士战殁碑”。

（原文为迟明发供稿，文史委整理）

外岔沟攻坚战

在外岔沟第一次伏击日寇不久，日军占领了外岔沟。为了收复失地，捍卫边疆，将民众自卫军五十二团调到西老岭，即双岔河的大青沟（今中兴村）、马面石（今治安村）一带。1932 年 9 月 13 日下午，民众自卫军五十二团接到民众自卫军十八路军司令部攻打外岔沟的命令，各部队从驻地整装出发，翻过几道岭，傍晚来到了治安沟里，吃过夜饭后半夜两点多钟又出发，部队经过榆树林子时，把占领榆树林子的日军从江口撵过鸭绿江。随后，五十二团部队爬过榆树林子岭，翻过旗杆顶子，天还没亮就到了外岔沟的西山坡和北山岗上埋伏。

9 月 14 日，天刚蒙蒙亮，大刀会战士在前，快枪队在后。当大刀会战士吞下符后，即发出攻打外岔沟的冲锋号令，向外岔沟里冲去。后边的快枪队也一边掩护一边冲。全团战士边冲边喊 “冲呀！杀呀！”“冲呀！杀呀！”的吼声，响彻整个山谷。前面的大刀会战士一溜气从北门攻了进去，先把 30 多名“维持队”（伪地方武装）缴了械。然后，就向驻守在“公和永”大商号院内炮楼上的日军进攻。当攻到炮楼跟前时日军甩出颗手榴弹，炸伤了旗手，1 个大刀会战士操起大旗，大刀会战士们跟随旗子继续向北炮楼冲去。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精神，硬打硬拼攻进了院内。大刀会战士同日军展开了砍杀战，不大功夫，砍死日军 50 多人。当部队攻到北门时，将日军中曹官小岛武郎和巡抚砍死，剩下的日军，惊恐万状，节节溃退，慌忙逃过鸭绿江去。在这个时候，驻朝鲜岸边的日军在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一方反扑过来。由于敌炮火猛烈和敌我力量悬殊，为了避免大的伤亡，民众自卫军五十二团部队，按照团部命令，撤出了外岔沟，又返回双岔河一带。

（原文为刘武忠口述，李重勤整理）

辑安县大刀会

辑安县大刀会的兴起有两次。

第一次大刀会于民国十六年（1926 年）十月份，兴起于临江县红土崖。大刀会首领姓匡，是山东人。当时兴起，主要是农民组织起来反对税捐局苛捐。兴起 1 个月后，当地公安分局利用大刀会剿匪，在剿胡匪期间和公安分局发生了冲突，因此就发生了战斗。从此大刀会逐步扩大，包围过通化县城。还到过辑安的三道沟、良民甸子、岭后头道、台上、财源子等地。1926 年 12 月曾在良民甸子打死过保长韩忠义，1927 年 2 月份在霸王朝张家大院被县区中队打败，驱除辑安县境，1927 年旧军阀吴俊升率军 3 个旅，进驻通化五道沟，3 月份大刀会失败。在辑安搜去枪支 100 多支。

第二次大刀会是在 1932 年，配合辽宁民众自卫军发起的，完全是抗日行动。当时辑安县公安队、公安局以及地方联合组成 1 个抗日团体，名称是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有 3 个团，五十二团团长是张义忱，是地方武装。五十三团团长董作顺（又名董英华），是公安大队武装。五十四团团长田英杰，是县公安分局武装，第十八路军指挥的大刀会为 1 个营，营长是台上人，叫杨风山。他们曾攻打外岔沟的日本守备队；1932 年 8 月分，还攻打过县城河西一带（这次牺牲很大）；1932 年 10 月份，随辽宁省民众自卫军一起转移到抚松县一带活动，以后随之瓦解。

（原文为王敬文回忆，文史委整理）

抗日联军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

袭击日军巡道车

1935 年春夏之间，从辑安开往通化的公路已经修成通车了。日本侵略者怕有人破坏公路和显示武力，经常有两辆卡车拉着日伪军，从辑安至通化间来往巡视。车上的这些日伪军，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耀武扬威。他们路过村屯时，经常停车下来以休息为名，到老百姓家里抢吃要喝，调戏妇女，无恶不作，老百姓恨透了这些巡道兵，背地里咒骂他们不得好死。

这一天还真的来到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一队抗日联军来到了天桥沟口一带的几户群众家住下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抗日联军的部队（当时老百姓都称他们为红军），只见他们穿戴不够好，但很整齐，他们说话特别的和气，对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称大爷，大娘，对年轻一点的都称兄弟姐妹。他们很有纪律，从不向老百姓要吃要喝。群众吃什么，他们就跟着吃什么。有的群众家粮少，他们就拿出自己带的粮食，送给缺粮的群众。那时，我家就住在这里，在我家住的红军战士，全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他们一住下，就给我们看热闹的一群小孩子讲日本侵略者是怎样侵占东北和如何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还讲他们打小鬼子的故事。他们不但讲，还教我们唱抗日救国的歌。我所以能在 1938 年参加抗联，跟我这次受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小战士在我家什么活都帮着干。我曾偷偷地问他们想不想家，他们说：“都是父母生的，肉长的，咋不想家呢！”我又问想家了怎么办？他们说：“想到不打跑小鬼子，就保不住国家，自己的家和父母也保不住，就铁了心，咬住了牙。”他们的话就像泉水流进我的心里，心里敞亮了不少。

我家有两铺炕，他们十几个小战士就挤在一铺炕上睡，再怎么挤，他们也不上我们的炕上住，在别家的红军也是这样。有一天早晨，我醒的早，睁开眼一看，北炕上的红军一个也没有了，跑到院子里也没找着。到别人家里去打听，也没有。这才知道红军在天没亮前，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撤走了。老人们都称赞红军，是从来

没见过的好军队。有的老年人说:“这是些神兵,是下来专为穷人打天下的。”大家正在议论时,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枪声是从大蚊子沟口王八炕一带传来的。听枪声,嗒嗒嗒!咕咕咕!像是机关枪响。响了十几分钟就不响了,大伙就又议论起来。有的说,根据刚才的枪响,必是红军打了鬼子的巡道车。老万家小土说:“不能是。王八炕那地方,两帮夹一沟,中间又是河,公路是从石头砬子下修过去的,石头砬子有几十丈高,根本待不住人,红军怎么能打?”这个说是,那个又说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这一群半大孩子就决定上王八炕附近去看个究竟。当我们来到天桥沟和龙爪沟会合的小街时,过了不大一会儿,只见一队红军从沟口押着一些战俘进了小街。红军战士们面带微笑和我们及那里的群众打着招呼,点头说话。突然一个小红军喊我,我一看,是昨天晚上住在我家的那个小战士。我赶忙跑过去,和他亲热的拉着手,笑着,高兴得不得了。我望着他们扛在肩上新缴来的三八大盖枪,和他们一样,内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当地群众也和我们一样,说着笑着,小街充满了欢喜的气氛。只有那几十个战俘,赤着脚光着头,肩上背着麻袋,手提着裤子,耷拉着头,不敢看人。熊汤汤的,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像是一群落水狗。我指着那些小鬼子和满军,问一位岁数较大的红军,俘虏是怎么抓的?这位红军才讲了战斗的经过。

原来这部分抗联部队,在侦知敌人的巡道车要来的消息后,便在拂晓前埋伏在王八炕一带,袭击了敌人的巡道车,除击毙者外,其余全被俘获。同时还缴获了一批盐。日伪俘虏背的就是盐。为了怕他们跑了,就没让他们穿鞋和系裤腰带。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喊好。吓的那些日伪俘虏脸都变了色,腿直打哆嗦。

这支抗联队伍在小街的东头休息了一会,一位首长和群众讲了打汽车的经过,又宣传了一阵子抗日救国的道理,便给群众留下一部分盐,就往龙爪沟里走去了。

从此,通辑公路上,再也没有看到日伪军的巡道车。

(原文为徐光口述,李藕堂整理)

老岭山上的红军洞

辑安境内的老岭山区，在1935年至1939年间，曾是杨靖宇领导下的抗联第一路军的根据地。在这千峰叠嶂中，有两处曾是抗联战士为国捐躯的山洞，为了纪念他们，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红军洞"。

一是治安沟里的红军洞

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一部来到榆林子区治安村沟里葫芦头子和大小天桥沟一带，进行抗日活动，他们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采取"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团结广大群众，联合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活动。

1936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抗联一军刘金铎连长的妻子金××快要临产了，为了不给部队找麻烦，刘连长便带着妻子和两名警卫员，从岭上秘密地转移到岭下，住进一个人称窑棚窝子的破窑洞里，然后，刘连长又去找曾是他的"拜把"兄弟的王春富，交给他50元伪币，托他到榆树林子街（今榆林镇）里购买有关临产和过春节所需的物品。

第二天一早，王春富来到榆树林街，他边走边想："我家要是有这50元钱也能过个好年……"想到这儿，他就丧尽天良地来到榆树林子伪警察署，向伪警察署长王鹤年报告了刘连长的秘密住处及一些重要情况。王鹤年得知后，便马上率领伪警察潘士坤等人和伪自卫团30多人，一部份乘坐两张马拉爬犁，一部份人跟在后面步行，朝着刘连长住的窑棚窝子奔来。

当刘连长他们发现敌人时，敌人已经封锁住了他们的窑洞口，子弹像雨点一样射来，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刘连长立即和窑洞里的其他3个人奋起还击，寻机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幸先后中弹，4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当岭上的抗联部队听到枪声急速赶来救援时，敌人已仓惶逃去。

解放后，治安村人民纪念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抗联战士，将刘

连长等人殉国的窑洞命名为“红军洞”。

二是高地沟里的红军洞

1939年10月，抗联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曹亚范率领所属部队来到老岭山区的高地（今大路镇高地村）沟里，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他们在集桓公路必经的转山子岭顶伏击了伪满军谷麟部队，毙敌7人，粉碎了敌人的这次“讨伐”。战斗结束后，抗联部队又迅速转移到其它地方打击敌人，留下3名行走不便的伤员，其中一名女战士，转移到转山子岭下不远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天然山洞，叫红石砬子洞。这3名抗联伤员就秘密地住进去养伤。

时隔不久，驻在高地村的伪满军谷麟部队蒋二连（因连长姓蒋而得名）得到密报，说红石砬子洞中住有红军的伤员，蒋连长随即带兵扑向红石砬子洞，把洞口严密封锁起来，同时喊话，叫抗联伤员出来投降，被困的3名抗联伤员，拒绝投降，敌人恼羞成怒，用机枪朝洞中疯狂扫射，2名伤员先后中弹牺牲，剩下1名重伤员，被敌人拖出洞外杀害。

后来，红石砬子洞也被人们称为“红军洞”。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马蹄沟南山突围

1935年秋天，抗联连续破台上和花甸子村，拔掉了伪警察所后，吓的敌人魂飞丧胆。驻辑安的日本守备队顾问小樾为了稳定局势，亲自领兵出征，跟踪杨司令，妄图一举消灭。

一天下午，杨司令领着十几个抗联战士来到马蹄沟南山上，打算夜里袭击韭菜园子警察所，被一个汉奸告密了。小樾得知消息后，马上调动一些警察和守备队，团团把马蹄沟南山围住，要活捉杨靖宇。

马蹄沟南山，山深林密，藏上十个八个人是很难找得到的。杨司令看到四面扑上来的敌人，便同十几个战士找个岩陡林密的地方躲了起来，他还亲自上到树上察看敌人的行动，准备天黑再走。到了傍黑天，杨司令发现敌人按兵不动了，他知道敌人是没有摸清抗

联的人数，害怕天黑吃亏，杨司令轻蔑一笑，骂道："原来是一群虎头兔子胆的孬货。"便从树上跳下来，让另一个战士到树上放哨。

住了一会儿，树上的哨兵告诉杨司令，说山下上来一些老百姓，还背着一些像麻柴一类的东西。不一会，哨兵又说山下点起一堆堆火。开始，大伙还以为是敌人烧火做饭吃。后来，火越烧越大，不断向山上蔓延，火堆也越来越多，山前山后同时燃烧起来。杨司令心里明白了："噢，敌人是想要把我们烧死啊！"他便让战士弄水吃炒面，然后睡上一觉。他一个人躺在用树棵子搭起的床铺上，仔细的核计办法。

到了二更多天，山下的大火烧得更大了，火光也更近了，烧到了山半腰，从火光中可以看到一些老乡不断忙活。这时，杨司令把大家叫醒，把行动计划说了一番，他们各自脱下外衣，把枪藏好，扮成放火老乡的模样，抱着干柴顺山坡往下走去，到了离火光不远的地方，杨司令他们也分散开来，在林子中点起火来，他们也同样在火光中忙活着，渐渐同上山放火的老乡混到一起，悄悄地说了真情。大伙都是穷苦人，知道杨司令领导的抗联队伍，是专打鬼子和警察的，谁也没吱声，有的还把自己头上的破帽头扣在杨司令的头上。站在下面催阵的警察，口口声声要烧死杨靖宇。杨司令和十几个抗联战士，在老乡中间暗暗好笑。

半夜多了，满山着起大火，小樾才让催阵的警察把山上放火的老乡放回村去。他们万万没想到杨司令竟敢混杂在人群之中跳出了火海，还在路上探听了一下韭菜园子警察所的情况。到了小马蹄沟的沟口，杨司令领着十几个战士上山了。他们回头望着沟里山上的大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杨司令他们上了山，顺着马蹄沟东岗向韭菜园围子奔去。到了韭菜园南山，杨司令让两个熟悉道路的战士带着下山，趟过新开河，又巧妙地越过村头岗哨，悄悄向围子里的警察所摸去。他们刚来到警察所门口，屋里的灯亮了。杨司令他们隐蔽到墙底下察看动静，只见屋里灯亮着，杨司令便让两个战士去看看。两个战士爬到窗前一看，只见屋里只有 4 个人。3 个警察正在呼呼睡觉，警察所长赵蹶子在过大烟瘾，正是打进去的好机会。两个人把手一摆，杨司令他们忽拉一下子来到门前，一脚把门踢开，冲进屋里，缴了 4 个人

的枪支弹药。3 个警察吓得围着被缩在炕上，赵蹶子也吓得魂不附体，全身都哆嗦到一块去了，一个劲儿地求饶。杨司令先是警告了他，然后让他给抗联战士拿出一些衣服穿，最后又对 3 个警察讲了一些抗日救国道理，才把他们反锁在屋里，悄悄撤出围子。当小樾得知杨司令借着他用火攻的机会逃走时，气得暴跳如雷。杨司令端掉了警察所，带领战士与活动在腰营一带的抗联部队会合了，并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了。

（原文为朱文山、陈立志口述　卢庆福整理）

二道崴子伏击战

1936 年 3 月初，杨靖宇司令率领我们抗联一军军部在热水河子端了邵本良的团部，把当时正在通化开春季讨伐会的邵本良气红了眼，他就像一条疯狗似的跟在我们后面，穷追不舍。杨司令没有理他，就叫他跟着，伺机揍他一下。4 月 3 日晚上，通过偷听敌人的电话，了解到敌人的奉天骑兵教导团要路过二道崴子，奔辑安搞春季讨伐。杨司令得悉这一情报，便提出袭击敌人的作战计划，军部上下一致拥护。于是一场伏击战便开始准备了。

我们一般白天不行军，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在第二天午后，公开拉着队伍向西走去。这就给敌人一个错觉，认为红军从这一带撤走了。其实，我们并没走多远，到了二道崴子前面那个沟掌子，就住下不走了。这时，我们的便衣手枪队又抓来了敌人派出的两个探子。因为这两个人是老百姓，我们一问，他们就说了实话。原来我们走后，敌人不放心，便派这两个人出探，看我们走的方向。问完之后，有的主张杀了这两个人，杨司令说："他们是老百姓，又不是专门干这工作的，又是被逼来的，不该杀了他们。"不杀也暂时不能放，杨司令就让人先将他俩绑起来，留下吃的，再留下两名战士看着，等打完仗再放。另外，通过这两人，我们还掌握了伪奉天骑兵教导团，今晚住在三道崴子，第二天一早去辑安这个重要情报。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当天晚上又回到二道崴子，对这场伏击战又进行了细致地研究部署。初春正是跑桃花水的季节，河水非常凉，

要过一条大河（苇沙河），我们的队伍来到大河边，一些小兵怕冷，谁也不敢下河。杨司令见状，二话没说，头一个下了河。他那个大个子头前一走，我们还有啥说的？也都噼里啪啦地全下去了。过了河，人家作战部队都进屋了，烤火烘衣裳不冷了。我们指挥部的就不行了。上了岸，杨司令也没拧拧身上的水，就往岗上爬，我们也只好跟在后面爬。到了岗顶，因为棉袄棉裤湿的呱呱的，现在这么一冻，再加上小北风嗖嗖地一刮，我们可就受不了啦。看得出，杨司令他冻得够呛，可他还是站在岗顶上，迎风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直到观察完了，他才亲切地问我们："冻得够呛吧？"我淘气地说："冻倒不冻，就是冷得受不了！"

杨司令笑了，他叫我们互相依靠着，挨的紧紧的躺下休息休息。我们按他的法一试，还真灵，比刚才暖和多了。不过还是冻得谁也睡不着，盼着快点天亮，盼着快出太阳。可是天不亮时，大家还可以动一动，冻急了，还可以起来蹦一蹦，活动活动。天亮以后就不行了，就不能动了。因为打埋伏么，岗顶上又光秃秃的没有隐蔽物，再冷也得老老实实地趴在那里，如果一动，就暴露了目标，会被敌人发现。好容易盼到出了太阳，身上才暖和一点儿。等到上午 10 点多钟，外边大街上开始动了。挑水的，扫院子的，喂牲口的……这些人全是我们自己人乔装打扮的。昨天夜里，我们一进沟，就把这个小堡子封锁了，只准进人，不准出去。要不一旦走露了风声，可不是闹着玩的。

10 点多钟，我们发现敌人已经从头道崴子村出来了。他们骑在马上，有的挎着枪，有的将枪倒背在肩上，什么姿势都有。队伍后边，跟着十几辆拉着炮弹箱子的大车，一共有 300 多人。当头前的尖兵，到了河沿时，指挥部的枪就响了，埋伏部队一齐开了火。骑兵行军有这么个问题，前边一打枪，后面的骑兵一时停不下来，往前一涌紧慢疏散不开，正好就全部进了我们的包围圈。原来我们考虑，敌人是骑兵，速度快，弄不好我们头前一开枪，由于我们的埋伏线不够长，很可能不会全兜进敌人，能跑出去一部分。谁知道，现在这么一开火，敌人就全部进了我们的口袋。有的敌人干脆连马也没下来就被打死了，有的可能要下来还没来得及，一条腿还挂在马蹬子上，就被打死，被马拖着跑了……没死的也都缴了械。整个

战斗，杨司令亲自看的表，仅仅打了十五分钟就结束了。除了敌人的团长（于芷山的小舅子）和3个尖兵跑了外，其余的全被打死和活抓。这次战斗，共缴了一门三号迫击炮，一架三八式重机枪、两架弯把子机枪、步枪接近300支，手枪、匣子枪有三、四十支，还有一批弹药。那十几辆大车上的炮弹箱子，除了有六发炮弹外，其它装的都是石头。原来敌人每门炮，只发给六发炮弹，为了吓唬人，虚张声势，就故意装上石头，招摇过市。

这次战斗，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奉天骑兵教导团，还包括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所俘战俘，除了留下会使用、维修轻、重机枪的十几个，剩下的70多名，经过教育，每人发给5元钱都放回家了。

（原文为王传圣口述　李重勤整理）

决定成立一军三师

二道崴子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完了战场，当天部队就撤到了附近的高丽沟里住下了。这时，军部第二教导团由军政治部主任孙铁坚和教导团政委周建华率领也来了。安顿下之后，杨司令的临时办公的屋里坐满了首长，其中有杨俊恒、王仁斋、孙铁坚、周建华和柳万熙等。由杨司令主持召开了军党委会，主要是研究成立一军三师及下步行动部署等重大问题。1936年5月间，在兴京（新宾）草岔沟正式建立了一军第三师。三师的组成，主力部队由军部的第二教导团，王仁斋同志带领的那个游击队（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团），还有五团的不足三个连，成立一个合成部队，师长是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组建完成后，集结地点在桓仁县的外三堡，进行暂短整训之后，再回到了河里抗日根据地。转移之前，留下了一支小分队，继续在摇钱树岭和刀尖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王传圣口述　文史委整理）

米架子“灯笼阵”

1936 年春，杨司令带领的抗联部队在米架子抓到一个探子，从他嘴里知道了辑安守备队顾问小樾四处调兵遣将，要围歼杨司令的消息。杨司令得知后，便对战士们说：“小樾这条老狗叫我们打疼了，他想亲自出马报复我们，咱们也不能让他空手回去！”杨司令说完，在地上来回走动，战士们都知道，杨司令又在琢磨歼敌的办法了。

突然，杨司令把大手一挥，说：“马连长，你马上通知各个队伍，晚上在这集合，大伙一块商量商量打小樾的办法。”说完，他领着五个抗联战士，从米架子岗梁上向高丽河子村的方向走去。

4 月的长白山区，冰雪还没化净。杨司令领着 5 个战士在阴森森的大树林子里，一跐一滑地走着。傍晚时分，杨司令他们来到了高丽河子村后的山梁上。山梁上，静悄悄的，只有春风刮着电话线在耳边呼叫者。杨司令站在一个大树下的石头上，看见高丽河子村里悠悠飘起的稀疏的炊烟，又皱起一双蚕眉。夕阳的余辉照在他那高高颧骨的脸上，泛着红润。5 个战士知道杨司令又在想什么，他们站在杨司令身旁，一声不吱地警惕着四方。

在这时候，有一个小警卫战士，从兜里掏一卷细铁丝，头上拴着个小石头，往辑安通往通化的电话线路上一甩，正正道道落到电线丝子上。然后，他很快接通背在身上的行匣子（电话匣），把耳机子扣到耳朵上听着。杨司令回头一看，他在截听电话，便问：“怎么，有情况吗？”那个小警卫战士轻轻点了点头，把耳机子伸向杨司令。杨司令大步流星走过去一听，果然有电话，是肖翻译官给驻在通化的守备队打电话，要求联合出兵围歼杨靖宇部队。杨司令听到这里，对着耳机子严肃地说：“我就是杨靖宇，我在米架子沟里，你们来吧，我等着你们！”这时，耳机子啊地一声，电话断了。

杨司令放下电话，看了看身边的 5 个战士，嘿嘿一笑，说：“小伙子们，害怕了吗？”一个战士忙说：“不怕！有司令在，我们个个都是豹子胆！”杨司令说：“那好，咱们赶快转移！”战士们跟着

杨司令，穿过林子，又来到高丽河子村的南山上。

高丽河子南山，离围子很近。掌灯时分，杨司令便领着小战士们来到村边的一户老乡家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打听村子里这两天的情况。吃完饭，杨司令又让老乡到邻居几户人家买一些粮食，背着上路了。临走时，杨司令又告诉几户老乡，等他们走了以后，到村公所去报告，说杨靖宇亲自领人下山买粮来了。

杨司令他们走了，几户老乡先后跑到村公所去报告。村长吓的头发都站起来了，赶忙召集自卫队去追。自卫队早就叫抗联打怕了，一听杨靖宇更是浑身发抖。他们来到村头，胡乱地向山上打了一阵枪，又都跑回村公所，说杨靖宇已经跑远了。哪知道，杨司令他们这时候却没有从山上走，而是背着粮食大摇大摆地走在通往米架子的路上。中途，他们还碰上一个砍柴、打猎的人，杨司令把他截住盘问了几句。后来杨司令一看他那双细皮嫩肉的手，知道他是探子，便没再细问，把他放了。探子刚走出不远，小警卫员喊道："杨司令，咱们快走吧！"那探子猛一回头，又赶快走开了。杨司令会心地一笑继续朝前走。

探子一听喊杨司令，吓得怀揣兔子——乱蹦，他连跑带颠回到高丽河子围子，一头扎到村公所，就把路上遇到杨靖宇的过程说了一番。村长把这情况和方才老乡的报告一核对，确定杨靖宇真在米架子沟里，赶忙抄电话向县里报告。小樾一听报告，也相信无疑，连夜给通化和头道的守备队打电话，兵分 3 路攻打米架子沟，围歼杨靖宇的队伍。

却说杨司令回到米架子山里，马连长通知的抗联队伍都已来到宿营地。杨司令放下粮食便和马连长他们核计办法。办法核计完了，各支队连夜行动去了。杨司令躲在马架子窝棚里睡了一觉。天刚亮，出探的抗联侦察员都回来了，他们向杨司令汇报了驻在双岔河东大营的伪警察讨伐队和驻在头道的日本守备队都有行动的迹象。杨司令听完，先派人通知各山头上的哨所，加强警戒，然后拿出一张自己描绘的地形图，小警卫员举着一根松明照亮，杨司令便拿着铅笔在地图上的米架子沟口、岗梁上和四平街地方划了 3 个圈，又在岗梁处划了一个箭头，直指热闹街上面的龙爪沟。看完了地图，杨司令又问马连长，其它准备工作怎么样了？马连长告诉他，一切都准

备好了。这时，杨司令披上旧大衣同马连长他们一块往山上走去。大约走了二里多路，他们来到高高的岗梁上的一个小山包。山包上，树大棵稀的树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中间还挂着一个大灯笼。杨司令高兴地夸赞了一番，便登上搭在树上的“岗楼”，向远处瞭望。

太阳升起来了，围歼杨司令的鬼子守备队和警察讨伐队纷纷出发了。一路是通化来的日本守备队，从砬子沟直奔米架子的四平街；一路是头道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讨伐队，从正面向米架子沟走来；另一路是小槭亲自带领的驻辑安的日本守备队和双岔河东大营的警察讨伐队，要从米架子沟的后坡上去，堵住杨靖宇部队的后路。这3路的进攻点，正是杨司令在地图上划圈的地方。杨司令对小槭早已了如指掌，胸有成竹地等待他们到来。

傍晌天，充当围歼杨靖宇队伍的先头部队的警察讨伐队，和抗联小分队接火了。抗联战士们占在各个山头打着冷枪，警察队刚往前活动几步，就撂倒他几个，打得他们像乌龟一样缩脖不前。直到下半晌，日本守备队上来了，枪声才像炒豆似的响起来。从米架子沟进攻的日本守备队，被占在南北山头上的抗联的机枪扫得不能前进，鬼子死伤很大。从四平街上来的鬼子守备队，也让居高临下的抗联战士压住了。这时，正在路上行军的小槭顾问，打马催兵，妄想偷偷从米架子沟的山背坡抄后路进攻。哪知道，杨司令早就在山梁上埋下了一个连的伏兵，准备收拾小槭这条老狗。

天近黄昏，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特别是米架子沟口仗打得更紧。突然间，抗联在山头上的机枪不响了，远处山梁下的树林子里升起缕缕炊烟。这下子可把守备队弄蒙了，他们哇啦哇啦直叫，不知抗联摆的啥阵式。他们想攻，怕中计，不攻，还怕交不上帐。于是，守备队便让警察讨伐队先打，磨磨蹭蹭一直快到黑天了，警察讨伐队才开始胡乱地往上冲，一直冲到山梁底下也没见到一个抗联战士的影子。又冲了一段，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发现在村子里丢下一些做饭的锅，有的锅里还剩下一些饭，炉灶里的火还没灭。鬼子一见这情景，知道抗联刚刚从这里撤走，便要向上追去。可倒好，他们刚一起动，抗联小分队的机枪又在林子里响起来了，山头上还噹噹响起了几声炮，炸弹在鬼子当中开花了。他们一见不好，天也开始黑了，上面林子又大，还怕上当，又龟缩不前。这时候，岭上

的枪声大作，弄得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杨司令一直在指挥米架沟这方面的战斗，要把敌人压在山半腰不能前进。所以，杨司令指挥小分队打到黄昏，便突然停止，使敌人一时不知所措，借着这个机会，让战士们生火做饭吃。可是抗联战士刚刚吃完饭，山梁上来人报告，说从背坡上来了两股敌人。杨司令知道小樾这条老狗耍花招，马上抽出一部份兵力，亲自领着去岗梁上堵击。

杨司令来到岗上的树上“岗楼”一望，果然不错，狡猾的小樾老狗，把东大营的警察讨伐队放在正面佯攻，而他却领着守备队，从背坡的一个沟膛里偷偷往上摸。杨司令立刻命令队伍向小樾射击，这样岗梁上枪声大作，把小樾打趴在沟膛里。

天黑了，守备队和警察讨伐队都不敢和抗联打夜战，各自找个地方，安营扎寨，放上哨兵，准备第二天再打。这正中杨司令的计了。抗联队伍也在岗梁一些地方住下，防备万一。夜里，抗联小分队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弄得几路的敌人不得安宁，谁也不敢闭上眼睛睡觉。而抗联战士，却轮班睡觉去了。

到了下半夜，杨司令命令把挂在林子中的各种灯笼点了起来。顿时，树林里红灯高照，一盏大灯笼亮在中间，格外显眼。3 路上的鬼子和警察，一齐向这里开火，林子里也叮叮噹噹的直响，又像机枪又像排子枪，有时炮弹和机枪子儿还在鬼子和警察的头上飞过。敌人真以为这里是抗联队伍的大本营了。3 路队伍同时向这里进攻。杨司令派了 3 个小分队，3 处还击，不让敌人上来。

天快亮了，林子里又点起火堆，显得更亮，杨司令首先命令堵击东大营警察讨伐队的抗联小分队撤退，然后又让占在米架岭半坡山梁上的小分队撤退，最后又让挂灯笼在林子里的几个战士把挂在水桶里剩下的鞭炮都点着后，到岗梁上来，杨司令领着他们和一个小分队的战士，狠狠打击小樾的守备队。同时也不时地向米架子沟和四平街的方向射击，使他们摸不透岗梁上有多少队伍。打了不到半点钟，杨司令看到东大营的警察讨伐队快攻上来了，把手一挥，说：“点鞭炮，撤退！”说完，领着队伍在天亮前很快从岗梁上撤走了。岗梁上的“枪声”，还是嘎嘎地响着。

杨司令领兵撤走了，可是各路的守备队和警察讨伐队还是打个

不停。当攻打米架沟的守备队和警察讨伐队攻击红灯高照的树林里时，东大营的警察讨伐队却抢先攻上了岗梁，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挂灯笼的林子里射击，林子里的敌人以为是杨靖宇的队伍在岗上，也往上攻打。四平街的敌人也认为岗梁上还是抗联的队伍，也攻打不停。敌人相互之间打乱套了。等到小樾这条老狗爬到岗梁上时，天已大亮了，他也跟着胡乱打了一阵子，后来一看情况不对劲，是自己打了自己，嗷嗷直叫唤，好歹算把各路队伍喊住了。这时，他们知道中了杨靖宇的灯笼阵了，鬼子警察死伤很重。小樾这条老狗，气得像个气鼓子，把头道守备队的大胡子指挥官打了一顿大嘴巴子。

（原文为于新江口述　卢庆福整理）

白砬子突围

二道崴子战斗后，我们在高丽沟子刚刚住了几天，邵本良就又追上来了。根据敌情分析，敌人可能在天亮以前赶到，杨司令就决定再狠狠打一下邵本良，然后再撤走。于是，我们在天亮前，部队全部上了山岗，由于我们才打了胜仗，士气高涨，加上地势又对我们很有利，部队士气相当好。

战斗前，我们问被俘的那个伪军机关枪射手：“你能不能参加战斗？”他说：“能。”我们又问：“你打的准不准？”他说：“差不多吧。”这样，我们就把机枪交给了他。天亮以后，邵本良的残部追来了。由于我们的重机关枪子弹一共就有两箱子，只得等敌人到了北边山坡下的一片荒地，重机枪才开始射击。那个射手打的还行，战斗一打响，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到壕沟里去了。打了3个小时后，我们又撤到头道阳岔大沟里的岭顶（群众称为“白砬子”）。那是在1936年4月9日，邵本良纠集1 000多伪军，把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团团围困在“白砬子”岭顶。伪军一军管区司令部接到邵本良的报告后，立即派伪军参谋长满良、顾问武田乘飞机赶赴现场指挥。在这一天里，我们一次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敌人轮番向白砬子岭顶抗联阵地进攻，都被我们击退。伪军越包围越紧，战斗打得十

分激烈，一直持续到天黑。入夜后，杨司令命令我们拣来木头，在白砬子岭顶周围点起一堆堆篝火，从远处山底下看，像挂起的一盏盏灯笼。杨司令随后布置几名战士站岗放哨监视敌人，让其余战士们睡大觉。由于我们点上了堆堆篝火，迷惑了敌人，敌人误认为抗联没有走，便放心地退下山坡，到老百姓家去睡觉了，梦想第二天天亮后，全部活捉抗联。到了午夜，杨司令等指挥员将战士们一个个推醒，根据白天侦查好的情况，从敌人包围薄弱的悬崖峭壁下的沟膛子空隙，部队不声不响地迅速地突出了敌人重围，到了离白砬子仅十几里远的高丽沟子进沟里住下了。第二天天亮后，敌人大队人马小心翼翼地攻上了白砬子岭顶，一看抗联部队早已无影无踪了。至今，这里的群众还传说："杨靖宇队伍飞了！"

（原文为宫明义口述，李重勤整理）

给赵家兄弟报仇

民国时期，在热闹屯的上面，有个村庄叫富言海。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大院高墙，四角有炮台。1935 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后，便搞归屯并户，他们强迫天桥沟一带山里的分散住户，迁到富言海围子住，让甲长和宪兵监视着。富言海离热闹街大约有四、五里地，热闹街有警察、宪兵和伪军驻守。

1936 年春天，一支抗联部队为了筹给养，在夜间十点多钟突然进了富言海围子。那天晚上是个月黑头，围子里的两个日本宪兵，到围子南角的老万家，找万家小姐抽大烟胡闹去了，听说红军来了，他们两个钻到老万家的马槽子底下，才算拣了条命，没被红军发现，后半夜红军走后，他们俩才敢出来，为了报功，他们用枪互相伤了腿，说是战斗中受的伤。然后，才派人去热闹报告昨天晚上红军打进了围子。

第二天一早，热闹街的日本指导官就带着一群宪兵警察和伪军来到富言海。他们一进去，就把大门关上了，只准进不许出。接着把围子里的男女老少集中在靠南大门的空场上，并强逼着老百姓跪在地上，前面架起两挺歪把子机枪。人到齐后，日本指导官开始训

话。其大意是，红军打进来，是有人通“红胡子”，逼老百姓讲出是谁通的“匪”。要是不说，就用机关枪将人统统打死。住了半天工夫，老百姓跪的尽管有人昏了过去，小鬼子急得哇啦哇啦地直叫，可也没有一个人说出是谁给红军开的门。日本指导官本来要下令开枪，不知谁给出了个主意，那个小鬼子便接受了建议，把老百姓关进两所房子里，然后一个一个地进行审问。结果不知是哪个没有民族气节的家伙，把赵家兄弟俩给递出来了。原来昨晚赵家兄弟俩从杨木桥子沟往回拉谷子，遇上了红军，叫开了门，领着红军偷偷进了围子。日本指导官听到告密后，立即将赵家兄弟俩抓起来，进行刑讯。第二天，又将他二人五花大绑的捆在大车上，拉到热闹街游街，然后拉到热闹的南山坡给枪毙了。

赵家兄弟俩遇难的第三天，那个日本指导官不死心，便领伪军和通化来的讨伐队，到杨木桥子沟里去搜山，和抗联一支部队遭遇上了。抗联战士知道，正是这伙敌人杀害了赵家兄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家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喊着“为赵家兄弟报仇”的口号猛冲猛打，很快敌人就被打死打伤数十人，狼狈逃窜，若不是仗着人多，那个小鬼子指导官也剩不下。

富言海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说是天理报应，高兴得不得了。

（徐光是抗联老战士，这是他在病床上写的史稿）

攻打台上警察署

1936 年 4 月 5 日，抗联队伍来到台上，包围了台上伪警察署和“集团部落”。对伪警察署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并高唱起《劝降歌》。伪警察署的署长和警察，拒不缴械投降，还抵赖往下拖，抗联部队在杨靖宇指挥下，顺手将手榴弹扔向警察署院内，然后发起冲锋，一举攻克了伪警察署，伪警察和自卫团全部被缴了械。杨靖宇站在村南边碾子上，对伪警察和自卫团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后，都释放了。抗联部队把伪警察署烧掉撤出。接着攻打花甸子（今花甸镇）伪警察分驻所。警察早跑了，我们看见他们抢的鸡蛋放在那

里，就放进锅里煮，准备每人分 10 个。还没等煮熟，邵本良从北面那个山岗上来了，我们没理他，不管鸡蛋熟没熟，捞巴捞巴装进铁桶挑着就走了。到了摇钱树岭，我们又住下了。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滚兔岭遭遇战

我们抗联部队在二秃顶子扎下密营，住了不几天，杨司令派我和朱学范等好几个人，到滚兔岭去执行一项任务，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出发了。

开头，我和小朱走在最前边，漫山的积雪，一踩进去挺老深，还咔嚓咔嚓的响，一步深一步浅的真难走啊。我们俩刚爬到岭顶，往岭下一看，正好有一股敌人，顺着拉柴禾的爬犁道上来了。一个个端着枪，像是发现了什么目标，在搜索前进，再有几十步，就到岭顶了。

我赶快拉小朱隐蔽起来。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在这节骨眼儿上，我也不能更多的考虑了，反正不能让敌人上来。我举枪撩倒了前边一个高举战刀的小头目，接着我就喊："队伍散开！敌人上来了。"

我这一喊，后边的几个人全上来了，噼里啪啦地接上了火。

我们的密营离滚兔岭不远，这边枪一响，部队知道我们遇上了敌人，机枪连上来 9 挺机枪，在岭顶上一架，居高临下，朝着往上爬的鬼子和汉奸扫了起来。

敌人是顺爬犁道上来的，往回退，退不下去，往两旁跑，都是树林子，大雪插裆深，打得他们无处躲藏。就有少数几个有武士道精神的，还"呀！呀！"地喊着往上冲。岭上的机枪，一个一个地点了他们的名。

正在这时候，杨司令也从密营赶来了。他在一个制高点上，从两道石缝中间，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突然，"叭叭"响起了几枪，我一看，是趴在一棵大树旁边的几个鬼子，发现了杨司令，他们一发一发地点射。我赶紧扑上去，拽住杨司令让他躲一躲。杨

司令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就是不肯躲。正在我们争讲的空当儿，“叭叭”又来了好几枪，有一发子弹打掉了杨司令的帽子。但杨司令毫不在意，还是继续指挥我们，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王传圣口述　文史委整理）

我的哥哥叶景山

我的哥哥叶景山在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开进了辑安一带时，投奔了杨靖宇，正式参加了抗日联军。

杨靖宇对有文化的人格外重视，叶景山因为熟悉这一带的情况，便很快当上了侦察员。他每次执行任务，一不带枪，二不带人，总是背着一个水龙布的画夹子，走到哪都说自己是个画画的。有一次，他在通化执行一项任务，被便衣盯了稍，当作可疑分子被抓了起来。

一个日本军官瞪着眼睛逼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他慢悠悠地说：“太君，你要画张画，对吗？”

他便打开画夹子，取出一张画递给他，说：“画画的如果是个瞎子，或者整天坐在炕头上，你叫他画什么呢？”

日本军官见问不出什么来，就笑笑说：“那好，我就让你来给我画张像。”

叶景山摊开画夹，提起笔，对着鬼子军官便画了起来，鬼子军官见他手不乱，心不慌，不一会儿，就把自己的模样画出来了。心想，看来确实是个功夫不浅的画家，便消除了怀疑，把他放了出来。

我哥哥是秘密地参加抗联的。好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他已参加了抗联。他一年到头很少回家，有时深夜回来了，还带着人来。慢慢我们就知道他是做什么了。家里老人都很害怕，整天提心吊胆地，因为要被日本鬼子发现，就会全家被杀，那样的事我们是看见过的。我那时年纪小，正念书，一年之中，我们只能见一两次面。但他每次回来，不管时间多么紧，总要给我讲点什么，有时讲红军少年连打鬼子的故事，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时，还教我唱抗联的歌。我听得入迷了，就要求去参军，他说：“景华，打日本要有文化，将

来建设咱们的国家更要有文化啊！你还小，要把学习搞好。等用着你的时候，我会叫你的！”在他的开导下，父母渐渐地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开始支持哥哥了。

1936 年 10 月，情况很紧急，他总是一天天地在外面跑，回家的次数更少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是抗联的团长了。有一天晚间，秋风刮得正紧，他领来了 16 个人，他们穿的很破又很单薄，其中有一个李营长负了伤，被一个战士搀扶着，我哥让我嫂子给他们倒些水喝。他们围在一起核计了一会，就又往东走了。

他们在离头道村不远的砬子沟住了一天，就被奸细发现告密了。半夜时，敌人从西面摸进了村，幸好被他们的岗哨发现了。他们急忙撤出来，走到砬子沟和米架子之间的一个小屯子里，又被迎面来的敌人截住了。他们只好退守在一所房子里。我哥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敌人两头夹击的情况，断定只有从东面突围，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从一个战士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斩钉截铁地说：“冲出去一个，革命就多一份力量。”说着便勾响了扳机。战士们不忍心让他掩护突围，可是一看他那白净的脸盘上暴着青筋，一双眼睛像吐出了两条火舌的样子，便知道现在只有服从命令。于是，便一个个跳出去，朝东面荒地突围了。

敌人料想不到这个抗联部队能这么迅速地集中火力进行突围，来不及调整力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时，十几个战士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上了东山。

我哥见同志们都已脱险，便和李营长边打边冲，想要夺路突围。这时，敌人已经调整了兵力，把他围得铁桶一般。不幸，一颗子弹又打中了我哥哥的左腿。李营长见他被打倒了，顾不得自已伤痛，跑过来背他。他一把推开李营长，说：“老李，现在不是管我的时候，快，我掩护你，先把文件烧掉！”

李营长这才想起，他身上还带着几份重要文件，便接过来，划着了火柴，把文件烧掉了。他们两个象卸掉了包袱，才松了口气。这时，天已经快亮了，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尽可能地争取突围的机会，李营长和我的哥哥分手朝不同的方向爬去。他拖着一条断腿，咬着牙，慢慢地爬到一个萝卜窖里，隐蔽起来了。

敌人进村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鬼子见一个红军没抓到，便

开始搜查。他们像一群野狗似的，看到了草地上的血迹，便顺着我哥哥爬过的痕迹找到了那个萝卜窖子。

一个鬼子军官喊道："喂，快快地把枪扔出来，缴枪不杀。"一句话没喊完，只见窖子里"叭"地一枪，那个鬼子便归了西天。

鬼子一见活的抓不到，便叽里呱啦地乱叫了一气，一连朝窖子里面扔了几颗手榴弹……

我的哥哥叶景山，就这样牺牲了。鬼子割下了他的头，要带到通化去示众。我那时还在通化念书，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含着眼泪到处查找。后来才听说，敌人还没等拿出来示众，就被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把我哥哥的头偷了出来，经过几次转手，躲过了敌人的追查，在家乡安葬了。也是在后来，我们通过多方了解，才知道了我的哥哥叶景山壮烈牺牲的详细经过。

（原文为叶景华口述　姜运超整理）

再攻台上警察署

1936年8月，抗联一军部队，驻在台上镇兴安村湖里夹板沟。8月21日下午，抗联部队打发两名抗联战士，到台上镇去购买点食盐等东西，哪知道到了台上"集团部落"门岗不让进。当抗联战士回去汇报，抗联部队决定，当晚再次攻打台上伪警察署。这天傍晚，抗联一军第五团、第六团，还有拿着刀斧的兴安村农民参战。原来台上伪警察署被抗联烧掉后，搬到"东盛勇"（今台上镇供销社收购部）商号院里。杨靖宇把抗联五团、六团分成4路：一路攻打"集团部落"后山炮台，其余3路攻打"集团部落"。抗联首先拔掉了"集团部落"后山炮台。抗联战士和随来参战的农民群众，用刀斧砍断了"集团部落"外的铁丝网，沿着打开的铁丝网缺口，顺利地攻进了"集团部落"。伪警察躲在"东盛勇"大院的炮楼上，抗联部队用机枪猛烈扫射。在火力猛烈地射击下，炮楼上的伪警察抵挡不了啦，便纷纷举枪走下炮楼投降，并俘虏了伪警察署长沈志文，缴获20多支步枪。当抗联部队攻到"义和永"商号大门时，叫门不开，就用大木头将门撞开，打开了粮仓，将粮食分给农民群

众，把棉布和胶鞋等物品带走作为抗联的军需补充。抗联部队撤出台上后，连夜攻打了花甸子伪警察所，把台上俘虏的伪警察带到荒岔沟里，经过抗日救国的教育后，都释放了。

（原文为宫明义口述　李重勤整理）

杨司令的“空城计”

1936年12月5日，杨靖宇得悉日伪军已开始冬季讨伐的情报，一面布置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向西转移，一面由他自己带着30人的警卫排，来到辑安老岭一带联络红军的二师六团，以便做好这一带反讨伐的准备。

这天中午，我们来到黄柏甸子，刚刚与二师六团的交通接完头，老百姓就来报告，说日伪军的大队人马已经从辑安县城开来了，像扇子面似的把大荒沟、黄柏甸子至老岭山根下一线全部包围了，扬言：一定活捉杨靖宇。

得到这一情报后，杨靖宇将军经过一段思索后，向我们挥了一下手，表示大家跟他走。于是，我们立即出发，从黄柏甸子往大青沟里转移，为了缩小目标，我们避开大道，延着崎岖的山间小道，钻进了荆棘丛生，野藤交错的林子里，不知走了多远，当黄昏时，我们在一个盆地的中央发现一座破烂不堪的民房，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屋里面空荡荡的，除了两面缺席的土炕和无锅的火炕，屋角布满了蜘蛛网，院内还有牲口棚子和一座苞米仓子。看完里里外外之后，杨靖宇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隐蔽的好地方，我们在这住下了。”这时，我心里想：“在这住下，怎么能成呢？敌人眼看就要进黄柏甸子，这座房子是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也是敌人的一个目标，多么危险那！”我想说，但见到杨司令威严的面孔，就沉默下来了。

在这时，杨司令打开了地图，用手指着地图上的波纹，说：“来！你们看看，我们已被包围了。敌人这次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已没有去路了，只好在这等待时机！”他睁大了眼睛，巡视了大家一下，问道：“同志们，你们能经得起考验吗？”大家齐声回答：

"能。"

我们在这座破房子里，呆了四天，还不见敌人来到这里，只在前两天隐隐约约地听到盆地缺口处有人喊"有没有人"的声音。周围还是很平静。但我们一直没有闲着。在杨司令的指挥下，我们在房子的墙上，挖了八个枪眼，今天杨司令又要我们掏地面。挖枪眼好理解，可掏地面干什么呢？我们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大家都坚信，杨司令让干的不会错。我们干得很欢，没有锹镐，就用刺刀在冻僵地上挖。在杨司令瘦弱的那张脸上，不一会儿就流下了汗珠，我们劝他休息，他拒绝了。大家忙活了一上午，才在两面炕的中间掘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深坑。这时，大家已累得筋疲力尽了，但杨司令又要我们在厨房靠门的两个墙角挖两个深坑，挖成三角形，约莫能卷着身子躺下 6 个人。大家指望能休息了。这时，杨司令又说："我知道大家很累了，但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来，把挖出的土送到房外坑里去。"他边说边干了起来，大家见杨靖宇带头干，也都干了起来，都忘记了疲劳，不一会儿，把土也都运出去了。而后，又在地面上覆盖一层雪，使之与附近的冬景浑然一体，看不出丝毫的痕迹了。杨司令由于过度疲劳面如白雪。

在杨司令告诉要干的都完成后，他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全部完成了。现在我批准大家每个人吃一茶缸豆面，可还有一条，大家还得把院子和猪圈里的烂草打扫打扫，放在屋里土炕里。"大家刚坐下在新挖的土炕里，靖宇同志又说："同志们！让我们把'城门'打开吧！"他一脚把窗户踹开了，两块窗户"呼啦"一下掉到院子里。我们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时，杨司令像是大功告成似的，安稳的坐下来，对大家说："同志们！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吗？"一提起讲故事，大家来了精神。大家聚精会神听他讲着"空城计"……。而我们要做到绝对隐蔽，使敌人来到窗口也不觉得屋里有人，没必要"进城"，那就靠我们很好的爬土炕了。

第二天，太阳刚爬到头顶，突然发现前后山头出现了敌人，从服装和说话声音让我们判断出是伪军。山沟里回荡着敌人的喊声："有没有？""没有！"这时，"啪！啪！"猛然两声枪响，火炕震动了一下，我们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都紧张的警戒着，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杨司令双手握枪，从枪眼里监视敌人活动，可是在山头

上只发现敌人摇摆红旗，然后升起一个信号。敌人便消失在密林里，我们略微伸伸腰腿，发现炕面上有个碗口大的窟窿，大家没有去研究它，只是会意地微笑着，庆幸 “空城计”的首次胜利。

在连续的几天时间里，成群的敌人在山沟里搜索者，来来往往没断，但屡次都是嚎叫一阵就走了。因为敌人这样频繁，我们也不觉得紧张了。这时，看来真正可怕的倒不是敌人，而是越来越寒冷的威胁，从杨司令把“城门”打开起，我们就仿佛在北冰洋里，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不停的往我们这个“小城”里灌，许多雪落到北面无窗的炕上堆成了堆，渐渐地凝结成冰窖。冰窖下边的我们，我们脚靠脚，背靠背，挤在一起与这无情严寒搏斗，冻得我们上牙打下牙，浑身打哆嗦，腿和脚裂成血口。更严重的威胁着生命还不只是这个，我们每个人只有一茶缸苞米粒子，里面还混有四分之一的泥沙。因为它是从苞米楼子地上抓来的，虽然很脏，但不得命令还不准吃。吃什么呢？吃树叶，树叶已经枯萎了，吃皮带又嚼不烂，用火煮还不准生火，实在不行了，就吃衣服上的棉花，棉花絮，咽不下去，杨司令告诉我们拧成小棉花球泡雪花硬吞。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杨司令！咱们突围吧？”杨司令说：“同志们我不早跟大家说了吗，那是鸡蛋碰石头！”杨靖宇和大家一样饿得精力殆尽了，但他强打着精神鼓励者大家。

大家的心里都一样，“一定保护好杨司令”。当韩排长号召我们把仅有的一点苞米粒留给杨司令吃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的袋子递过来，被杨司令制止了。杨司令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再勒紧裤带挺过几天，等把这点苞米粒吃了，实在挺不住了，我们再想办法……大家还是睡觉吧，睡觉是不想吃东西的。”

第二天，天刚放亮，日本鬼子又来到沟里了。大家伏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着殊死的决斗。日本鬼子叽哩哇啦愈来愈近了，走到院子当中站住了，领头的军官拿刀指了一下，一个走狗就奔苞米楼子来了，望了望苞米楼子又瞅了一下猪圈，一直来到窗子跟前。这时我们都屏住呼吸，紧扣着扳机，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敌人。这些家伙，看了结冰的炕面说了一句：“妈的连点影子都没有。”便哈着腰走到鬼子跟前说：“太君，里面空空的……”他咕噜一句日本话“山上的去！”日本鬼子军官的刀一挥，其余的鬼子都跟上去了，直到

鬼子的背影在林中消失了，我们才眨巴了一下眼睛。

这时，我说："杨司令，咱们还是突围吧！"他瞅着我："小张，你还有几颗子弹？"我说："还有两颗！"杨司令命令大家把子弹数一数，一共有 99 颗。杨司令对大家说："同志们！99 颗子弹，要在 16 万敌人手中突围能打死多少鬼子啊！"接着又说："同志们，不要性急，性急吃不了热锅饭，敌人扫荡是一阵风的，过 10 天 20 天就会退的。"

我们已经在这熬过 15 个昼夜了，今天是第 16 天开始，由于难忍的冻饿的折磨，早就想要出去拼个你死我活，但杨司令说："再坚持三两天一定会胜利！"因此，我们还继续坚持。早晨，韩排长把大家空空的干粮袋，使劲的拍打，好不容易才拍打出一酒盅豆面。他说："这点豆面无论如何得给杨司令吃！"就在这时山窝窝里又骚动起来了。一个伪军官暴跳如雷地吼着问："有没有？""没有。"难道"杨靖宇飞了。"他像疯子一样，挥着白晃晃的刺刀，砍在树上。树上的雪花被震落下来，纷纷落在呆立的军官的头上，一群敌人耷拉着脑袋呆立在那里。

那个疯人似的军官，见他部下一点反映也没有，就用刺刀指着下级军官的鼻子喊着："从谁那里跑掉的？说，不说把你们全部杀掉！"停了一会儿，那个疯人似的军官不得不泄了气，颓丧地走了。不一会儿，到处响起了号声，日军和伪军全部撤出山了。

第二天，杨司令叫韩排长和我下山去联系。百姓听说杨司令还活着，高兴的哭起来。

消息传开了。红军二师六团的刘团长，带着几个抗联战士来和总司令杨靖宇会合了。还带来一个可笑的消息：通化城里的老百姓，昨天见到敌人用汽车载着一个人头到处宣扬战功，说红军匪首杨靖宇已被击毙。那些鬼子汉奸在庆功会上，对着人头直喊"邦扎衣！邦扎衣！（日语：万岁！）"杨靖宇将军一听哈哈大笑："这才叫演戏呢。这些丑角装的不像样，真还下不了台呐！"附近夹皮沟屯的老百姓带着吃喝到山里来接总司令。

（原文为张泉山口述，李重勤整理）

“许大烟灯”落江记

“许大烟灯”是当年良民甸子村（今青石镇下套村良民屯）头号财主，平常为人奸诈刻薄，因为抽大烟瘦的两只眼睛眍眍着，老百姓暗地里都叫他许大烟灯。1936 年冬天，日军讨伐队进驻村子开始围剿抗联后，许大烟灯为保全家产，更为混一官半职，不惜血本溜须讨好讨伐队，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侍候，终于当上了警察所长。更可恨的是依仗鬼子权势，欺压村民，密报抗联活动，因此，抗联决定除掉他。

农历正月 20 这天早上，许大烟灯早早起来，穿戴整齐，备了一份厚礼，叫上 4 个卫兵，喜洋洋地踏着鸭绿江的冰面到对岸朝鲜瓦皮窖日军讨伐队长家祝寿去了。

许大烟灯一行人过江后，抗联冷支队长率人在他回来必经的江面上用斧子凿开一个两丈见方的冰窟窿，然后又用碎冰块填充伪装好。因为天寒，很快又结成一层薄冰，不注意很难发现。然后冷队长又对月梅布置一番。

冬日天短，等许大烟灯他们从日军讨伐队长家中酒足饭饱回来时，已是黄昏时分了。走在前面的许大烟灯突然停住了脚步，使劲地睁开朦胧醉眼，不怀好意地向身后卫兵问：“你们看前面冰面上是什么？”

卫兵们向许大烟灯讨好，并报告：“所长，是个娘们，正在捣鼓马爬犁呢，可能是爬犁坏了吧？”

许大烟灯淫笑着说：“咱们的艳福不浅哪，又有肉吃了，弟兄们馋不？”

一听玩女人，卫兵们高兴了，高声嚷着：“煮熟的鸭子还能叫它飞了吗？弟兄们不吃素！”

“好，你们给我好好警戒，本所长先尝个鲜。”许大烟灯有些急不可待了。

“所长，你自己过去我们不放心，这一带抗联活动频繁，是不是我们一起……”一个卫兵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放屁！你小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一个荒野村妇也成了

抗联不成，你们给我好生望着风，一会儿人人有份！”许大烟灯喝住卫兵，大摇大摆朝马爬犁走过去。越走越近，许大烟灯也就越高兴，因为他看到蹲在马爬犁旁系绳扣的女人穿着鲜艳，是个新媳妇。他便喊了起来：“大嫂别着急，本所长来帮你！”

听到喊声，那媳妇似乎紧张起来，一阵手忙脚乱地系完绳扣，便登上了爬犁。许大烟灯一见不免心头一阵着急，高喊：“大嫂，等等，我有话问你！”边喊便朝马爬犁跑过去。突然“嘎巴”一声，许大烟灯脚下的薄冰裂开了，紧接着又“扑通”一声，许大烟灯掉进冰窟窿里，冒了一串气泡就顶了“锅盖”。

这边卫兵们等着看所长的好戏，可眨眼间所长却不见了，等他们跑到冰窟窿旁边，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月梅已扬鞭催马，爬犁好似离弦之箭，已跑的无影无踪了。

（摘自《古城沃土》文史委整理）

只身巧歼日本兵

米架子八宝沟有个仙人洞，洞顶岩石重叠，树木挺拔，一条清清的小溪从洞前蜿蜒流过，一、二斤重的细鳞鱼在溪水中遨游。就在这里，流传着一个抗联战士巧歼日本兵的故事。

抗联小战士吕云凤，才 17 岁。他原先是给地主李独耳朵扛活，后来跑出来参加了抗日联军的。

抗联战士人人都有一支枪，可吕云凤没有，他多么渴望得到一支枪呀。他恨死日本鬼子了，目睹过日本鬼子烧杀同胞的惨景。他下决心，一定要亲手杀死几个鬼子，夺几支枪。营长见吕云凤年纪小，又机智聪明，便派他去头道崴子给伤员买药，吕云凤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吕云凤来到头道崴子，躲过岗哨，很快到药铺把药买好，带着药，朝米架子方向走去。突然，有两个日本兵挡住他的去路。

日本兵喝道：“站住，什么的干活？”

吕云凤一怔，眼珠子一转，便巧妙地回答：“我去挖人参，人参大大的有，挖回来能卖好多的钱。”

日本兵又问："人参的，哪边的有？"

吕云凤不慌不忙的回答："人参，米架子八宝沟里大大的有，挖一棵就能换回 8 个元宝，挖两棵就能换回 16 个元宝，吃一棵还能长生不老。"

日本兵听得入了迷，其中一个突然抓住吕云凤说："你的撒谎，那边抗联的有，心坏了坏了的，枪毙的有！"

吕云凤面不改色的说："抗联早都走了，你们不信，跟我的去一趟看看。"

日本兵松了手，又问："抗联真的没有？人参真的有？实话的说，要不死了死了的。"说完，打了个手势，做出个开枪的样子。

吕云凤从容回答："真的没有抗联，人参大大的有。"

两个日本兵用日语哇啦一阵，一个日本兵又说："你的带路带路的，人参大大的挖，我的钱的大大的给。"

吕云凤点头答应，并说："你们的话可要算数，要不我可不去。"

日本兵啪地打了吕云凤一个耳光，骂道："八格牙路，你的快快地带路，不去死了死了的。"

吕云凤在前面带路，两个日本兵提着枪在后面紧跟着。吕云凤看着日本兵手里的枪，心里馋的直痒痒，他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打死，夺下两支枪。他左思右想，不行，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两个人，只得想个办法智取。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个妙计来。

他们走到阎家沟门，吕云凤坐在地上不起来，只嚷饿得走不动。

日本兵急于到山里挖人参，掏出饼干罐头让吕云凤吃。吕云凤吃完，站了起来，摇晃了一下身子，觉得自己有了些力气。

他们继续往前走，沉重的背包和子弹枪支把日本兵压得冒了汗。当来到八宝沟，吕云凤告诉日本兵，前面就有人参，要慢慢地找。吕云凤拿着小棍，不停地拨动着野草，佯装找人参。日本兵虽然不认识什么人参，也得紧跟在吕云凤的身后。树木林立，杂草丛生，日本兵背着背包和枪支弹药，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他们向四周看了看，听了听，确实没有一点动静，才放下心来，把枪和背包放在大树下边，又继续跟在吕云凤后面寻找人参。

他们边走边找，吕云凤见时机一到，突然向前蹿出很远。日本兵没及时反映过来继续往前走，"咕咚"一声，掉进了鹿窖子里。

鹿窖子是一个长方形，很深很深的大坑，上面用树枝杂草伪装好，鹿走到这里掉下去就会被逮住。前几天，吕云凤看到这里有个鹿窖子，所以便把两个日本兵引到这里来。这个鹿窖子没逮住鹿，却逮住了日本鬼子。

两个日本兵叽哩哇啦直叫，边叫边喊："小孩，过来过来的，把我们的拉出去，大大的有赏。"

吕云凤抱起个大石头向一个日本兵砸去，当时日本兵脑浆迸流一命呜呼。剩下的一个日本兵更急了，大声喊叫："你的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他一边喊着，一边手脚乱蹬乱抓，可怎么也爬不上来。吕云凤又搬起石头向他的头上砸去，他也立时蹬了腿。吕云凤怕日本兵不死，又搬起一些石头猛砸一阵，才算罢休。

吕云凤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去大树下边拿起枪支，高高兴兴地回到抗联营地。

（摘自《古城沃土》文史委整理）

关老爷"显灵"　小鬼子丧命

民国年间，双岔河到榆树林子中间的老爷岭是个交通要道，岭北双岔河、台上、花甸、韭菜园、热闹街、青沟子等村镇，来往于岭前岭后包括岭前去通化县（今通化市）的车辆，都要经过老爷岭。

老爷岭距辑安西北 24 公里，是长白山一大支系，山高林密，峰顶海拔 960 余米。因山高路窄坡陡，过岭的车经常在这一带翻车，人畜时有伤亡。车夫们多数不敢走这个岭。几户地主、财东和商贩们为了愚弄车夫，筹集资金，合伙在岭上路边建了一座二层楼高的关帝庙。大庙由前后两栋 5 间正殿，东西两间有配殿，大院前面有两个角楼，院中一个钟鼓楼，庙门两边有东西两座马殿，俗称老爷庙。有道长郑灵、道士刘志兴等人管祀。他们还编造了一个关老爷显灵的故事：说一年深秋，有人发现地里的冬小麦，在一夜里被牲口吃了不少，大家便都来看，见到麦地里的马蹄印忒大，庙里的马嘴里还叼着麦苗。这便是关老爷显灵了。地主、财东们说，有了关老爷保佑，行车就安全了！从此，车行此处，车夫们都来烧香磕头，

祷告关老爷保佑行车安全。由于这个庙，这道大岭就称为老爷岭了。

距辑安县城（今集安市城区）西南 60 余公里的外岔沟村，是靠鸭绿江上闻名的水旱码头。清朝光绪和民国年间，是辑安经济贸易中心。这里有 700 多户人家，大部分是老式瓦房，人烟密集，商业兴隆。东有上排窝子，西有下排窝子。从长白山砍下的原木，春天开江后，穿成木排，沿鸭绿江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经过这里。靠岸、休息，补充给养后，再放流至安东（丹东）。沿鸭绿江上行，船可达临江和长白八道沟，下行直达安东。车来船往，十分热闹。许多地主、商号把从农民手中收购上来的大批粮食、木材、山货，用马车、牛车、驴车，不间断地从各地运往外岔沟经销。伪满时期，日军的一个守备队就驻扎在外岔沟。

1937 年农历八月十五，驻外岔沟日军指挥官佐藤一郎上尉带领一些日本兵乘两辆军用汽车，到岭后“讨伐”抗联，遭到了抗联的伏击。在逃回外岔沟的途中，在老爷庙休息，他们发现庙里地上有干草，怀疑抗日联军部队在这里住过，佐藤一郎便下令放火烧了关帝庙，把关老爷庙烧得只剩下一个钟鼓楼。

日本人信神，特别崇敬关帝。烧了关帝庙后，心存恐惧；加之去“讨伐”抗联，中了埋伏。虽侥幸狼狈逃出，却心有余悸。下午从双岔河往回返，经过通天沟岭时，天全黑下来。本来是八月十五月儿圆，可能是老天发怒，乌云压顶，伸手不见五指，却偏偏这岭路窄坡陡。下岭时，由于驾驶员心神不定，下盘道转弯时，后车正好翻扣到前车上，砸死许多日本官兵。当时我父亲住在通天沟门，父亲赶马车，被日军捉去连夜向外岔沟街里运送死伤官兵。当他们赶到现场时，见汽车滚到路边，已经砸得不成形了。路上道下，横七竖八，到处是死、伤的鬼子。因为天黑看不清有多少，只能听到伤者的呻吟声。现场指挥的小鬼子，紧催着往车上抬死、伤者。折腾到大半夜，才打扫完现场。估计死、伤五、六十个，没有几个好着的。小鬼子还威胁不准向外讲。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地老百姓知道后，无不拍手称快。都说“关老爷显灵，小鬼子火烧关帝庙遭报应，砸死活该！真痛快！”

（原文为蔡克仁整理）

杨司令为抗联设计帐篷

1937 年春天，我们到了辑安，在摇钱树岭、刀尖岭找到抗联小分队，就在那住下了。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研究起住的地方来。因为 1935 年冬，敌人开始推行“三光”政策，归屯也就大部分开始搞了。这样，山里的房子基本上都烧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只能住山沟里那些还没完全烧毁的破房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天气冷到零下 30 多度时，实在受不了。再不解决住的问题，是不行了。因此，杨靖宇将军早已在心里琢磨这件事了。

开始，靖宇将军先在纸上画，画完了又剪，剪完了又用浆子糊。先是搞了个圆型的，当中用棍子支起来，转圈用绳子拉，门放在一头。这玩艺儿研究出来后，发现有个毛病，就是敌人用机关枪一封门，要跑也跑不出来。后来又做了几个，也不理想。最后搞出来了一个像个房子、在中间开门的帐篷，转圈用木头压好，夏天可以用石头压。这个样好是好，只是一有情况，拱也拱不出来。这就说明在中间留门也不科学。另外，这种帐篷顶上还得留个方眼，在里边拢火时好往外排烟。否则门关严后不通风，里边的人憋得慌。要是夏天太阳再一晒，里边热的就更受不了啦。后来，杨司令又经一番仔细的研究，设计一种从两侧开门的帐篷。这种帐篷在热得不行时就将两头打开通风，用了一段时间后，大伙也照着这么办，从那以后，我们的帐篷就做成了这个样式的，再也没变。从此，新的帐篷诞生了，受到了战士的好评。

（原文为王传圣口述　李重勤整理）

抗联创立老岭抗日根据地

老岭抗日根据地，是杨靖宇率领抗联一路军在斗争转折的关键时期和斗争环境最艰难时期，在辑安（今集安）秘密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几度成为东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和在这个根据地召开两次老岭高干会议、成立一路军总司令部以及重新使东南满抗日斗争进入高潮等重要历史史实，在中国抗日战争、东北抗日斗争和抗联一、二军、抗联一路军抗日斗争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一路军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辑安老岭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历程和较长历史时期。其创建大体上分为 3 个阶段。

一师部队进入辑安与北部游击区和密营地的建立

1933 年 10 月底，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渡过辉发江，南下开发游击区，在不断袭击敌人的同时，派出多路人马，进入包括辑安在内的原辽宁民众自卫军活动区域内，联系各路抗日民众自卫军部队及其散兵游勇以及其他抗日部队。在很短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就联络和收编了大批抗日部队。

1934 年 1 月 18 日，杨靖宇率一军独立师和抗日军“臣军”攻占八道江后，独立师部队首次进入辑安辖境，在三道沟一带(时为辑安县太和保，1944 年划归临江)筹集给养。2 月 21 日，独立师与南满 17 支抗日武装的代表在临江三岔子附近举行会议，即著名的城墙砬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为参谋长。嗣后，以收编的各路抗日部队改编和成立南满抗日联军八大支队和两个游击大队。是年 4 月 28 日，独立师攻占临江林子头，部队再次进入三道沟一带，不久又深入到辑安腹地的黄柏秋皮和天桥龙爪沟一带建立了抗日秘密营地。

1934 年 9 月，人民革命军和南满地区党组织在临江、金川交界的河里召开了全南满党团军政主要干部会，决定成立一军；同时

决定乘收编改编抗日军取得可喜成果之机，进一步“开辟广泛的新的游击区”，一师一部再次进入辑安境内活动。东北抗日联军相关史料记载，自此“我军开始活动于桦甸、濛江、临江、金川、辉南、通化、柳河、辑安、桓仁、兴京、西安、海龙、伊通、双阳、吉林、宽甸等广大区域。”同年11月5日，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决定正式成立一军和建立中共南满临时特委。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下辖一师（时辖第3、5、6团）、二师（时辖第8团）和教导团。其中一师由李红光任师长，韩浩任副师长，程斌任政治部主任，其活动区域被正式确定于辑安、临江一带，建立游击区。设在辑安三道沟、黄柏、天桥沟、太平沟、东岔一带深山老林中的秘密营地逐渐增多，并成为一师的重要后方基地。

一军军部进入辑安与中部根据地的初期建设

1935年初，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得到了关于日伪为切断人民群众与人民革命军的联系和支援，即将实施归屯和将进一步强化区村保甲制的确切情报。一军领导决定，针对即将出现的险恶局面，要进一步扩大游击区，增建抗日根据地，落实好1934年2月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中提出的“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的要求。遂命一师自辑安、临江一带挺进桓仁、兴京（今新宾）、宽甸、本溪一带巩固老游击区，开辟新区；命二师在濛江、金川、辉南、桦甸一带活动，留下教导团在临江、通化一带坚持斗争；军部和直属队进入辑安，在开创辑安中部老岭山脉根据地的同时，协调和策应一、二师以及教导团的军事行动，指挥各部队迅速建立稳固的秘密营地。

辑安老岭山脉，是杨靖宇亲自选定的根据地预设区。它位于辑安县中部，属长白山南脉，由一连串的高峰峻岭组成，这条山脉将辑安分成了岭南、岭北两部分，它山势险峻，地形复杂，崖高林密，与村屯距离较远，适于部队秘密出入。同时，这一带一直是一师的游击区，分布着十余处一师密营，而且仍保留了一部分群众“关系”。是年2月，杨靖宇率部进入辑安山区，将司令部先后设在东岔岭、

龙爪沟和太平岭密林以及榆林复兴沟朱家炉等地，杨司令率部袭击了日寇通化至辑安警备道巡逻车，并活动到了财源马蹄一带。又分别在台上湖里、马蹄沟沟里（今新建村）老平台建起新的密营。

由于日伪开始在辑安大肆进行归屯和强化区村保甲的干扰，一师部队几次南下作战，直到3月底，才在桓仁和宽甸一带站稳脚跟。同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独立师正式扩建为第二军。同时，一师南下作战也取得了较好的战绩，但不幸的是，是年5月11日，一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和兴京交界处与敌作战中不幸身负重伤，并于次日牺牲，杨靖宇将军闻讯后，不得不放慢老岭根据地建设步伐，留下部分人员扩大根据地，并继续寻找作为密营的最佳地点，同时亲率军部和卫队团赶赴桓仁、兴京一带。杨靖宇将军命副师长韩浩接任一师师长，并率军部与一师一起行动，先后转战于桓仁、通化、金川、濛江一带。9月11日，军部和一师在金川朝阳沟袭击了邵本良部；10月初，一军司令部和二军西征队在濛江那尔轰附近会师，并决定两军联合夺取安图作为人民革命军在东满的根据地。11月底，一军司令部与一师又突然出现于宽甸步达远钓鱼台夹击了伪警察队；翌年1月，军部直属队夜袭本溪碱厂；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但由于敌人实施“秋季治安肃正”，自九月下旬调动三毛部队、尾高部队、岩越部队、川岸部队、谷部队，儿玉部队等日伪军大部从事“全面肃正”，其中“以三毛部队为基干部队，担任安东及奉天三角地带及东边道方面的讨伐。到处扫荡匪徒，剿灭他们的巢穴，籍以分裂匪团；并广泛分驻于秋季肃正工作地区之要处，从事搜索残存匪贼，以游击队到处追击与捕捉匪徒（《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是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语）”。同时在各县设治安维持会、宣抚小委员会实施诱降宣抚等，也使抗联力量遭到极大的损失。

1936年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和军直属队秘密杀回辑安老岭一带，进入根据地新址之一的天桥龙爪沟一带秘密休整。当时，在东满一带活动的二军正式扩编为两个师。与一军形成了犄角之势。抗日斗争形势有所好转。北满的抗日斗争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署名发布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是年3月下旬，杨靖宇率一军军部和独立团再次回到辑安山区，并于4月

4日在辑安二道崴子，伏击歼灭了伪奉天骑兵教导团，引起了驻辑安一带敌人的惊恐，派出大批密探，搜索一军军部踪迹。为保护根据地建设，杨靖宇决定率部离开密营，与敌周旋于岭后浑江沿岸一带。4月9日，得到台上警察署和花甸警察分所的密报，日军在辑安头道阳岔，以重兵将杨靖宇率领的一军司令部包围。伪第一军管区司令部立即派伪军参谋长满良、顾问武田乘飞机赶赴现场指挥，但被杨靖宇率部乘夜巧妙突围。4月15日，一军直属队袭击了告密的台上和花甸两个警察署、所，对敌人进行了惩戒。为加强与二师的联系和准备成立三师，同时为减少敌人对老岭各密营组成的秘密根据地的注意，一军军部和卫队团留下伤病员在根据地养伤，其余人员再次于6月底转向濛江一带活动。

是年7月初，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金川河里地区召开，二军魏拯民政委率一个连与一军会师。在主要领导干部会上，一、二军领导决定，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其中第一军当时有基本部队3 000余人，辖一、二、三师和教导团，军部设有秘书处、军需处和军医处；第二军辖四、五、六师和教导团；在改称抗联的同时，正式将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

抗联一路军与老岭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日伪为对付日趋活跃的抗日联军，从1936年春天起，对1932年开始的保甲制实施进一步强化，1936年指定包括辑安在内的55个县“实施特别巩固”（1937年又指定60个县），建立自卫团，以“归屯、保甲连坐”和“出密探”等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抗联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抗联活动日渐困难。日伪扫荡中“剿灭匪贼巢穴”等措施更使各抗联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后，辑安老岭山区的秘密根据地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重视，一路军据此增加了对根据地使用率，军部先后数次回辑安休整。同时也相对减少了在辑安各密营根据地周围的作战。同年秋，杨司令又一次留下军需处、军医处的部分人员留守根据地，亲率警卫旅等直属队转入外线作战。

1936年7月，日本关东军下发第853号命令，决定实施年度内第二期治安肃正。关东军司令部在《第二期治安肃正纲要》中强调，在“前半期（8、9月）将肃正重点放在治本、思想工作上，即加强掌握群众、分离匪民、建设治安设施等工作”，在“后半期（10、11月）以治标工作为主，展开果敢而适当的讨伐，逮捕等消灭匪徒之行动。治标（军事讨伐）工作的重点，依然是歼灭在满洲国东部地区的匪贼，特别是歼灭共匪”。要求各地边防卫司令官“将其属下或指挥的部队固定分散在各县或游击区内”，治标时，要有“持久的行动和宪警灵活的配合动作”。“尽可能将多数满洲国军向北部东边道方面集中”，“独立地担任桦甸、安图两县之南部及东边道（抚松、濛江、辉南、金川、柳河、长白、临江、通化、辑安各县）的治标工作”。在治本上，强调“要促进、加强、建设集团部落，设定无人区，以及警备道路、通讯网等设施；在治标上，要做出使匪贼无存在之余地的措施，剿灭匪贼之山寨……亦要运用盘查、逮捕等工作，剿灭潜伏逃亡之匪徒”。同年11月，日伪为扩大治安肃正成果，关东军司令部又实施年度内第3期治安肃正。“继续进行猛烈果敢穷追的治标工作”，“同时根据需要，进行不可预测的、先发制人的治标工作；重点是穷追捕捉，搜查逮捕有力之匪首，以便直接压制匪势”。改进军事部署，“日满军要有分散的配置”，也有“机动的游击”，“在各县分设消匪特别工作班，以其游击活动，扫荡消灭小的匪团”。

抗联开展的对敌斗争，由敌人的第2、3期治安肃正，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斗争阶段。1936年9月，敌人在宽甸、桓仁、兴京一带增加了大批兵力进行“治标工作”，将一师大部分密营破坏掉，一师不得不回师辑安，进入尚未被敌人注意到的辑安老岭根据地，直到1937年初才重新回到宽甸、兴京一带。虽然杨靖宇率一军直属队在1936年中先后取得了通化四道大拐弯伏击邵本良、占领宽甸大荒沟、宽甸四区错草沟伏击日军牛岛部队等战斗的胜利，一、二军主力部队也打了一些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战，但抗联一路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7月，一军一师西征队回师途中，师参谋长李敏焕在战斗中牺牲；8月，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在敌人进攻抚松东岗碱厂密营的战斗中牺牲；11月，二军军长王德泰也牺牲在抚松

松树镇的小汤河。1937 年 2 月，一军一师在本溪和尚帽子的密营被日伪军包围，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也不幸牺牲。

1937 年 3 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始部署新一个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工作，重点在铁道沿线、县城、主要城市附近展开围剿抗日武装行动。提出了消灭抗联根据地的根本目标。要求“除全部消灭匪贼之根据地外，在全地区内须严密监视残余匪徒，尤其是共匪之活动，不要失去时机，随时给予彻底的讨伐。”1937 年 7 月，日伪根据关东军 1063 号命令，又实施了年度第 2 期治安肃正。敌人将治标的重点放在省界、县界附近，强调“对贼匪的根据地，要坚决进行周密、果敢的讨伐，搜索歼灭残匪”。

敌人连续展开治安肃正，导致各抗日联军主力部队对敌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特别是以破坏抗日武装根据地为主要手段的狡猾策略，严重地破坏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密营。杨靖宇为保护辑安老岭各密营，使之成为一军军部的可靠根据地和一路军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率领一军军部、警卫旅等直属队 300 余人、配合行动的部队 200 多人转战于金川、通化、辑安、桓仁、兴京、清原、宽甸、本溪一带，继续坚持外线作战。另一方面，留下独立营政委陈秀明（负责榆林、太平一带密营）、蔡指导员（东岔一带）、姜指导员（文字、天桥一带）、张指导员、小李子（摇钱树、刀尖岭一带）等十余人，分别率小分队对辑安老岭山区的各密营实行单线管理，保护密营，筹集给养，同时开展群众工作，秘密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先后在岭前大路、榆林、太平和岭后头道、青沟、荒崴、财源等一些区、村成立秘密的抗联外围群众组织——抗日会、救国会、祖国光复会、保国会等，组织群众秘密为抗联筹粮筹款，提供物资和情报支持，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杨靖宇要求一师（当时活动在本溪、桓仁、兴京、宽甸、凤凰、奉天、岫岩、辽阳一带，基本部队 400～600 人）、二师（当时活动于抚松、临江、濛江、长白、桦甸、敦化、蛟河、磐石一带，基本部队 250～400 人，是年春夏季长期与二军六师协同作战）、三师（当时活动于兴京、清原、柳河、四平、抚顺、铁岭、开原、奉天一带，基本部队 350～500 人）、二军四师（当时活动于濛江、桦甸、辉南、柳河、金川一带，基本部队 250～350 人）、五师（当时活动于汪清、珲春、宁安、依

兰、额穆、穆陵、方正、勃利一带，基本部队250～400人）、六师（当时主要活动于朝鲜、长白、临江、安图、和龙一带，基本部队500～600人）要注意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在扩大游击区、不断打击敌人的同时，加强根据地和密营建设，要求各部队要认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坚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做好群众工作。是年8月，二军先遣团毕团奉魏拯民之命进入辑安，与杨靖宇所率一军军部及直属队会师后，奉命留在辑安保护根据地，重点在热闹、文字沟一带活动，将敌人的注意吸引到根据地边缘地带，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老岭秘密根据地。这一年中，一路军各主力部队频繁出击，取得了较好的战绩，其中包括二、六师协同，两战长白八道江鲤明水；六师在抚松城南歼灭一部靖安军；二、六师长白十三道沟伏击战；二军攻克辉南县城；一军攻入桓仁雅河口等著名战斗。但是，由于敌人在治安肃正中调集重兵，实施残酷的军事围剿，同时由治安维持会等组织实施瓦解诱降，抗联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蒙受了重大损失，除部队出现较大减员外，部队的中高级领导损折严重：是年3月27日，抗联的重要盟友王凤阁在通化六道沟被日军俘获，不久被敌人杀害；4月24日，二军四师政委周树东在与安图县治安队作战中牺牲；7月16日，杨靖宇率一军军部和直属队150人在兴京县永陵街与敌遭遇，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牺牲；10月31日，三师师长王仁斋在清原县钓鱼台，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年末，三师政委周建华又在开原、西丰和清原三县交界的夹皮山与敌作战中牺牲；年内，二师师长曹国安也牺牲在与敌作战中。由于内部人员叛变和敌特追踪，尤其是敌人实施重点对根据地的围剿打击，各主力部队密营及根据地再次遭受了极大损失。至此，一路军的抗战陷入了低潮。

1938年1月，杨靖宇派于指导员等先行进入辑安根据地，调查了解敌情和根据地状况，得知根据地未被敌人破坏，而且留在辑安的毕团已将王凤阁的潘团收编等情况后，于2月底率一军军部再次回到辑安老岭山区根据地。

当时，由归屯形成的集团部落已经逐渐稳固，警备道（公路）建设及通讯（主要是电话）建设已经基本形成网络，抗联一有稍大动作，即被侦知，并迅速遭到日伪军追剿，这使抗联队伍面临着更

大的军事压力。同时，一路军一些师、团级主要领导的牺牲，严重地削弱了一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使部队尽快树立必胜信念，推动抗日低潮重新进入高潮，杨靖宇在辑安老岭根据地派出部分干部西行和北上，一方面联系三师和二师部队，传达、部署新的作战意图；另一方面，派联络员将原王凤阁牺牲后的东北义勇军余部张团和李团、朝鲜人民革命军余部正式接进抗联。并将此前于 9 月中旬被政委周建华派来汇报情况的三师参谋长杨俊恒留在一军司令部，协助自己作军事工作，将原王凤阁部团长潘××调任军部秘书长；同时扩大了辑安老岭山脉的天桥密营、东岔密营、太平赤板松沟密营、松林五道沟密营、马面石密营、大路刀尖岭密营和双岔大青岭、摇钱树岭密营、马蹄沟里老平台密营等二十几个密营的联系，很快将辑安老岭山脉连成了一整片秘密根据地，根据地范围由今清河、麻线、台上、榆林等乡镇的交界处扩大到南至大路，东至青石，北至头道，西至花甸、财源一带的高山密林，总面积由此前的 120 平方公里迅速扩大到 600 多平方公里。杨靖宇将司令部设在东岔红石砬子附近，后又改变将司令部固定一地的做法，而将司令部游动于各密营之间；在东岔一带设立后勤部和后方医院。至此，老岭根据地已经成为第一路军的主要根据地。

鉴于东岔警察分所和驻双岔大营的伪军严重威胁根据地安全的实际，抗联一军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做出了争取伪军和警政人员、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在重点加强抗联部队的内部团结，尤其是汉族与朝鲜族干部战士之间的团结、维护抗日大局的同时，切实落实党中央关于“满洲党必须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的指示，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措施。对东岔伪警察分所和伪保甲人员，实施武装谈判、爱国教育并行之策，争取与之和平共处，并得到其暗中支援，为我所用；对双岔大营的伪军，则派出精干人员，采取民间“认干亲”、“拜把子”和加入“斋家礼”民间组织等形式，与伪军士官广交朋友，建立秘密联系。同时，继续扩大群众救国会、抗日会等秘密组织，对告密者实施严惩。这些有效的统一战线形式和处置措施，对抗日根据地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至 1938 年 5 月，一、二军两个军部及部分部队再次在榆林五道沟会师后，老岭根据地已经成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核心根据地，并在 1938

年～1940 年更加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抗联创建老岭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以及辑安老岭根据地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抗日联军斗争史册。老岭根据地所铭记的一路军为民族危亡浴血奋战的的历史功绩，将永远牢记在集安人民心中。

（佟德才整理）

四方顶子上过大年

1937 夏，二军先遣团毕团来到辑安，与一军军部取得了联系，并于军部会师。这年，三师参谋长杨俊恒被调到军部任参谋长。我们军部也再次向西活动，与一师会合。回程中，在雅河口打掉了敌人的兵站之后，于 1937 年末，部队再次回到辑安，与毕团会师。榆树林子西边，摇钱树岭的东边，当中有个四方顶子。那上头竟是雪，又没有树，我们就在那上头支上了一片帐篷，决定在这过阴历年。那上头没有水不要紧，我们可以化雪水喝，除了二团去弄给养不在外，其余的人都在忙乎过年。

四方顶子南坡有个石洞，门口有块大石头挡着。虽然一次进洞只能进去两个人，但里边很宽敞，可以容纳好几百人。二团搞给养回来，天黑了，人也累了，部队就进了山洞去休息。不知怎么被敌人发现了，把石洞给包围了。情况很危急，双岔河的马营从东南方向上来了，南坡是鬼子，西边还有警察大队，战斗打响后，什么枪声都有。那时候，我们已基本学会了“三番子”（一种行帮组织），就朝马营打了 3 枪，想试试他们的态度。他们立即打了 3 枪，我们一听乐了，他们是斋家礼的，这回不要紧了，他们不会再打我们。果然，他们心里也明白我们也入了斋家礼，就在岗底下打，不往上攻了，我们为防意外，就用一个排看着他们，集中精力打旁的地方。那天，我们部队干脆没撤，转着圈和敌人打。打到天黑，敌人撤走了，我们就在四方顶子上度过了除夕之夜。

（王传圣口述 文史委整理）

一次特殊的侦察任务

过了春节不久，杨靖宇将军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让我带着另一个同志到外边跑情报。开始三天一汇报，后来改为七天。时间长了，就又变成什么时候有情报什么时候汇报。我明白，这是杨靖宇将军对我们的爱护，怕我们刚刚出去，没经验，发生了意外。当然也有点不放心，怕我们在外头闯了祸。明白了杨司令的心意，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工作，决不辜负杨司令对我们的期望。

那是当雪开始要化的时候，大概是在农历二、三月份，杨靖宇将军让我们去执行一个任务。我们在向导的指引下，沿着大蚊子沟岭顶上往热闹街趟道。那个时候雪大，雪深能有膝盖以上。到了大蚊子沟岭，得爬后山绕过去，再往什么王八炕、热闹街那个方向走。我们晚上走，正好还有月亮，一边走一边做记号，就是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就这一条道，我记得连来带去，走了四、五天。通过我们这次侦察，天桥沟的沟里，直接翻岗到闹头，为以后奇袭老岭铁路工地，摸清了确切情况。

（原文为王传圣口述　李重勤整理）

奇袭老岭隧道

正在建设中的老岭隧道工程分为两段：第一段老岭隧道工程工事区从通化县十二道沟沟口直线穿过老岭山脉，隧道长 2 310 米，出口 500 多米不远处进入第二段老岭隧道工程工事区，在老岭山脉内盘旋一周，从老岭山脉的谷底出来，隧道长 1 765 米。整个老岭隧道工程工事区，全长 5.5 公里。老岭隧道堪称通化与辑安之间铁路运输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东北的殖民统治，掠夺东北矿产，森林资源，补充国内日益枯竭的资源，而修筑的这条铁路。

老岭隧道 1937 年开始修建，担负打通老岭隧道建设工程的是日本东亚土木会社。担任警备的是日本丹治小队和伪骑兵第二十五团第一连。

为了粉碎敌人掠夺东北资源的美梦，破坏通辑铁路工程建设施工，3 月 12 日抗联一军部队决定攻打老岭隧道工程工地。杨靖宇召集直属部队的干部会议研究，认为老岭隧道工地一带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工事区日伪军戒备严密，铁路沿线经常有角田部队的巡逻。靠硬打硬拼，势必造成重大的伤亡。于是，杨靖宇决定智取。在进一步摸清情况基础上，寻机袭击老岭工事区。

3 月 13 日，杨靖宇率领警卫一团、三团和司令部，共 500 余人，兵分三路，从东岔出发，一路经天桥沟过岭，到下午 3 点多钟到达十一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中隐蔽。派出侦察员去十一道沟口进行侦察，通过侦察发现木场有四、五百名身穿褴褛衣服的劳工在艰难的劳动，只有十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监视。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并亲自观察，认为是个好机会，便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了伐木场，缴了看押劳工的日本鬼子和伪警察的械，解放了伐木场的劳工。劳工们听说杨靖宇的抗联部队要攻打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队伍进入工事区。经商定，一批抗联战士换了劳工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劳工队伍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公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迅速拔掉了鬼子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两道铁丝网、电网的防守严密的东亚土木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山田松芳、荣田太十郎等躲在室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等物资。

与此同时，另一路抗联部队攻进十一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部队 100 多人，袭击十二道沟火药物资仓库。日军警备小队的漆烟千代松、戎亥浅松及铁路工地调度久保直左卫明等被击毙，其余的伪军全部被俘。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区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

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份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几十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

药，将日伪残淡经营的隧道及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炸毁烧光，使老岭隧道工程全部陷入瘫痪。这次奇袭老岭隧道工事区战斗，日伪军被击毙 7 人，俘虏 5 人，解救被抓去的劳工 1 731 人；烧毁建筑物 12 栋，汽车 3 辆以及大量建筑材料，敌人共损失达 20 万日元以上。

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工事区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气焰，日伪损失惨重，日伪统治当局十分震惊。

（原文为李重勤撰写）

激战挠头　重挫角田

奇袭老岭隧道后的第三天，杨司令率领我们往龙爪沟、天桥沟一带转移，夜里住在挠头。天亮以前，有一小股部队按规定在附近搜山（根据敌人袭击我们都是在黎明之前的经验，我们在天亮之前都要搜山，并形成了制度）。在营地 3 里多远的一个沟口发现了敌人，搜山部队发现敌情后，占领有利地形，与敌人接上了火。枪一响，由于我们住的长方形帐篷，两头有门，大家一冲出来，拽下帐篷就抢占了山头，架起了机关枪，就把迎头来袭击我们的 1 000 多伪军打了下去，压在一个小山窝窝里，使他们不敢抬头。为了减轻压力，预防后边再来的敌人，两面袭击我们，我们就对伪军进行宣传，还高唱抗日战歌。有一支歌的大意是：“伪军兄弟们，咱们都是黄帝子孙，日寇入侵，神州危亡，为什么不反对日寇侵略，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唱完了歌，伪军也喊话了，他们说：“我们不打你们，你们快走吧，山背后有鬼子，他们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有一位负了伤的指导员向他们喊：“我们是打鬼子的，他们来了我们怎么能走？不能走！我们要打鬼子、救中国！”伪军不吱声了，他们答应不和鬼子夹击我们，并告诉我们，从山后包围我们的是鬼子的角田部队。于是我们就用几挺机关枪看着他们，他们真的不再打枪。过一会儿，五、六百名小鬼子果然从山背后上来了。这时伪军要求打空枪，要不回去不好交待。我们答应了他们，他们就放空枪。因为我们事先有准备，就把鬼子放近点打。虽然鬼子火力强，

再加上雪大路滑，他们干挨揍，也冲不上来。12 点以后，小鬼子的飞机飞来了，又轰又炸，打的石砬子直冒烟。这次战斗打了一天，鬼子伤亡很大。天黑以后，鬼子撤到山下焚化尸体，我们就朝龙爪沟奔去。第二天来到小龙爪沟的老土顶子山，那个山挺高，没有多少树。这时，部队由我做向导，到了大龙爪沟，过了河，爬到山顶，发现天桥沟一带的山头上，火光挺亮，侦察人员回来说，天桥沟口被敌人封锁了。这时一团许团长找我研究怎么个走法，靖宇将军也来了。他对我说："你家住在这里，熟悉道，看看怎么个走法能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我想了想说："我们干脆不下山，顺山岗往里走，不会遇上鬼子。"靖宇将军和许团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们就顺着岗顶往天桥沟里走去。到了天桥沟的大湖时，就下山过大湖，在小吊水湖沟里就休息了。吃完饭，天黑以后，我又领着部队顺着大蚊子沟的家什房子小沟，过了公路，到了小五岔，经过五岔，来到蚂蚁河进行休整。

（原文为徐光口述　李重勤整理）

常家店子伏击战

常家店子位于辑安县榆树林子屯北约 12 公里的六道沟口两侧山坡下，东距榆林至双岔公路 40 米。小村十余户人家，住房较集中，小村相对高度低于公路 5 米左右，处在群山环抱的沟谷之中。当年常家店是老岭南坡下的一座大车站，过往车辆常在此歇脚打尖。店房朝东，面对公路三间厢房，两边有马棚。

1938 年 4 月，驻辑安五道沟里的抗联部队，得到县城伪军团部要经过榆树林子，到老岭北坡双岔河伪东大营换防的消息，便决定在六道沟一带伏击伪团部。

六道沟位于老岭南坡不远的地方，由岭南通往岭北的一条狭长的公路从这里通过，是伪团部往岭北去的必经之路，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北面是老岭，敌人一旦进入抗联的包围圈，就会成为瓮中之鳖。

在伪团部要通过的前夜，抗联又得知北来的双岔河东大营伪军

一个连在路上来接应的情报。抗联战士连夜做好战斗准备。杨靖宇将军亲自指挥700多名抗联战士，分别埋伏在由五道沟沟门到老岭山脚下的公路两侧7个地方，布成一个口袋阵形。

第二天上午9点钟左右，由北向南开来接应伪团部的伪东大营一个连走到六道沟常家店附近公路旁时，发现常家店停了几辆大车，就骂骂咧咧的从东山坡上公路走下来到沟底进店抓大车，想勒点“外快”。伪军把机枪架在公路上，进店抓大车的伪军同埋伏在店内的抗联部队碰在一起，短兵相接，几个伪军如梦初醒，慌忙不知择路，转身撒腿就往山上公路跑。抗联战士就在后面追。在悬崖峭壁顶上埋伏的抗联部队，有一个小战士，很机灵的一瞬间纵身跳下悬崖跑上公路，把敌人机枪射手推开。这时，两面山坡上的抗联战士发起了冲锋，冲了下来，杀得敌人措手不及，无处藏身，全部投降了。抗联部队缴获全部敌人武器之后，把俘虏带到六道沟的南岗上。杨靖宇给俘虏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告诉他们不要替日寇打自己的同胞，让他们脱下军装后，发了路费都释放回家了。由县城经榆树林子开来换防的伪团部刚到二道沟门，听到前面沟里有枪声，知道不妙，就掉头经原道回辑安县城了。

双岔河伪东大营的马营，因通过抗联宣传教育，与抗联战士结成“拜把子”和“斋家礼”盟兄义弟，暗暗地同情和支援抗联的抗日斗争。伪团部因此而要换防，从这次常家店战斗后，马营仍驻防于双岔河伪东大营并多次以虚假鸣枪的办法，说与“红匪”发生激战，暗地里却从伪东大营里扔出一些枪支弹药，然后捡回一些抗联扔下的破枪，当抗联走远了，马营就向上司报告，“讨伐”的战果。以此，多次给抗联武器弹药支援。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奇袭太平警察所

1938年春天，在辑安的抗联部队很多。人一多部队的粮食问题就成了一件大事，为此，杨靖宇将军决定派出一些小部队，为主力部队筹集粮食。太平沟驻有伪警察，对我们的小部队在这一带活

动威胁很大，这股汉奸坏得出奇，他们经常以搜查为名，到外残害老百姓。特别是我筹粮小分队经常活动的地方，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常常以“通匪”为名，杀人、放火、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使老百姓生无宁日，当地人民群众对这伙敌人恨之入骨。

杨司令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派出3支侦察小分队，尽快摸清敌人情况。了解到这帮警察，非常爱管闲事，警察所和哨兵都设在公路边上。平时，只要有人路过，敌人哨兵就一定上前盘问，以便借此对群众勒索。轻则骂几句，重则打一顿。杨司令听到各小分队的报告后，立即决定利用敌人爱管闲事这一特点，打掉这股汉奸。

这次行动，共抽出25名队员，组成手枪队。队员们都换成便衣，每人一把匣子枪，由教导一团许团长带领。

第二天早晨，通往太平大路上出现了一辆拉着高粱秸的马车，马车的前面稀稀拉拉地走着二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人似乎喝醉了酒，东倒西歪，骂骂咧咧，你拉我的脖领子，我拽你的上衣，路上撕撕打打，连喊带骂，当到了敌人的哨兵跟前便打得更厉害。路边的岗哨见状抻长了脖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不好好走路，打什么架？过来，老子给你们断断官司！”这时候，看热闹的，拉架的，都围上前来，敌哨兵正欲逞威风，却腰后背顶上了冰冷的枪口，有人在他耳边厉声喝道：“不要动，喊就打死你！”

原来，这辆拉高粱秸的大车前后的二十几个人，及那两个“打架的醉汉”都是抗联的奇袭队员装扮的。许团长一个手势，赶车的老板立刻把手枪从高粱秸里拽出来，端着和战士们一同冲进屋子里。“缴枪不杀！”有两个警察从炕上爬起来企图顽抗，“咚，咚”两枪，当即被战士们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其余的警察全都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投降了。待把枪支收缴完后发现那个日本鬼子指导官不在，经审讯俘虏，才知道那个日本鬼子指导官在东南边的炮楼里找几个女人陪他喝酒呢。许团长命令队员去把那个日本鬼子抓来。队员到东炮楼里发现只有几个女人坐在炕上，桌上还摆着酒菜，可是那个日本鬼子指导官不见了。其中有个女人朝桌下递递眼色，战士们发现那个日本鬼子藏到八仙桌子底下去了。我们的队员大喊一声：“出来，不出来打死你！”不管队员们怎样吓唬他就是不出来，最后被战士硬拖出来了。

这次战斗前后共用了 20 分钟时间便结束了战斗。我们只用了两发子弹的代价便把敌人安插在太平的这个据点拔掉了。

我们的部队撤回驻地后，经调查得知这个鬼子指导官曾杀死过几十名无辜的农民，还强奸了许多妇女，罪恶累累。司令部便决定立即把这个日本指导官处死，并张贴告示示众。

奇袭太平警察所这一仗，使周围的敌人惊恐万状，再也不敢随随便便欺压群众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抗联筹粮也得以顺利进行。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抗联第一、二军在老岭会师

打完太平沟不久，我们听老百姓讲，东边下来了一支队伍，在高丽沟子打了仗，还说这支队伍带着炮。靖宇将军说可能是魏政委他们过来了。住了两三天，我们听说在台上和双岔河中间的东面响了几枪，就进了沟里了。靖宇将军断定是二军来了，就叫我去找找。接受任务后，我就和教导团一中队人称刘大愣的老刘，从军部出发了。我们奔到响枪的地方，找老百姓一打听，他们说不错，昨天晚上从这里过去一支队伍，过了一宿，有多少人就不知道了。老百姓的话我们不能全信，因为晚上一过队伍，他们就赶紧把门窗关好，吹灯熄蜡，怕被祸害。这样，我们敢肯定，就是这支队伍过时，没惊动百姓。从老乡的回答中，可以断定是抗日队伍无疑了，而且人很多。因为日伪和土匪，路过村庄，不能不惊动老百姓。判断以后，我们就往沟里的山顶上看，只见山顶上有帐蓬，还冒着烟。我就高兴地对老刘说："这准是咱的队伍，可撵上了。"老刘也说："肯定是了！"我们俩心里这个高兴劲就别提了。走路也有了劲。仰着脸一边唠着一边走，不一会儿就进了沟里。我们还没进沟，山上的岗哨就发现了我们，悄悄地派下来一个班，躲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我们不知道，还仰脸说笑着往沟里走呢，人家从大石头后面出来了，在一片枪栓响声之中，厉声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心里虽然吓了一跳，可心里有数儿，就说："找你们的呀！"

他们一听，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又问："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我说："我是一军的。"

他们的班长是个朝鲜族人，和他们的人交流了一下眼神儿，我乘机问："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他们说是二军的，我高兴地忙说："哎呀，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快走，魏政委来了没有？"

那个班长说："来了。"

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快领我去见见他去。"

可能他们见我说的贴谱，便领我向沟里走去。这时我才发现，这班战士拿的武器，子弹都推上膛了，还上了刺刀，要是回答的不贴谱，还真危险呐。走进沟里，正好看见了魏政委。1936 年夏天，魏政委到河里开军党代会时，我见过他，现在他还认识我。一见我被押了来，他就明白了，幽默地对我说："哎呀副官来了！"

我认真地说："我不是副官，我现在是联络员。"

魏政委拉着我的手，和气地问我："联络什么呀？"

我说："就是想办法找到你们，把你们请到一军去。"

魏政委高兴地忙问："你们离这里有多远呐？"

我说："现在走，用不到天黑就到。我们在老爷岭东坡。"

魏政委一边连喊着好，一边又向我打听了一些其它情况，显得特别的高兴。我看出来，他也正急着想见到杨靖宇将军。

吃完了饭，我到外边挨着看了看，二师的宋茂璇我认识，张团长是初次相见。通过交谈，我才知道曹师长已经牺牲了，二师的少年连也没有了，为此，我心里很难过。

天快黑时，我领着队伍出发了。20 多里路，由于不能走车道，只能爬山翻岗走山路，所以走得就不快。当走到老爷岭背坡的岭下时，天已黑下来了。我的意思是赶快走吧，别在这住下了。因为那边是榆树林子，这面是双岔河，弄不好会暴露目标，敌人来个两面夹攻，那可就麻烦了。我将这些想法对魏政委讲了，我寻思他准能同意，不会在这只有几户人家的的小围子住下。谁知他说："不要紧，我看今晚住下，明天吃完早饭再走。"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才明白，魏政委为人心细，他怕半夜到了一军，影响杨司令和其他指战员的休息，就冒着危险在这深山的小屯子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沿着陡峭的北山坡往上爬，我还担心魏政委那单薄的体格爬不上去，可是他爬上去了。只是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过他仍然高兴地说："岭再高，再难爬，这不也踩在脚下了么！"

下了岭，就到了我们一军军部，我们便告辞魏政委，头前先走报信去了。

等我们回到军部，军部已经知道二军来了，一切欢迎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牌楼是用松树枝扎成的，上面写着欢迎的字样，转圈有几面彩旗。另外，连按帐篷的窝也挖好了，支帐篷的木杆也弄好了，甚至连做饭的锅灶和铺草都准备好了。我有些不解地问杨靖宇将军："干么这么隆重啊？"靖宇将军说："我们是当地户，人家二军来的是客人，就得好好安排一下。"

二军来到一军驻地后，得到一军的热烈欢迎，并在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两军战士欢喜若狂。这次会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以后的抗日斗争将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原文为王传圣口述　李重勤整理）

召开老岭高干会议

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任务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向关内大举进攻，将东北作为它的重要后方基地，关内成为侵略中国战争的主要战场。东北地区局部抗日战争变成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份，东北抗日联军的任务即由单独作战改变为袭扰敌人后方，削弱敌人，牵制日军入关，配合关内作战。1938年，全国抗战爆发第二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除留第一师部队坚持本溪、宽甸、桓仁一带的游击战争外，军部和第三师在杨靖宇将军的带领下向辑安老岭森林地带转移，其目的，就是杨靖宇为了与魏拯民会合，以便党的南满省委与抗联第一路军领导机关商讨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新形势下，南满、东满抗联部队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同年3月，抗联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领二军教导团、独立旅和第一军二师一部，

于4月初渡过浑江并经通化向辑安疾进，再折向桓仁边境。于5月初，调头进入辑安，继而进入老岭山区。于5月11日，与正在老岭山区五道沟沟里密营的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一军胜利会师。

1938年5月中旬至5月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部和中共南满省委于辑安县老岭山区五道沟（今复兴村林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即老岭高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靖宇、魏拯民、杨俊恒、韩仁和、黄海峰、徐哲、吕伯歧、伊俊山、宋茂璇等十余人。

这次会议主要是健全南满省委；补选一、二军党委委员；总结一、二军1936年7月至1938年5月冲破日本侵略者围剿的经验教训； 分析全国和南满地区对敌斗争的形势，提出我军的任务和采取的战略战术；加强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对战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扩大部队，详细研究我军今后补充战士的兵源问题；我军在东南满地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打开局面后，派出若干小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我军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创造条件；为了和关内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决定抗联一军从一、二师抽调兵力补充三师，加强三师力量，在适当时机再次向西远征进关；划分游击区，一、二军互相配合作战，互相牵制敌人。

会议讨论了全国和东南满的敌我斗争形势，研究和交流了游击战争的策略和经验，提出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策略方针。关于游击活动的方向问题，杨靖宇提出应该与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同时和东北各抗日部队相互配合，共同作战。补充三师后，由三师先进行西进，然后一、二师相继进行西征。抗联二军四、六师在通化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五师仍在绥宁一带活动，并负责与吉东、北满抗联各军联络的任务，还补选了魏拯民为抗联一路军副总司令。

会上，抗联一军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伊俊山还汇报了北满、吉东各兄弟部队战斗情况和独立旅南征的情况。

这次会议共进行了20天。在开会之余暇，杨靖宇为反映会议精神和对抗联一路军全军要求，提笔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成立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

1936年6月，杨靖宇同志率领抗联一军与魏拯民同志领导的抗联二军在河里地区胜利会师。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主持召开了东满和南满特委及一、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四个省委和合编路军的指示，讨论了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和一、二军的任务以及党的工作问题。会议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精神和一、二军活动地区已连成一片的实际情况，决定将抗联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统一领导。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将东满和南满两个省合并为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由于战争环境等原因，第一路军成立后一直没有成立总司令部。

1938年6月1日，老岭会议结束第二天，在辑安老岭山区复兴村五道沟里，距庙沟沟门100米处沟塘中，中间有一条乡路穿过，较宽阔平坦的地方，召开了在辑安的第一路军干部战士大会。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主持了大会，总司令杨靖宇站在路北的大石上，宣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此时，打出一面军旗，军旗为红色，镶着边，横幅长约120厘米，宽约70厘米左右，军旗左上角用黄布剪成镰刀斧子，边缘用线绣的。军旗上还用黄布剪成绣上3行字：第一行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二行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第三行，年月日。杨靖宇仍然穿着他经常穿的那套褪了色的军装，头戴黄军帽，用带有河南乡音的东北话，向干部战士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和老岭会议情况。他在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经济、军事、政治、人口及地理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之后说："因为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无论在国际和国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为了响应中日大战，更快地把日本侵略者驱出中国，我们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从现在开始 ，要更加勇猛地进攻敌人，歼灭敌人。"在老岭会议、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以后，抗联部队在五道沟

里进行了学习和整训，战斗力有很大的加强。随后，抗联第一路军第一、二军协同作战，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连续在家什房子、阳岔工事区、东岗辑安工区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给日伪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从而把辑安的抗日斗争推向了高潮。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杨靖宇将军创作的抗日军歌

1938 年 5 月底，著名的老岭高干会议在辑安榆林五道沟胜利结束。这次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下一个阶段的斗争任务，同时又于6 月 1 日将一直未能成立的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了起来。当日晚，杨靖宇将军豪情万丈、兴奋异常，提笔创作下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接着又针对抗联一路军中朝鲜同志增多的实际，进一步创作了《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这几首歌曲充分反映了杨靖宇将军和抗联全体将士在那异常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示了“山河欲裂征马鸣”的豪壮气概。杨靖宇将军在部队中亲自教唱这两首歌，极大的鼓舞了一路军的斗争士气。这是杨靖宇将军继不久前创作的《西征胜利歌》之后，留给抗联和集安人民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　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
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　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　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
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　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　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
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　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　　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

山河欲裂，万里隆隆，大炮的响声，
帝国主义宰割弱小民族的象征。
国既不国，家何能存，根本没有和平。
黑暗、光明，生死线上斗争来决定。
崛起呀，中朝民族！万不要再酣梦。
既有血，又有铁，只等着去冲锋。

全世界上，最大仇敌日帝数头等，
焚烧掠夺，奸淫侮辱，亡国且灭种；
并朝吞中，莫非“田中奏折”的兽行？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决不让再久逞！
联合呀，中朝民族！团则生，离则亡，
谨防备离间计。手携手打冲锋！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齐觉醒。
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军灯。
旌旗所至，势如破竹，虏焰自息影。
阵容强化，战线巩固，基础早奠定。
团结呀，中朝民族！互相间，本赤诚，
坚持那最后五分钟。勇冲锋！

照耀全球，闪烁不灭，最惊人的火星。
万恶日寇，自掘坟墓，非人能回生。
勇猛冲锋，吉凶福祸并非天来定，
事在人为，诚至金开，自有曙光逢。
前进呀，中朝民族！既有始，要有终，
誓杀到敌人的大本营。猛冲锋！

西征胜利歌：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齐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
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展，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匪死不远。

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匪，金田全队，我军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缴获无数，齐奏凯歌还。

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拚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家什房子伏击战

1938年6月初，抗联部队的侦察员，通过“行匣子”（电话匣子），挂在电线上，得知素有“满洲剿匪之花”的索玉山旅步兵三十二团和辑安县警察大队要一起出动讨伐抗联的消息后，杨靖宇司令和魏拯民副司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伏击敌人，吃掉这个团。随后，将部队分为两部分，首先由魏拯民副司令率一部份队伍，攻打蚊子沟伪警察分所诱敌深入，杨靖宇率主力部队埋伏于蚊子沟西南方向的家什房子沟口一带，布成口袋阵，

埋伏下来，只等敌人上钩。

两支抗联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后，于6月6日蚊子沟伪警察分所派农民王文堂出探，被我侦察兵抓住，经过教育，他便向抗联侦察员提供了蚊子沟的敌人设防情况，并表示愿意带路。当晚，魏拯民率领的抗联队伍跟在王文堂后边到了文字沟围子外，王文堂叫开了围子大门，抗联战士蜂拥而入，攻进了围子。紧接着包围了伪警察分所，俘虏了全部伪警察和自卫团，缴获步枪20余支。魏拯民率领的抗联队伍于次日凌晨撤出蚊子沟围子，到天桥沟门一带隐蔽，待机截击从热闹、通化来的援敌。

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一团、三团、八团的一部份和司令部自6月9日开始埋伏在家什房子沟口一带公路两侧草丛中，指挥部设在沟北侧略向前突出的小岗上。站在岗上可清楚的看到北面的蚊子沟围子。同时配备十几挺机枪，沟口南坡和沟口对面小西沟两侧的山梁上，也分别配备了机枪，同指挥部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封锁着公路和沟口小木桥。公路两侧是一片狭长的开阔地，生长着灌木丛和杂草。埋伏线长达两公里。还有几个抗联战士专用“行匣子”听敌人的电话，日夜不停的搜索着敌情和监视敌人的行动。

在家什房子伏击敌人的抗联部队，头几天就埋伏在公路两侧蒿草中，晚上撤回到家什房沟里。6月10日从敌人电话中听到县伪警察大队向伪县公署要给养，并要求火速用汽车运来。于是，杨靖宇派一支小部队，向南翻越小爷岭，潜伏在岭南南坡绿水桥子一带。

索旅得知蚊子沟遭袭击后，便派伪索旅三十二团和县警察大队一部，匆匆忙忙朝蚊子沟方向扑来，到了蚊子沟扑了个空。6月11日，敌人驻扎在蚊子沟围子。翌日早晨，骄横异常的索旅三十二团一营共300多人因急切去县城，不等县警察大队吃完早饭，便集合队伍，一头就扎进抗联部队已埋伏4天的口袋里。杨靖宇指挥枪一响，霎那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密集的子弹飞向了敌群，一下子把敌人压在公路上。公路附近地势低、开阔，无可掩护，敌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慌乱一团。顿时死伤大半。部分残敌钻到小桥下面进行负隅顽抗，恰好在抗联的火力网内。这时，抗联部队发起了冲锋，抗联战士个个都从公路两侧蒿草中跳出，杀向敌群，吓得敌人一个个跪在地上求饶，余敌全部被我抗联部队俘虏。这次

家什房子战斗，将索旅三十二团一营全部歼灭。俘虏敌人200多人，缴获机枪8挺，步枪130余支，望远镜两架。

（原文为徐光口述　李重勤整理）

夜袭阳岔工事区

阳岔工区，是辑安工事区第八工区，由日本今井组负责，施工地段从阳岔村北至土口子前。第十一、十二老岭河桥梁工地也都在这一段内。自抗联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事战斗之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阳岔工事区的警备，伪骑兵二十五团及日本警备队150多人驻军、巡逻在这一带。

1938年6月19日傍晚，杨靖宇和魏拯民指挥700多名抗联战士，分成3路，进入阳岔西山和土口子一带的密林中潜伏。

深夜23时许，3支抗联队伍，同时分别袭击了阳岔工区今井组事务所、第十一、第十二号老岭河桥梁工地竹内丁工场和土口子隧道工地3处。一时间，通辑铁路阳岔至辑安区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日伪军从梦中惊醒，不知来了多少抗联，慌忙躲进工棚里还击。阳岔西山坡上，抗联的机枪、步枪猛烈地向今井事务所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日伪军伤亡惨重，一部分抗联战士冲下山坡，绕到东侧山下，从侧翼包围了今井事务所。这时，四面发起猛攻，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接连不断响彻山谷。事务所外的仓库、厂房、宿舍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阳岔工区的对外联络全被抗联切断，企图冲出工事进行抵抗的日军全部被击毙。

阳岔村南3公里的河边竹内丁场及第十一、第十二号老岭河桥梁工地也遭受到抗联的猛烈攻击。在阳岔方面的有力配合下，抗联从山上冲下来炸开铁丝网，消灭了守备的日伪军，冲进了工地和工棚，活捉了日伪工程和守备人员8名，解放100多名劳工。竹内丁场主任竹内仁助，也成了抗联的俘虏，烧毁了桥梁工地，并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

另一支抗联部队约150多人，迅速包围了土口子隧道和东亚土木会社值班室，击溃了警备人员，把土口子工地建筑材料和值班室

烧毁。随后，抗联部队迅速占领土口子附近山坡上有利地形。因电话线路在阳岔工区战斗中被切断，因此辑安工事区的守备队没有发来援兵。三处战场，全部获胜。这次夜袭阳岔工区战斗，共击毙持枪顽抗的敌人 9 名（其中日本人 8 名），俘虏了日本工程师竹内、小林等人（后来释放了），共解放劳工 700 多名，使敌人损失又达数万日元。

（李重勤搜集整理）

夜袭土口子工事区

在辑安太王小学西面有一片高岗地，群众称为东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辑铁路辑安工事区就设在这里，管辖着第七工区岗组、第八工区今井组、第九工区东亚土木会社承担的通辑铁路黄柏至辑安段的建设工程。担任警戒的是警备队长前田清率领的 24 名日军警备人员和伪军骑兵第五团。日军驻在东岗辑安工事区附近，骑兵第五团团部设在东岗西北不足一公里的地方。

1938 年 6 月 24 日，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教导团等 300 多人，由根据地东岔沟里出发，傍晚到达土口子附近山上密林中隐蔽。

当日夜 23 时许，杨靖宇指挥抗联部队，袭击了东岗工事区、土口子隧道工地现场、伪军骑兵第五团团部。当半夜 11 点钟时，抗联战士组织火力从东北高地向辑安工事区猛烈扫射，同时伪军骑兵第五团团部也传来了激烈地枪声，袭击东岗辑安工事区的战斗全面展开。抗联战士在机枪火力掩护下，迂回到伪东岗派出所及工事区两侧，同敌人展开逼近作战。工事区的日军警备人员不明情况慌忙抵抗。派出侦察人员下落不明，使敌人更加慌恐不安。敌人凭借着高墙深院，武器精良，子弹充足负隅顽抗。我抗联部队击败了顽抗的敌人，顺利地攻入土口子工地，击毙日军警备长铃木横田，释放了劳工 250 多人，其中不少人当场参加了抗联部队。当时，有推“轱辘码子”和挑小土篮的小劳工于喜、于学哥俩等一、二十名参加了抗联部队。被俘的日本人福间一夫，释放他时，他却不走，并说：“我要参加你们抗联队伍。”当场，杨靖宇问他：“你为什么要

参加抗联的部队呢？”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对的，所以我才参加你们的队伍，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再三恳求，杨靖宇就收下了他。从此，抗联一军里有一名日本籍抗联战士。这次战斗，使土口子至辑安一段铁路工程又遭到重挫，使日本鬼子损失甚大。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程斌叛变投敌

抗联一军在辑安老岭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进入鼎盛时期，日本关东军不得不采取新的更加残酷的讨伐伎俩，由野付昌德为司令，调集 77 000 人的重兵对东边道的抗联再次进行疯狂围剿，除了经济上的严密封锁，还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进行欺骗宣传和政治诱降。

1937 年 12 月，抗联一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在外三堡的倒木沟密营，被敌人包围，突围时，腿部负伤，一师四团隋团长为了掩护胡国臣突围，壮烈牺牲。胡国臣转移到外三堡的洋湖沟里黑坑大地密营养病。这时，胡国臣的警卫员叛变投敌，领着敌人将胡国臣逮捕。胡国臣被捕后叛变。

由于胡国臣的出卖，中共南满省委宣传部印刷主任樊帝被捕牺牲。同时将抗联一军政治部主任安光勋逮捕。安光勋被捕后也叛变投敌。由于胡国臣、安光勋叛变投敌出卖，中共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主任兼抗联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傅世昌被捕牺牲，桓仁县委书记李明山(陈秀明)工作困难，被迫转移到辑安，到抗联一军军部工作。

1938 年 6 月，敌人根据我军叛徒的提议，逮捕了抗联一军一师师长程斌的母亲和哥哥。27 日，程斌在敌人的军事围剿、讨伐和政治诱降下，带领一部分队伍去八楞村敌警察分驻所宣誓投降。

杨靖宇将军得知程斌叛变后，曾给程斌写过两次信。问他能不能回来？如果能回来，就派人去接。两封信措词恳切，十分感人。寄走后，杨靖宇将军一直盼望能有个复信。可是，程斌一直没有给杨靖宇将军回信。对此，杨靖宇将军断定程斌是真的投降了，而且会死心踏地为敌效劳。他十分愤慨。果然，程斌可耻叛变后变成了

敌人的忠实走狗，同年 8 月，被编入通化省伪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担任讨伐抗联的副大队长。

程斌，作为抗联的高级指挥员，熟知我军战略战术以及密营等重要机密，他的叛变对抗联一路军带来了极大威胁。一军一师在本溪、桓仁方面的抗日根据地遭到彻底破坏后，他又带领伪富森警察大队向辑安扑来，讨伐抗联一军部队。由于根据地的破坏，一师余部不得不放弃本溪方面的根据地，陆续实行战略转移。9 月一师四团四连指导员马广福率所属部队从桓仁出发转移到蚂蚁河，与军部会合，一师三团、六团的余部从本溪撤离，经数百里奔袭来到辑安境内与一军总部会合。10 月，接到军部的通知，一师的游击连、特务连和由马指导员、于指导员领导的两支游击队会合后，去兴京县，在县委书记李明山带领下，昼夜兼程到达了辑安的八宝沟，在教导旅政委韩仁和的指引下，又于 1938 年 10 月末到达了金川河里与军部汇合。1939 年 5 月，一师军需部小分队长甄宝昌带十名战士克服重重困难，从兴京的西河掌出发，经桓仁的仙人洞，到桦甸一带终于找到一路军总部。就这样，一师各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克服重重困难，陆续与军部汇合。

（原文为李重勤等整理）

老岭高干紧急会议

程斌的叛变，把抗联一军的重要部署和军事机构全部泄露给敌人，打乱了老岭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魏拯民、杨俊恒、韩仁和、徐哲、陈秀明、伊俊山、孙永浩和中共南满省委青年部长刘佐健等领导同志，于 7 月中旬在辑安老岭先是五道沟里密营，后来敌人干扰又转移到大阳岔紧沟里的松木头沟的岗梁上召开了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即老岭高干紧急会议。会议针对程斌叛变投敌后出现的严重形势，做出了新的部署，并决定改编抗联第一路军，将抗联一、二军统一改编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在实行分区作战的同时，决定留下部分兵力在辑安老岭山区游击区里坚持游击活动，以牵制敌军；抗

联主力部队则撤离辑安老岭游击区，向龙岗山脉的河里地区和濛江（靖宇）、桦甸县境山区转移，并决定取消抗联一军部队再次西征的军事计划，所有部队东进，依托长白山森林与敌人展开斗争，在这次改编后抗联一路军总司令仍然是杨靖宇，副总司令魏拯民。

老岭高干紧急会议后不久的月末，组成警卫旅（500余人），归一路军总部直接领导，旅长由军部参谋长方振声兼任，政治委员是由军部参谋韩仁和兼任。下属两个团，即一团（原一军教导团），二团是一路军总司令机关代号。一团团长许国有，政委黄海峰，参谋长丁守龙，团部下设四个连。三团团长朴先锋，团部下设3个连，全旅跟随一路军总部活动。在组成警卫旅的同时，将抗联一军二师改编成第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政治部主任伊俊山，参谋长尹夏太，组织科长宋茂璇。一方面军下设一个机枪连和一个团，团长张明生，政委赵成才，团部下设两个连，全军约250人；第二方面军以二军六师为主组成，指挥是金××。后来成立的第三方面军以二军五师组成，总指挥陈翰章。原活动区域不变。除第一方面军留在辑安、通化、金川、辉南、临江、濛江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军外，军部和主力部队撤离老岭山区转向濛江、桦甸东进长白山区。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截击敌铁路保卫队汽车

1938年7月29日，上午9时30分，日本人汽车司机黑河内省一郎，驾驶一辆通辑铁路保卫队的汽车，从辑安工事区向老岭方向驶去。搭乘该汽车的有辑安工程区的机械助理心得、雇员运屋完善、技术员成鸠正行、土木工室井重吉、老岭工程调度员森圭及担任警备的警备员岩田忠平、品川清治、齐藤德次郎、相马清见等9名。10时30分左右，当汽车行驶至大荒沟时，又有伪军4名官兵搭乘此车，11时到大青沟工程分区，森圭调度员下了汽车，随后汽车继续向老岭工区驶去。11时30分左右，这辆敌保卫队汽车行驶在老岭与大青沟区间的双安附近干沟时，突然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等候的我军杨靖宇部队约150人，将其包围袭击。因该处被搬运电

线杆子的数台马车堵住了去路，加上路窄坡陡，敌人来不及躲藏，只好立即下车进行顽抗，被我抗联部队一举全歼。当抗联部队打扫战场时，隐藏在壕沟草丛中一个敌人气势汹汹地窜了上来，被我机智的一名抗联小战士，一刺刀捅死推进沟去。这次截击战斗，汽车上的 12 名日伪人员，被打死 7 人，打伤 3 人，俘虏 2 人，缴获了步枪 10 余支及一些军用物资，并在撤出战场前焚烧了敌汽车之后，抗联部队带着战利品撤回到东岔沟里小八宝沟密营。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斋家礼”组织与“三老四少枪”

在创建老岭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抗联一路军有时利用“斋家礼”与“三老四少枪”这种与敌伪人员进行交往的措施，为坚持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掩护部队和减少冲突，创造了有利条件。

斋家礼，是旧社会里，在辑安老岭山区民间存在的一种帮会组织。这种组织，平时不活动，只是每年农历三月三、九月九，凡是参加斋家礼组织的人，都要在这两个日子进行集会。由斋家礼组织的头目，大家都称呼为“大爷”主持操办活动，参与活动的人，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自愿捐献金钱。少则一元，多则不限。“大爷”就用这部分钱，操办一次招待新参加“斋家礼”组织的人，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从而相互交流感情，密切关系，平时生活中大家相互关照和支持，像一家人一样亲近。

“三老四少枪”，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老岭抗日根据地期间与当地斋家礼组织进行秘密联络的一种“暗号”。就是双方约定，作战时，由一方先放三枪，如果对方是斋家礼组织的人，即放四枪进行回答，这样双方都明白了，都是参加斋家礼组织的人，从而双方互不进攻了。

说到三老四少枪，还有一段故事：

1937 年初春的一天，抗联一军的青年干事长即抗日救国青年团的书记王传圣和抗联警务排战士刘大愣要回根据地里的五道沟，路上就见从榆树林子街那边过来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位中年妇

女，车上还拉着四、五个大柳条包和一对皮箱。王传圣和刘大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便迎上去盘问那位妇女。他们的话还没出口，那位中年妇女已经吓得全身发抖。他俩上前去问："你是哪儿来的？"她说："我从辑安来，上双岔河去。"他俩一看她的打扮，就知道她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就又问："你男人是干啥的？"她说："是当兵的，在双岔河。"又继续问："姓什么？是什么职务？"她不敢细说，只说："姓季，在机关枪连。"一听，这个人果然就是马营伪军机枪连连长季成东的老婆。随后，他俩像没事一样的说："你走吧，捎个话给季连长，我们是抗联的人有机会要见见他。"季连长的老婆一个劲答应着，往前走了两步，又回头问："往前走，再碰上你们的人怎么办？"王传圣说："那不用愁，我们给你写个条子，只要是我们的人拦住你，你给他们看这个条子，就平安无事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抗联就展开了一次极其特殊的统战工作。当时，在辑安老岭山区流行一种拜把结义形式的"斋家礼"，行过"斋家礼"的人都要互相信任互不相伤。季成东正好就是一个特别信仰"斋家礼"的人。这一次抗联放过了他的老婆，对此他一直念念不忘。抗联跟他一联络，立刻就有了回音。不久，抗联一军派出王传圣、宫明义、刘大愣等人与马营的董副官、机枪连连长季成东进行接触。随后，在八宝沟（现长岗村）李家店正式摆了香堂，行了"斋家礼"仪式，并定了今后三老四少枪的联络方式。即以后双方相遇先行"三老四少枪"，就是一方先打三枪，另一方如果马上回四枪，互相就知道是"斋家礼"的兄弟了，彼此就不再向对方开枪攻击了。在这次结拜"斋家礼"后，抗联还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批准了今后可以用这种形式作团结群众和伪军官兵工作。

自此以后，马营的伪军再也没有进犯老岭抗日根据地的行动了。根据地的南大门基本上很平安。马营的伪军官兵有时还在暗中支援抗联武器弹药，故意谎报军情，调开日本鬼子，让抗联搞突袭。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马蹄沟之战

1938 年 6 月下旬的五道沟伏击战，让索玉山这条日本的忠实走狗，在他的主子面前丢尽了脸。主力未动，就损失两个连，大胡子团长气得发了疯。到处派探子找杨靖宇决战。7 月中旬，他探听到杨靖宇部队在韭菜园子（今财源）附近的马蹄沟，就把部队调到韭菜园子，并立即向驻热闹街的旅部报告，部队长藤井、旅长索玉山决定亲自赶到韭菜园子督阵，还调来了飞机助战。

当时，住在马蹄沟的红军，是抗联一军的二师八团。他们得到情报之后，就报告了杨司令。杨司令和参谋长杨俊恒就带着警卫旅一团和机枪连赶到马蹄沟。晚饭刚过，杨司令听到山上的“站杆子”树，被木棒“梆梆梆”敲了 3 下，知道这是地下关系把敌人已经开来的信送来了，连忙对八团长说：“快挨家挨户通知老百姓，饭后都掌上灯，灯点的越亮越好。”布置完毕，杨司令叫上杨俊恒说：“走，这里留给二师八团，咱们去截敌人后路，掏它的老窝！”

韭菜园子兵营里刚开完晚饭，大胡子团长命令蒙古骑兵 200 人紧急集合，夜袭马蹄沟。这些内蒙古王家卫队改编的骑兵，在大渠教官的率领下，向马蹄沟奔驰而去。他们老远望见马蹄沟家家灯火通明，大渠教官勒住了马，正在仔细观察，灯火熄灭了。大渠教官瞪圆了双眼，急忙拨转马头叫道：“不好！回去！”没跑出两箭地，前面的战马便被抗联的绊马索绊倒，一个个骑兵摔下马来，再往前又被一棵棵横在路上的大树挡住去路，枪声顿时大作，大渠教官一看不好，赶忙带着 50 多名骑兵落荒而逃。余下的 100 多名骑兵，不死即伤，多数被俘。

大胡子团长带着步兵，等在韭菜园子外边，原计划如果大渠得手，见到信号便接着冲上去。但左等右等不见音信，过了半个时辰，才望见七零八落的骑兵逃来，还没等接话，背后围子里呜嗷喊叫：“不好啦！红军端了警察署啦！”鬼子大胡子团长转过身去，只见警察署被大火烧得呼呼直响，气得他直跺脚，浑身冒冷汗。他赶忙带兵回围子，到处找藤井，左找右找找不到，半晌，才见藤井光着

脊梁，只穿着裤衩，哆哆嗦嗦被两个鬼子从高粱地里扶了出来。大胡子团长迎上去道惊，被藤井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刮子。大胡子团长赶忙掉头去追红军，一直追到天亮，也未见红军的影子。正着急间，见一个被逼着去出探红军的探子，带着盖有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大印的信回来。信是杨靖宇写给藤井的，只有一句话："在老爷岭上恭候你。"藤井看完后把信摔到索旅长的脸上，怒气冲冲地回到了通化省城。索旅长对大胡子团长也没有好气，限期3天，追剿杨靖宇。但索玉山也知道，这毕竟是白日做梦。

（王传圣口述 文史委整理）

长岗伏击战

根据老岭高干紧急会议的战略部署，抗联第一路军主力部队于1938年7月末开始，陆续离开辑安老岭抗日根据地，向濛江、桦甸县境山区转移。伪军索旅旅长索玉山为了围剿抗联亲自率领伪军索旅骑兵四十一团和步兵三十二团残部，四处寻找杨司令领导的抗联主力。

8月2日，他再次率队从辑安县城倾巢出动向抗联部队经常活动的长岗奔来，进行堵截围剿。恰巧，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一路军军部、警卫旅和一方面军一部，于前一天来到长岗一带的八宝沟(今长岗村)，就住在村里。是日，抗联部队按预定计划准备向西北方向进发。当杨靖宇率领大队人马，刚刚翻上西山岗梁就传来了后卫部队的报告：在八宝沟仅一山之隔的埋财沟的南端庙岭发现了敌情。是按原定计划行动，还是返回去消灭这股敌人？杨靖宇紧急召集干部会议，研究后，一致主张对送上门来的敌人绝不放掉。杨靖宇便立即指挥部队兵分几路，紧急行军，分头进入埋财沟的伏击阵地。

埋财沟是一条在长岗之上的西北伸向东南的小山沟。沟的两旁和沟掌上全是高山，公路就在沟东侧的山坡上，在沟掌上，长岗公路与通向八宝沟的公路相接。在这里地势比较平展。山下是小河的源头，在北面的山腰上，宜于隐蔽设伏和向公路上冲杀。指挥部和

机枪排就设在北面的山腰上，杨靖宇在这里指挥既可以掌握全局，又便于封锁敌人向前逃窜的道路。杨靖宇还派一方面军的一个连，扼守敌人逃路东山的一个制高点。到了下午二、三点钟，一切布置就绪。

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伪军经过一上午的行军，累得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庙岭上刚吃过午饭的敌人，脱掉外衣，架起枪来休息。老远望去，伪军的白衬衣白花花一片。过了不一会儿，伪军开始站起来整队向长岗岭奔来。长岗岭上埋伏的战士把子弹都推上了膛，等待着指挥部的命令。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杨靖宇打响了指挥枪，紧接着枪声四起，震撼着整个老岭山谷。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大部分敌人都被压制在公路上，部分敌人钻进沟底草丛里，恰好进入我冲锋队的阵地前。抗联战士个个纵身跃起，端着刺刀像猛虎下山一样冲进敌群，不到一袋烟功夫，就杀得敌人死尸遍野，未被打死的敌人纷纷跪在地上举枪投降。

这时抗联战士在沟底阵地正打扫战场，突然东山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机枪子弹向我军阵地和沟底猛烈扫射，当即有几名战士倒了下去。杨靖宇发现是我军控制制高点的那个连见敌人大势已去，也下山去缴械抓俘虏，一股敌人乘机在络腮胡子营长高岗武治的带领下，乘机占领了高地。杨靖宇非常着急，果断的下达了必须夺回制高点的命令。由于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致使我方几次进攻都没能成功。在这严峻时刻，杨靖宇立即命令一军参谋长（老岭高干会议时被任命为三师师长）杨俊恒亲自带领冲锋队夺回高地控制权。杨俊恒率队连续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他再次率队冲锋终于冲到了离山顶 10 余米的一个凹处，但不幸的是，敌人投过来的几颗手榴弹连续爆炸，杨俊恒等 10 余人先后牺牲。杨靖宇见状，心中燃起怒火，要亲自率队冲锋，被警卫人员拦住。随后，杨靖宇指挥机枪火力掩护冲锋队冲锋，战士们高喊着“为杨参谋长报仇”的喊杀声，终于夺回了制高点，只有少数敌人跳崖逃跑。

同时，杨靖宇又派了一个连队搜索战场，又抓获了十几个躲在树林里的伪军。至此，抗联部队歼灭了索旅骑兵四十一团和步兵三十二团余部，击毙骑兵中尉西田隆重、步兵上尉高岗武治等日酋，毙伤敌 60 余人，俘虏 200 多人，缴获机枪 9 挺，步枪 140 多支及

一批军用物资。.

长岗伏击战结束后，同志们于次日黎明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召开了追悼会，掩埋了杨俊恒烈士遗体，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要狠狠打击敌人，为杨参谋长报仇。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组建少年铁血队

抗联一路军少年铁血队，是在杨靖宇将军的关怀下，在辑安六道阳岔深山里诞生的。杨司令曾称少年铁血队是“长白山火种”、“抗联的未来”。

1938 年 7 月后，东北抗日战争进入了更加艰苦、残酷的年代。由于程斌叛变，抗联一路军的战略部署、主力分布、军事力量和战略战术以及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大部分被日寇所掌握。叛徒程斌等亲自带领日伪讨伐队、警察队进攻抗联根据地和密营，破坏我抗日组织，抓捕抗联基本群众，尤其是围剿抗联武装，致使抗日斗争，尤其是抗联一路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由于程斌率敌讨伐队逼近辑安，改编后的抗联一路军主力于 1938 年 7 月底开始陆续向濛江、桦甸森林地带转移。其间，取得了长岗伏击战的胜利。随后，尚未撤出辑安的抗联部队改变战略部署，推迟了向濛、桦森林地带转移的时间，撤到了辑安县六道阳岔沟里密营进行休整。杨靖宇等一路军领导研究决定，为了培养抗联后备干部，使一些小战士迅速成长为部队骨干，在战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决定用长岗战斗缴获的三八式马枪作装备，把各部队十三、四岁至十六、七岁的小战士（其中一部分是抗联袭击土口子隧道时解放的小劳工）都集中起来，组成少年铁血队。由高玉信任队长，王传圣任指导员，全队 24 人(后发展到 50 余人)，分为 3 个班，一班长叫于林；二班长姓王，外号大王；三班长叫郭凤歧。

少年铁血队随司令部活动，是司令部的机动力量，同时也是杨司令的警卫队。行军的时候，铁血队经常是与杨司令身边的特卫排一起前后保护；宿营时，铁血队的帐篷就设在杨司令的帐篷附近，

为杨司令站岗放哨；打仗时随主力一起出击，分担自己的攻击任务。

少年铁血队成立后的首战，是向北转移时的红土崖反击战。这次战斗中，铁血队与警卫一团配合，在反击战中占领高地，将敌人压制在沟底，警卫一团三面包围敌人，铁血队一、二班战士冲到沟底，将敌人全部缴械，受到了杨司令的表扬。

这支队伍参加的第二次战斗，也是他们在辑安的最后一战。1938 年 10 月 17 日和 18 日，抗联主力由红土崖一带突围后，经辑安虾蠓沟（今沿江村）一带渡浑江撤向通化江甸子。在涉水渡江时，发现讨伐的敌人再次跟踪而来，并包围了我军。铁血队和司令部抢占北岗，阻击敌人，突围时，又从铁血队抽出一个班，配合突击队向北打开突破口，保证大部队顺利突围。

此后，这支队伍又先后参加了柳树河子突袭战、袭击木箕河集团部落、木箕河伐木场、大蒲柴河攻击战、老营沟救护杨司令、攻打三道老爷府、太平沟战斗以及马屁股山突围战等重要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成为抗联一路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秀文等根据李重勤《长白山火种》整理）

我在少年铁血队

长岗战役之后，靖宇将军找我，当时我记得杨靖宇将军拿出一大一小两支钢笔，对我说："这是给你留的。"

我说："我就要这支小的吧。"

靖宇将军把钢笔给了我，说："我想从你和张秀峰俩人中，选一个去少年铁血队当指导员，你要去，张秀峰就去警卫排当排长。"

老实讲，我不乐意当官。当警卫员多好，除了首长管我以外，旁人多大官也管不着我。那时候，我在司令部还挺吃香，所以我不乐意去，靖宇将军说："我不和你谈了，你去找魏政委去！"

在这之前，靖宇将军叫我管军部的抗日救国青年团的工作，1938 年正式任命我为青年干事长，也就是抗日救国青年团的书记。我虽不大同意，但接了。这次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呢？就是感到少年铁血队这帮小孩子不好带。后来我去找徐哲谈过，他说："这个事

已经定了，找我也没办法。”

实在不行了，我就去找魏政委了。魏政委谈话的方法是，他不着急，不上火，总是笑呵呵地跟你磨，跟你反复讲道理。我和他谈了两次，最后叫他说服了，我就说：“那我就先去干一个月看看，能行，我就接着干；不行，我就交差，你们再安排人。”

一次，我到少年铁血队看过，只见那个帽子歪戴着，这个怀开着，一个皮带郎当着，一个子弹带搭拉在膝盖上。还有的淌着两筒鼻涕，有的还带着鼻涕疙瘩。我一看这些小兵心想，这可怎么带？可是，最终考虑军人应服从命令，我还是到职上任了。这支队伍，开始时，连长加我，一共是 24 个人。一班长是于伦，二班长姓王。这些孩子，大都是打土口子工地那一仗时参军的，实在不好管。但是，从孩子到战士，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于是，我便和高队长两个人研究，决定搞一次整顿。整顿前，先把军容整理了一下。过去水龙布做的子弹袋坏了，现在全换上花旗布的，还领了花旗布做的新帐篷。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这个少年铁血队，总算是比过去强多了，开始往好处转化了。

有一天，靖宇将军到我们帐篷来检查枪，检查到一班二号孙宝祥，他是毕团来的，参军较早，算老战士了。靖宇将军看了他的枪后，问他：“你叫什么名？”

他说：“孙宝祥。”

“你枪上的来复线怎么丢了呵？”

“没有丢。”

“没丢，那你看看吧。”孙宝祥接过靖宇将军递过来的枪一看，傻眼了。原来每支枪里头有 3 根来复线，子弹靠这出去才有劲。由于他没擦枪，枪生锈了，来复线也就看不见了。他知道自己不对，咀一撇，承认了错误。靖宇将军看了他一眼，对大家讲：“大家要爱护枪，才能在战场多杀敌人。”话虽不多，但这些小家伙听了，却很认真。从那以后，他们把枪擦的铮铮亮，当童工时的不良习气逐渐改没了，个个都像个当兵的样了。

（王传圣口述 文史委整理）

攻打青沟子警察署

第二次老岭会议后，抗联一路军主力决定撤离辑安老岭根据地，转入濛江（今靖宇县）一带坚持抗战。在撤离前为教训一下日伪反动势力，补充我军的给养和枪支弹药，打击敌人的反动嚣张气焰，我军决定攻打青沟子警察署。

8 月上旬一个阴雨的晚上，抗联毕团长带领 200 余名战士，首先把东岔伪警察分所包围起来，随后赶到青沟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占领了西南炮台，缴获了一批枪支，继而包围了警察署。敌人在大院炮台上喊："别打了，王署长吓得不行了！"并派警察杨景义出来谈判，警察署答应抗联提出的各项条件，按时将布匹、鞋和粮食送到指定地点，这样，抗联暂时撤出了青沟子。

第二天，通化派来了省特设警察队 32 人常驻青沟子。警察队依仗特设警察队势力，竟拒不交给养而且加强了防务，怕抗联夜间进攻，各炮台备有煤油和从老百姓家中收来的枕头，以备照明之用。

红军撤出青沟子以后，了解到青沟子警察署的行迹，决定再次惩罚这些汉奸走狗。于 8 月 19 日再次组织队伍攻打。第一队是便衣队，第二队是手枪队，主力部队由杨靖宇直接率领，直奔青沟子。

这天傍晚，警察署长正从别人家中借来烟具，准备回家和岳父抽大烟。在回家的路上被特设警察队于万海遇上，责备其吸用"违禁品"，王署长不服被打了两个耳光，大烟盘也被打落在地，王署长恼羞成怒，捡起了大烟盘子气冲冲地跑回警察署，组织自卫团进行报复。警察队见势也荷枪实弹奔向战斗岗位。正值此时，一个警察进来报告，抗联从东岔沟里打下来，前山炮台已被占领。青沟子四周响起了枪声。两个大院的敌人都乱了手脚，并向我军还击。战斗进行一个小时后，抗联攻破了青沟子村，守在东北角炮楼上的于万海，余怒未消，一边骂一边指挥还击，并将几个蘸着火油并已点着的枕头扔到墙外，照得村子如同白昼。抗联看清是于万海，便和他对骂，并叫号："你先打我吧！"于万海听后得意忘形，马上答应。红军把头伸出来，于万海没有打中，就慌了神，想不伸头又怕在警

察队中丢面子，万般无奈，只好壮胆伸出头，等他把头伸出垛口，抗联只一枪就把他送上西天。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拂晓，敌人伤亡惨重。警察署长给通化打电话，向驻通化省的佐藤求救。当佐藤派来援兵时，杨靖宇已率队安全撤离了青沟子。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高丽河子突围战

1938 年中秋节过后，由于程斌的叛变，我们提前向北转移。杨司令率领着直属部队的一团、三团和机关枪连、少年铁血队共七、八百人，从蚂蚁河的东岔上围子出发，路经蚊子沟、小吊水湖沟、天桥沟、龙爪沟、奔通化方向。第二天，离开小龙爪到了高丽河，在高丽河住下了。部队撤离路过天桥沟时，我（徐光）在人群中看见了我爹，我怕他难过，躲着他没让他看见我，从此一别十几年。

部队在高丽河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我们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枪响后，机枪连很快占领了制高点，给冲上来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打退了敌人，使部队很快冲出了包围圈，并掩护了后撤的部队。

这次突围战，我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缴了敌人的武器弹药，主要原因有 3 条：一条是我们住的地方有利，一有情况，马上就占领制高点；第二条是我们有黎明前搜山的制度，能尽早摸清地形和情况；第三条就是司令部一个号兵一早起来去解大便，发现前面有弯着腰跑的敌人，他就开了枪。我们的机枪连在韩参谋的指挥下，迅速占领土崖这个制高点，压住了敌人，使部队能得到时间转移。敌人原以为这次偷袭一定会成功，因为 1936 年，他们在这个地方偷袭成功一次，我大哥就是在这里牺牲的。这一次，他们万万没想到失败了。部队在撤离时，只留一个班没跟上，他们是去一个小山头接岗，被敌人截住了，他们就爬到了一个大石砬子上面坚守。敌人以为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一直打到黑天。我们这个班牺牲了两个。当天全黑下来以后，他们利用天黑的有利条件，突出包围圈。第二天就追上了大部队。这是我们离开辑安时打的最后一仗。

（李重勤搜集整理）

曹亚范率部在辑安老岭山区坚持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杨靖宇将军率抗联主力部队，向濛江、抚松森林地带转移后，曹亚范，伊俊山率领抗联第一方面军，继续在辑安游击区坚持抗日斗争和策应抗联一军部队战略转移。1939年1月，先后袭击了辑安的二道阳岔，新开岭和刀尖岭等敌人主要据点。2月，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又袭击了花甸子、土城子伪警察分所。3月15日，于石青沟村东沟袭击了日军曾原部队，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系步兵上尉吉田林一郎和两名伪军士兵，还打伤6名士兵。战斗结束后，曹亚范率领一方面军转移到大甸子筹集给养。4月，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迂回岭后，攻克了辑安台上“集团部落”。5月，袭击了辑安县横路村伪警察所。而后第一方面军北上河里地区，准备与杨靖宇将军率领的军部会师。

1939年5月9日，杨靖宇将军给曹亚范和伊俊山写信，介绍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关内抗战情况及军部战况，并勉励和指示第一方面军坚持在鸭绿江沿岸和辑安老岭山区的斗争，要注重对矿山、铁路的袭击，争取铁路矿工和森林采伐工人参加抗日队伍，要加强群众的反日工作，注意解决给养，机动灵活地袭击敌人。

1939年8月，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在辑安连续袭击了麻线沟、活龙盖和榆树林子江口等伪警察分所以及榆树林子伪警察署，解除了伪警察武装。10月底，曹亚范率第一方面军攻克辑安县黄柏警察分所，并缴了伪警察的武器。12月，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又在辑安榆树林子南岭与敌人交战。从1939年初到年末的约一年时间里，曹亚范一直身患重病（肺结核），他抱病率领抗联第一方面军，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迂回于辑安抗日游击区，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机动灵活，神出鬼没，英勇顽强，穿梭苦战，搅得日伪军昼夜不宁，惊恐万状，成功地完成了粉碎敌伪“肃正治安计划”，掩护我军主力部队转移，分散杀伤敌人兵力，牵制日军入关等光荣使命，其英雄业绩，至今仍在老岭山区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我的日籍战友福间一夫

我在抗联时期，有一位8号战友，叫福间一夫。1942年冬天，不幸于穆棱县四道河老松岭南坡壮烈牺牲。

他原来是位日本工人，1938年春天，他在辑安土口岭铁路工区劳动时，被我袭击铁路的抗联部队俘获。当查明他是一位普通的绑架子工人，而且对待中国劳工挺好，就释放了他。可是他不走，他要求参加抗联。杨靖宇同志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抗联，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我也是个受苦人，反对这种做法。所以，我才要参加你们的队伍。"杨靖宇同志经过再三考虑，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收下了他，他很高兴。从此，我们一路军多了一位日本籍抗联战士。

福间一夫是个小个子，还有点罗圈腿，但身体很健壮。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团结同志，吃苦耐劳。他为人很随和，很快就和我们熟了。有时我们问他："你是日本人，怎么还和我们一起打你们的人？"

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对的，我反对这种做法。"

我们又问："那你将来怎么办？"

他笑着说："将来你们革命成功了，给我写封证明信，证明我在中国没干坏事，我就回到祖国去。"

根据他的言行，再根据他在铁路工地时对劳工的态度，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是位日本共产党员。但那时，党组织是保密的，谁是不是党员，一是不准打听，二是不准外讲。党员是单线领导，党员彼此之间也不知道谁是党员，残酷的斗争环境，根本不过组织生活。从他的表现看，却始终有着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以后我们就分开了。

1940年夏天，我给三团赵政委当警卫员。1940年10月，在东宁找到了二路军警卫旅一团的全连长（朝鲜族人）。他那时有60多岁，我们便汇合在一起猫冬。这时候，我发现福间一夫在全连长那个连。艰苦的生活虽然使他瘦多了，但精神头还很足，充满了革命

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夏天，赵政委将跟他的十几个人，留下6个身体好的，又将全连长那个连的人留下40个人，编为一个连，由全连长指挥，他领着其余的人过境到了苏联。福间一夫也被留下了，从此，我们又在一起开始了艰难的战斗生活。

赵政委去苏联后，我们就在境内准备过冬的粮食。并埋在山里隐蔽起来。下大雪了，我们准备往密林里运粮。一次，由李排长领着一部分同志去搬运粮食，我们一部分由老大夫领着，埋伏在附近。很长时间，他们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由于叛徒出卖，我们藏粮食的几处地方都被敌人挖走了，李排长领的那些战友也全部牺牲了。我们只好就地转移。那天雪越下越大，因为没吃的，路也越走越难走。饿急眼了，弄点咸盐水喝喝，将就着维持生命。我们前后走了20多天，没鞋穿，没衣穿、那罪遭的，就没法说了。这时的福间一夫，瘦得更厉害了，但一点也没动摇，革命的决心很大。一个日本人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此坚贞不屈，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

有一天我们包围了林场的一个房子，解决吃和穿的。从房子外边看到屋里有4个伪警察在推牌九，墙上挂4颗破套筒枪。我们进屋，把来意和他们一讲，工人们很爽朗，不仅告诉了我们米面在什么地方，还纷纷向我们捐衣裳、鞋子。大米因为不出饭我们没要，背走的是玉米面、白面。这两样粮，煮一锅菜放进点面子，就可以大吃一顿。背上粮食，衣鞋等物。我们就又上山了。怕敌人追，大家跑得很快，唯独福间一夫跑不动。什么原因？原来他有一天饿急眼了，在路过一片粳地时，把一些干瘪的粳穗，就嚼嚼咽肚里了，结果拉不出屎来，他就自己偷偷地扣，把直肠扣感染了。摸进林场后，他又饱吃了一顿大饼子，大便更困难了，连走路也非常不方便，他背的东西，又不让大伙帮着背，所以走得更慢。为了加快速度，经再三动员，他才同意把他的粮食让给了别人背。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地形挺好的地方，就住下休息了一夜，第三天天亮，哨兵打响了枪，李医生命令我和石吉庆打掩护，他们撤退。他们走远以后，我们发现了敌人，就边打掩护，边撤退，到了中午，就接近老松岭了。这时的路越走越陡，我和石吉庆就分开往岭上撤，等我们

快接近林子时，发现福间一夫和另一个朝鲜青年战士负伤了，坐在地上不能走了。我们俩立即叫他们快走，我们给掩护，怎么说福间一夫也不肯，他说："我们已经不能走了，绝对不能再连累你们，你们快走吧！"说完让我们快走，这时，敌人越来越近，我们架起他俩，扶他们走，福间一夫坚决不肯，最后命令我们把手榴弹留下，让我们快撤，他在班里虽然是个 8 号（最末一位），可是眼神里显示的精神，使我们不能不执行，只好忍痛和他们分手了。但我们没有忘记战友，就往另一个方向跑去，想把敌人引向我们，可是他们也开枪了，掩护我们。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他显示出高尚的情操，我们很受感动，更加拚命地射击敌人，就是当我们进到林子里，跳来跳去，依着树，也射击敌人，希望敌人全来追我们，给我们的那两位战友以生存的机会。我们一直坚持到快天黑了。听不到敌人的枪声了，也没撤走。我们不能扔下两名战友，这时，老医生领人来接我们，我们就悄悄地摸出了林子，往山坡下走去。

我们悄悄地往山下走去，多么渴望能听到一声声、那怕是微弱的呻吟声啊，那会使我们得到安慰。因为我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的战友能活着。可是四野一点人声细语都没有，四下里一片寂静。敌人的尸体一个也没有，我们知道敌人运尸后连夜撤走了，我们便加快了步伐，向山坡走去。当来到我们看见福间一夫负伤的那个地方时，都惊呆了，心中的剧痛使泪水立刻模糊了双眼，原来我们的福间一夫和那位朝鲜 3 号战友，被敌人解剖了，尸骨扔得到处都是，头也被割下来扔在一边。

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将他们的尸骨抬到一起，又捡来干柴，将他们火化了。面对着熊熊的大火，我们默默地向他们告别，并向他们默默地保证：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摘自沈凤山回忆录）

辽盟与地下党

在集安抗日活动

辽盟与辑安地下党组织

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成立

1940 年日本侵略者在胶东登陆，到处烧杀抢掠，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纷纷过海来东北谋生。这些人每逢年关，都要返乡探亲。中共胶东区党委为了扩大党在东北的影响，统战部门便利用每年春节机会，邀请由东北回乡探亲的各界人士出席“海外归乡人士座谈会”。并通过拜年、访问、组织参观等活动广交朋友，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动员他们为抗日救国出力。

1942 年 2 月，在中共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党的外围组织——“海外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该工作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具体领导，由统战部长林一山、副部长于谷莺为正、副会长。其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战绩，扩大其政治影响，动员“海外”同胞还乡参加或投资根据地的生产建设；积极而慎重发展会员，团结“海外”各阶层爱国人士，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会员多为商人、职员等，当时在安东（现丹东）伪政府任职员的姚黎明就是会员之一。

1943 年 10 月，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又成立了“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定姚黎明为主任委员，会员有姚黎明在大连发展的张寿山和通化一带发展的李鹏飞、李剑云等十余人。该组织隶属“海外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领导。这些会员，分别活动在大连、沈阳、安东、通化、辑安（今集安）等地。

1944 年春，胶东区党委为加强对“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党的干部直接领导该组织；二是将“辽东各界同胞动员委员会”会址转到东北。当时，胶东区党委又接到党中央给胶东区党委和冀热辽区党委的紧急电报指示：“积极开展敌伪区域内的工作，要切实掌握东北”；同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必然要同我党争夺东北，战后中国

内战不可避免，能否确保东北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根据中央的指示，胶东区党委认为：切实掌握东北，必须派党员干部进入东边道开展工作。其根据是：（一）东边道是日伪重工业基地，是日伪必保之地，是最后决战的战场；（二）该区域工矿密集，工人集中，便于组织发动；（三）由于抗联的影响，当地群众基础好；（四）该地区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同敌人周旋的好战场；（五）这一地区胶东人多，利用乡亲关系，便于开展工作，又有会员在这一带活动的基础。依据这种分析，胶东区党委决定：改建“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为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以下简称辽盟），总部设在辽东。派中共党员罗衡（原名张致清）领导这一工作，设法进入东北迅速打开局面。“辽盟”的主任委员由姚黎明担任，组织委员由罗衡担任，宣传委员由李剑云担任。张寿山为辽盟大连分会主任委员。罗衡为党的负责人。

派党员罗衡进入东北

1944 年 3 月，胶东区党委决定，派党员罗衡赴东北到辽东一带开展工作。统战部部长林一山、副部长于谷莺对此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国内外的斗争形势，让他尽可能熟悉东北的一些情况，并向他交待了总任务和具体任务。总任务：“组织力量待机暴动，配合反攻”。具体任务：一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对辽盟要加强领导，掌握情况，审查会员，了解干部，培养骨干，转入基层，稳速发展，建立分会。首先在辽盟会员的骨干中，积极发展党员，逐步把这一组织建设成为党的地下组织；二是发动群众，组织工人，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积蓄力量，待机举行暴动；三是掌握东北，配合我军反攻，变敌人后方为前方，建立革命基地，创造条件，迎接我军接收。要在行动上，采取“水鸭政策”，如鸭子浮水，表面平静，暗里紧张活动。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联络办法：一是由交通员直接联络；二是通过信件。信的内容多用暗语，以“生意盈亏”与“年成半欠”等表示工作开展逆顺。还把罗衡的代号“乐恒”为辽盟的代号和刘子祥的代号“知母”为党的组织代号，以此进行联络工作。同时，交代了暴动的时间是：苏德战争结束是暴动的信号，苏联红军出兵东

北是暴动的开始。斗争的特点是三角斗争，尽量争取国民党，打击日本侵略者。

胶东区党委向罗衡深入东北所要开展的工作任务方法等全部交待清楚后，于5月罗衡持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的介绍信到了荣城县统战部，经张元启介绍，会见了姚黎明，姚黎明向罗衡具体汇报了辽盟工作开展情况。

罗衡将启程进入东北，但日寇封锁很严。于是将刘剑鸣（罗衡嫂子弟弟）从牡丹江经商回胶东探亲持有的"劳工证"，经东边道七道沟矿劳务系的事务员刘仁宏和在大连经营洋行的王锡礼等两名辽盟会员，通过各种关系更换成罗衡的照片和指纹。随后，罗衡就以大商人之子的身份，以逃避抽兵为由，扮成大连工厂的工人，于七月份与刘仁宏启程了。

罗衡、刘仁宏在威海上船遭到盘查，因罗衡说不清大连的情况被扣押。排在后面的刘仁宏见此情况，没有上船。经熟悉大连商界的王锡礼一番周旋，旅店老板和账房先生出面将罗衡保了出来。经过紧张的筹措，取道烟台，检票前就上了船，在船上罗衡、刘仁宏见到了王锡礼互相以目示意后，各归铺位。

到了大连后，罗衡检查了"辽盟"工作，发展了张寿山入党，并奖励了辽盟大连分会，指定张寿山为主任委员。后到沈阳，通过刘仁宏的拜把兄弟刘仲民（沈阳的宪兵补），给罗衡在沈阳大和区办了户口和去七道沟铁矿就业手续，罗衡让刘仁宏先回七道沟铁矿，安排妥当后来信相告。

1944 年 8 月上旬，罗衡接到刘仁宏的信后，立即同王锡礼从沈阳动身来到七道沟铁矿。到矿山后，刘仁宏为了罗衡的安全，把他安排在刘仁宏的"把兄弟"刘逸民家里住。过了几天，罗衡让王锡礼回大连开辟港口工作，建立大连港口交通站，以便接送从胶东到辽东的干部。

同年的九月初，罗衡开始"就业"对工人宿舍卫生的检查和报纸、信件分发工作。这种工作便于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在此期间，罗衡从刘逸民家搬到了独身宿舍（22 栋房）。刘仁宏为了掩护罗衡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与矿山特务高××拉关系、交朋友，经常和高在一块玩牌赌输赢，猜拳行令"千杯少"，以此分

散他的注意力。

胶东区党委派到东边道的党员干部罗衡同志，就这样打进了日寇残酷统治的七道沟铁矿，在东边道一带开展了地下党的工作和领导辽盟的活动。

辽盟第一次工作会议

1944 年 10 月初，辽盟主任委员姚黎明、宣传委员李剑云来到七道沟铁矿，同辽盟的组织委员罗衡在一工房内召开了辽盟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辽盟会员李鹏飞、刘仁宏。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会前，罗衡代表党组织接受了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刘仁宏的入党申请，逐个谈话后，分别吸收入党。

在这次会议上，姚黎明、李剑云等都汇报了工作开展的情况，罗衡传达了胶东区党委的指示，明确了“积蓄力量，待机暴动，迎接反攻”的总任务。依据上级指示，进行了工作部署和人员分工。姚黎明兼任辽盟辑安分会主任委员，党的负责人，利用他岳父居住良民甸子为点，开辟农村工作；李剑云兼任辽盟通化分会主任委员，党的负责人，以通化市为点，在铁厂、二道江方面开展工作；罗衡暂时兼任辽盟七道沟分会主任委员和党的负责人。分会下设的辽盟七道沟小组暂由罗衡负责，铁矿工人杨德广 12 月入党后，由杨接任；刘仁宏为辽盟七道沟分会八宝特别小组负责人，党的负责人，以八宝为点，向石人、砟子、大栗子一带伸展；张寿山仍负责辽盟大连港口特别小组工作，为党的负责人。

李鹏飞负责跑交通，在通化市、辑安县以经商为掩护建立两个交通站，盈利为组织活动经费。通化市交通站设在龙泉汽水公司。辑安交通站设在兴亚饭庄，由李鹏飞任经理兼会计，李剑云任服务员。

11 月份，王锡礼建立了大连交通站，指定王锡礼负责大连交通站工作，并担负辽东与胶东区党委的联络工作。

“辽东特支”和“通化分支”的诞生

1945 年 2 月，刘芝祥（方志舟）来到辑安与李鹏飞接上了关系，又由李鹏飞陪同去通化七道沟铁矿与罗衡接头。罗衡向刘芝祥作了全面汇报。刘芝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正式批准了罗衡发展的党员。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立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刘芝祥、罗衡、姚黎明、刘仁宏、李剑云、李鹏飞、王锡礼、杨德广、王兴昌等党员参加会议。刘芝祥宣讲了国际、国内敌我斗争的大好形势，使到会的同志受到教育和鼓舞。然后，他在会上，宣布上级党委的决定：成立“辽东特别支部委员会”，并指定刘芝祥任辽东特别支部书记，罗衡任组织委员，吕荣任宣传委员。随后，对辽东特支委员负责的区域进行了分工：刘芝祥负责安东、本溪、沈阳一线；吕荣负责大连到沈阳一线；罗衡负责通化一线。

辽东特支建立后，同时决定设通化分支部委员会，书记由党员选举产生。罗衡被选为通化分支部书记。通化分支部下设五个党小组：李剑云任通化市党小组组长，兼任辽盟通化分会主任委员；姚黎明任辑安党小组组长，兼任辽盟辑安分会主任委员；杨德广任七道沟特别党小组组长，兼任辽盟七道沟分会主任委员；张寿山任大连党小组组长，兼任辽盟大连分会主任委员；王兴昌任沈阳党小组组长，兼任辽盟沈阳特别党小组组长；李鹏飞为刘芝祥在通化一带的交通员；王锡礼仍负责大连交通站，与胶东区党委联络；刘仁宏除掩护罗衡外，还负责情报工作。

会议决定罗衡、刘仁宏到辑安和大连等地检查辽盟建党工作。

日寇投降前夕通化分支部的活动

1945 年 3 月，中共辽东特支通化分支部在辑安“兴亚饭庄”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就罗衡、刘仁宏检查工作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辽盟和党建工作，并且做出具体规定：（1）先在辽盟老会员骨干中发展一批有斗争经验，经过一定考验的同志加入党组织；（2）发展党员以工人为主，特别是产业工人；（3）入党前必须先入辽盟，经考验，再吸收入党；（4）简化入党手续，取消候补期，由于时间与环境所限，不填表、不宣誓，经过最后一次组织

谈话，指定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即可。

会议还决定：罗衡转移到通化市开展工作；通过辽盟会员丛福海介绍（并负责掩护）来到通化市官道岭石灰窑当账房先生（会计）；刘仁宏通过与松岗、尾园的关系，乘矿山内部人员调整之机，调到八宝矿工作，公开身份仍任事务员。

1945 年 5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在欧洲，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德军投降。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我国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我军全面反攻阶段。通化分支部为了迎接反攻的任务，于 5 月份，在通化市官道岭石灰窑召开了“五月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党组织，加强纪律性，克服自满情绪，提高政治觉悟，适应新形势，迎接新任务，更好开展工作。

会议上，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与会同志讨论了德军投降后的形势，分析了敌人的动态。尤其通过分析通化区域内敌人的防空、捕人、调兵等动态看，暴露了敌人企图垂死挣扎的狰狞面目。这也标志着全国大反攻的形势指日可待，武装暴动的时机即将到来。

这次会议明确了今后的行动准则：（一）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反对自由主义，加强组织纪律性；（二）一切为了武装暴动的胜利；（三）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鼓动群众，动摇敌人；（四）积极组织基本群众，选拔干部，调查敌人的武器配备力量，监视敌人，确定目标，待机行动；（五）确定七道沟、八宝、辑安为主力重点和主要爆发点。为武装暴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准备好暴动的武器与工具，并对负责人作了分工：姚黎明、李鹏飞领导辑安方面；刘仁宏、杨德广领导七道沟、八宝方面；李剑云负责铁厂方面；罗衡为武装暴动总指挥。

会议约定：苏联对日本宣战和我军反攻东北，就是战争即将转入最后阶段，听到这个消息，随即到通化集合，开紧急会议，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当时，通化一带的辽盟会员已发展到 50 多人，暴动以工人为主体，尽量动员更多人参加。

这次通化分支部的“五月会议”，不仅是一次党的整顿会议，而且是一次党的地下活动转向武装斗争的动员会议，也是一次武装暴动准备会议。

辑安紧急会议

1945年8月8日苏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通化分支部各党小组负责人赶到辑安，在兴亚饭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衡、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李鹏飞5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日寇投降了，还要不要武装？搞起武装会不会影响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我们怎么办？经过热烈地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日寇虽然投降了，但还没有全部放下武器，伪政权还存在，伪军警还没被缴械，战争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二）国民党必然派人到通化活动，势必要出现争夺，内战有可能爆发；（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政权，应先把伪警、宪、特的武器夺过来，建立工人为主体的人民武装。基于上述三点分析与判断，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建立武装；二是接收伪政权；三是接触苏联红军，取得盟军的帮助。会议还决定：由罗衡、李鹏飞去安东向辽东特支汇报，请示工作；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去通化组织宣传队、编写标语口号、印发传单，同时负责与苏联红军接触。

1945年8月20日，罗衡、李鹏飞起身去安东。8月22日，中共辽东特别支部在安东的元宝山上召开了第二次支委会，李鹏飞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罗衡关于通化分支的工作安排汇报，然后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并作出如下决定：建立武装，监视敌人，保护重要物资，等待我军接收。把辽东全部武装力量组成“辽东抗日游击纵队”，下辖3个支队，即三、五、八支队。安东为三支队，由刘芝祥负责，任务是配合我军接收本溪、沈阳一带，控制本溪安东一线。安东另一部分武装为五支队，由吕荣负责，任务是控制安东公路，占据安东以保证我军从安东登陆。通化为八支队，由罗衡负责，任务是占据通化打通通桓公路，同安东相互策应。

8月20日，李剑云领警卫员曲永学到七道沟矿山去发动工人，被矿山国民党被俘人员串通日本人将李剑云、曲永学关押起来。当天黄昏，经我地下党营救，李剑云、曲永学很快脱险。8月22日，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到通化市，通过东江春饭店经理王云东（会

俄语）与苏联红军上校司令官莫洛道夫进行接触，并得到了部分武器。随后，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速返七道沟，举行了矿山暴动，拉起队伍，缴了矿警、铁路警察的枪支，占领了矿山。随后，把队伍开到了通化市郊，李剑云以党代表、军代表的身份，找伪通化省长杨乃时谈判，杨鉴于形势所迫，对提出的一些条件要求都一一答应，顺利地解决了即将进驻通化的八路军所需的粮食和住房问题。

建立通化第八支队

1945 年 8 月 24 日，罗衡、李鹏飞从安东赶到了通化，着手筹备成立“辽东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的工作。

9 月初，通化各地骨干来到通化市。通化分支部在东江春饭店的经理办公室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罗衡主持会议，首先传达了辽东特支的指示，经过简短的议论后，作出七项决定：一、宣布正式成立辽东抗日游击纵队通化第八支队，姚黎明任司令，罗衡任政委。二、由刘仁宏负责中共党员、辽盟会员登记。三、号召各矿工人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看管好重要物资，加紧训练，准备战斗。四、对敌伪军警，分别情况，采取四项措施：1、以自卫团的名义进行改编，派进党的干部，调出武器；2、接收过来，加强领导，再做改编，调动武器；3、命令其上缴武器，或遣散或重编或维持原状，听从我们的命令；4、以武力解决。五、发表《告同胞书》以及标语、口号、传单印刷工作；六、将辽盟通化地区各分会，特别小组改建为“通化地区建国联合会”。总部设在日本宪兵队大院，同时挂出牌子。七、派李剑云去沈阳和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联系，请示派干部接收通化伪政权。

会后，通化第八支队和地区建联会的同志们星夜撒出通化城，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公开发表了《告同胞书》，撒传单，贴标语，街头演讲。一时间，“八路军起义”、“八路军到通化”的呼声传遍大街小巷。伪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伪官吏惶惶不可终日。工人们纷纷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第八支队由原来 40 人，发展到 200 多人。

通化第八支队成立后，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各种反动势力开始蠢蠢欲动。1945 年 9 月中旬，原通化日伪特务机关的

特务于俊峰从沈阳带来五、六十人的国民党武装，自称是通化保安司令部司令。他到通化后，气势汹汹，飞扬跋扈，让伪省长杨乃时交出政权，命令赵殿礼挂通化县国民党部的牌子，反动气焰嚣张。

于俊峰被人宴请到东江春饭店的消息，被新参加第八支队不久的沈殿铠得知。沈便以学徒跑堂身份来到小客厅里，听见有人问于俊峰："于司令这次来通化与八路军姚司令合作吗？"于俊峰说："蒋委员长指示，合作是暂时的，等我站稳脚跟，就把他们消灭。"沈听后，便寻机而出，回到第八支队向姚黎明司令作了详细汇报。

第二天，伪省长杨乃时、治安大队长吴景政在"东江春"设宴，为于接风。姚黎明也应邀出席。在席间，骄横的于俊峰，用小手枪敲打杨乃时、吴景政的脑袋说："你们他妈的，一个是大汉奸，一个是小汉奸，没他妈的一个好东西。"弄得两人敢怒不敢言。散席后，姚借机向吴提出干掉这个实为汉奸的冒牌司令于俊峰，杨、吴表现畏惧。见两人害怕，姚说："你们配合一下就行，一切由我负责。杨、吴点头应允。

10 月初的一天下午 3 时，第八支队包围了通化保安司令部。八支队在清真寺后山头的大柳树下布置机枪封锁，各路口都设下埋伏，吴景政的治安队在清真寺胡同堵截。布置停当后，派两名战士以给于送信为由，乘其不备夺了门岗的枪，并俘虏了他。然后就往一楼里连仍 3 颗手榴弹，没被炸死的都跑到二楼。楼上也遭到对面山头的机枪和街道上投来的手榴弹的袭击，八支队一个班冲上二楼，残敌举手投降，于俊峰被生擒活捉，当即把罪大恶极的于俊峰拉到南江沿枪决。全歼了这股反革命武装。

在全歼了这股反革命武装后，大灭了敌人的威风，第八支队声威大震，保卫了通化山城，通化地下党公开武装斗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通化第八支队队伍迅速扩大，发展到 12 个正规连，7 个自卫团（通化市 2 个，二道江 1 个，铁厂 1 个，七道沟 1 个，八宝矿 1 个，石人矿 1 个），共计 2 000 多人。

接收通化和辑安伪政权

1945 年 9 月末，沈阳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派来了蒋亚泉等几位干部。10 月初，接收伪通化政权，成立了辽东省通化地区专员督察公署，蒋亚泉任专员，李剑云为专员秘书。蒋亚泉到任不久，将第八支队改为五十八团，任命李冀泉为团长，姚黎明为政委。

10 月中旬，姚黎明奉命率五十八团二连来辑安县接收伪政权，并任县长。因专员公署急需 50 万资金，姚黎明到辑安后，就带人到银行取款，遭到银行拒付，姚黎明强行把款取走，弄得全县大哗。

伪警察出身的二连连长何学福，早就与共产党离心离德，二连成员大部分是刚从伪警各队收编过来的，他便借此机会与辑安公安队相勾结，于 10 月 8 日晚 11 时策动叛变，将县长姚黎明、指导员李鹏飞等 34 名同志扣押在县公安局。专署闻讯后，请苏军上校司令官莫洛道夫到辑安要人，伪公安队便把扣押的人带到后山藏起来，上校无功而返。五十八团派人把何学福家属都捕起来作人质，以保护我 34 名干部战士的人身安全。

何学福一见不妙，便把姚黎明、李鹏飞从县公安局提出单押在宪兵队作人质，把其余 32 名干部战士都放了。五十八团第一次攻打头道，损失一个连，被俘 20 人，押在辑安县公安局。姚、李与这 20 人的伙食由当地福盛裕商号供应。直到 11 月下旬，祝顺鹏副司令率队打垮了头道、苇沙河的叛敌。在攻打辑安前，何学福在我强大的武装力量震慑下，又因其全家人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不得不将姚、李和其余 20 人释放。

11 月初，祝顺鹏副司令率领教导团一部，从通化乘火车来辑安，当火车行驶至石湖车站时，因路基发生故障，火车不能行驶，教导团连夜徒步赶到县城，控制了叛军和“地方维持会”，迫使地方维持会交出了政权，同时解散了国民党辑安县党部。于 11 月 20 日，正式成立了辑安县民主政府，姚黎明任县长，并兼任辑安党小组长。从此，开始领导全县人民减租减息、除奸反霸斗争。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回忆辽盟与地下党在辑安的活动

我叫罗衡，在祖国光复前，我是通化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原名叫张致清，曾化名刘剑鸣。现将我在通化、辑安活动时的一些情况，做简单的回顾。

1942 年 2 月，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海外各界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由区党委统战部代管和具体领导，当时的副部长于谷莺担任主任委员，这个组织是统一战线群众性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战绩，扩大影响，动员海外侨胞还乡参加根据地生产投资。发展会员，团结海外各阶层及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毫无疑问，这个组织的活动是秘密的，委员多为上层商人、职员、技术人员等。姚黎明就是这个组织的委员之一。1943 年为了指导辽东的抗日救国活动，准备迎接全国大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又成立了辽东各界抗日同盟会，并指定姚黎明为总会的主任委员。1944 年 2、3 月份将这个机构设在东北。虽然它仍然归海外各界抗日动员委员会领导，但性质已经变了，不只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它已成为扩大组织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它是辽东党组织的外围组织。这样，必须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

根据这一精神，1944 年 3 月，胶东区党委派我到东北，主要是在通化地区工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基地，加强党的领导。具体任务是：组织工人，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力量，积蓄力量，待机暴动，领导与掌握抗盟会，发展会员，审查干部，培养骨干，转入基层，稳步发展，建立分会，建立交通联系，争取建立港口工作。另外，组织还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辽东地区党的工作由我负责；二是抗盟会以姚黎明为主任委员兼组织委员，李剑云为宣传委员。

3 月做的决定，7 月份才出发，掩护我的人有刘仁宏（抗盟会员）、王锡礼（抗盟会员、路外城的商人）。我靠介绍信，亲自到王家去过。他表现得很好，利用了我嫂子娘家的兄弟刘剑鸣回家的证

明，做了化妆。在领导和我谈完话后，便出发了。到了大连，先会见了“抗盟会”小组长张寿山，会员宋天鹏等，我在听完汇报后，就决定发展张寿山入党，并想定他为党的小组长，还做了工作部署。在大连十余天后，便到沈阳，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通过王锡礼的本家爷爷，在铁西一家工厂里教私塾的王世昌，影响一下工人；另一个就是想在沈阳办一个户口，便打发刘仁宏先去了七道沟了解情况，安排合法就业的事。不久我接到刘仁宏的来信，并在大和区办了个户口，便在 8 月 10 日前后到了七道沟。开始住在刘逸民的家里。住了几天，我又把王锡礼派回大连，建立秘密交通站，与胶东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时决定王锡礼负责交通工作。11 月份，王锡礼完成了任务，我便派他回胶东汇报工作。

9 月初，我开始在七道沟上班当工人，目的是与工人接近，便于开展工作。但有一点不利，就是当了工人便缠住了身子，以后再外出活动就不容易。于是，我就想挂个劳务系跑外勤的差事，这样便于活动，但是没办成。以后又通过刘仁宏给日本人当翻译的工作条件，跟劳务科日本人石黑科长联系才办妥。住了几个月，又被调到材料厂，这对我们的工作开展也很有利。

从 1944 年 9 月到 1945 年 2 月，即辽东支部建立前的这段活动，主要是：1944 年 10 月末，姚黎明、李鹏飞、李剑云相继来到东北（姚黎明长期在东北工作，这次先回山东汇报后，再次回来了）在七道沟与我会面。10 月末，在七道沟召开了抗盟总委员会，传达了党的指示，主要研究了抗盟会方针，要把一切工作都投入到积蓄力量，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反攻，工作范围是以通化地区为主，向北发展。这次会议，还分析了敌情，布置了任务。根据党的指示，会上决定我和刘仁宏以七道沟为据点，向北伸张，开辟石人、八宝、大栗子矿山工作。李剑云以通化为据点，开辟铁厂子、二道江一带工作。姚黎明主要在辑安开辟工作。李鹏飞负责通化地区的交通联络，交通点设在通化汽水公司。另设大连交通站，由张寿山负责。总的领导中心设在七道沟。这个部署的目的，是想很快地打乱敌人，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方。它的根据是：1、这个地区人数集中，大约有 3 万人左右，并且和农村紧连。2、山林连绵，交通方便，地理形势很有利。3、从我们初步调查敌人的情况，感到符合区党委

的预见，这次会议的作用很大，对于整个辽东工作和抗盟会的工作，推动很大，是个转折点，为后来的工作，打开了局面。

1945 年 2 月，胶东区党委派刘芝祥（又名方志舟）来到七道沟，以“知母”为代号，和我接上了关系，当天晚上，在材料厂我们俩人的会晤中，他向我传达了区党委指示，我向他汇报了工作。然后，根据区党委的决定，由刘芝祥、我和吕荣成立辽东党支部，并指定了刘芝祥为书记，我为组织委员，吕荣为宣传委员。辽东支部成立起来以后不久，立即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批准姚黎明、王锡礼、刘仁宏、李鹏飞、杨德广、宋天鹏、李剑云、张寿山八人加入党组织。当时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入党手续不得不简化，没有规定候补期，也没有填表和严格的入党仪式，只是经过最后一次谈话，本人表示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便指明入党日期就算入党了。支委会根据区党委指示，成立了通化分支，由我任书记，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会上决定李剑云为通化党小组长，张寿山为大连党小组长，姚黎明为辑安党小组长，榆树沟为七道沟党小组，王世昌为沈阳抗盟小组长。李鹏飞为我和刘芝祥之间的交通员，王锡礼为胶东区党委和大连之间联系的交通员。刘仁宏负责情报工作，掩护我向北开辟工作。另外还决定刘芝祥负责成立沈阳抗盟分会，以沈阳为据点，开辟本溪工作，吕荣建安东抗盟分会，开辟安东一带工作。

1945 年 2 月，我在七道沟召开了分支和抗盟总会会议，传达了辽东党支部的决定，做了工作部署，会上决定兑收辑安兴亚饭庄，作为交通点。会后我到良民甸子、大连等地检查工作，4 月份回到通化。5 月份，在市官道岭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苏联红军已打到柏林，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形势紧迫，任务紧急。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工作，由于党的方针正确，工作开展得顺利。大连、沈阳、通化、铁厂子、二道江、八宝、七道沟、辑安、良民甸子、上套等地工作都有了很大发展，有的开展党或盟的工作，有的正式成立了党、盟的组织。不过，这时有的干部，便滋长了盲目乐观、居功骄傲的情绪。这次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1、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反对自由主义，加强组织纪律性；2、一切为了武装暴动；3、积极开

展宣传攻势，鼓舞群众、动摇敌人，选拔骨干，调查敌人装备，监视敌人，明确目标，待机行动。另外，会议还决定姚黎明、李鹏飞领导辑安行动，我和李剑云、刘仁宏、杨德广领导七道沟、八宝的行动。会后，我又在 7 月份到各地检查工作，了解到各地的起义准备工作做得挺好，从起义工具到突击队，都做了部署。特别是七道沟，有 4 个人把宪兵补高元龙的手枪缴了，并把他看起来。另外，他们还组织了 20 多人的突击队。正在这时，日本投降了，形势突变，我们一时又接不到上级党委的指示，怎么办？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开展工作，我们在 8 月 16 日在辑安兴亚饭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姚黎明、李鹏飞、李剑云和我共 4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重点研究了形势发生的变化，还要不要搞武装，以及目前工作怎么开展？经过研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日本投降了，但还没完全放下武器，敌伪政权还没有垮台。2、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国民党还要争夺东北广大解放区，内战不可避免，革命没有成功。3、武装革命是我国革命的特点，应该把伪军、汉奸的枪杆子夺过来。辑安会议以后，我和李鹏飞到安东会见刘芝祥，召开了辽东支部第二次支委会。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然后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1、成立武装，监视敌人，保护重要物资，等待我军接收；2、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扩大我党我军声威。

从安东回来，正是 9 月份了，我在通化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安东二次支委会精神，分析了形势，决定了武装起义。会后，我们就缴了通化宪兵队长的两支手枪，举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建立了一支以工人为主的武装力量。在七道沟、八宝、石人、二道沟、五道沟等地，建立了工人自卫团，成立了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总支队，近 2 000 人，我为团长，姚黎明为副团长，对敌伪政权震动很大，从而保卫了通化。8 月 21 日，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同志在通化，与驻通化的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这时，国民党从沈阳派来一个叫于俊峰的人任通化保安司令。立脚未稳，便被我们消灭了。有原冀、辽、热军区司令部李运昌司令，从胶东带来了我们的关系，我们便向他汇报了工作，这个时候，通化既有了专员，上级又派来了地委书记，活动在通化的地下党，便结束了历史使命。

（原文为罗衡口述　李重勤整理）

地下党的交通站兴亚饭庄

1944 年 9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抗日同盟会辽东总会，在通化县的七道沟铁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人员有辽东抗日同盟总会主任委员姚黎明，组织委员罗衡，宣传委员李剑云。会议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研究了地下抗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成立大连、丹东、奉天（沈阳）和通化四个分会；同时决定：为了使我们党的地下抗日组织更加隐蔽，又便于辽东各地党的组织和抗日同盟会之间联系，决定由在通化龙泉汽水公司任店员的李鹏飞同志负责交通工作。由外地来通化找我党地下抗日组织联络事情的一切人，都要先与李鹏飞同志联系，由李鹏飞同志根据情况再与其他领导人联系接头。

1944 年 11 月，我地下党辽东支部书记刘芝祥同志受胶东区党委的委派，于 11 月中旬由胶东抵达通化市，由李鹏飞同志陪同找到罗衡同志，并同时召开了党的辽东支部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辽东支部和通化分支部。通化分支部由罗衡同志任书记，李剑云同志任组、宣委员。并决定召开通化分支会议。辽东支部会议结束后，刘芝祥由通化回丹东。经李鹏飞同志转达，李剑云同志去七道沟参加通化分支部的第一次会议。分支部会议主要传达讨论了地下党和抗日组织的安全隐蔽问题，一旦发生问题时的应急措施。根据工作需要，会议决定成立交通站。因为李鹏飞同志担负交通站工作，但住在集体宿舍里，接头很不方便；地下党的抗日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党组织和总会对各地的工作需要有较频繁的接触，过去大多是到七道沟矿山独身工人居住的工棚里与罗衡同志会面或开会，这种来往已经很多，而且很不方便，继续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转移；地下党的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开办一个以商业活动为掩护的交通站，可以获取一些盈利，以便解决地下党的活动经费问题；为了更好的收集敌人的情报。交通站的筹建工作由李鹏飞同志负责。交通站的地点设在辑安。因为地处边境，有铁路直通朝鲜，日寇把朝鲜作为它侵略中国的基地，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期，日寇又企图把中国的通化地区和朝鲜半岛作为它防止苏联红军进攻，最后顽抗的基地，而辑安则是它运送军事物资和进行军事活动的一个交通要道。把交通站设在辑安是比较合适的。

李鹏飞同志按照分支会议的决定，立即进行了紧张的筹建工作，他从大连其姐夫袁国英处借来了5 000元伪币，到辑安县找到了同乡亲友战孚英。战孚英在辑安县烧酒组合当职员，社会交往较广，有一定活动能力。李鹏飞请战孚英帮助，兑了一家王姓饭馆，仍用原来字号，即兴亚饭庄。这个饭庄坐落在辑安县城东门外不远处路北，是一座2层红楼，楼下有一间办公室，一间饭厅，还有厨房和宿舍，楼上有4间餐厅，适合开展地下工作。

1944年12月，辽东抗盟总会在七道沟矿山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姚黎明、罗衡、李剑云、李鹏飞等同志，会议汇总各方面工作情况，传达了党的辽东支部和通化分支会议精神，讨论研究了近期工作。同时，还听取了李鹏飞同志关于筹建辑安交通站的汇报。会议决定交通站的行政负责人由李鹏飞担任，对外名义是经理兼会计；决定党内由李剑云同志代表分支部对交通站实行领导，并决定必要时李剑云同志要辞退铁厂子矿山的工作，到辑安直接参加交通站的工作。会议对交通站成立以后的安全和保密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决定：为了保证交通站的隐蔽和安全，各领导人不是工作和会议需要不能随便到交通站去住；交通站对地下党的经费支援，必须严格控制，不经分支部领导人的批准，任何人不能随便到交通站借钱使用，以便把钱用在刀刃上。会后不久，大约在1945年春节前后，经分支部决定，李剑云同志由铁厂子矿山调到辑安县“兴亚饭庄”交通站工作，其公开掩护的职业是饭馆的跑堂工人。

这个饭馆里另外还有3名工作人员，一名跑堂工叫谢修禧，是李鹏飞、李剑云同志的同乡；一名面案工名叫李日新，是抗盟会会员；一名厨师姓李，是一名比较可靠的老工人。

姚黎明同志是辑安党小组长，在良民甸子一带农民中开展工作，经常到交通站吃住，有时也当跑堂，帮助饭馆做些零活。

从交通站成立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由防卫战转入反攻战，取得了节节胜利，1945年5月苏军攻占柏林，德军投降。这个期间，我地下党的抗日活动

更为紧张繁忙，大连、丹东、奉天（沈阳）等地的地下党的抗盟分会，经常派人来向党组织向抗盟总会联系事情，汇报工作，请求问题，都要通过兴亚饭庄才能和有关领导接头。“兴亚饭庄”这个交通站，成了各地同志住宿吃饭和联系工作的最后和最安全隐蔽场所，他们的路费不足或发生了困难，交通站就给予帮助和接济，同志们把交通站当成自己温暖的家。

1945 年 5 月，通化分支在辑安县“兴亚饭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研究了各地下抗日工作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整个战争形势，当时预计苏联红军很快就会打败希特勒，欧洲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在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不久就可能挥师东进，对日作战，这时我们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就会到来。我们地下党必须加紧工作，在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时，立即组织武装暴动，在东北敌人的后方——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以通化和朝鲜为基地，进行最后顽抗的战略计划，配合我八路军主力和苏联红军对日寇的正面进攻。为了争取时间较快地扩大抗日同盟会的力量，分支会议决定，原在七道沟矿山工作的罗衡和刘仁宏（党员）二人，设法转移到其它厂矿去工作，把地下党和抗盟会的组织迅速伸展到其它厂矿。经李剑云、李鹏飞同志通过抗盟会员从福海将罗衡同志介绍到通化市郊的石灰窑工作；刘仁宏同志通过一个日本人和这个日本人一起调到了八宝矿工作。

会议还决定派罗衡同志去大连检查一次大连分会的工作情况，并要按照分支部的决议把大连分会的工作安排布置好。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统治，敌人的宪兵、警察、特务到处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样残酷困难的环境下，我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机智勇敢，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躲过敌人的多次盘查。有一次李鹏飞和李剑云两位同志还挨了伪警察于树祥、李长喜的打，但是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交通站的同志胜利地完成了交通联络、搜集情报和为地下党筹措经费等任务。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政府向日本宣战，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关东军进攻；随后美国又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这些行动，迫使日本天皇于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在东北的

关东军却企图继续负隅顽抗，他们把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迁到大栗子，大批关东军撤退通化地区之内，他们妄想凭借通化山区和朝鲜半岛为依托进行最后一战。由于形势突然变化，敌伪人员恐慌万状，辑安和通化整个地区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我地下党于8月17日在辑安交通站召开党的分支部和抗日同盟总会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虽然企图顽抗，并且把重兵集中于通化一带，敌伪的武装力量还保持着全副武装，他们还有强大军事力量。但是由于投降的大局已定，敌人的军警官吏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无心作战。人民群众也会受到鼓舞，可以较为容易地被我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我党领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我们必须迅速组织起武装力量，收缴敌人的枪支，扩大我党我军的力量，配合我军主力和苏联红军打击敌人，收复我国的失地，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同时会议还分析了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认为国民党一定要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他们可能会发动内战，争夺东北和其它日伪占领区，因此内战很可能要爆发。为了应付上述形势，必须迅速发动武装暴动，组织扩大我军力量，占领通化及其附近地区，建立人民政权。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1、由罗衡、李鹏飞二位同志连夜赶到丹东，与刘芝祥等同志接头，召开辽东支部紧急会议，把大连等地的党组织和各抗盟会的一切力量紧急动员起来，组织暴动，建立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共同打击日寇在东北各地的军政力量。2、由李剑云、姚黎明等同志通知八宝矿的刘仁宏和七道沟矿的杨德广等同志，迅速动员地下党员和抗盟会员，立即行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收缴枪支，进行暴动，摧毁敌人的军警政权组织，收复失地，建立政权。8月25日前后，我地下党组织的各路抗日武装，共1 000多人集中通化市附近，准备进攻和解放通化市。当时我军派李剑云为代表，只身进入通化市与日伪通化省长杨乃时等人谈判，他们表示接受我军进驻通化市内的各项条件，愿意向我军投降。这时，罗衡、李鹏飞两位同志也从丹东回到通化，根据辽东支部的决定，我们的军队正式命名为“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

至此，辑安“兴亚饭庄”交通站，胜利完成了党赋予它的使命。

（原文为李鹏飞、李剑云口述　李重勤整理）

光复时的辑安城

1945 年 8 月 15 日（伪康德十二年），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向日本国民宣读了《停战诏书》。他说："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即《波茨坦公告》），……"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8 月 16 日半夜，关东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做出"拥戴圣旨"的决定。17 日拂晓，日大本营命令关东军总司令官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关东军投降了。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也随之倒台。8 月 17 日，逃亡到通化大栗子的伪满皇帝溥仪，在矿山食堂召开伪满洲国紧急会议，作出决定，于 18 日凌晨举行了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仪式。

从此，祖国光复了。这是一寸山河一滴血，我军民同胞经过 14 年的浴血奋战而获得的胜利，这是华夏民族史上光芒万丈的一页。

饱经战乱的辑安人民，听到这一喜讯，欢喜若狂，涌上街头，竞相呼号，弹冠相庆。接连数十日，这极大的喜庆，使古老的小城沉浸在欢乐之中。

但是，长期积压在人民心中对敌伪人员的怒火，难以抑制，如烈火干柴，一触即发，熊熊地燃烧起来了。吓得本来如丧家之犬的日伪人员，东躲西藏，狼狈之极。但也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在他们待降的时候，妄想逆历史的潮流蠢蠢欲动。光复时的辑安城里，到处是欢乐，到处有复仇的怒火。

青年学生痛打县视学

伪满时期统治教育事业的，不是傀儡的伪教育行政部门，而实权是操纵在日本人的视学手里。日本人视学川口，是个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暴徒，每逢下去视察，对教师非训即罚，对中国学生非打即骂，但那时的师生们敢怒不敢言，只好把满腔的怒火强压在心底。现在日本投降了，报仇的日子到了。于是师生们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到处寻找曾经欺压他们的川口，越聚越多的师生们一窝蜂

似的跑到荷花泡岸边。当时日本人的住宅里去，将川口从屋里拽出来进行暴打。这个在过去趾高气扬的日本人，今天在青年学生面前磕头如捣蒜，一个劲的央告求饶，其妻子也跪在门前磕头求饶。

民族败类受惩罚

宪兵是伪政权的太上皇，群众的活阎王。老百姓管他们叫“离地管三尺”。所以，这帮家伙平时是无恶不作，不知多少无辜群众死于他们手中，因此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尤其是这些民族败类，为了自己向上爬，像哈巴狗一样，趴在日本人面前摇头摆尾，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同胞而讨得日本主子的欢心。刘宪补就是这些败类的典型。所以，当日本宣告投降以后，积压在群众心底的多年仇恨，一下子迸发出来，非要找到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刘宪补算账不可。而刘宪补也深感大难临头，到处躲藏。最后终于被愤怒的群众在刘生的院内找到，当即拽到街上，大家七手八脚一顿暴打，险些被活活打死。

宫瓦匠痛打日宪兵

瓦匠宫××，在伪满时，不知为什么，被日本宪兵抓去，施以严刑逼供，只打得皮开肉绽，然而冤枉无处伸张。现在他听到日本投降，满洲国倒台的消息后，立刻操起一根铁棍，去找曾经无情折磨过自己的那个日本宪兵。他到处找也不见踪影，在归途走到会泉街（现在胜利街）霍家剃头棚理发店门前时，突然发现那个过去腰挎洋刀、身背王八盒子（手枪）、威风凛凛，横行于市的日本宪兵。今天像只丧家犬似的耷拉着个脑袋从前面走了过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于是举起铁棍，朝着那个日本宪兵的头部猛力砸去，那个日本宪兵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棍，来不及逃避，幸好将头向右一歪，虽说头颅未曾开花，然而肩膀却被打掉，这时他见势不妙也顾不得疼痛，撒腿就跑，逃之夭夭。

日本关东军狼狈撤退

1945 年 8 月 10 日，关东军接到来自日本本土大本营的命令，命令上说：“根据帝国全面战况，以朝鲜为最后一线，必须绝对予以保卫。以满洲全土为前进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接到这一命令之后，关东军组织避难列车，让其全部家属带着细软家什，退往朝鲜避难。这样，辑安这个地方，就成了日本关东军和

所有的日本人退往朝鲜的必经之路。不到几天的时间，退往朝鲜的日本关东军，一批接一批地退到辑安县城的东岗一带，等待火车运送过江。但因没车，而在辑安县城的东岗一带集结了约有三、四万关东军的主力部队候车过江。因为关东军组织的列车，在“八·一五”之前这段时间主要是抢先运送日本人家属过江，由于车辆有限人数又多，尽管每天数次，而车厢里却是已经达到了不能再塞的程度。车厢里不仅座位是满满的，而且过道以及所有的空间全都是人，没法又在车厢里搭上了两层格，这样也还是不能满足抢先逃命人的愿望。所以，每次列车不仅车厢里到了再也挤不下一个人的程度，就车厢上面也用绳子拦上一圈，人们爬在上面，生怕被甩下车来而死死的抓住车棚不放。经过长途跋涉，穿行隧道，烟熏日晒，个个被弄得披头散发，黑脸白牙。此时的日本人，过去那种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派头，早已丢的净光。剩下的只有狼狈、惊慌的丑相。

也就在这竞相逃命的日子里，日本关东军用军用卡车，装着满满的一车钞票，准备运回日本国去，当卡车走到土口子岭上时，被辑安县伪公安大队的刘大队长率领一帮人，拦住去路，而此时押车的日本军和司机，也顾不得钞票了，逃命要紧，见有人堵车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砸“建国神社”

这一时期，由于伪满洲国刚刚倒台，新的政权尚未建立，群众称这一段时间为“三不管时期”，所以，社会秩序很乱。因此，伪政权机关——辑安县公署，在尚未被接收之前又摇身一变，成立了“辑安县临时地方维持委员会”，出头维持社会秩序。尽管将“辑安县公署”的牌子，换上了“辑安县临时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而实质未变，是换汤不换药。在8月20日左右，以“辑安县临时地方维持会”名义在大操场召开“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由于这几天群众一直在欢乐与兴奋之中，听说召开大会，人们都涌向会场，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正要准备开会时，突然在广场的西北角上一片骚动，原来是前来开会的人，看到了伪满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建立的那个建国神社，不由怒火中烧，大家七手八脚，用棍棒和石头，将“建国神社”砸个稀巴烂。有的群众还把日本人在神社里供奉的牌位，夹在胯裆里像小孩骑竹马一样到处跑。整个

会场欢腾起来，人心大快。正当群众沉醉在欢乐与幸福的时刻，突然从镇郊的东岗开来了十几辆卡车，上面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停在会场的外围，这意想不到的突然变化，使大家束手无策，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然而赤手空拳是无法对付这些全副武装的关东军的。大家只好等待命运的安排。然而，几个日本军官围绕会场转了一圈后，走到被砸得稀巴烂的“建国神社”跟前停了一会，也深感大势已去。之后，几个人在一起叽哩哇啦地核计了一阵之后，只见一个军官说了几句话，然后一挥手，十几辆卡车开走了。一场虚惊结束了。

苏联红军收降关东军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日本关东军的主力部队撤到辑安待命回国时，由于日本帝国作为战败国尚未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因此，这段时间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尚未解除武装。直到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帝国签字正式投降以后，苏联红军从朝鲜进兵抄了关东军的后路。所以，在 9 月上旬，由朝鲜的满浦过来 4 名苏联红军，前来辑安收降关东军主力部队。一天，这 4 名苏联红军，乘坐一辆吉普车前来东岗日本关东军驻地，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一队队整整齐齐的集结在大地里等待前来收降的苏联红军。当苏联红军的车子一到，身背冲锋枪的 4 名苏联红军，为首的是一个一道杠两花的中士，站到日本关东军的队前。这时，一个关东军的指挥官，双手捧着指挥刀，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红军并解下武装带和身上的武器，然后一个向后转，严肃地向关东军部队讲了一番话，之后只见各队的关东军将所有的枪支唰的一声放到了地上，再后退几步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那里。从此，这三、四万人的关东军主力部队正式被苏联红军全部收降。

被缴械的关东军官兵解体了，在其经由朝鲜回国之前，曾在东岗一带的大地旷野里，焚烧衣物达数日之久才陆续回国。

（迟明发收集整理）

集安人民积极支援抗日斗争

他帮我完成特殊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老爷岭山脉是敌我双方互相频繁活动的地带。敌伪兵第一团团部设在外岔沟，该团的东大营在双岔河镇守老岭，这个团的第六连驻扎在大荒沟门的荒崴子村，这个连表面上应付差事，暗地里帮助红军。

1936 年的夏季有一天，伪警察队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沟里住有红军的伤号，决定去搜捕。这个消息当天就由伪六连通过老百姓送到山沟里的红军那里。经商讨由我承担掩护红军伤员转移这一任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地窝棚出来，越过天桥，见沟外的大道上远远地来了一伙敌人。我故意晃动一棵小树让敌人发现自己，然后直奔沟里而去。几个伪警察同时发现了我，狼嚎般地喊叫着，“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我听到后面的喊声就东躲西藏的往前跑，敌人认为我是红军，就开了枪。随着枪声我立时倒在道旁不动啦！不一会几个伪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我围住，我猛地站起来又要跑，被迎面一个家伙给抱住了。一个伪军小头目说：“这个家伙没有死，把他给我绑起来！”我就又蹦又跳地不让他们绑，不小心，将身上藏的子弹掉在地上，被伪警察发现了。“好啊！你是红军！有子弹，枪哪里去啦！”“快说！”“我不是红军”我高声争辩道。“不是红军哪来的子弹！妈的！给我打！”伪警察队长凶狠地说。“长官！长官！你听我说。”伪警察队长瞪着狗眼，“快！快说！”我装着害怕的样子说：“昨天晚间，大约半夜的时候，有四、五个红军到我家喝水，有的带手枪、有的扛着歪把子，还有的拿着大枪。他们喝完水就出了门，我一看道上有好多人。”伪警察队长急忙插嘴问：“到底有多少人？你要老实地说，不然就打死你！”“天黑也看不清楚，大约能有 100 多人吧。”那个伪警察队长听说红军有 100 多人，吓得瞪着眼直盯视我老半天才问：“你那子弹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早晨起来看见屋内地上有 5 颗子弹，是红军掉下的。我怕他们回来找，我就赶紧地去沟里给送去！”伪队长说：“他

妈的，你通匪！和红军有联系，带回去审问！”

警察狗子把我五花大绑带回了荒崴子警察所。伪警察所长审问我，我还是那句话：“子弹是红军昨天晚间掉在我家的。说实在的，你们有枪都怕红军，我哪敢不给送去呢？”这一句话，把伪许所长惹火啦，“混蛋！妈的，谁怕红军，给我往死里打！看他还敢嘴硬”。我闭着眼睛心里想，“你就是打死我，也不能说真话。落在你们这些黑狗手里，我就没指望活”。正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说：“老许啊！你真有本事，一出马就能抓个红军来，恭喜你！”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住在当地伪军第六连林连长来啦。

许所长讨好地对林连长说：“林兄，大驾光临，必有事情吩咐小弟吧。”“许老弟，这回讨伐，抓来一个通匪的老百姓，功不可没啊！该当喝他两盅啊！”林连长取笑地说。“你想打死他？还是先押起来？”“打死有啥用，问了半天什么也问不出来，押起来还得供饭吃。”“老兄，有何高见，请讲当面。”“许老弟，他既然通匪，何不放他回去劝降？等他劝来红军投降，一箭双雕，那不是坐享其成，功上加功吗？”林连长的话音刚落，伪许所长说：“佩服，佩服，老兄有办法”。“来，干！”“砰”的一声酒杯一碰，脖子一扬，一盅酒灌了下去。林连长不易察觉地微微一笑，一饮而尽。“来人！”许所长一声呼喊，进来一个警察狗子，吩咐说：“叫那个通匪老百姓回去，限 3 天内劝不来 10 个投降的红军，就杀他的头。”那个警察狗子说声“是！马上照办。”转身走了过来，给我解开绳子，气势汹汹地说：“放你回去，3 天之内不劝降来 10 个红军，就毙了你。”

林、许两人，边喝边讲怎样才能领功请赏，很快，伪所长已快烂醉如泥了。林连长乘机站起来晃了两晃佯醉说：“老弟，祝你走红运，我该回去啦！”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去。随着不在意地问陪同的那个警察，“把那个通匪的老百姓放走有保人吗？”那个警察狗子回答说：“没有保人！”林连长喷着酒气，不理不睬地朝大门外走去。出了大门见四周没有人注意他，略一思索，加快步子向前赶去。不到半个时辰，赶上了我，“站住！好一个没有找保人的吴道玉。”“啊！是你，我正没有办法呢，你给出个主意！”林连长说：“快跟我走！”

林连长把我带到连部，随手关上门。对我说：“老吴，沟里的

红军伤号安全的转移啦？”我说：“林连长，您给我那五发子弹，让警察狗子给拿去啦，怎么办？”“老吴，那是小事一段，不要提啦，您回去到外地先躲躲。关于3天后分所让你劝降红军的事，由我来对付许所长。”果然，我出去躲了10多天，回来后，什么事都没有了。

（原文为吴道玉口述　李延鹏整理）

给红军送子弹

在高力沟村（今团结村）驻扎的敌伪军第十二连，声称要去米架子沟里讨伐红军。高力沟的群众都说，日本鬼子2 000多人，都打不了红军，伪军这几个人，还不是打着灯笼捡粪，找屎（死）啊！

不一会儿，一些支持红军的群众就到二道阳岔，找红军送信，让他们做些准备。红军听了群众的报告，便笑呵呵地告诉群众，你们只管放心地回去好了。伪军的枪声，越来越近，红军战士们便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地行动……就在二道阳岔一带，敌伪军和红军接触了，敌伪军一看见红军，枪声立刻加紧啦。可是，红军的枪声，却是一会一下，好似在逗着他们玩，将敌伪军逐渐地引进了密林中，他们怕吃亏不敢向山里走，只是围在林子外面转。可不一会，林子中的红军战士们却唱起了四季歌来：

满洲士兵兄弟们，眼看立了春。

大家提精神，何不反正杀敌人。

你们别在梦中睡沉沉，日本是仇人……

红军战士们，接二连三地唱着，敌伪军随着那阵阵的歌声，逐渐地把枪放下啦。这阵阵的歌声唤醒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有很多人都留下了悔恨的泪水，激发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把成箱子的子弹，一箱一箱的放在林子里撤到一边去，抗联战士们便把这些子弹，一一的搬到了自己的阵地上。

日头快要落山啦，红军从林子里面扔出来一支破“套筒子”枪和四个包袱皮。

伪敌军十二连讨伐了一天，损耗的子弹再多一点也是自然的，

也是应该的。由于他们一个兵也没有损伤，又缴获了一支破“套筒子”枪和 4 块白包袱皮，这“战果”，上司以为打了胜仗，感到非常的满意，并大大地奖赏了十二连的官兵。

米架子山战斗以后，抗联主力转移到桓仁县，在米架子只留了一部分红军战士。他们在那里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维持和巩固着游击根据地，灵活机动地打击着敌人。

其实伪军哪敢主动讨伐红军，他们连躲都躲不过来，哪里还敢找着去打呢？原来是这样，留守的红军，为了弥补子弹的不足，特地去信告诉住在高力河前哨的伪军十二连，给送的这次子弹。

（原文为王德芳口述　李延鹏整理）

我和抗联的一些联系

我叫林进忠，字千臣。1897 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州府（今菏泽专区）钜野县六所营坊一个贫农的家里。1920 年因黄河泛滥，我流落东北，先在辽阳给地主家扛活，后到临江一带当木把。以后又被征兵。1920 年我被编在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骑兵一团二连任排长。

下面，我重点回忆一下我在任伪军连长时，与抗联的一些联系。

我们马营的情况

我们营是伪军二旅一团二营。营长是马玉山（通称马营）。马营有 3 个连（序列是四连、五连、六连）。四连连长是纪鼎山，这是个机关枪连；五连连长是张禄；六连连长是我，五连和六连都是步兵连。团部分别驻在辑安街和外岔沟两处，我们营部设在双岔河街里。

我们这个营当时有 3 个特点。一个是这 3 个连长都有民族自尊心，暗中支持抗联，但只意会，从不言明；二是马营的军官和兵士都加入了斋家礼；三是由于我们营长马玉山，是有名的道德官，马营官兵基本上不扰民。所以，我们驻防在双岔河时，当地群众对我们挺好，抗联与我们有联系，也不打我们。

我所在的六连，驻在荒崴子，也有 3 个特点。一是六连的兵，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山东乡亲，人称山东棒子连；二是我有个较硬的后台，就是旅参谋长高明，在过去的廊坊战役时，我曾救过他。以后关系极为密切，一般人不大敢惹我；三是我民族心未泯，又有后台，在马营中唯独我的连不打日本旗，不唱日本军歌，没有日本军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荒崴子驻防期间，跟抗联红军有些来往，与当地群众关系极好，从来没有打骂过群众，人们也称我为道德官。这是我在光复前退出军界到荒崴子为民、镇反时由山东老家二次回荒崴子落户的主要原因。

我是怎样与抗联联系上的

到辑安不久，我们奉命在一次去讨伐抗联的战斗中，我的兵在山上的窝棚里抓到一个抗联战士，交给我处理。

我详细地盘问了这位抗联战士，知道他姓王，叫王玉侯，是抗联警卫旅五团的战士，负伤后在这里养伤。这位抗联战士很了不起，被俘后大义凛然，还向我们讲了不少爱国的道理。我听了脑子里开了不少窍。这是我第一次和抗联的人接触，对他的话，既感到新鲜，又很折服。最后，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杀死。于是，我仗着我连弟兄大部分是山东人，和我感情上很融洽，便没有多大顾虑地将这位红军战士放了。

没想到一个月后，小梨树沟里开店的李掌柜的，给我捎来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杨靖宇大队长（那时红军这样称呼他，我们也这样称呼他）写给我的。大意是：被我放走的那位抗联战士已回到部队，讲了我的情况。杨大队长向我表示感谢，并借此机会，向我进行了一番抗日爱国的教育。我从这封来信中，才知道共产党与毛泽东等伟大的人物，使我很受教育与启发，觉得抗联不是匪，而是一些由真正中国人组成的抗日武装。从而产生了敬意。从此，我便开始了与抗联的联系。

我与抗联有了联系不久，有坏人来向我告密，说花甸子乡土城子村的王殿喜通抗联（王殿喜是王八脖子的牌长），把两个儿子送去参加了抗联。我一听，便想到如果让这个人作为我与抗联的联络人，有两点可以保证：一是他对抗联感情深，绝不会泄密；二是他若知道我与抗联有联系，绝不会出卖陷害我。因此，我便立即将他传来，秘密“审问”。

给抗联三送情报

1937年正月，日本的侦察飞机发现了抗联在老爷岭一带活动，日军立即下令在初四对抗联部队进行讨伐。我接到命令时，已是初三夜里，由于事情紧急，火烧眉毛，便立即派人找来王殿喜，连夜让他去给抗联送信，抗联部队立即转移到刀尖岭，使去老爷岭讨伐的日伪军扑了一场空。

1937年4月，抗联部队一部份在大青沟沟里住下了，日军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秘密调动了一批部队进行围剿。我记得当时是调了两个团的兵力，一是由黄团长率领的伪步兵一团，二是由郑团长率领的步兵二团、还有日军守备队等兵力。我接到命令后，立即委托大青沟牌长赵守良（此人也做两面的工作）去给抗联送信。抗联由于兵多，地势有利，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没有转移。那天日伪军不敢硬攻，抗联也不主动出击，双方相持了一天，均无伤亡而告终。以后，抗联转移到砬子沟去了。

1937年秋天，抗联有一支部队在大顶子被敌发现。我接到去讨伐的命令后，便连夜派我的通讯兵张守仁去送的情报，使抗联那支部队得到信后，迅速撤出了敌伪的包围圈。

马营长的马夫

我和机关枪连连长纪鼎山，曾将一名负了伤的抗联战士，保荐给马玉山营长当了4个多月的马夫。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7年秋，我奉命在倒木沟讨伐抗联，有一个弟兄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抓到一名抗联伤员，交给了我。我经过审问，那位抗联战士承认了他是抗联一军五团的战士，负伤后在老乡家养伤。查明他的身份之后，为了避开坏分子的耳目，我命令队伍在双岔河村外等候，独自一人进村去找纪连长。因为我知道纪连长和抗联的蔡指导员好熟（据说蔡指导员是红军专门管后勤的），与抗联有密切联系。现在出了抓住抗联伤员的事，如何处置？我便找他商量。否则，如果我们不处理，落到日军手里，那位抗联伤员必死无疑。纪连长听了我的讲述，我们便苦思对策，最后决定将这位抗联伤员送给马营长当马夫，一来可以搭救他，二来给马营长当马夫，谁也不会怀疑，也不敢动。

商定之后，我俩便去找马营长。我说山东来了一位老乡，在山上打猎走火受了伤，现在无处落脚，想荐给营长当个马夫。纪连长帮腔说："林连长这个老乡我熟悉，给您当马夫我做保人！"马营长经过我俩这么一说，就活了心。而他那里确实也缺个马夫，便默许了。于是，那位抗联伤员，就作为我的山东老乡亲，给马营长当了马夫。4个多月后，马营长不知从哪儿听到了什么风声，在一次去执行讨伐任务时，将我找到他那里，将此事捅开了，斥责我不该这么乱来，把一个抗联伤员弄来给他当马夫。他生气地说："你们做别的，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事也可替你们打打圆场。可这事做得太过分了！让上级查出来了得吗？咱们都得被杀头的！"我知此事办得欠妥，就承认了过错，最后说："营长，你是有名的道德官，现在靠谁也不行了，那人只你能救他一命了。"马营长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一直采取不问不管的态度。如今抗联的伤员命在旦夕，他不会坐视不救。于是，他叹了口气，看看身边只有我和他的通讯员赵炳文、我的通讯员张守仁，便说："我看他伤也好了，快悄悄将他送走吧！"我按照他的命令办了，那位给他喂了四个半月马的红军，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马营，回到了抗联大部队。

再救红军伤员

1938年2月（农历正月）的一个午后，执勤兵向我报告："五连的松本连长从我防地一座小山下路过。"松本是日本人，他担任连长讨伐抗联最卖力。我听说他路过防地，不去见不好，忙下山去见他。不多一会儿，果然松本骑着马来了，我忙说："连侨（日语即连长）辛苦了！"

松本说："辛苦的没有，红匪的两个抓住了！"他一边说一边指马后的两个抗联战士。

我一听，想到抗联战士落到日军手里，根本活不了。便决定搭救这两名抗联战士。我想先将松本请上山，再想办法。谁知他不去，说："红匪前面的还有，我的还要立即追击！"

因为他骑的是马，他的兵靠步量，被他拉下挺远，他边和我说话，边等他的士兵。于是，我就说："连侨追击的大大辛苦，这两个'红匪'交给我的处置吧！"

松本先是为难，后来在情面难却的情况下，只好点点头说："约依！连侨！"

日军抓到的红军，在通常情况下，是绝不会交给满军处理的。松本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就答应了我？说起来有一段小插曲。

那是在1936年冬，在荒岔沟沟里有10个自称是救国军的人。由于他们人少枪不足，不敢去打大户，专门祸害穷苦百姓。时值年关，好不容易弄得年货，不少人家被这些人抢去了，群众恨之入骨，想报告当地驻军军官为民除害，由于驻军连长是日本人松本，怕他话听不明白打人，就不敢去找，而派人到我这里苦苦哀求，要求我派兵去剿。我听了群众的哭诉，真想立即为民除害。可是想到荒岔沟地属花甸子，是松本的防地，不通过他去剿土匪，必会引起他的不满。另外，更主要的是我对那10个人的来历，还没有查明白。虽然从作派上，我敢说不是红军，可他们要是抗日的人呢？根据抗联杨大队长的训令，也是需要团结的。因此，我当时没有定下来去或不去，只是说："你们先回去，我查查看。那伙人要真是胡子，我必定去剿他们。"群众走了后，我立即派传令兵去调查荒岔沟里那10个人的身份。通讯员张守仁很快查清了那10个人的身份，确是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的胡子。于是，我决定为民除害，让群众过一个平安春节。

第二天，由荒岔沟农民姜大牙（绰号）和徐大个子领路，我们直奔荒岔沟。进沟后，很快找到了那伙土匪，战斗立即打响了。这伙土匪人少枪差，没一会儿便被击毙了6个，后来又击毙4个，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这事发生后，松本果然大怒。他由于军衔低我一级，不便对我发作，便将姜大牙、徐大个子抓去，要以通匪论处。为了救出这两个人，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歼灭的10个胡子的人头，全部送给松本，说这是以松本连队为主攻、六连为侧攻歼灭的10个"红匪"。在当时，一次歼灭10个"红匪"不是个小数字，不仅有奖赏，而且还会加官进衔的，松本听了我的建议，果然转怒为喜，放了那两个农民，我们就一齐填了呈报表。呈报表由营呈报到团部，团部立即嘉奖了我们不少钱（当然松本得的最多），还将松本的少尉军衔晋为中尉。松本一枪未放，白白得了这么许多好处，自然对我十

分感激。从此，我们俩有了交情。否则，他这次路过我的防区，作为一个日本连长，根本不需要做礼节性的通报。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他讨要这两名被俘的抗联战士时，尽管他的内心并不乐意，但碍于情面，也就只好答应了我。

松本等齐他的士兵，就匆匆走了。

将松本送走后，我立刻命令士兵将这两名抗联战士带进我的寝室盘问。这两名抗联战士威武不屈，先是什么话也不说。后来听说我是六连长后，便对我讲了实话，说他们是抗联六团的战士。一个叫闵庆山，一个夏景玉，他们俩是在打十三道沟时负伤掉的队，迷失方向被松本抓住的。

我听完他俩的讲述，就决心搭救他们。便想出了一个法儿，对他俩说："要想救你们，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你俩不能承认是抗联的人。承认了这一点，天神爷也救不了你们。你们得说自己是十三道沟的辅导工人，被抗联抓去背给养，往回走时遇到了松本被打伤抓住的。你俩看这法儿行不行？"

他俩一齐说："这法儿行，我们就按林连长你的主意。"

他俩同意了，我就重新过堂。这次人多点儿，他俩照我的话儿一讲，我就让文书登记备了案，并用电话又将此事告诉了松本。

第二天，我派人叫来荒崴子的王甲长，告诉他松本错抓了两个辅导工人，因负伤走不了，叫他安排在村子里吃派饭(一家吃一顿)。我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我怕有人报告。这一家吃一顿，那一家吃一顿，家家都吃，谁要想去报告也有通"匪"之嫌！就不敢去告了。最后，我对王甲长说："一切花销由我支付。"

王甲长忙说："这点子花销哪里要用连长支付！难道我们连俩个人还养活不起？一切由我们！由我们！"

王甲长领着二位抗联战士走后的第二天，我不放心，就下山去看。这是个白天，我看清了这两位抗联战士身上棉衣净是些小窟窿眼儿。这显然是久居深山的人烤火烤的，有经验的人仅从这一点便可断定他俩是抗联的人。我怕在这方面出岔头，立即让我三弟给每个人做了一套棉衣，买了新胶鞋，并给他二人理了发。这么一打扮，原来的特点没有了，两个小伙子精精神神，好是英俊。只是由于伤势太重，一时走不了。

但是没过几天，就出了风声，有人说我窝藏“红匪”。马营长派赵炳文来调查了一次，没有下文。我怕再出风波，便让家住荒崴子的石绵矿的把头陶兴斋，将这两名抗联战士领去了石绵矿。

但风波到此并未结束。

团部又派日本人中原中尉来调查，我拿出备案，说松本不是在与抗联交战时俘虏的，而是在路上抓获的，说是抗联证据不足。中原中尉拿不出证据，只好悻悻而回。

事情到此，仍未停止。团部后来又下令调我去任迫击炮连任连长，委派中原中尉来六连任代理连长。我明白这是团长屈服了日本人的压力，采取调虎离山。目的是一旦我走了，中原接任后，就可以用权势将这件事调查清楚。我想，如果这事要调查明白，不仅对我大大不利，而且对整个马营、甚至对郑团长也不利。因此，我没有屈服，我找到团长，直陈了我的看法（未承认窝藏抗联之事，而是说这是有人想整我，整团长等等），并说：“要实在调我走亦可以，但不能叫中原来接我。中原是中尉，我连王廷贤也是中尉，怎么就不可以代连长？团长，此事如何决断，你可得为我也为你好好着想。”

郑希贤是我的老上司，又是我老婆的干爹，听了我的直陈，心里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在谁来接任我这个大事上，他采纳了我的主见，改变了原来的安排，下令我连中尉王廷贤为连长。我获悉后，自然十分高兴。

王廷贤出任连长后，果然没有再认真调查我窝藏抗联这件事儿，事情一拖再拖，此事从此便不了了之。

我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

那两位抗联伤员在我去迫击炮连上任时，特意从石绵矿赶到大路上来送我。我没别的相送，就将身上仅有的6元钱分给他俩，最后说：“你们身上的伤养好了后，赶快回部队吧！”说完，我们依惜而别。

我在迫击炮连上任后，最后见到闵庆山一面，他说他们俩在回山时被敌人的讨伐部队冲散了，他是来见我最后一面。果然，从此我再没见到他。那位姓夏的（夏景玉），解放后，他听人说我未死，曾去看过我，一见我就下了跪。回去时，他非让我去他家做客，一

进他家门，他们全家人也给我跪下了，表示谢恩。

为红军送子弹和衣物

我与抗联有了联系以后，杨靖宇大队长有事就派人和我联系。由于联系的次数较多，有些记不住了，只讲记住的几次吧！

有一次杨大队长从红石砬子派人来，对我说这一个阶段抗联缺少匣枪和机枪子弹，我得悉后，将匣枪子弹 150 发，机枪子弹 1 500 发，装在金枪烟盒里（盒是硬纸壳的），再放进麻袋里，让我最信任的王殿喜将子弹背在肩上，送到大青沟。以后马永林也送过几次。

衣物过去也送过，但最多的一次是在 1938 年秋天，严格说最初不是送。那是我们二连军官搬家，共有 5 辆大车，拉的全是衣箱，还有几个家属跟着。车走到王八脖子一带，被红军的蔡指导员领人劫去了，他们不知是我们六连的家属车，缴获了衣物后，把人放了，一点也没虐待，只是对她们讲："秋天来了，我们没有衣裳穿，没办法，先借你们的吧。"家属回来一讲，我们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认为红军不大够意思，我们帮助他们干了不少事，怎么好拦抢我们的衣物呢？不过大伙都没讲出来。正在这时，杨大队长派人来了，说原来不知这车上的衣物是你们的，劫误会了。直接送来怕给你们带来麻烦请我们商定日子去取。杨大队长怎么会给我们来信呢？原来我们的衣物被红军送上山后，从一件呢子大衣里，他们发现了我的名信片，杨大队长才知劫误会了，很不好意思，便赶快特派人来向我们致歉并商定取回的时间与地点。我听了很受感动，当即对来人说："请转告杨大队长，误会已经产生，没有什么，不知者不足怪嘛！至于那些衣物就不要退了，现在天气已经冷了，你们吃住在山上，没有衣裳不行。我看那些衣裳你们就留下吧，这也是我们一次送寒衣难得的机会。要不，我们想送，也送不了那么多，也不方便。"经我再三劝说，那位同志回去了。

就这样，那 5 车衣裳我们全送给了抗联。杨大队长后来捎信，向我表示了感谢。

我在任六连连长时，除了做了以上一些支援抗联的事外，我还默许了山沟里的许多农民支援抗联。因为我知道，住在山沟里的农民离杨靖宇大队长指挥的抗联最近，他们找这些农民最方便，最安全。而且这些农民大都善良老实，淳朴厚道，有一腔爱国心肠。所

以，他们之间的往来，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更主要的是我认为，民众给抗联送衣裳、粮食比我去送强，而且很有力量，目标小。因此尽管有不少坏人向我来报告某某人通匪，某某人通匪等等，我均以将严查严办答之，但我从未查问一件。另外，我从民众对抗联的支援上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别是山沟里的农民，生活过得很穷苦，但他们支援抗联却异常大方，宁肯自己不穿不吃，甚至不怕掉头流血。这是一股什么精神？当时我认为这就是民族的向心力，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我对自己常常说："林千臣啊林千臣，对于这样的民族，你只有保护的权利，不能有镇压之心。就是为此死了也是值得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通"抗联"的民众默许之，而对告发者中的极恶劣者，决不手软。比如台上乡山头有一户农民叫马永林，那年岁数刚到 20 岁，给抗联做了不少事。他老婆有外心，为了想和奸夫勾搭成亲的目的，向伪甲长告发了马永林通抗联的事。伪甲长报告了我，我对马永林家的事早有耳闻，便将马永林传来。马永林对"通抗联"之事供认不讳。我问他："你老婆咋不早告你？"他又恨又羞地低下了头，后来才对我讲了他老婆有外心的事。我当即将伪甲长（徐××）传来，对他说："马永林的老婆和外人通奸，为了达到同居的目的，以私通抗联来陷害马永林。你把马永林领回去，速将他老婆传来！"马永林回家后，他老婆被传来了，我让人将她吊起来好一顿打，斥责她和奸夫妄想谋害亲夫的行为。最后勒令她好好回家和马永林过日子。她一一照办了。随后我又将她那个野汉子抓来，不仅狠狠打了他一顿，而且还让他立即离开县境，永远不许回来。并且对他说："要是我在辑安再遇到你，非毙了你不可！"那人吓得一一答应，从此，他真的再没回来，我也再没见到他。马永林的家庭保住了，他也没被杀头，对我很感激。虽然比我仅小十五、六岁，却硬是认了我做干爹。从此，他也成了我给抗联送武器弹药的心腹人，干得很是卖力。他老婆再也不敢去告他了，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两口子恢复了感情。

我和荒岔沟的民众如果说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在这个期间结下的。

退出伪军职

1939 年秋天，团长郑希贤退职了，马营长调走了，我也被调

到二团一营一连任连长。我知道，这是日伪当局对一团、特别是对马营的不信任，这是一次大改组。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

不到两个月，日伪当局对抗日联军的大讨伐升级了，规模空前，使抗联处境更为艰难。而我自调到外岔沟后，听说杨大队长率大部队向北转移了，从此失去了联系，心中空落落的，有些心猿意马。尤其是想到自己失去了一个熟悉的连队（我原任职六连，几乎全是山东乡亲，外号山东连），失去了可信赖的老上司和同仁，如今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善于奉承的大老粗，再也没有什么干头，唯有被排斥和歧视，下场也不堪设想。再说，我也实在难以去领兵讨伐抗联这些真正的中国人。因此，心里非常痛苦，便装病不到职。为此事，营长严厉地斥责我，我不服，和他吵了一架，并打到旅部。此时旅部还有我的老上司，就是高明参谋长。他当然庇护他的老部下，营长没得到好脸，我则仍然装病，不上任。团部惧于高明的权势，奈何我不得，只好让我去濛江二道花园一个部队后方医院作临时负责人。我去后没有多久，在惊悉杨靖宇司令在濛江遇难的消息之后，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决定退出这罪恶的伪军界。1940 年 4 月，我提出退职报告。获批后，我就回到了以前驻防的荒崴子为民，从此结束了我的伪军生涯。

（原文为杜进忠口述　李藕堂整理）

帮助红军打鬼子

（1）我见到了杨靖宇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他们实行 “三光政策”，无恶不作。

1938 年，在我 13 岁的时候，我家搬到了腰营子附近的磨齿子，在沟膛里面的一个小山坳里，我父亲搭了 3 间草棚，搭了一铺朝鲜族式的大炕，就住了下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晚上我们家里却常来一些陌生人，他们都穿着杂乱的服装，带着枪，在炕上休息闲唠，每当在这个时间，父亲就把我们打发出去。我常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来到我家里和一些人在炕上围着一张地图在商量

着什么事情，看样子是个官，后来听一些人喊他杨司令，这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司令。

第二年的阴历二月份，有一天傍晚，我刚睡下，就被一阵敲门声惊起，原来又是杨靖宇司令领着战士们下山来了，父亲赶紧地把他们让到炕上，叫我和母亲去烧水，给他们洗脚用。他们也从不吃我们的粮食，知道百姓们生活的疾苦，每次来都是自己带着高粱米或者玉米饼子，由于我当时年龄小，对什么事都很好奇，就扒着门缝往里看，被正在吃玉米饼子的杨司令看到了，他向我招招手，让我到他跟前来，递过一个饼子叫我吃，我摇摇头表示不要，他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问："小姑娘，你怕不怕日本鬼子？"我点点头说"怕"。他又拉着我的手说："不要怕，等我们把他们杀光了，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他讲的很多，都是来安抚我的。等他们吃过饭，几个人就又围在地图前商量着什么。这时，父亲进来把我领了出去。出了棚子，我就和大弟弟一起上围子（即屯子）里玩，一路上到处都是红军，他们有的在站岗，有的几个人围在一起吹口琴，有的口里含着一片叶子学鸟叫，在场院里还有几个人在摔跤、打拳，一点也没有疲惫的样子。他们的衣服各式各样，长短不一，有的人穿的布鞋，而大多数穿的是草鞋；他们的枪也是什么样都有，有的甚至还没有枪，扛着一杆长矛或者提着一把日本式的大战刀。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条长布口袋，里面装着都是已经炒熟了的豆子。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平时是吃不得的，只留在打仗时吃。

在家里我遇到一个朝鲜人，长得很帅气，看样子也是一个干部，因为他腰间也挂着一支小手枪。我用朝鲜话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也用朝鲜话回答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等我们把日本鬼子都打死了，咱们就不再住像这样的房子，穿这样的衣服，我们要过上好日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棚顶和我身上穿着的布衣服，态度十分的和蔼。在当时我想象的好日子，是能吃上一顿饱饭。第二天凌晨，父亲就和他们又一齐上山了。从此我再没有见到杨靖宇。

（2）鬼子烧民房

红军们刚刚走不一会儿，日本鬼子就来了。看样子他们一定是得到了消息。他们都骑着一色的白马、穿着黄色的衣服，把整个沟膛子都挤满了，几个日本兵拿着大刀、恫吓着几个惊魂未定的百姓，

打听红军的下落，正在这时，南面的老虎砬子山上响起了枪声，我们一听就知道是红军为了百姓免受灾祸、故意把敌人引开的。鬼子们一听枪声，立刻就缩着头把身子贴在马肚子上，战马也驮着他们往山上跑。这一仗足足打了有一上午，约摸快到中午的时候只见他们有的用马驮着死尸，有的负伤趴在战马上回来了，看样子他们是打了败仗。于是，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就惨无人道地放火烧了张家街和孟家街，大火把整个沟膛都映得通红，我们家也被几个日本兵拿着火把给烧了，等他们走了，我们才敢走进家，只见我们家的房子烧得落了架，我爷爷就只好把炕面上的灰烬收拾一下，四周扒一扒，就地又搭了一个地棚子。家里收拾完后，爷爷叫我去看看张家街的李大爷，我就往围子里奔去，只见到处都是烧落架的房子，烟尘中有股难闻的焦糊味，仔细看看在灰烬中还有被烧死的老人和孩子，在街口还有一个被马踏烂了的约有三、四岁的孩子，那惨像，真是目不忍睹，令人心寒。活着的人哭天叫地，祈求着神灵保佑，祈求着杨司令带着红军来杀尽这群吃人的魔鬼。

（3）给抗联送信

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一天，3个自称是放牛的人来到我家，年纪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问我父亲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和红军走了？虽然当时我年纪小，却已经明白许多事情了，怕说错了要遭到杀头之祸，就回答说："推碾子去了。"看我说得那副认真的样子，他们都大声笑了。笑罢，他们几个人又小声的嘀咕了一会，那个年纪稍大点的又问我："你能不能吃饱饭，日本鬼子好不好？"我说："吃不饱，家都烧没了，粮食也烧光了，我妈只好到西甸子和腰营子要饭，再弄点榆树皮、榆树叶、白公草混在一起做菜糊糊吃，日本人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说好不好呢？"他们一听我反问起他们来，又笑了起来。那个人从兜里掏出一把豆子塞给我，神色严肃地说："日本鬼子是不好的，他们烧了我们的房子，杀了我们的亲人，他们欠了我们的血债，是一定要他们偿还的！"

第二天，我在山坡上挖野菜，那3个人又来了，他们夸我聪明，又小声问我父亲到底上哪里去了，我一时分不清他们是不是好人，哪有放牛的打听这么多的事，就说不知道，转身背着弟弟跑回家，他们也紧接着跟进了门，还是那个年岁挺大的那个人抿着嘴笑着对

我说："你这孩子真精，我们是故意考你的，看看你会不会对日本鬼子说你爹和红军走了。你爹明天就能回来。"他们走后，我就把爹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妈妈。

果然，第二天晚上父亲和那3个人一起回来了，父亲看上去显然是瘦多了，可精神十足，我和母亲赶紧给他们烧水。那3个人在我家住了两天就走了。当时，日本特务、奸细也常常到沟里来打探消息，所以，父亲很少出去。有一天，父亲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到岗后一条大沟里的几棵梨树下，交给那天来的那个人，并嘱咐我不要让母亲知道。于是，我就把信缝在裤子的补丁里，翻过岗很快到了那几棵梨树下，四下一看，没有一个人影，却听到有布谷鸟叫的声音，我就奔着声音去了。果然，有一个人从一棵大树后面闪了出来，我一看认识，是那三个放牛当中的一个，就把信交给他，他笑了笑，将信折一折塞在破衣服里，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我们没有看错你。"说完后又嘱咐我在归途上要小心，就走了。大约又过了五、六天，父亲又叫我到原来的地方送信，我就拿了一个小筐，筐里装上一些四叶菜和枪头菜等，把信压在筐底下，在路上又碰上了几个上山采菜的熟人，我就和他们一同往岗上走，一边采菜，一边故意和他们拉开距离，等互相看不到了，我就径直奔着那几棵大梨树去了，那个红军正在那儿等着我，我把信交给他后，他又给了我一封信，我回来就交给了父亲。可这件事不久不知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知道了。那天，我父亲正在田里翻地，就被几个日本鬼子抓走，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下，用扁担打，追问抗联的下落，一阵功夫就将我父亲打得昏死过去。于是他们又用水往我父亲的鼻子里灌，苏醒过来后再打，直打得他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等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才将奄奄一息的父亲抬回家，晚上就死去了。母亲、小弟弟、小妹妹也相继在半个月的时间由于生病和饥饿离开了人世。只剩下爷爷、我和大弟弟在苦水里煎熬着。日本鬼子又把我们归到围子里，我们生活没有着落，就搬到花甸子叔叔家，我也在这一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弟弟不久也随着李红光支队走了。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被选为区妇女会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我知道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原文为车杜氏口述　孙志强整理）

“归屯”割不断军民鱼水情

日本鬼子为了割断抗联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把抗联部队困死在山上，便实行了“归屯”政策。归屯，就是把散居在各沟岔的住户都归到村子里来，村子四周土墙上拉起铁丝网，村的四角都修起炮台，只留一个大门，门口设有一个警察分所，大门和炮台都有警察和伪自卫团轮流站岗。围子里的农民只准白天出去种地，晚上天不黑就得回村，谁若没回来就按“通匪”（指抗联部队）论处。这样抗联部队的吃穿等用品的筹集，就成了最大的困难。怎么办呢？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子弟兵饿死、冻死吗？

1938 年的一天晚上，小青沟甲（现高台村）的甲长栾仁福接到抗联没有“给养”（粮食）的信，立即把七个牌长找到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研究怎么样能给抗联继续送粮、送鞋的问题。经过周密商量，最后，研究出的具体办法是：1、以牌为单位，由牌长亲自负责找几名可靠的人和牌长一起到各家各户去动员农民群众，凡是家里现有的苞米面、楂子、小米等，装好袋子先集中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2、由甲长亲自安排最可靠的人（已打入伪自卫团的人），在“围子”大门口站岗，以保证他们的出入安全。3、当晚点灯以后，统一行动筹集粮食，晚 10 点一起出发，往墙缝沟（现上绿水桥北沟）送粮。

当天夜里，由甲长栾仁福和各牌长亲自带队，有用牲口驮的，有人背肩扛的，牌长孙恒禄和儿子孙洪德用自己家的骡子驮着粮食和大伙一同进山把粮食如数交给了抗联，然后又连夜偷偷地回来，溜进“围子”里。

由于小青沟从甲长到牌长，在“归屯”前后多次给抗联送粮、送鞋、送盐等物品，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当年春末夏初之际，被二鬼子刘增国和狗腿子田稽查（名字不详）知道了，便到辑安县城里报告给日本宪兵队，宪兵队如获至宝，立即派兵和二鬼子刘增国、田稽查一起到小青沟甲来，把组织给抗联送过粮的甲长栾仁福和牌长曹立升、孙恒禄、隋珠俭、张风斌、钱德洪（朝鲜族）、

桂高丽（名字记不清了）、张没牙子（名字记不清了）等8人一起抓到辑安县城的宪兵队里去“过堂”。日本宪兵队是伪满洲国最厉害的衙门，他们对这8个人进行吊打用刑，坐老虎凳、过电、灌辣椒水、用烙铁烙等，进行残酷的折磨之后，又把这8个人一起押送到伪满通化省（现通化市）的宪兵队坐牢。

这8名甲、牌长被送到通化省的宪兵队监狱后，万恶的小日本鬼子对他们根本不当人待，同样采取了与辑安宪兵队一样的刑法，用些毒辣的手段折磨他们。吃的是猪狗食，穿的破衣烂衫，赤身露体，每顿一人只给一个窝窝头，根本没有菜。由于白天黑夜地折磨，加上饥饿，这些人（还有其他在押的中国人）很快都得了疾病，死了很多人。家里去亲人探望，不让接见，好话说了不少，看守们只当耳旁风，有时给他们一点小礼，好歹才能让你见上一面，只给5分钟的时间，看守在场监听，什么话也不敢说，只能问问家里大人和孩子的情况，亲人带去的一点衣服、吃的东西等，一概不让给。这个监狱里，有些中国人不等咽气就往外拖。小青沟甲的一个牌长叫孙恒禄，还有气就被看守和打手们给拖出去活埋了（活着回来的隋珠俭亲口说的）。小青沟甲抓去的这8个人，不到半年就先后死了6个人。最后活着回家的只有隋珠俭和钱德洪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是活着回来的，可已经奄奄一息，时间不长相继死去。

（原文为周春枝搜集整理）

我家愿当联络站

伪满时，我家住在辑安县蚂蚁河上围子（今清河镇东岔村）的河西，因为离屯很近，只隔一条河，所以，归屯时就没有归进去。

1938年前，在阴历五、六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从沟里（红石砬子）来了6个人，都穿着老百姓的衣裳。我心想，这都是些哪边的人呢？我还没琢磨出个头绪，这些人就来到我家大门外了，笑着和我打着招呼，就进了屋。

进门后，有的叫我大嫂，有的叫我大婶，坐在板凳和炕沿上，和和气气的，像自家人一样。那时，我们是3间草房，他们去的是

东屋。我因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心里有些害怕，不敢坐下。

他们之中的一个大个子，停下抖着的帽子，和气地对我说："大嫂，你们吃饭啦？"

我说："吃啦。"

"几口家呀？"

"现在5口。"

"噢。"那个大个子问我："你听说沟里有红军吗？"

"听说过。"我说。

"你怕不怕红军？"

"听说红军不打骂穷人，净打小鬼子，我们不害怕。"

"那就好，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们就是红军，下来串串门，唠扯唠扯。"

我听说是红军，就放心啦，便问："你们吃饭了吗？"

这六个红军一齐说："我们吃完饭下来的。"

看他们这语气做派，像传说中的红军，可究竟是不是，我心里还直划魂。

就在这时候，我外甥王庆祥来啦。他是上围子的甲副。他一进门，我就赶紧问："你来干什么？"同时暗示我家屋里有人。

王庆祥听了，笑了笑，回头看了看，我才看清，他身后又进来一个人，日后才知那人是杨靖宇的警卫员王传圣。

王庆祥和王传圣进屋后，屋里的那几个红军就站起来，和他们打着招呼。我心想，没想到我外甥认识他们，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心里也就有底啦。果然，我外甥对我说："五姨，你不用犯疑，也不用害怕，这些人都是好人，是山里的红军。"

我听说他们是真红军了，一颗心落了地，才说："你们一定口渴了，我去给你们烧水去。"说完，就出去了。

他们也没客气，就在东屋里说笑着，虽说这儿离围子很近，但这些红军一点儿也没在乎，我从心里佩服他们的胆子真大。

他们在屋里唠了一会儿，王庆祥出来了，悄悄地和我说："五姨，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啥事？"

"刚才红军们讲了，为了开展抗日活动，同小鬼子与警察狗子

作斗争，要在这里设个地下联络站。经过核计，大队长想把这个联络站设在你们家。

“什么大队长？”我惊讶问。

王庆祥小声对我说：“就是杨靖宇呀！”

“他来了吗？”关于杨大队长，我早听人讲了，都说他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

“就是那个大个子呗。”

“呵，是他？像！像！”

“咋像？”

“你没看他那嘴形吗，那是个虎嘴，虎嘴吃遍天下嘛。还有，那相貌，多出奇，可不是凡人呢。”

“五姨，你说得对，这事不说了，你快说说我刚才讲的这件事行不行？”

“行不行等会再说。你先告诉我什么联络站，是干啥的？“

“五姨，就是帮红军送个信，交换情报的地方。”

“怎么个联络法？”

“初步合计，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红军的通信员来了，进不了围子时，就把情报和信交给你，再由五姨你转送到围子里。

“往里送？交给谁？“

“这事关重要，你答应了我才能告诉你。”

我犹豫了。我知道在那个年月里，给抗联办事如果被日本鬼子知道后可是要杀头的，我一时没有说话。我外甥见了，就劝解我：“五姨，咱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人家抗联为了救国能舍出一切，抛家舍业吃住在山上打鬼子，难道五姨你就不能为抗联送个信啥的？”

经外甥这么一说，我想了想，可也对，就答应了。我外甥听了，笑了，这才对我说：“咋个联络法，咱进去听大队长的。”

说完，王庆祥领我进了屋。大伙见我进来了，就都站起来给我让座。我坐下来，王庆祥先和杨靖宇大队长小声说了几句，杨靖宇就笑着对我说：“大嫂，你肯为咱们办事，这太感谢了。我先说说为啥要把这个地下联络站设在你家。以前我听王庆祥、王传圣同志说了，你这个人挺爱国，是本乡本土的老实农民，办事又很灵敏，

再加上你家这地方不在围子里，挺僻静，有个啥事的方便联系。今儿我来一看，果然和他们说的一样，你又答应下这差事，我挺高兴呵！”

我听了忙说：“大队长你这是抬举我啦，我一个妇道人家办啥事都是肠子短不谅事，全靠你们指点啦！”

他们听了全乐了，杨靖宇忙说：“既是自家人了，就不说外道话了，我相信你能干好。好在和你联系的人不是别人，是你的外甥王庆祥，这你就更放心了吧？”

我一听联系人是我外甥，我可真的放了心，又一次表示了要干好的决心。杨靖宇又和我唠了一阵，水也没喝，就走了。

从此，我们家成了抗联的地下联络站，我就当上了联络员。

在送信时，有一次差点儿出了事。我把抗联送给王庆祥的一封信，扎在腿带子里。谁知我没扎紧，进了甲公所，腿带子开了，那个纸团掉在了地上。幸亏王庆祥在屋里，发现了这个纸团后，就跑过来以帮我扎腿为由，将那个纸团捡了起来，才没出事。事后我想起来心里都突突地后怕。

这个联络站设了不长时间，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一共传递了五、六次信，后来因为抗联要往北撤，这个联络点才撤销了。

（原文为徐殷氏口述　李藕堂整理）

送情报

1938 年，我在辑安蚂蚁河上围子当甲副，暗地里参加了抗联的地下联络站，表面上为敌人办事，实际是为抗联当耳目。

那年 6 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在甲公所里坐着，正在和别人闲唠嗑，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接过话筒问：“哎，你是哪里呀？”

对方说：“我是热闹街警察署。你是蚂蚁河上甲吧？”

我忙说：“是呵！”

对方又说：“我问问你，这几天红胡子在你们那儿有什么活动？”

我说：“我们听说在双岔河的倒木沟一带有活动，没在我们这

儿。”

“估计能有多少人？”

“详细数不知道，据说有几百人吧。”

“你是谁？”

“我是甲副王庆祥。”

“我告诉你们甲公所和分驻所，这两天要一定注意匪情，有情况及时报告。要过队伍时出了事，可得找你们算帐！”

“过队伍？什么队伍？”我一听说过队伍，忙问。

“索旅，县警察大队要来领路，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明白吗”

我忙说：“明白！明白！”

索旅，指的是从热河调过来要讨伐抗联的部队，日军称他们是“皇军剿匪之花”。据说这个旅旅长索玉山，手下有 3 个团（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大部分是蒙古人，班以上军官全是日本人，不仅武器装备优良，而且作战骠悍、骁勇。他们要经过文字沟，这是要上哪儿去呢？我真想问个明白，一来是不敢问，二来对方把电话也撂下了。只好闷着头，苦苦地琢磨，半天也没琢磨出个头绪来。午后，热闹警察署又来了一次电话，内容大致相同，并再次提出要保证索旅安全过文字沟岭，这一下子我明白了，过文字沟岭，这准是进城。这可是个重要情报，得及时报告给抗联。于是，我赶忙找来一个可靠的人，也就是情报联络站的成员之一林喜山，让他尽快将这个情报送上山，告诉杨大队长。

林喜山是甲公所里专门负责修理电话的工人，也是地下联络站的成员。他接到我的任务后，就连忙出发了。很快将情报送给了王传圣。回来时，我问他情报送去没有，他说：“送出去了，红军好像也得到了这个情报。王传圣说他过两天能来。”

过了两天，王传圣同志果然来了，让我帮他一起赶快收集苞米面蒸成的大饼子。我问他干啥用？他只是说：“大哥，你很快就会知道。”我听他这么说了，也不好再问。

又过了两天，从文字沟的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传圣这才告诉我，抗联在家什房子设下了埋伏，要打索旅，这枪声就意味这仗打响了。

我听了这消息，又激动又高兴。等我们在枪声停下后，向沟里

去送大饼子时，才知道那枪声果真是家什房子伏击战，战斗打得很快，仅仅一个来小时，就消灭了索旅的一个团，还打死了不少小鬼子，缴了不少枪炮子弹。我听了，心里真高兴。我心里想，不管是不是我们送的情报起了作用，但毕竟是消灭了敌人，而且是敌人的王牌部队，这样的大喜事也够我们庆贺的了。

（原文为王庆祥口述　李藕堂整理）

帮王传圣脱险

家什房子战斗打完不久，有一天，抗联一军青年干事长王传圣同志来上围子找我。

王传圣同志虽说打过不少仗，又是杨靖宇身边的干部，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对乡亲们特别亲，嘴也甜，大伙对他都很尊重，也很喜欢他。这次下山来找我，是看看最近有什么敌情。谁知他刚刚跨进我家的门，就听见街上炸了营，人喊，狗咬，乱糟糟的。有人还特地跑到我门前喊："日本宪兵队来了！"我们明白，这是老乡在给王传圣送信，让他快点走。

我忙出去看看究竟，果然甲公所、分驻所进来了一批日伪军。一打听，知道他们是来搜查抗联的。我听了急得头上出了汗，回来赶忙告诉了王传圣。

王传圣别看当时才20出头，可挺沉着，他想了一会就说："我出去看看。"

我一听着了急，忙说："这可不行！"

他笑着说："要不这么办吧！"说着，他接过我怀里的孩子，把腰上的一支手枪递给我说："你这儿敌人八成不会查得太细，把我的这只手枪先放你箱子里。"

我赶紧接过来，放到箱子里，用破衣裳包好。这时，日伪军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了，喊声越来越近，我急得坐立不安。

王传圣也着急，但他并不慌，眉头皱了几下，突然对我说："大哥，我有办法了！"

我忙问："啥办法？"

他伏在我耳朵一讲，我放心了，说："这办法儿行，快把孩子给我！"

王传圣将怀里的小孩递给我老婆，就出去在院子里挑起一副水桶，用山东腔哼哼着小调，奔河沿去了。

我不放心，抱着孩子一直看他到了河边，才急忙往家走。一边走一边想：这小王可真有两下子，大白天的敢挑着水桶从敌人眼皮底下走了。这胆量，这脑袋瓜可不是一般的呵！

回到家，我就叫老婆子去河边把水桶挑回来，我就去了甲公所。

在甲公所我打听明白了，原来敌人在家什房子打了败仗，怀疑蚂蚁河上围子有人通"匪"，派来日伪军示威，想抓几个人撒气。结果搜查半天，一个红军没抓住，只是打了几个人拉倒了。日伪军为啥没敢把事闹大，不是他们没有这个打算，他们原想杀一批人的。不知咋叫红军知道了，杨靖宇给他们来了信，告诉他们如果敢杀老百姓，就没你们的好光打，所以他们只是出口气，没敢抓人和杀人。

王传圣从河边走了，安全地回到了红石砬子。

（原文为王庆祥口述　李藕堂整理）

给抗联送咸菜

1938 年，我家住在辑安大青沟里的天桥沟，种地时，就在沟里压些地窨子，在那里住。那阵子鬼子刚刚搞归屯，我还没归到屯子里。有一天，我听说沟外警察要进沟里来打抗联，我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就去给红军报信。

从沟门到沟里有 60 多里，去红军二团的根据地，要经过倒木沟，大、小黑虫沟，才到陈沟一带红军住的地方。

我从天桥沟一走进陈沟沟门，便从山半坡走下来一个打柴的青年人，他迎着我走来，并和气地问我："老乡，你进沟要上哪去？"

我说："我去找红军的马班长。"

"有事吗？"

"有要紧的事告诉他。"

"好，那跟我来。"那个人领我直奔陈沟沟门的墙子而去。

在那里，我见到了膀大腰圆的马班长，唠过几句嗑后，我就将得到的情报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同时将在屋的三连蔡指导员介绍给我。我进屋时，见蔡指导员正在看书。马班长给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为我们，你跑这么远的路给我们送信，可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我忙说："这么说就远了，我为了你们，你们为了谁？还不是为咱老百姓。"

他听了笑笑说："你说的不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人人应该为国家做点事！"说着，他指着他们的一些轻机枪又对我说："警察狗子来打，咱们红军不怕，你看，咱们也有机枪，到时候，有他们好看的。"

这时，已经到了晌午了。他们留我吃饭，我也没客气，就在那吃了。这时我才知道抗联吃的饭，全是用保险盆子煮的苞米粒子，连点咸菜也没有。蔡指导员让我吃的病号饭，是细粮，我不吃，他不让，我只好吃了。不过，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里想，抗联为救国，常年住在山上，在这百草不生的季节，吃饭连咸菜也没有，生活可真苦啊！就暗暗决定回去之后，把家里的咸菜挑来给红军。

吃完饭后我回去了，到家我就把家里的咸菜全捞出来，装进水桶里，送进了沟里。

我万万没想到，这挑咸菜他们怎么也不肯要。我生气了，蹲在地上不起来，也不说话，蔡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老乡，你想想，你这点咸菜留给我们，我们人多，不够一顿吃的，可你全家，一春一夏天的菜可就没了。"

"这没事。住些日子山芹菜什么的就出来了。"

"可是眼下没有，你要种地，孩子正在成长年龄，不吃咸菜怎么行？老李，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咸菜决不能收！"

"不留也得留！"说完，我站起来，扔下水桶，一扭身就走了。

我怕他们追我，就一路小跑地往回跑。满以为这回咸菜他们可收下了，谁知，我到家不到一个时辰，马班长挑着那一挑咸菜也追到了我家。我一见那挑咸菜原封没动一点儿，眼泪就唰唰地掉下来了，心里想：这真是咱穷人的队伍，秋毫不犯啊！

（原文为李恒春口述　李藕堂整理）

给抗联送寒衣

1938年，那时我26岁。家住蚂蚁河沟里，被小日本鬼子归到大屯里，不准随便出去，那年月，要吃的没吃的，穿的是更生布，日子过得比黄莲还苦。

可是，活动在这一带的抗联红军比我们老百姓还艰苦，特别是穿的，因为有钱买不到布，红军们穿的破衣裳都缝不成个。尤其到了冬天，连棉衣也穿不上。那时候，东边道这地方气候异常的寒冷。抗联红军住在山上，有的没有棉衣、棉鞋，冻坏了不少。所以，抗联红军常常派人下山，找群众帮助弄粮弄衣裳。老百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恨不得自己不吃不穿，也要接济他们。但是粮食好办点，可这衣裳不好办呐，配给的更生布一点也不经穿，送上山去也不管用呵，这可咋办？

当时的甲长是"阴阳人"（那时，在辑安这不少地方，都有这样为敌我两方面办事的人，称为阴阳人）。我父亲那次去了，我也跟着去了。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我爹说话了："更生布不行，别的布咱又买不到，咱们家里不是都有陈底子吗？比方说我有件大棉袍，就可以重新加工，改成两件棉袄。家家都翻翻箱底子，凡能改的，我看都做一件，积少成多，这中吗？"

大伙一听都说对，那个甲长也认为办法不错。于是，大伙便回家连夜翻箱倒柜，有大棉袍的就改大棉袍，没有的，干脆挤出一床被，拆了做棉衣。就这样，很快做成了35件棉衣。

可是，咋送去呢？那时候归了屯，出入不自由，夜晚更不准出去，何况又有那么多棉衣裳，就更不好出围子了。

甲长说："这事好办。等晚上派人站岗时，我给换上一帮可靠的人，就能出去。

果然，那天晚上，他换上一帮可靠的人站岗，我们20多个人，拿着棉衣就悄悄进了山。

因为那时，抗联的红军主力在这一带，人很多，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他们见我们在冬天极需棉衣的时刻，送来了御寒的棉衣，

而且又都是布做的。特别是听说有的人家，是用自己仅有的棉被改做的，感动地流了泪，纷纷说："老乡这么样对待我们，我们死了也忘记不了你们呵！"还有的说："凭乡亲们对咱这一片心，咱也得多杀鬼子！"有一位年轻的战士流着泪说："乡亲们对咱们比亲人还好。在这么冷的季节，就是我亲爹也不能给我送寒衣，可乡亲们给咱送来了……"他说着哭了，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们听了，也都很受感动。这些与我们岁数相仿，甚至有的战士比我们还小，在山上又冷又饿，还得打仗，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打鬼子救咱穷人出苦难，咱们才做了这么一点事，人家就感激得不得了，以后可不该忘了人家呵！想到这里，我们也落了泪。

抗联战士们还忙着给我们冲炒面吃，我们谁也不忍心吃一口，推辞说来时吃饱了，就急忙下了山，出了沟往回走。

快到围子时，我们怕站岗的换人了不好办，大伙就先叫我回去看看。我硬着头皮走到围子边，这时天快亮了，发现站岗的还是原先那帮人，甲长也发现了我，忙问："咋就你自己回来了？他们呢？"

我就将那意思对他讲了，他放心了，叫我快去把他们领来进围子，我答应着，一溜小跑，把那 20 个人叫了回来，悄悄地进了围子。

这时，鸡才叫二遍。当我们躺到自家的热炕头上时，想起山上的抗联战士，心里真不好受，以后一定要多为抗联办事，支持抗联打鬼子。

（原文为孙景发口述　李藕堂整理）

一双胶皮鞋

伪满时，我家住在石庙子沟里，经常看到抗联红军在这大山里活动，吃的、穿的非常艰苦。我对这些人心里又佩服，又感动，心中常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中国人呐！

在一个冬季，有一天，我上山去捞柴禾，看到有一名红军在山上好像是站岗。因我们经常见面，都认识，他也对我挺和气。这个战士那年只有十八、九岁，长得身板儿不算结实，身上穿的棉衣很

破，但还可以遮点寒，可是那脚下没鞋穿，只用一块破麻袋片包着，我一见心里就不好受，人家这么大点就出来救国家打鬼子，在这冬天没有鞋穿，脚还不冻掉啊，我真有点心疼。我走过去一边和他说话，一边看他的双脚，果然冻得都肿了。我心疼得眼泪流到了眼边，便对他说："你们是咱穷人的队伍？"

那战士正儿八经地对我说："你说的对。"

"我们穷人有难，你们管不？"

"管！那当然管啦！"

"那你们有难呢？"

他不吱声了，大概听出了我话里有话，就说："大哥，有话你就说吧！"

我便直接对他讲了："小老弟，看你没鞋穿，我心里难受。我家里正好有一双新买的胶皮鞋，你要是不拿我当外人，我就回去拿双鞋给你穿！"

他听了我对他说的话，似乎受了感动，一个劲儿地摇头说："这可不行！不行！"

"怎么不行呢？"我有意问他。

他说："我们有纪律，不准要群众的一针一线！"

"可我不管这些，我一定得送！"

"送我也不要！"

"不要我也给！"

他见我态度坚决，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吧，眼下胶鞋难买，你卖给我，也是对我行善了，你告诉我，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我不想告诉他。可他又说："你要不收钱，我宁死也不能要！"

我见他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好说："那好，我先回家去取来！"说完我就下山了，一溜小跑回到家里，取出那双新胶鞋，就又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那战士挺受感动，接过来鞋往脚上一试，大点，包上布穿就正合适，连喊："太谢谢你了！"说着，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了我，我数也没数，也不得不接这个钱，当他问我"钱够不够"时，我立刻说："够！够了！"

就在这时，那个战士的班长来换岗，看到他穿上了一双新鞋，

便很严肃地问他这双鞋的来历，他如实地讲了。那位班长听了，问我他给了我多少钱，我也就如实讲了，最后说："还多了1毛钱呢！"

那位班长听了，笑着说："你别替他打马虎眼，这鞋的价钱我知道，还差你两毛钱呢！"

我忙说："不差不差！"

"别犟了。"那位班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两毛钱，一定叫我收下，我说啥也不收，他动情地说："老乡，你能把你的胶鞋卖给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哪能少给钱呢！你要不收，我立刻命令他把鞋退给你！"

那战士一听，就要脱鞋，我见了忙说："鞋别退！别退！这两角钱我收下了！"

我接过钱，怕再出别的岔头，将鞋再退给我，就赶忙捞着柴禾走了。走了不远，我听到了那位班长正在批评那位战士不应该买老乡的胶鞋："老乡如今买双鞋也很难，咱们怎么好买老乡的鞋？……"我一听，心里更加感动，但又怕那战士把鞋退给我，走得就更快了。

（原文为于永江口述　李藕堂整理）

两斗小米

抗联红军在辑安活动时，我家住在天桥沟里，那时，抗联战士的生活太苦了，大冬天经常吃不上饭，能吃上盐米煮苞米粒子就算挺不错了。很多时候，他们打完小鬼子，缴不到吃、喝的就挨饿。我看在眼里，心里挺不好受的。

有一天，我上山打柴禾，看到一些红军在山上林子里的雪地扒拉找东西，一打听，才知他们找橡子、山里红什么的，已经3天没粮断炊了，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住了一会儿，就下山了。

回到家里，我看了看自家的粮食，本来是将供嘴的一点粮，一点多余的也没有。可想到山上的红军，露宿在山上，再没吃的，这怎么行，于是我和家里的人商量了一番，把家里唯一的二斗小米拿出来，决定送给红军，好煮个粥喝，熬过这难关。

我把小米送到红军那里，他们先是怎么也不要。后来，见我说的诚恳，指导员就收下，并给我打了一张借条，上面写着，这二斗小米是暂时借的，以后一定还。我揣在怀里，像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一样，就急忙下山回家了。

（原文为辛丕良口述　李藕堂整理）

雪夜送粮

抗日联军开进红石砬子不久，王传圣就和我磕了头，成了拜把子弟兄，我是大哥，他是老帮子，无话不讲，情同手足，赶上亲哥们了。

有一天，王传圣下山来找我，说现在抗联缺粮，让我给送点苞米去。我说："老帮子，你放心吧，我明天半夜准送到。"王传圣高兴地走了，我就连夜搓苞米棒子，用磨推成馇子，装进麻袋赶上爬犁，半夜就送去了。回来时，怕给山上留下痕迹，我就砍棵大树枝子绑在爬犁后面往下捞，这样，就把爬犁印子趟平了，不留痕迹了。以后，其他乡亲往山里送粮时，也用的这个办法，粮安全送上山里，又都没留下痕迹，进山来寻找抗联的敌人，寻不到行踪。

（原文为薛征林口述　李藕堂）

中秋佳节送月饼

自从抗日联军开进了蚂蚁河的红石砬子，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我们老百姓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都佩服抗联了不起，为中国人出了气，解了恨。

那年过得似乎挺快，转眼就到了中秋节啦。在家家户户准备过中秋节时，我们大青沟的农民想起了山上的抗日联军，人家为了救国打鬼子，抛家舍业的在山上，逢年过节也没顿好吃的，于心不忍，有好吃喝也咽不下去！于是，我们就背地里和乡亲们串联，要在过

节那天，给抗联送些月饼猪肉，大伙一致同意。于是，大家都分头准备去了，不大多会儿功夫，月饼、猪肉凑了不少，为了安全，把这些节日食品都搬弄到围子外头藏了起来。天一黑，正当伪警察们在吃吃喝喝时，我们就背上东西出发了。

当我们将东西送到山上时，月亮刚刚升上中天，抗联战士还没睡，听说我们送来了过节的东西，抗联战士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杨靖宇同志接见了我们，除了感谢我们外，还对战士们说："你们知道老乡送东西的用意吗？"

少年铁血队一个小战士说："叫咱也过个节呗！"

杨司令笑了，说："对！除了叫咱好好过个节，更主要的是叫咱吃着月饼，要想到一件事。就是如今国破家亡，咱们吃着月饼，要想到这国难家仇，日后好好作战打鬼子，争取早日打走日本侵略军，使祖国破碎的大好山河回到人民手中，使数不清破散的家庭早日团圆。"

战士们听了，很受启发。我们听了，也挺受教育，心中想，没想到中秋节咱们送这么点东西，意义这么大，对战士有这么大的鼓舞，红军可真是穷人的队伍，和咱紧贴心啊！

（原文为李宗唐口述　李藕堂整理）

送炒面

我们家原住在三道沟（今台上），知道抗日联军是打鬼子，救中国，救穷人的好部队，我们打心眼里佩服，决心帮他们做点什么。

1938 年的夏天，我们听说抗联又要打仗，这时，新粮食还没下来，我们怕红军没有吃的，打起仗来不行，就背地里从家家户户动员出来五百多斤苞米与豆子，晚上偷偷地用磨推了；连宿带夜地炒成了炒面。心想，战士们有了炒面，带在身上，打仗的间隙时间，饿了也可以抓一把放进嘴里，又方便又抗饿。所以，我们就将这些炒面送给了红军。红军首长非常感谢，给我们打了借条，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后来听说红军将炒面带在身上，在老爷岭的常家店打了一个漂

亮的战斗，整整干掉了伪军一个连，我们听了，心里真高兴，都觉得这炒面没白送。

（原文为邹德山口述　李藕堂整理）

帮助抗联打青沟子警察署

我是辑安县清河镇东岔村的农民，1938 年秋天，曾帮助抗日联军打过青沟子伪警察署。

那次是由杨靖宇司令带队去打的，我们农民听说了，都很高兴，有四、五十人参加了那次战斗。当时，我们没有武器，大多数人拿的是镐头、斧子、铁锹，有的还把腊木棍子削成尖，用烧开的滚油炸一下，当扎枪使。我们随着抗联来到青沟子，和抗联一样，不顾危险，冒着枪林弹雨，用铁锹挖围墙，用斧头砍铁丝网，村民段玉琦，在挖围墙时被石头压倒了，被红军战士救出后，还继续挖。农民王启有在用斧子砍铁丝网时，脖子被刺伤，血流得很多，仍坚持战斗。这一切，红军战士看在眼里，受到了鼓舞，作战更加勇敢。另外，我在抗联攻打青沟子之前，曾受磕头弟兄、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王传圣的委托，和一位抗联战士，化妆打扮后，混进青沟子，做了地形和敌人火力部署等方面的侦察。后来差点被敌人发现。

我们帮助抗联红军攻打青沟子，有力地打击了青沟子伪警察署，对抗联战士鼓舞很大，对敌人震动也很大。

（原文为薛征林等口述　李藕堂整理）

王殿喜送子参军

抗战期间，我家住在花甸子。有一件事很感人，谁听了谁佩服。

伪满洲国成立后，小日本鬼子加紧了对东边道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可是抗联红军不怕，不仅没被讨伐光，而且越讨伐人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当时，抗联就在我们家乡这一带活动，穷人对这支

部队从不叫胡子，习惯称红军。不少人家都送儿子参军。

土城子有户农民叫王殿喜，该人很爱国，常对人讲保家救国，匹夫有责。红军来了没有多久，他就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一齐送到抗联一军第六团参了军，并嘱咐儿子一定要作战勇敢，听从指挥，一心报国，不要牵挂家里。大概是在 1938 年秋天，抗联要向北边大转移，他赶到六团驻地夹板沟去送儿子，又一次嘱咐儿子一心救国。别挂记家里。无论时局怎样艰险，一定要跟随杨司令抗战到底并对刘团长说："刘团长，我岁数大了，不能跟你们去打鬼子救国家，我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你，别的我不说了，你要教育他们好好杀敌救国，不当汉奸，我就感谢你的大恩了。"

刘团长听了他的话，紧紧地握住王殿喜的手说："你放心吧，抗联的指战员，会像你一样疼爱你这两个儿子，我们也相信他俩不会辜负你对他们的心愿，一定会好好杀敌报国的。"王殿喜的两个儿子听了，一齐跪下对他爹说："爹，你就放心吧。我们走了，你和俺娘要多多保重……"

两个儿子哭了，说不下去了。在场的红军战士也感动地哭了。王殿喜忙扶起儿子，大声说："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走吧！"

王殿喜就这样送走了儿子，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两个儿子。当时，有人问他："你舍得俩儿子一齐走？"

"保国打鬼子，不舍得能行吗！"

"你送一个走也行嘛。"

"咳！杨家将满门忠义，死的都剩下寡妇了，比比人家，咱送两个儿子去出征，一点也不算多！"

（原文为唐恩波口述　李藕堂整理）

掩护抗联火山脱险

1935 年秋天，抗日联军连续破台上和花甸子的集团部落，日伪军就加强了对这一带的防守，同时驻辑安的日本守备队也来到了这一带，要与红军较量一番。

一天下晌，十几个抗联战士来到了马蹄沟南山，打算夜里袭击

韭菜园子伪警察所，不想这事被人密告了，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立刻把马蹄沟南山团团围住，想要全歼这股抗联，他们采取蓖梳的讨伐方法，把这些红军逼到了山头上。这时天已黑了，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逼来一大群老百姓放火烧山，想烧死红军，红军要是跑出来就活抓。当时。我也被抓来在山上放火，心中真为红军着急呵！

大火不断向山上烧去，火势越来越大，日伪军就在不远的后面，驾着枪，随时准备开枪。

虽然大伙不愿意火烧红军，可是不点火，日伪军不让，只好不让火着得太快。可是到了二更天以后，大火越烧越大，就眼瞅着快到山顶了。正在大伙急得要命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从山上火势小的地方走下来十几个抱着柴禾的人，穿的衣裳和老百姓一点没区别。我们心里明白了，他们是抗联战士，扮着放火烧山的老百姓下来了。我们既为他们的高招高兴，但又担心敌人会发现他们。很快，我们的顾虑就打消了，因为他们也点火忙活着，根本使人发现不了他们是什么人，特别是到后来，他们和我们混在了一起，就更加分不出来了。我们大伙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都很高兴，没有一个表现出惊慌的。我们为了掩护他们，就将自己头上戴的破帽头扣在他们头上，他们感激地笑着点点头。

到了后半夜，满山着起大火，封了山，日伪军才叫老百姓下山回村。这十几个抗联战士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从容地从敌人眼前下了山，事后敌人扬言抗联战士全被烧死了，我们心里话：你们可真能吹牛！

（原文为朱文山口述　李藕堂整理）

宁死不屈的老张头

抗日战争时，我在江口的孙茂德买卖家打杂，遇上了一个人，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这人死得刚烈，至死不屈，留给我的印象极深。

那是一天午后，日本守备队的一个分队，抓了十几个老百姓来到孙茂德家，我很害怕，就去问也在那吃劳金的柜头是怎么一回事，

他悄悄地对我说："兄弟，这事事关重大，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不敢再多嘴问了，弄不好可要被杀头的。"那年我才16岁，听后也觉得害怕，也就不敢再问了，掌柜的叫我去给那帮鬼子打洗脸水，我麻溜地去了。侍候他们洗脸时，我也规规矩矩的不敢多言多语。

那帮日本鬼子洗完脸，掌柜的就叫我去请复兴德掌柜的来一趟，说有大事核计，我赶忙跑去了，一进复兴德院子，迎头看见了在那里管院子的老张头。他见是我，忙拉我到旁边，悄悄地问我："小唐，日本鬼子抓那么多乡亲是怎么一回事？"

我忙学着我们的柜头，对他说："大爷，这事事关重大，我也不知道，你也别问了。"老张头听了，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就没再问我什么。我就去找了他们掌柜的，把话捎给了他。他听了，就急急忙忙地跟我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后院去有事，看到一个木桩子上绑着一个人，我仔细一看，万没想到，竟是复兴德管院子的老张头。我一见他，立时愣在了那里。老张头平日为人和善，心眼特别好使，大伙对他印象都特别好。所以，我一见桩子绑的是他，心里真不是滋味。

老张头发现了我，忙抬起头用眼看，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忙跑过去，轻轻地问："张大爷，你咋的啦？"

他回答说："叫小鬼子抓来啦。"

"为什么呀？"

"你相信你大爷不是坏人就是。孩子，这次被鬼子抓来，活不了啦。你去跟掌柜的说说，给我弄点菜和弄点酒，送送我吧。"

我听了，眼泪就刷地流下来了。他叹口气说："孩子，你不用哭，咱活活得正直，死，也要宁死不屈，你快去给我捎话吧，没有多长功夫了！"

我听了，忙大步走了，去告诉了掌柜的。掌柜的怕连累自己，半天不吱声，后来叹口气说："你快上柜房，叫打杂的给他弄点吃的去吧。不过，千万不能叫日本鬼子看见！"

我忙答应着走了，到了柜房跟一个管事的一讲，他忙说好。不知从什么地方，很快弄来一碟炒菜和一壶酒，一个打杂的就端着去了后院子。

老张头因吊在桩子上，自己不能吃喝，那个打杂的就一口一口

地喂他，老张头一来怕送慢了让鬼子看见吃不成，还要连累别人。二来大概也饿了，很快就把那碟菜和一壶酒喝光了，笑了说："这是我最后一顿饭了，谢谢你们了，我死了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说完，他点点头，让我们快走，我们最后看了他一眼，只见他脸上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一脸正气，眼睛望着那莽莽苍苍的大山，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吃过早饭后，老张头和那 11 个被抓来的群众被日本鬼子押走了，是押往山后。那里，小鬼子早叫人挖好了一溜坑。这些人一走到坑边，鬼子兵就动了手，吆喝着用枪上的刺刀，把这 12 人一齐刺进了坑里，然后就逼着挖坑的群众活埋他们，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撒腿就跑了。一边跑，一边掉眼泪，心里想，日本鬼子咋这么坏？这么狠？……

过了些日子，我才从掌柜的嘴里知道，老张头因为给山上的抗日联军送过胶皮鞋，不知咋叫小日本鬼子知道了，就被抓起来活埋了。那 11 个老百姓，据说也是因为通了抗联，给红军办过事才被日本鬼子杀掉的。

（原文为唐文清口述　李藕堂整理）

给朴连长送给养

抗联里有个朝鲜族人，是个连长，只知他姓朴，不知叫什么名字，只听见大伙管他叫朴连长。他为人和气，心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有一次，我们听打柴的老李头说，抗联的朴连长领着的那些抗联战士在文字沟里挖野菜。我想一定是没有粮食吃，断了顿，心里很不好受。立刻从几户可靠的人家，凑了 3 斗苞米面，由我和几个人，去文字沟送粮。当我们找到他们时，才知他们已经两天多没吃到粮食了。他们一看到我们送来了苞米面，都十分感动，朴连长用汉语一再向我们道谢。我们说："朴连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粮没及时送到，俺们心里愧得慌呵！"

他听了挺受感动，那些朝鲜战士也挺受感动，纷纷表示决不辜

负中国群众对他们的支持，一定努力杀敌，报答乡亲。

我们送的这点粮虽不多，但送在关键时刻，朴连长一直没忘这事。在向北转移时，还一再向我们致谢。可惜，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朴连长。

（原文为薛征林口述　李藕堂整理）

我认王传圣做“干儿”

1937 年，我的家乡青沟子这一带常有抗联红军去活动。那年秋天，王传圣领了几个抗联的同志来到了我们家，说话亲亲热热，问长问短，我们虽然不熟，一看就知道是好人。时间长了，他们就像自家人一样，来了以后，帮助我们干这干那，我们也不把他们当外人。他们提出要求，让我们帮忙解决红军的一些苦难，我们想尽办法帮。觉得他们比自己的亲人还亲。他们每次到我家来，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就叫我的两个女儿轮流为他们放哨，直到把他们安全送走。这些抗联的同志里，尤其王传圣让我特别喜欢，别看他长的个子不高，但他人说话好听，办事麻溜，干净利落，实实在在，有一次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有这样一个儿子该多好哇！于是想认他当个干儿子。

于是，有一天，他来我家时，我就把他叫到一边，向他说了我的心里话：“小王，我这么大年纪，身边只有两个女儿，我看你这个人挺好，想认你当干儿子行不？”当他听我这么一说，就乐哈哈地跟我说：“大娘，说实在的，我觉得您老人家待我比亲妈待我都好。但是，我是有组织的人，不知这样做合不合适，我得请示一下我们的首长，如果组织上允许，我认，我早就想认。”我一听乐得不得了，说：“好，那我等你的信。”

走了以后不几天，王传圣真的来了，来时还拎了好几样东西，他一进屋，就高兴地说：“大娘，我们首长批准了，还给我钱，让我给您买点进见礼。说完就跪在地上给我磕了 3 个响头，叫我亲妈。起来以后，他搂抱着我喊妈，我也抱着他叫“我的好儿子”，抱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松了手，赶忙擦了自己的眼泪，说说笑笑一阵，

我就忙乎给他做饭吃。

从此，我有了一个在抗联当兵的好儿子。后来，我家也就成了王传圣的家了。抗联的同志来了，我们就更亲近了。我家也就成了抗联的一个联络站了。

（原文为逄王氏口述　王秀文重新整理）

群众帮助攻打台上警察署

1936年8月21日，根据军部的部署，抗联一军第五团、第六团从台上乡湖里夹板沟走出来去攻打台上警察署时，数十名群众主动跟着参加了这次战斗。

台上村周围布满了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前来参加战斗的群众见此，争先恐后用自带的刀斧砍断了铁丝网，使抗联战士们顺利地通过了障碍，很快攻进了台上警察署的院里，敌人还未来得及反抗，抗联战士便闯进了警察署长的办公室，活捉了警察署长崔××，其余的伪军先后被缴了械。缴获步枪30多支，接着群众点火烧毁了伪警署，我们第二天奔向了花甸子。

（原文为宫明义回忆　李重勤整理）

支援抗联　血染古桦

高锦波是我的姨夫，我们住在一个村里，对他在伪满时期所做的事情，我亲自见过，对他的一颗爱国之心，有所了解，现根据回忆，记述如下：

高景春，字锦波。山东省掖县人，早年随祖父闯关东，定居于辑安县榆树林子台上村（今向阳村）。高锦波在辑安师范毕业后，曾历任大路大阳岔小学教师、校长，后又任县教育局教育委员，劝学员。他为人正派、耿直，极有民族自尊心。民国时期，献身教育事业，有一定声望。

“九·一八”事变后，誓不为日本人做事，遂赋闲在家，忙于农耕。当抗日烽火在辑安燃烧起来后，他多次为王凤阁部队（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征集粮食、衣物等。1935 年秋，因坏人告密，被日寇枪杀，时年仅 37 岁。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高锦波从城里回到了向阳村，虽然不缺一日三餐，但眼见祖国沦陷，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宁，愁绪日增，不到 40 岁的人，便生了白发。

1932 年，榆树林子一带也闹起了民众自卫军，王凤阁的部队经常来求村民捐赠衣物粮食，高锦波获悉，尽力帮助张罗。等到 1935 年，此地来了抗日联军的部队，深信中国有救了，亡不了啦！从此，他脸上有了笑容。

当时抗日联军的生活比较艰苦，除了从消灭敌人时缴获一些粮食衣物外，就得靠群众的支援。一天，抗联某连连长刘振铎下山，在西岔吊垛沟门的周家粉房召开了一次会，高锦波也参加了，参加会的还有商人王子元、农民吴德利、伪村长刘兰廷等人。这次会议主要是刘连长宣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抗联的任务，要求民众在必要时给予支援。

高锦波在会上率先发言，讲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应从各方面给抗日联军支援。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赞同，初步定下先筹集 14 000 元钱，给山上的红军购买华其布、粮食和枪支弹药。为了保证安全，在会上还订了不准泄露、告发的纪律。

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虽然当时白色恐怖异常厉害，但高锦波却非常喜悦，觉得抗日救国有了奔头。

高锦波接受红军的任务后，白天晚上向有钱人家进行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当时人们对他这种想法很担心，怕叫日伪军当局知道了会惹来杀身之祸，但他坦坦荡荡毫不在乎。许多民众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一场支援抗联的热潮，很快在小小的山村掀了起来。

民众行动起来后，他们在夜里开始收钱和粮食。并把黑夜里装好的粮食、衣物等送到高粱地、苞米地里。然后又用捐来的款项，买一些布匹，胶皮鞋，还有枪支弹药等军需品。组织人员往山里送。

运送时间、地点，是事先由刘连长安排好的。高锦波虽然是个

读书人，县里的有名人物，可他不例外，也照样背上一份东西。当刘连长和战士来接他们时，见他们一个个都累得汗湿透了衣裳。特别是高锦波，累得气喘吁吁，倒在地上。抗联战士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刘连长埋怨他不该背这么多东西，高锦波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背的应当！应当！"

刘兰廷原是伪村长，在抗联压境的形势下，他答应给抗联办点事。但他在募钱、募粮时，私吞了 7 350 元没有交给抗联。高锦波、王子元、吴德利、曲蔚东等，多次找他算帐，要求他将钱如数交给抗联，他便怀恨在心。

事有凑巧，县城有一个汉奸姓庞，是日伪稽查队成员，人称"庞稽查"。他不知怎么听说刘兰廷私通"红匪"，便向通化日本宪兵队递了呈子（密告信）。刘兰廷遂被捕。

刘兰廷被捕，在过堂时一口咬定他没通"红匪"，不是他给抗联办的捐，日寇一时结不了案。这时，刘兰廷的盟兄弟王敬文、刘仲礼、修辅臣等人，联合向通化宪兵队保释刘兰廷，通化日本宪兵队这才放了他。

刘兰廷回到辑安，以为他在过堂时没招出高锦波等人，他私吞捐款的事就不会再追究了。谁知，高锦波等人依然揪住不放，让他把私吞的钱送给抗联。刘兰廷又羞又恼，一气之下，向辑安日本宪兵队告发了高锦波等人通抗联的事。

辑安日本宪兵队队长堀江正一，接到刘兰廷的密告信，立即派庞稽查来核查。庞稽查是一个大烟鬼，每天总要抽两个大烟泡。谁只要能满足他这口瘾，他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他满以为到了榆树林子，会发点财，过足瘾。谁知高锦波等人，根本不理他，气得他大声骂道："高锦波你他妈的不用不摆我，有要你命的那一天！"

庞稽查回到城里，果然第二天就来了一队日本宪兵，将吴德利父子抓走了。不知过没过堂，这爷俩就被日本宪兵在南江沿用大洋刀砍了头。

曲蔚东闻讯，立即躲了起来，免于一死。王子元惶惶不安，跑与不跑，一时举旗没定。这时，有人来到高锦波家中，劝他快跑吧，要不就会有生命危险。高锦波当时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一来他还没有看透日寇的本质，以为凭他的三寸善讲之舌，会驳倒敌人。二来，

他只有一个儿子，怕拉家带口逃跑，若被日本人抓住，全家人性命也难保。因此，思之再三，他决定哪儿也不去，坐等事态发展。

过了两天，辑安日本宪兵队的四辆汽车，直接开到高锦波家的所在地——向阳村，将高家包围，不容分说，将高锦波抓走了。同时，王子元也被抓去。

这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在榆树林子驻下没有走。刘兰廷设宴，招待这伙日本宪兵队，他的小老婆陪着喝花酒，一直吃喝到半夜。

刘兰廷怕高锦波押进城后，熟人多，保出来死不了，对他不利。为了尽快杀死高锦波、王子元，摆脱自己，并将私吞下的钱永归己有，便向日本宪兵队指导官小村节一劝酒时说："高锦波与'红匪'的大大的好，红匪要知道他被抓时，会劫狱和闹法场的，给你们带来麻烦大大的有……。"

"刘的，你说怎么好？"小村节一信以为真，忙问刘兰廷。

刘兰廷忙说："我看，你们半道上就处决他们最好，又省事，又安全。"

"好，好的！"小村节一采纳了刘兰廷的建议。

第二天，日本宪兵队押着高锦波、王子元二人回县城了。高锦波、王子元万没想到，当汽车走到车道岭顶时，汽车停下了，他们被拖下来，站到一棵古老高大的桦树下，日本宪兵队举起了枪，向爱国的志士们下了毒手……

当抗联一支小部队闻讯赶来时，高锦波、王子元二人，已经被枪杀了。刘连长悲痛地对战士们说："高老师是为了咱们抗联死的，咱们应该给他报仇！"

"给高老师报仇！"战士们发自内心的誓言，久久地响彻在大岭之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53 年肃反时，人民政府终于查清了刘兰廷的罪恶事实，将他判处了死刑。当他被押赴刑场时，榆树林子的群众奔走相告，刘兰廷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原文为张殿元口述　杜　宇整理）

成立秘密组织支援抗联

1935 年后，抗联在老岭根据地周围村屯组建了很多支援抗联的秘密群众组织，并得到了这些组织的大力支援。据日伪档案记载，曾有部分秘密组织被日伪破坏，使根据地的保障受到严重损失：

（1）太平村救国会

1937 年 8 月 14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某部政委陈秀明到太平村样子沟屯王克礼家宣传抗日活动，参加人有太平村长田克勤、太平沟甲长刘玉章和牌长 5 人，村民 1 人。经商讨决定成立太平村救国会，田克勤任会长，确定今后开展四项工作：积极向抗联筹款筹物；及时提供日满军警之配备和集团部落防卫的情况，并经常保持同抗联的联系；向一般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破坏日本并村归屯、赋役和出劳工。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他们先后向杨靖宇部队送去大米 2 石，苞米 27 石，华其布 46.5 匹，袜子 507 双，现金 1 780 元。

（2）二道坎子祖国光复会

1937 年 8 月 20 日，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师某部政委陈秀明率部队在袭击二道坎子（今自兴村）集团部落之际，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成立了祖国光复会，朴永根为会长，胡亭、朴竟方为干事，又发展 4 人为会员。他们在群众中筹集打糕 20 斤，苞米 2 石，华其布 1 匹，送给抗联部队。

（3）榆树林子保国会

1937 年 6 月，榆树林子村长游殿甲与该村牌长副牌长在该村背阴亭山林中与抗联红军政治委员于仙舟举行秘密会议，并成立了榆树林子保国会。以后在群众中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宣传，并先后筹集到华其布 22.5 匹，苞米 37.45 石，水袜子 163 双，袜子 60 双，大酱 200 斤，猪肉 180 斤，现金 64 元，送给了抗联部队。

（根据吉林省档案馆编译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关国清整理）

日本侵略集安罪行

日伪时期辑安县公署组织机构

伪大同元年（1932 年）6 月 8 日，日军侵占了辑安县城，9 月组建了伪辑安县公署，刘天成任第一任日伪县长，折田弥久郎为参事官。伪康德二年（1935 年），免去县长刘天成职务，任命汪毓昌为县长，是年 5 日 21 日新委任日本人属官佐藤久吉为参事官。同时，在县政权机构中的其它部门，配备了日本人警务指导官、经理指导官、产业指导官。辑安县公署内部行政机构设总务、内务、财务、警务、电话等科局。

伪康德五年（1938 年），县一级政权参事官改称副县长。相应的县一级的政权机构设置，也有所增加。伪康德十一年（1944 年），伪辑安县公署组织机构设置如下：

日伪时期辑安县公署组织机构（1944 年）

县公署下设地政科（内设事业登录股、地政股）；财务科（内设征收股、赋课股），加设日本经理官；警备科（内设保安股、警务股、村务股、警务股），加设日本首席指导官；实业科（内设建设股、商工股、林务股、农务股），加设日本经理官；行政科（内设民籍股、国兵股、动员股、保健股、行政股）；总务科（内设经理股、人事股、文书股、庶务股），加设日本经理官；以及企划室。

伪满时期辑安县公署历任县长、参事官更迭表

任　期	官　职	姓　名	籍　贯	到职时间
第一任	县　长	刘天成	河南	大同元年9月9日
	参事官	李连馨		大同元年11月13日
	参事官	拆田弥久郎	日本鹿儿岛	大同元年6月9日
	副参事官	大穗久雄		大同元年11月21日
	副参事官	三轮健儿		大同3年9月15日
第二任	县　长	汪毓昌	锦州北镇县	康德二年4月16日
	参事官	佐滕久吉	日本山形市	康德二年5月21日
	副参事官	坂田义政	日本熊本县	康德三年10月14日
	副县长	西岛宽		康德五年4月1日
第三任	县　长	陈天喜		康德七年11月1日
	副县长	井上宗亲		康德七年
第四任	县　长	于尔谟		康德九年
	副县长	井东信夫		康德九年
第五任	县　长	雍善耆		
	副县长	井东信夫		
第六任	县　长	马庆文		
	副县长	井东信夫		

伪满洲国初期，在乡村的基层政权中实行保甲制。基本上沿用原来的机构和制度。伪康德二年（1935年）全县设有16个保，134个甲，1 869个牌。伪康德四年（1937年）实行街村制。当时，在全县的基层政权设有1个街（辑安街），16个村。伪康德七年（1940年），日伪当局又制定了《国民邻保组织确立纲要》。根据这项法令，市街居民按区、组划分居民区域实行管理，而在农村的居民则实行屯牌制。

伪康德十一年（1944 年）12 月资料记载辑安县街村（区屯）组牌数调查表如下：

日伪时期辑安县乡村（区、屯）组牌统计（1944 年）

街村别	区屯别	组牌数	备考
辑安街	12 区	251 组	
阳岔村	11 屯	88 牌	
榆林村	8 屯	70 牌	
太平村	4 屯	40 牌	
大路村	8 屯	96 牌	
良民村	6 屯	69 牌	
台上村	10 屯	116 牌	
久财源村	12 屯	163 牌	
青沟村	8 屯	76 牌	
头道村	8 屯	135 牌	
合计	12 区 75 屯	251 组 853 牌	

（以上内容摘自《集安县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集安罪行略记

日本侵占辑安后，实行其野蛮统治，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生灵涂炭，百业凋蔽。辑安人民经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

抗战时期人口伤亡情况

辑安抗战前，据1930年人口资料统计，全县总户数20 565户，总人口129 404人，其中男72 186，女57 218人。到1944年，全县总户数20 814户，总人口121 826人，其中男66 832人，女54 994人。1944年比1930年总人口减少7 578人，其中男人减少5 354人，女人减少2 224人。据统计，经过14年抗战，因战争原因伤亡13 795人，其中被杀、失踪等直接伤亡5 553人，被俘捕、灾民、劳工等间接伤亡8 242人，这还不包括因战争原因而病故等人口伤亡数。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在辑安统治时期，辑安居民直接伤亡5 553人。其中死3 346人，伤2 207人。间接伤亡8 242人。其中征发兵役100人，死2人，强征劳工8 140人。

日伪时期辑安财产损失情况

日军在辑安横行期间，使社会财产损失几乎贻尽，原有的手工业、农业、林业、商业等更是遭受巨大损失，文物古迹、公共事业全部遭受重创。

（1）社会财产损失情况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社会财产损失统计表

项目	类别	直接损失		合计	备注
		数量	价值		
矿业	铅锌矿	2 400吨	—	2 400吨	
	石绵矿	2 720吨	—	2 720吨	
	云母矿	91 992吨	—	91 992吨	
	金矿		—	—	
农业	粮食	309 556千斤	—	309 556千斤	
	参业	206 438元	—	206 438元	
林业	砍伐薪材	23 552吨	—	23 552吨	
	伐木烧炭	1 832吨	—	1 832吨	
	剥椴树皮	240吨	—	240吨	
	原木	22 960立方米	—	22 960立方米	
交通	铁路	—	15 590	155 920日元	
	公路		—	—	
	航空	418亩	—	418亩	建飞机场
邮政	邮政	—	—	—	
	电讯	—	—	—	
商业	商业	618家	—	618家	
	外贸	—	—	—	
财政	税收	267 918元		267 918元	伪满币
	其它	26 610元	—	26 610元	
古迹		14座	—	盗掘太王陵、将军坟、西大墓、千秋墓、三室墓等	
教育	小学	81所	—	81所	
	中学	2所	—	2所	
	中专	2所	—	2所	
	其他	1所	—	1所	
古建筑		2处	烧毁老岭关帝庙、霸王朝基督教堂		

农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伪抢掠、破坏等原因，使辑安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使农业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低水平上，粮食亩产始终不超过100公斤。加之日本侵略者为了军事需要，在辑安强占土地修建机场、电站、公路等军事设施，致使大量良田被毁。1935年，日军强占农民土地418亩修建军用机场。1939年，日军修建喇咕哨（水丰）电站，致使农民大片良田被淹、房屋被毁，农民被迫流离失所，使辑安耕地面积大量减少。生产出来的粮食都被日伪强制征缴和掠夺了。

商业：

日本侵略者占领辑安后，一些商号相继关闭，外岔沟、县城日趋萧条。1932年，日本侵略者对农副产品残酷掠夺，对百姓急需的工业品严格控制，实行以缴纳农副产品数量，确定工业品供应量的“粮油出荷”办法。1934年以后，对烧酒、卷烟、胶鞋等生活用品实行配给。由于垄断粮食，实行配给，一些点心铺、饭馆得不到充足原料大部分停业。城乡的居民和工人，起初配给玉米面，后来则改为供应橡子面。外岔沟通往安东的商船经常被日军掠夺，外地行商也不敢来这里交易，全县商业受到摧残。到1938年，县内农村商号仅有10多家，占1931年的五分之一。1939年，日军在鸭绿江下游修喇咕哨（水丰）电站，水路运输被中断，船舶不能通行，水没区居民被日军强制迁出，外岔沟许多商户迁到县城、大路、凉水、花甸子，有的迁至通化、桓仁等地。外岔沟作为辑安的商业中心逐渐没落。1941年，日本侵略者加紧搜刮战争物资，对辑安各种资源及农副产品进行疯狂掠夺，对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严格控制。1942年，成立小卖联盟和配给店，日本侵略者把农民出荷交粮和布匹相挂钩，决定农民交多少粮食给多少布匹，规定稻米必须全部出荷，一粒不留，少有隐留，便视为经济犯。警察、特务四处侦察，发现有吃大米的就要毒刑拷打，没收粮食，按经济犯问罪。日伪在粮食实行配给不久，对棉布、豆油、火柴、食盐、煤油等生活必需品进行配给。并在全县设定私人商号发放这些物资。由于商品不足、原料奇缺、交易萎缩、商号倒闭，辑安商业经济出现一片

萧条景象。到1945年，全县仅有商户40家，配给店28个，比1939年减少300余户，民族商业受到严重摧残。

工业：

辑安县矿产资源丰富。日本侵略者占领辑安后，加快了对矿产资源的掠夺。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开办了铅锌矿、石绵矿、云母矿、金矿等，并将开采出的矿产运往日本。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在辑安共掠夺各种矿产资源97 000余吨。

1935年8月，日本人成立辑安汞洞子采矿所，有劳工50多名进行开采，日产铅锌矿石2吨，年产量600多吨，日产重晶石2吨，年产量600多吨。1939年关闭，共采铅锌矿2 400余吨、重晶石2 400余吨。同年，日本人大平松在辑安小荒沟（今清河镇）建立"石绒株式会社"，有劳工120名，日产石绵50吨。到1945年，共采出石绵3 000多吨。

1936年，日本人在财源霸王朝建立三光云母矿，有劳工500名，年产量约10 000吨，1945年关闭，共采矿石80 000吨。同年，日本人谷田海在腰营乡金家村开采金矿，有劳工60名，生产出的矿石运到沈阳冶炼提出黄金。1940年关闭。

1942年，日本人在花甸乡新开河桥南邵家大院内，开设大东云母矿，开发矿点多处，有劳工200名，年产量4 000多吨，1945年关闭，共采矿石12 000多吨。

林木资源：

为掠夺辑安林木资源，日本侵略者在安东（今丹东）成立鸭绿江采木公司，凡鸭绿江流域区森林采伐，该公司有收买的优先权。鸭绿江采木公司规模很大，是东北最大木材公司。鸭绿江流域木材几乎砍伐殆尽。按协议规定，该公司应于1933年撤销，但日本侵略者在夺取东北后，直到1940年，每年仍伐木1 303万立方米。1940年，日本"代采株式会社"等私营采木组织大肆采伐林木，从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4个年度统计，在辑安、阳岔、太平、榆林、台上、财源、头道、青沟子等各处砍伐坑木、电柱及一般用材16 966立方米，砍伐薪材23 555吨，伐木烧炭1 832吨，剥活椴树皮240吨。日本"合成林业组合"，从1940年到1945年，在阳岔、大青沟、大荒沟、三道阳岔、双安屯等处采伐

坑木，每年达 1 000 多立方米。同时又对辑安到通化铁路两侧 25 公里之内森林实行清扫采伐，毁掉大片森林。到 1944 年，全县林木蓄积量仅存 1 063 万立方米，基本上已演替为中令林为主的二代或三代次生林。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仅于 1932—1945 年间仅在辑安掠夺木材就有 22 960 立方米。

人参产业：

辑安人参种植历史较早，解放前人参就是辑安的一项重要产业。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归屯政策后，使参户远离参地，无法经营，致使参园荒芜，参地面积急剧减少，产量大幅下降，农民损失惨重。1934 年，全县人参 15 000 帘，年产水参 13 380 公斤，产值 71 360 元（伪满币）。到 1936 年，全县人参减少到 10 000 帘，产量下降到 7 920 公斤，产值仅有 42 768 元，产值减少 28 592 元。辑安腰营村归屯前园参有 5 000 帘，归屯后只剩几百帘。横路村原栽参 12 000 帘，归屯后只有几千帘。全县人参大户纷纷外迁，横路村东岔的“相园堂”、“仁义堂”等大参户，扒参作货卖掉后便迁往山东。有些参农归屯后，人参废弃在山上，损失惨重。1939 年，日伪设立“参业组合”，每年向参农征收卖货总额 10%的组合费，并征收 5%的参税，而实际征收大大超过此限，严重挫伤参农，参业遭到破坏。1939 年，日本侵略者为发动太平洋战争，大肆勒索民财，征收人参出山税、交易税、所得税，强迫参农认购公债券，规定人参出荷，实行人参统购预购贷款（月息 2 分），使全县人参产业受到严重破坏。

交通：

日本侵略者占领辑安后，为加快对资源的掠夺以满足于军事需要，开始在辑安大规模修建铁路、公路、架设桥梁等。1934 年，日军对辑安到通化 100 余公里公路进行整修。193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出于治安需要，在辑安县城东南方 5 公里处修建 1 个飞机场，强占农民土地 418 亩，该机场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才关闭。1937 年，日本侵略者为把掠夺的各种资源运往日本，从天津、山东等地强征劳工上千名，又从辑安及邻县强征几千名劳工开始修建通集线铁路，通往朝鲜半岛，将掠夺的物资运往日本。在铁路修建过程中，由于劳累过度、饥饿等原因，造成劳工大量死亡。通集线

铁路的修建，给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物资和倾销日货打开了方便之门。

财政：

1931年，辑安地方税实收129 592.43元。1932年，地方税实收额406 827.16元。1933年，日伪强制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税、省税、地方捐。地方捐有亩捐、车捐、营业捐、妓捐、屠宰捐、粮捐、豆石捐、剪子捐、茧笼捐、富户捐、园圃捐、市房捐、学田捐、桥梁捐、婚书捐、韩侨捐、韩侨证书费、出产杂粮税、出产细粮税、豆税、茧税、烟税、酒税、营业税、驴猪羊税、牛马骡税、印子税、油粮税、矿税等33种税捐。1935年8月，伪满国税分为关税、内国税两种。关税含输入税、输出税、转口税、赈灾附加税、吨税5种。内国税含盐税、地税（田赋）、禁烟特税、营业税、出产粮税、矿业税 登录税、木税、石税、牲畜税、屠宰税、酒税、卷烟税、烟税、棉纱统税、水泥统税、麦粉统税、契税、印花税19种。地方税有营业税附加捐、矿区税附加捐、矿产税附加捐、法定杂捐、许可杂捐、木捐、地捐、亩捐、园圃捐、剪捐、门户捐、市房捐、营业捐、粮捐、蚕笼捐、车牌捐、肉捐、屠宰捐、妓捐、渡口捐、参捐等21种。日伪还按农民土地亩数分摊税外经费。1937年，全县有土地336 352.19亩，收缴经费伪币值285 368元。苛税杂税，多如牛毛，劳苦民众，苦不堪言。

文物古迹：

集安高句丽古迹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开始对辑安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掠夺。日本侵占辑安后，这种掠夺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日本人成批相继来辑安调查古迹，肆意盗掘古墓，强迫辑安学生给他们临摹古墓中壁画，盗走大批珍贵资料和文物。

1935年9月28日，池内宏、梅原末治、水野清一、三上次男、藤田亮策、伊藤伊八、斋藤菊太郎、冈崎信夫等经朝鲜满浦进入辑安。9月29日至10月4日对国内城、山城子山城（丸都山城）及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西大墓、四神墓、三室墓、环纹墓、牟头娄墓等进行实测、摄影、著录和挖掘。同年，日本人池内宏对冉牟墓、环纹墓、折天井冢墓进行了实测和著录、盗掘等。日本人斋

藤菊太郎、七田忠治等对四神墓勘测。从此墓门大开，日本人在盗掘时，墓内壁画遭到严重破坏。

1936 年，日本人对千秋墓进行盗掘、勘察。1937 年，日本人池内宏等进入角觝墓，舞踊墓、临江墓、西大墓等进行踏查、盗掘和著录，致使西大墓破坏相当严重。同年，日本人黑田源次打开马槽墓门，对该墓进行盗掘，遂使壁画遭受破坏。

1940 年，辑安曾降落一次从日本东京飞来的一架专用飞机，午前降落，午后立即返航。飞机降落后，有专车将这些日本重要人物送到辑安火车站后面的古墓，日本人驱使中国民工打开墓门，又把中国民工赶走，日本人把辑安古墓中的珍贵文物及珠宝掠夺一空，装上飞机带回日本。

教育：

1932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辑安后，开始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列为主课，原有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教育被摧毁殆尽，整个学校被日本侵略者控制。他们在教育中强制学生劳动，把学生劳动制度用法令形式公布。为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和管理，国民优级学校派有日本人监学。

（2）民众财产损失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强掠豪夺、百般搜刮，辑安居民不堪重负，在房屋、人参、粮食及生活用品方面也遭受重大损失。

（集安市抗战课题组资料，关国清整理）

日伪残酷统治　百姓陷入苦难深渊

清乡归屯

1935 年，伪满开始实行集团部落政策，对农民进行归屯管理。日本侵略者强迫散居在各沟各岔和小自然屯的住房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将原居民一律烧光。梨树沟一地就有 50 多户房屋被烧。在青沟子范围内 14 个自然屯被烧，制造无人区。据 1935 年统计，全县共设集团部落 68 处，收容 17 231

户。被赶进集团部落居住的群众，出入部落要挂号（登记），出示“良民证”。到“围子”外面种地，收拾庄稼也不准离开部落太远，只准带够中午吃一顿的干粮。黄昏时关闭围子大门，干活回来晚了没有村里人出来作证，就按“通匪”处理。因此，使得耕地大面积撂荒，粮食不够吃，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绝大部分住马架子房和地窨子，阴暗潮湿，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归屯的第二年，瘟疫流行，群众大批死亡。1935 年，青沟子警察署仅在岭后片统计，就有 13 个村屯暴发了瘟病，其中有：霸王朝、花甸子、荒岔沟、宝马川、久菜园子、热闹街，青沟子、二道阳岔、鹞子窝、大川、高力沟、大蚊子沟、梨树沟等。染病人口 81 人，男 44 人，女 39 人。其中：疹子，8 个村 32 人，其中男 17 人，女 15 人；伤寒，8 个村 25 人，男 15 人，女 10 人；腥红热，4 个村 13 人，男 4 人，女 9 人；天然痘，5 个村 13 人，男 10 人，女 3 人。

（集安抗战课题组资料　关国清整理）

强征劳工

日伪统治时期，在辑安实行名为“辑安县勤劳奉仕规程”，挨家挨户摊派劳工。腰营村的参主于连德，用钱买通了头道村公所劳务系的孙长太，强迫没钱买免的戴永顺去顶替参主于连德当劳工，而戴永顺到大栗子铁矿当劳工不到两个月，由于忧愁、气愤加过度劳累成疾而含恨离开人世，妻子改嫁，弄得家破人亡。高力河屯的于成年被派劳工，于家只有一个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老婆怀孕 6 个多月，百般哀求不成，于成年回家后和老婆抱着痛哭一场，当天夜里，夫妻自缢而死。被送到七道沟铁矿出劳工的人，吃橡子面，住工棚，睡草地，挨打受骂，每天劳动 12 个小时，由于饥饿与过度疲劳，很多劳工被折磨成疾致死。劳工有病不给治，只等死亡，有的带气就被抬出去扔进死人坑。劳工这种非人的生活，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高压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集安抗战课题组资料　关国清整理）

制毒贩毒

日本侵略者为了毒害中国人民，收刮民财，在各地设“康生院”（戒烟所），进戒烟所先交 100 块大洋，实际却大肆宣传鼓励抽大烟、扎吗啡。1936 年至 1945 年，辑安县公署设烟务股，分别在三道沟、良民、黄柏甸子、榆树林子、大路、东岗、台上、头道、青沟子、财源、县城西门、县城东门设立 12 个官烟所，分发大烟炮，每个烟所有“通帐”（有公开烟证）烟民 200～400 人。吸食大烟造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比比皆是。太平村宁殿杰因吸食大烟，几年的工夫不但把 1 000 多石租子的地全抽光了，还卖了两个儿子，最后宁殿杰和妻子相继死亡。“永和泰”掌柜高云鹏，全家大人小孩都抽大烟，成瘾后，没钱抽了就开始扎麻啡，不到 40 岁就死了。据《通化省概览》记述，1939 年，辑安县生鸦片购入量 30 300 两，生产总泡数 1 032 915 泡，烟炮买卖数 1 034 555 泡。如 1939 年辑安某官烟所鸦片瘾者新录者月别表，按年龄划分了 6 个阶层：一月：0—29 岁，男 1 人；30—39 岁，男 4 人，女 1 人；40—49 岁，男 5 人，女 1 人；50—59 岁，男 4 人，女 1 人；60—69 岁，男 3 人；70 岁以上，男 1 人。到 12 月：0—29 岁，男 6 人，女 10 人；30—39 岁，男 36 人，女 16 人；40—49 岁，男 33 人，女 12 人；50—59 岁，男 21 人，女 20 人；60—69 岁，男 15 人，女 6 人；70 岁以上，男 4 人，女 2 人。由此看出，当年辑安鸦片瘾者发展迅速。一月新瘾录者，男 18 人，女 3 人。到 12 月末，男的达到 115 人，女的达到 66 人。男人增长 6 倍，女人增长 22 倍。是年全县共有鸦片瘾者 1 044 人，占全县当年总人口 124 934 人的 0.8%，100 个人中，就接近有一个鸦片瘾者。

（集安抗战课题组资料　关国清整理）

罪恶的法令

1932 年 6 月，日军从满浦过江侵占辑安（集安）县城后，实行高压统治，采用了“以华治华”和“民族离间”政策。在我国东北很快就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伪满洲国，扶植一支庞大的警察体系和宪兵、特务机构。虽然这些机构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人，然而却被日本人直接控制，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的工具。日伪为了推行其血腥的屠杀和镇压政策而接二连三地公布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与法令。

1932 年 11 月 9 日，公布了《暂行惩治盗匪法》和《暂行惩治叛徒法》。前者把“聚众”与“结伙”视为“匪贼”而加以惩处，后者则给军队与警宪以“临便格杀”的无限权力。1932 年 9 月 11 日和 1933 年 2 月 26 日，日伪当局又发布了《治安警察法》和《暂行枪炮取缔规则》。1933 年 4 月 21 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还发布了不准种植高棵作物的命令，即在县城附近 3 里以内、集镇 2 里以内、铁路和公路两侧 1 里以内，不准种苞米、高粱等高棵作物。上述法令导致了广大群众无边的苦难。

1933 年，日伪实行“十家连坐法”。如一牌中的一户出现所谓扰乱治安的“犯罪人”，其他各户都负有连带责任。错草沟部落里的李福生老汉，老两口都 60 多岁了，只有一个儿子，为了抗日而把独苗送到抗联队伍去打日本。老人把抗联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他给抗联送粮食，被敌人逮捕。敌人根据“保甲连坐法”将李福生老俩口绑在木桩上，让狼狗活活咬死。然后又将同牌的人家，不管大人小孩通通都拉出去活埋了。

1944 年 6 月 12 日，伪满洲国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共 74 条，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罪名，诸如反对帝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持法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等。还规定了“预防拘禁”和“保护监察”，就是为日伪军警提供了任意捕人的特权。有两人以上在一起唠嗑谈家常，或低声说话，被警察发现，就以国事犯、嫌疑犯逮捕。即使不

随便说话，还有个“预防拘禁”和“保护监察法”就可以随便抓人，甚至可以开枪杀人。1939 年的阴历十一月黄柏村民姜殿魁上街，因其患有疝气病，走路需捂肚子，恰好此时遇上了一队伪军由此路过，令其举双手，而姜还没来得及举手，伪军已经开枪，姜殿魁当场死于非命。

（原文为迟明发、周春枝整理）

劳工的苦难

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就开始抓紧掠夺我国的地下矿产资源，抓劳工为其修铁路、开矿山，把中国的财富运往日本。提起抓劳工，我就是被抓的一个，那年我才 16 岁。

（1）进了鬼门关

康德十二年，也就是 1945 年的春天，我叔父家住在土口子岭顶，叔父周本玉被派了劳工。他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两口子领着 3 个小孩，还得赡养 70 多岁的岳父。若是我叔父去出劳工，家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连地也没人种了，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再说，出劳工的人是羊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无回路！那个年头，谁家被抽了劳工就是劫数难逃啊，全家人愁得哭哭啼啼。

当时，我奶奶出于疼爱她的小儿子，便与我父母商量，叫我去替叔父出劳工，父母和我都不愿意。但是出于一家本当，父亲看在亲兄弟的面子上，忍痛答应让我去顶替叔父出劳工（那时候，有个能干活的人替也行）。当时正是种地的时候，这一次全县挑了 300 多人，统统集中到辑安县城里，编队后当天就从辑安火车站上了火车，奔往临江县的大栗子铁矿。

大栗子铁矿是日本掌管，当时称劳务系（背地里大家伙都叫它老虎系）。劳务系里边有二、三十名日本人，他们分别掌管各方面的事，中国人都得称他们为“太君”。劳务系设在南大楼里，他们吃的住的条件非常好。那时通化是伪满洲国的一个省，管辖 10 个县（原通化地区管辖范围），各县的劳工很多，一个县是一个“增

产大队”，都归劳务系管。

辑安县的劳工编成一个“增产大队”，共有 1 000 多人。下设 3 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 3 个小队，每个小队有六、七十人，我被分在三中队三小队。大队长姓孙（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是麻线沟人。三中队长姓李（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岭后的人。我们三小队长叫周公利，他是阳岔村人。

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辅导工人”（他们都是被俘的红军战士）40 多人，住在拉有电网的房子里，还有矿山警察持枪站岗放哨，黑白轮流值班。“辅导工人”出来干活时，也有矿山警察持枪严格看管。那儿还有一部分，叫勤劳奉仕队，他们都是挑国兵不合格的男性青年（也叫国兵漏），共有 200 多人，他们住的房子比我们劳工住的房子也强不了多少。所有这几部分人，都归劳务系的日本人管。

大栗子铁矿，分南部落、北部落。我们辑安县的“增产大队”在北部落，干活得到南部落附近有个叫“西里峪”的坑口。每个坑口都有一两名日本把头看管。因此，劳工们背地里偷偷地叫大栗子铁矿是“鬼门关”。那时，人们偷偷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进了鬼门关，牛马一样干，天日看不着，亲人不相见。”

（2）住的牲口棚

那个时候，劳工们住的全是简陋的卡杈房子，一栋挨着一栋（一栋十余间），一个小队住一栋，里边是南北通长对面炕。中间一间是小队的伙房。说是火炕，实际上由于火炕太长，炕头有点热气，炕稍可就不行了。夏天火过不去，炕潮湿得厉害，夜间被窝里潮乎乎的，可难受了；冬天冷得厉害，炕根本不热，门缝透着风。俗话说“针鼻大个眼，牛头大的风”，一点儿不假。劳工的被子也就是叫被子吧，破破烂烂的，净是些破旧棉花，疙瘩溜秋的，补丁挨补丁，又很薄，哪能不冷呢？每个人发给一套所谓的衣服，全是更生布做的，比麻袋片还粗糙，用指头一捅说是一个窟窿，虱子可有藏身之地了，衣服缝里是它们繁殖和生存的好地方。

（3）吃的猪狗食

论吃的，主食是粗苞米面和橡子面蒸的窝头。每天三顿饭，每顿饭每人只给一个窝窝头。副食每顿每人给一点点咸盐豆，劳工吃

不饱能干动活吗？日本人才不管你那一套，反正你有一口气就得给他们上班干活。劳工们好不容易盼到节日，心想能改善生活，哪曾想照常是窝头、咸盐豆。

（4）干的牛马活

在大栗子铁矿当劳工，主要是下洞子和露天两大工种。下洞子的，就是挖铁矿石，黑白班除了打眼放炮，就是装轱辘马子和推轱辘马子，这些活又脏又累，又有生命危险。在露天干的，除了有些强壮的劳工在南大楼那开摩电车，看翻板和漏子装火车外，其余的都是后勤的老弱杂工。那年我才 16 岁，长得又矮小，身体又瘦弱，安排当“包衣”（勤杂工）干些扫地、抹桌凳、生炉子、打水等零活。后来，看我干活还行，又给我增加了任务，每天还得往劳务系送传票（工票），往坑口送刚淬过火的钎子，再把不能用的秃尖钎子扛回来，送到烘炉去淬火。

有一次，我和表哥孙先璞在工地上用手指拉勾玩，正巧被我们三小队长周公利看见了，他走到我们跟前，叫我们把手伸出来，我们心里明知又要挨打，吓得心里突突直跳，可也不敢不伸出手来，这个坏家伙用木板把我们俩的手掌都打肿了，还得马上给他好好地干活。周公利因罪大恶极，解放初期被我人民政府枪决了。

（5）病死没人管

由于吃的不好，活又累又重，干不动，日本人和中、小矿长看见了，轻者骂一顿，重者举手就打，有的人被他们打得鼻口出血，有的人被打得直苗苗地给他们跪着。加上干活时出一身汗喝了凉水（井下的人喝洞子里的空山水），把好好的一个人就给活活地折腾出病来。劳工病了，日本人不给治疗还不让通知家里的亲人来看望。日本人怕得了伤寒病再传染别人，说把有病的劳工送进“病洞”隔离。什么是“病洞”呢？说是在离劳工宿舍远一点的平地上，用铁锨挖一个地槽子。把病人放进去，顶上用破席子一盖，只是遮遮阳光或雨雪而已。在人没死以前，派人给他们送去个窝窝头，吃不吃就不管了。所以，谁有病也不敢吱声，忍着疼痛偷偷地带病坚持干活，实在坚持不了，日本人只要发现了，马上就叫劳工送到“炼人炉”里去炼。有时“炼人炉”忙不开，就叫劳工把死人往“烂尸岗”里抬，就地挖个坑把死人扔进埋上了事。前头人走了，后头野狗就

去把尸体扒出来，狼撕狗掳，乌鸦成群，真是惨不忍睹。

（6）解放回家转

1945 年农历七月十四日那天，临江大栗子铁矿获得解放，正式宣布劳工解散。人们自由了，大伙甭提那个高兴劲了，互相找亲朋老乡，商量着一起往家走。我们辑安县的 1 000 多名劳工，一帮一伙的，接连不断地沿着鸭绿江北岸，从旱路往回走。农历七月十四日当天从大栗子，经过临江县的小栗子、错草沟、三道沟，进入辑安县境的石湖村、秋皮沟、良民甸子、下套、望江楼、蒿子沟、黄柏甸子、小长川、上解放、下解放、太王、民主……我们全是用腿量的，走了 3 天，农历七月十六日才回到辑安县城。一进辑安县境，人越走越少，越走越散了，岭后片的人和大路方面的人，都各自回家去了。那时，我们家在弯道里高丽堡子，那天傍晚，我回到了做梦都想见的亲人面前，心情高兴极了，热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几次高兴得跳起来。

（原文为周立波口述　周春枝整理）

警察、宪兵、特务横行

日本关东军又培植了一支庞大的警察、宪兵和特务队伍。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辑安有个十恶不赦的周振东（外号周大眼珠子，解放后已被处决），对待老百姓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仅在荒岔沟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被他打过的群众就有 100 多人。有一次，荒岔沟（今宝甸村）的张殿顺，在村外的路边小便时，突然看见周大眼珠子过来了，吓得没等便完，赶紧提着裤子上前点头哈腰地打招呼，而周大眼珠子则认为是对自己不恭敬，于是就地一顿暴打，张殿顺为此惊吓而病倒，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

花甸村的群众解会林，吃完晚饭去邻居家搭伴“拉枪锯”，正在窗外打招呼时，被喝醉了酒的周大眼珠子遇上，立即把解会林叫到跟前，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刘汉民出屋看见了，赶紧上前去求情，可是还没等开口就被周大眼珠子一起弄到解会林的家

里，当着解会林一家大人孩子的面，叫解会林和刘汉民跪在地上，而周大眼珠子却坐在解会林的炕沿上抽烟，自寻开心，尽管解会林一家老小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周大眼珠子坐在炕沿上，翘起二郎腿，时而拿棍照头打两下，时而哈哈大笑，一直折腾半宿才算是了事。

青沟子伪警察署的警尉补孙××，让吴令福给他修鞋，吴把鞋修好后，向他要修鞋费时，他不但不给反而将吴一顿暴打，还不解气，第二天又到他家用劈柴拌子将吴痛打多时，把吴打得全身青紫，一周后就死去了。

（文史委整理）

粮谷出荷与配给制

伪满初期，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垄断政策，即实行“统制”。推行“粮谷出荷”，即以“决战下绝对需要之数量”为基础，由伪满中央摊派给各地方，各地方再摊派给农民，不管有无一律强制交纳，每当“出荷”高潮的时候，“出荷督励班”纷纷出动，对广大农民进行逼迫。从 1942 年起特别加强了经济警察的权力，即在“督励“出荷时使用武力。如果农民把仅有的一点度命糊口的粮食隐藏起来，一旦被警察密探发现，不仅粮食被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凉水泉子伪警察分所长白××到滕芝清家强迫其交纳出荷粮，滕家穷困，拿不出来，白××就把滕的父亲痛打一顿，滕父一气之下得了心疼病，不久便死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警察狗子假冒骗收出荷粮，使百姓雪上加霜。砬子沟屯长高××和伪警察署的唐警佐挨户骗收“出荷”粮，然后他们从中把粮卖掉分钱。

（文史委整理）

民族离间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鼓吹日本民族是富有优秀的质量和卓越的能力，对其他民族负有指导、启蒙的责任，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并宣扬“民族协和也是以日本民族为核心”的。一个日本官吏的报酬，等于做同样工作中国人官吏的3～11个人的报酬；一切重要职责，都由日本人占据。伪协和会的一个日本头目就这样说过：“日本人为数虽少，他们是站在现代文化最高峰的民族，所以，立在指导地位也是当然的。”他还比喻说：“譬如满洲国是一个人体，满系人（指中国人）是肉体，日本人是骨骼，没有骨骼不能支持肉体，日本人是维持身体的重要部分，所以是不能呈现在外部的，若是骨骼跑到肉体外边来，那就不好看了。”

日本帝国主义大搞民族离间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朝鲜族的政策。1938年7月25日关东军拟定了一个所谓《在满朝鲜人指导纲要》，其中提出“要扶持其履行义务的观众和勤劳精神”，并“迅即首先把握和培养其核心的领导阶级，并将各种现有民族团体，根据其性质统一在满洲帝国协和会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显然在利用朝鲜族的上层来奴役和剥削广大的朝鲜族、汉族等群众。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朝鲜族中间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开始强迫朝鲜族人民群众改用日本姓名，并在朝鲜族中间实行“征兵制”，许多朝鲜族青年被征入日本军队，为他们充当炮灰。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制造民族差别，进行民族离间政策，但这一政策并未得逞。朝鲜族群众和中国人民一样，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肩并肩地战斗在鸭绿江畔和长白山的丛山密林之中，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文史委整理）

穷人身上的三把刀

日伪统治时期的人民大众身上有三把刀：税多、租重、利钱高。警察官吏的横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人间地狱里。伪警察、官吏，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对革命志士和广大劳动人民施用了种种酷刑。据查，日伪统治时期，仅在辑安这个偏僻山区县，就采用过 40 多种刑罚。如有：大卸八块、活埋、手指穿针、压杠子、支锅、蹲墙根、吊打、锨烙、火烧、过电、灌凉水、灌辣椒水、喂狼狗、零刀割、挖心等等。例如，极为惨无人道的“灌开水”这种酷刑，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用这种酷刑前，先把人仰面朝天地绑在长条凳子上，然后拿来一壶翻滚的开水，往嘴里倒，嘴若一闭即是满头满脸的一片燎泡，脸皮被揭了下来。之后，再用木棒将嘴撬开，往里灌开水，舌头、嗓子甚至内脏都被烫熟，人也就死了。其它酷刑的残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他们还利用各种毒辣手段，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那时在我县除普遍的地租剥削外，还有开荒倒楂、招人耪青、囤粮买窝、设赌抽红、高利盘剥、压榨长工等等。仅地租剥削这一项，又分“死租”、“活租”、“分租”。

例如：泉眼沟恶霸地主赵××的狗腿子林××，到佃户白风山家逼租。白风山将家里所有的粮食，全部拿出来交租也不够，又把来年用的种子也拿出来倒进斗里，斗还是不满，无奈百般哀求说：“我实在没有粮了，请你高抬贵手，等来年打了粮食，再给补上，”可是林××却不答应“那我管不着，我今天来是要租子的，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交租，少一粒也不行！”

此时 3 岁的孩子在炕上饿得直哭，要干粮吃，可是林××却说：“穷崽子，真是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风山十分气愤的说：“林先生难道你还要命吗？”而林××却说：“人命也要，拿来吧！”白风山被逼得实在无路走，一想孩子早晚也得饿死，一气之下，随手拿起菜刀，把正在要干粮吃的孩子的头砍了下来，扔进斗里。就这样，一个 3 岁的孩子，被地租盘剥而逼死了。这就是辑安的“人

头填斗”事件。

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农民，被重租盘剥致死的情况，何止白风山一家，他也只不过是千百万穷苦农民中的一个典型罢了。在殖民统治下的劳苦大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穷人身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钱高”。也就是说除像白风山被重租逼迫致死人命这样的事例外，高利贷盘剥而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例，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热闹村王凤石一家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王凤石 11 岁的时候，家里无一粒粮，无奈只得以“大加一”的利，向热闹街的刘××抬了两石粮，秋后就得还四石。可是偏巧又遇上灾荒年，打下的粮食，好歹把地租交足，可是还债的粮就一点也没有了。但是刘天天上门逼债，无奈把圈里的肥猪顶了两石粮被人赶走了。剩下的两石粮，刘限期十天交上。可是上哪弄粮啊，东跑西奔，已是借贷无门啦。就在过“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那天，刘打发其弟刘某带领两名警察到王家逼债，尽管王凤石的爹妈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最后将王凤石的父亲捆绑起来，拖到村头一个饭馆里，刘某与警察要上一桌酒菜，摆好后，将王凤石父亲吊到梁柁上，用鞭子抽打，打一阵喝一阵，王凤石爹被打得皮开肉绽，实在挺刑不过，最后答应将王凤石的妹妹（八岁）卖了还债。王凤石的爹由此病伤交加而卧床不起，不久便死去了。王凤石爹死后不久，刘又串通地主李老四，将王凤石的妈妈霸了去。就这样，王凤石一家被高利贷逼得死的死散的散卖的卖，弄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剩下王凤石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孤苦伶仃到处飘泊，沿街乞讨，吃尽了人间的苦难，一直到解放后，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原文为迟明发整理）

抽大烟扎麻啡等社会毒瘤滋生

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昏庸腐败，愚弄人民，坑害百姓，特别是种毒、贩毒、吸毒，是旧社会的一大毒瘤。辑安在清末建县后，统治阶级为了搜刮民财，不顾国民身心健康，公开贩卖大烟（鸦片）。到了伪满时期更为严重，小日本为使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不择手段地搞鸦片买卖，千方百计让中国人吸毒。伪满县公署就专门设立了烟务股，后改为保健股，下辖好多个官烟所，这些机构都是公开贩卖鸦片的地方，他们为吸毒人发放吸烟证，定期定量配给大烟炮。伪满我曾在县公署烟务股干了一年多。那时烟务股有 10 多人，我在烟务股里当会计。我记得当时辑安县公署烟务股，下辖 12 个官烟所，其中有三道沟、良民、黄柏甸子、榆树林子、大路、东岗、台上、头道、青沟、财源、城里东门西门各一个。每个官烟所共设四个人，其中一名主任，一名会计，两个看灯的。每个官烟所都有几百人通帐的（就是有公开烟证的），不通帐的就更多了。我记得那时有上千名大烟鬼，不但老的抽，连小孩也有抽的。钱越抽越少了，人越抽越瘦，到头来钱光、人死一场空。

抽大烟成瘾后，一天离了大烟就象活不成的样子，不仅什么活都不能干，身上哪都难受，受不了啦就砸门砸东西，有时瘾得满地打滚乱叫。如果抽上大烟，就什么病也没有了，活也能干点了。所以人是越抽越有瘾。肖洪雁就是个例子。他原是丹东大表店的大手艺人，30 年代于奎升用飞机把他从丹东接到辑安，来辑后就给于奎升开了个大修表店，买卖越做越兴旺，名气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多。有的请吃有的请吸大烟，吸了大烟后，心情更兴奋，腿脚也轻快。这样一来二去就抽上瘾了，后来他老婆夏淑兰也跟着抽上瘾了，（当时他俩仅 20 多岁）上瘾后，就天天离不开大烟了。他们没有公烟炮，完全是买私人的，比公家配给的贵好几倍，那时钱不好挣，他两口子一天买烟炮就得花两元钱左右（那时一天只能挣六、七角钱），就这样几年工夫，弄得家穷了，人垮了，肖洪雁 35 岁就抽死了。多亏共产党来了，肃清了种毒、贩毒、吸毒，他老伴真正

忌了大烟，身体很快好转，一直活到今日（74岁）身板还很硬实。

说起来小日本真鬼头，他们为了掩盖其贩毒的罪恶用心，建立了一个“康生院”。名义是专管戒烟的，实质却是让我们中国人吸毒，实现他们让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的罪恶目的。他们一方面公开搞大烟馆，发大烟炮，另一方面搞“康生院”，这不纯属于折腾人吗？再说他们还规定进“康生院”都得先交100多元钱，谁能进得起呀，就是进去了挨顿折腾，回来就是半死不活的，根本忌不了。

那时小日本和二鬼子还编了劝烟歌：

人生在世几何年，
及时行乐莫惜钱。
行乐之事样样有，
万般不如鸦片烟，
抽足大烟精神爽，
浑身上下都舒坦。
有病不用进药铺，
大烟治病赛仙丹。

正派人还是看清了抽大烟的危害编出忌烟歌：

大烟坑人又费钱，
犯瘾实在难：
腰痛腿又酸，
打阿嚏、泪连连，
美味不香甜。
晴天还好过，
就怕阴雨天。
妻子良言劝，
他还不耐烦，
亲友不靠前，
吸得缺吃又少穿……

还有些词我说不清了，说的都很实在，可是当时谁也没忌了，还是解放后共产党来，人民政府严禁种植大烟和吸大烟，从此，抽大烟、扎吗啡的社会“毒瘤”才被挖掉。

（原文为王殿令口述　荣其芳整理）

伪满时期辑安的瘟疫

现在我把父亲讲给我的瘟人实例说给大家听听。

1936 年辑安县第七区青沟子街，发生严重的传染病：斑疹伤寒、回归热。八区头道崴子、五区台上、六区财源子等都有大面积的瘟人发生，并波及到大牲畜。

青沟子街这场瘟病主要是瘟人、瘟大牲畜。起先，死了人，街房四邻还能凑到一块帮助做棺材，按旧的风俗习惯发丧出殡。后来人越死越多就什么也顾不上啦！做棺材也不跟趟！住家用的红色米柜，将隔板打开后往里装死尸；农家抠的住家用牲口槽子，也用来装死尸；最后，有的连炕上铺的席子，家里用的草包片子，高粱秸帘子都拿来卷死尸。抬杠子的人也不多啦，村公所的人、当地的牌长、伪警察到处抓病轻的抬病死的。有的抬到半路上，抬杠子的竟因病倒地而死，赵连生的父亲就是这样死去的。

日本从通化省派来的防疫队，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脸嘴堵着白口罩，到病严重的住户家宣布隔离处理，跟随着的警察就叫牌长钉门、贴封条、房子外面撒些生石灰、喷些刺鼻子的药水就离开。栾君盛家死得只剩他自己了还被隔离起来，邻居孤身老汉张石匠心甚不忍，夜间从隔离屋将他偷着抱到家里教养长大，后收为徒弟，以后又赶上出天花造成一脸麻子。我们家也不例外，我父亲当时还是未婚青年，这场瘟病后造成终身体弱多病，34 岁就死去了。我大奶、二爷、三奶、五爷、五奶、大娘，由于有老病、体弱，抵抗力弱也先后死去。原来 60 多口人的大家庭，这场瘟病后只剩 20 多口人了。

造成“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主要原因是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清野归屯、并村（老百姓叫归围子）。时间是 1934 年至 1935 年。先是秋天归小屯，房子盖不上就挖地窨子住，由于阴暗潮湿，克山病、风湿病症都有发生，后又强迫归大围子（归大屯）。今县内的村镇大居民点就是当年归大屯遗留下来的产物。老爷岭后的苇沙河、新开河的中上游流域，无霜期短，冷得早，暖得晚，加之这里山大林

多，潮气大，阴冷，8 月末 9 月初就见雪，水也硬。老百姓被强迫住在地窨子或简易房子内，潮湿阴暗，不光发生流行病，很多人还终身患上关节炎症。为什么归屯？据老人讲当时伪警察和村里头面人物说归屯子的目的就是把杨靖宇的抗联部队和高丽独立团及王凤阁的部队与老百姓隔开，企图把他们饿死、冻死在山上。如果谁不进围子住就是通匪。他们先把人逼到指定地点住，老百姓前面走他们后面就点火烧房子，断其后路。到围子里，都是互相帮助盖的简易房子过冬。屋内只有几铺泥火炕，上面无棚，窗户是木棍支撑着糊上纸，棉被少，棉衣也单薄，卫生条件就更提不了，由于有人生虱子，虱子传播病菌，所以发生窝子病（即瘟病）。日本鬼子统治时期老百姓遭的大难数也数不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当亡国奴的滋味啊！

（原文为宋翔霖整理）

伪满协和会

满洲帝国协和会，是与伪满洲国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团体。它是与伪满各级政府（公署或公所）并立的机构。在协和会《章程》中，把协和会当成与伪满政府是“表里一体”的组织，其共同的“精神母体”即“建国精神”。而“建国精神”，则被解为“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圣意”为宗旨。所以它既是日本侵略者奴役与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也是向中国人民群众灌输“建国精神”的反动政治活动中心。

协和会采取要挟、小恩小惠等手段愚弄民众入会。他们宣传说，在那战乱年代，谁家门上挂个协和会会员的牌子，日本兵就不进去搜查。谁戴个协和会会员的胸章，到了卡子（岗哨）给日本兵行个礼，日本兵就可让他过去。有人被守备队抓去，托托协和会，说这人是会员的亲戚也能放出来。对贫困会员还给贷款或无偿地发给些粮食布匹和日用品等。再加上他们到处开会宣传，就地发放会员证、胸章、门牌，因此有些人便入了会，农村的会员比城里的多。一时间凡是什么县长、区长、村长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胸挂协和会会

员章。逐渐挂章的人多了，也就不值钱了，一般会员也就失掉了当初许诺的保障。同时也暴露了协和会是个情报机关。如抽勤劳奉仕、训练青年等等，都由协和会出面办理。有的地方协和会设立了武装，叫行动队。也设立公堂，抓人审讯，压迫民众。其真相暴露，威信也就扫地。虽然老百姓不信协和会了，但是官场里还有人头戴协和帽，身穿协和服，在典礼日子颈佩协和带；并且成为文官的制服了！

满洲帝国协和会辑安县本部在康德三年（1936 年）11 月成立，地址在今市幼儿园处。县长兼任本部长（会长），第一任会长是县长汪毓昌兼，副县长兼任本部的副部长（副会长）。副县长是日本人，名叫西岛宽。此外，还设有专职的日本人事务长（理事长），以及常务委员（理事）若干名，评议员若干名。并在各区（村）设立协和会分会，设置分会长及委员、评议员若干人。

协和会的会长（本部长）是个牌位，说了不算，实权由理事中的日本人掌握。总的来说协和会是以政治、经济的谋划事宜为主，并有权拟定与提出措施和办法的团体。其内部组织机构有情报、经济、战备、宣传等组。其本部的人事，业务、财务等方面都由上级协和会本部统一安排和领导，不受地方政府干预。

协和会负责掌管抽“勤劳奉仕队”。凡是 18～23 岁的男性青年，检查不上“国兵”的，统统得去勤劳奉仕。什么叫勤劳奉仕呢？奉仕是日本语，意思是服务、效力，联在一起就是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意思。是一种变相抓劳工、奴役人民的办法。这种制度于伪满康德二年（1935 年）开始实行，劳役的军事性质日益浓厚，而且服役对象，遍及城镇到广大农村，时间也越来越长。辑安县抽的勤劳奉仕队，去间岛省（今延边地区）服役，去上套修建云峰发电站，去岭后的矿山村、青沟子采云母矿、石棉矿、大票子矿等等，多由日本人掌管施工。勤劳奉仕队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一个青年“集中营”，或者说是“苦役队”。队员们常挨打受骂，当牛做马，连苞米面、橡子面都吃不饱，还得干重活。

伪康德四年（1937 年）1 月 18 日，伪满洲国公布了《青年训练规定》，协和会县本部，根据这一规定，成立了“青年训练所”，在协和会县本部的直接领导下，对全县青年进行训练。这项工作由高魁举、王庆基、雷雨峰负责。训练的对象，主要是 18 岁以上的

青年和“国兵”检查不合格而身体又不残的青年人。除对他们进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和街村、保甲制度以及课税等方面的训练。

伪康德五年（1938 年）6 月 15 日，协和会发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从此，伪满洲国的青少年全部统一在“协和青年团”和“协和少年团”之中，并置于协和会的直接控制之下，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青少年团对广大青少年进行训练和奴化。

在伪满洲国倒台的同时（1945 年 8 月 15 日，康德十二年），协和会也随之垮台了。

（原文为杜宇整理）

伪满辑安道德会

道德会是伪康德二年（1935 年）成立的。成立时动员了一些有钱的商人、财主募金办的。有王少颂、焦湘亭、李良斋等。地址在南门（襟江门）里西侧的 100 米处，靠近城墙。城墙北侧有一个大院，大院内有前后两幢房屋，前面一幢是 11 间（靠马路）砖瓦结构的房舍。中间一间是一个门洞，直通院内。这幢房屋共设 3 个教室，每个教室是 3 间。有一间做为教员办公室，后一幢房屋共 3 间，是宿舍、厨房。

道德会的会长是焦湘亭，他是大商人，在城内开设了商号“福盛裕”杂货铺、药房兼油坊。副会长是李汝生。文化课专职教师周云峰，主讲语文、算术两科。

刚开办时，属于义务学校，不收学费。照顾念不起书的穷人，不管男女老幼，只要自愿来上学，都收为学员。当时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参加学习。以后逐步发展，像正规学校一样，学员毕业考试，成绩合格，也发给证书。

除了开设文化课以外，还专门开设了一个班，在每天晚间和星期天，开课讲道。听道对象，有官府里的人员，有商店里的财东和掌柜的，还有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可自愿参加听道。

传道师都是从外地聘请，没有报酬。传道师各处流动讲道。那时辑安的传道师，都从安东（现丹东市）和通化等地聘请。省里设总会，县设道德会分会。分会聘请传道师，总会都给大力支持。每次传道的时间不定，或讲半年，或讲两个月、三个月。传道师讲完就走。

据说伪康德二年（1935 年）夏天，来了一个传道师，人们都叫他刘善人（其名不详），此人 60 多岁，花白的胡须。县长刘天成亲自去东门外迎接。刘善人和县长一起吃住。刘善人来道德会讲道时，县长陪坐。刘善人在辑安城内住了一周，讲完道就离去了。

讲道时内容，主要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讲烈女、孝女，讲“仁义道德”，“团结友爱”，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做好事，莫问前程”，邻里和睦，不打仗，不骂人，互相忍让。强调人与人之间“你打骂我，我要笑哈哈”。讲“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人分金命、木命、水命、火命、土命；讲什么土命人性情忠厚、温和，而火命人性格暴躁，如何克服暴躁的性格等等。讲道先生有教材，全是线装书。书中文字是铅印字体。

道德会在“九、三”东北光复后，无人管理，就自动解散了。

（原文为李延春、秦秀娟口述 高飞 整理）

伪满时期的辑安教育

伪满时期的教育，主要分六个方面。

（1）教育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情况

据满洲帝国教育会于康德四年（1937 年）公布的《新制定之学制》称，满洲国的教育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民为教育之方针。”从这一教育方针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中国，在教育上推行一

整套殖民教育，以培养尊天皇、有奴化思想的人。为了强化这一殖民教育，伪民生部的训令强调："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表达得更为露骨。

奴化教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1 年"九·一八"事变～1937 年）初期，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及教材，不准挂中国地图。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新教材。新教材出版前暂用"四书"、"孝经"讲课。1935 年，伪满出版新教材 22 种 39 类。日语被列为大、中、小学的主课，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被摧残殆尽。

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学校后，立即加强奴化教育，要求学生必须"虔心诚意"地祟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都必须赞颂"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学生每天早礼都必须向皇宫遥拜，用日语和汉语背诵天皇诏书《国民训》。

第二阶段（1937 年～1945 年），1937 年（康德四年）建立新学制。新学制规定：初等教育方面，将从前的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学校，高级小学校改为国民优级学校，高级、初级共 6 年，初小 4 年，高小 2 年。中等教育方面，将全日制中学由 6 年改为 4 年，男女分校，校名职业学校，修业年限分为二年制或三年制不等。举办师道学校，临时初等教育教师养成所及男女师道大学，初等教育教师养成所，修业年限为 2 年或 1 年。师道大学修业年限，预科为 1 年，本科 3 年。高等教育方面，除师道大学外，分普通大学和特种教育设施两种，修业年限 3 年到 5 年。

新学制重视殖民主义的奴役式的职业教育，美其名曰"重视实业教育"。新学制废除了初高中六年制，改为分科的四年制，就是为了架空中等教育，阻止中国学生系统地学习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知识，阻止将来能具备管理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

在教学上，日本侵略者采用实用主义政策，男子中学每学年劳动 20 天，女子中学每学年劳动 15 天，称为"勤劳奉仕"。农科国民高等学校学生，除政治和日语外，则大部分时间从事田间劳动。

1942 年，伪满政府把学生劳动制度化，用法令形式公布。

为贯彻其教育方针，伪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县设教

育股，各校设校长，加强法西斯统治。

大同二年（1933 年）伪县政府成立教育局，都本德任局长，张永昌任视学。同年七月改组为教育股，仍委任都本德任股长。下面开办的师范、初中、小学等，凡 18 所县立学校以及 20 所区立小学皆委任了校长，副校长由日本人担任，实际上是日本人统揽学校大权。再加上收买、豢养了一批汉奸、特务，严密监视有无“反满抗日”活动。

伪满运用封建意识辅助奴化教育。1932 年把一年两次祭孔（阴历二月上丁日为“春丁祀孔”，八月上丁日为“秋丁祀孔”）作为国家法令祭日。同时表彰“孝子”、“节妇”，说是“王道之源”，“国民道德之根基”，“国家的代表”，“建国精神在发扬”。大同二年（1933 年）3 月 1 日，皇帝颁诏奖掖孝子、节妇。

（2）中等教育情况

“九·一八”事变以后，战事稍定，日伪强迫各地中学校相继复学。据 1935 年统计，我县设师范讲习一校、初级中学一校，农科各业学校一校。委任尹传家为师范讲习学校校长、辑安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辑安县立职业学校校长（当时 3 个校实为一个校、在县城内会泉街路北，校舍共 20 间，校田地 4 484 平方米，操场 6 760 平方米，实习土地 12 亩）下聘 12 名教职员，1 名事务员，招收学生，师范 2 个班，初中 6 个班，职业校 1 个班，计 7 个班 112 名学生。

伪满的中等教育，学制较短、男女分校，突出实业教育。课程改设国民道德（亦称“建国精神”）、国语、实业、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体育、音乐等。女子学校增设家事、缝纫及手工艺等科。

据康德四年（1937 年）10 月 10 日伪民生部颁布的第 16 号令《国民高等学校规程》第二章“科目及其程度”规定：国民道德科应根据建国之本旨授与道德之意义，并课授礼法，自有关修养人格之事项，进及齐家之道及对社会之责，务更使涵养为国奉公之念，及关于民族协和和日满一德一心之坚固不拔之信念。

“国语”以使了解普通之语言、文章学得正确自由表现其思想，并端正书写文字的能力，且培养文学上之趣味，启发智慧以资振兴

国民精神。

我县开设的是汉语的“国语”科。实践一年级讲读作文、习字方法，10 年加孟子选读。伪满的国语科，以使讲读现代文为主进及平易之古文，使作适宜实用之文章，并应课心方法之概要及习字。

我县国民高等学校的实业科是选的农业科、开设农作物、园艺、土壤、肥料、土地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畜产兽医等专业课，1933年～1941 年间，该校一度改为农林学校，加开育苗、造林、森林保护、森林数学等林业专业课。

历史科以使之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理解社会之变迁及文化发展之过程，尤应阐明建国之本义及日满两国之关系，鼓舞爱国心养成其为中良国民之信念为要旨。伪满中学的历史科，并不系统地教授历史知识，只讲“建国前史之概要、建国之由来及自建国迄现今之史实及日本历史并与我国及日本有重要关系之外国史之概要。”伪满洲国采用的历史课本，是本国史和世界史混编的。

地理科教授本国及日本之自然状态、政治、经济、产业、交通之状态及其关系并讲外国地理概要、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概要。

数学开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使之学得关于数量之知识，熟悉计算之能力，且能应用如意并使思考精确为要旨。

理科以授关于天然物及自然现象之知识，使之理解其对于人生之关系及其应用，并养成观察构思及创造能力为要旨。开设植物、动物、矿物常识、物理、化学等学科。

图画以使之精密观察形体及色彩，学得正确自由绘画的能力，陶冶构思、创造之能力，培养美感以资涵养德性为要旨。开设以写生为主，图案与几何画为辅的铅笔、钢笔、水彩、油画等科目的图画课。

体育以使身体各部得遂生理的发育增进健康，且动作机敏而养成活泼刚毅坚韧持久之精神及守规律、尚协同、重责任之习惯为要旨。课程内容是体操、器械、竞技、童子军事训练，并讲《生理卫生》。

音乐课以使能唱歌曲心情高洁，资涵养德性为要旨，教授唱歌和乐理。

日语课训练学生正音、会话、翻译作文能力。

辑安县的中等学校，除前述开学的 3 个外，1935 年 1 月，由辑安县教育支会创办一年辑安县日语学校，校址附在师范学校院内，日语学校有一名教员，一个班，50 名学生，每年经费 100 元。辑安县初级中学曾改为农林学校，1941 年又改为国民高等学校。辑安县立职业学校系民国时的蚕桑科改为农业科而成。

师范讲习科的全年经费为伪国币 5 184 元，初级中学的全年经费为 5 284 元，初级中学的全年经费为 5 288 元，职业校全年经费为 1 637 元。该款皆按月由县公署教育经费拨支。

（3）初等教育

伪满的初等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称为国民学校，四年制；高级阶段称为国民优级学校，二年制。

国民学校在总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强调体会忠孝之大义、民族协和之美风，“促其为国家社会效劳之观念，”养成勤劳精神。

在传授知识方面，强调日常生活之必需，强调切合专访之实情，强调顺应学生心身发达的程度，强调各学科配合协调，考虑男女有别、个人特性，地方事情，一句话，注意联系实际，因材施教。

国民开设国民科、算术、作业、图画、体育、音乐等课程。

国民科授与国民道德基础，国语、国史、地理、自然初步知识。也就是说，是把政治、国语、史、地等知识合一讲授。其国民道德教学指导思想，除贯彻日满一体，强调孝悌、礼仪、亲睦、勤俭、诚实，义务等品德的培养，对女子，努力培养善良贞淑之美德、巩固齐家之志念。

国语讲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普通语言文字及文章，养成正确发表思想的能力。国史讲满州及日本国史实大要，了解建国的由来，“忠良贤哲”的事迹；地理科使学生知道满洲地势、气候、区划、都会、特产、交通等知识，关于日本国及邻接各国国势之简单知识以养成爱国心。

自然讲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现象，以学生目击的事项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之事项为主，知其名称、形状、效用及发育之大要，理解相互关系及对人生的价值，养成亲近自然利用自然的习惯。

算术以使熟悉日常之计算与生活上必须的数量知识，培养思考精确的能力。强调开珠算课，注意简易和循序渐进。

作业讲学习日常生活中必须的作业知识，养成勤劳习惯。授课内容初为简易手工，渐为园艺初步，器具制作及修理等。然后结合地方特点讲些农商知识。对女生讲解家事、裁缝。

图画以使学生学得观察形体，色彩及描写能力，启发美感涵养德性。

体育以使身体得遂生理的发育，保护增进身体健康，使之精神活泼、刚毅有涵养，守规则、尚协同的习惯。学习内容有教练、体操、游戏、竞技。

音乐使学生能唱平易歌曲，启发美感、涵养德性。

国民优级学校开设课程只有“实务”一科替换了“作业”一科，其余相同。只是教材内容深广，要求严格一些。

伪满的初等教育，教学方法是传统的注入式，允许体罚学生。

据大同二年（1933 年）统计，辑安县县立小学数为：完全小学男校 4 所，女校 1 所，共 5 所；初级小学男 19 所，女 6 所，共 25 所，班级数为 55 个，学生数总计 1 777 人。教师数为 75 人。

另据康德二年 5 月调查统计，辑安县区立小学数为 51 所学校，44 个班级，45 名教员，1 444 名学生。

国民学校各学年每周授课时数为：第一学年 24 节，第二学年 26 节，第三学年 28 节；第四学年 30 节。国民优级学校每学年每周均为 33 节。

国民学校春季始业，1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为第一学期；7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为第二学期。学期中祭孔日（春祭：阴历十月上丁日；秋祭：阴历八月上丁日）。放假，元旦放 3 天，春节放 5 天，执政万寿（正月十三日）放 1 天；元宵节放 1 天；建国纪念日（阴历三月一日）放 1 天；端午、中秋节各放 1 天；祀关岳秋祭（阴历八月秋分后第一个戍日）放 1 天；孔诞（阴历八月二十七日）放 1 天；寒假 60 天，暑假 30 天；另外春播、秋收各放两周农忙假。

（4）幼儿教育情况

伪满时期，辑安县县城曾设幼稚园一所，两个教员，两个班，招收满 6 周岁以及不足 6 周岁幼儿，大同二年共招收 64 名幼儿，康德四年共招收 66 名儿童入园。

（5）教育经费

伪满时期的辑安县教育经费由县地方财政支出，也收学杂费，初中学生每人每年 12 元，职业学校每生每年 6 元，小学高年级（四、五、六年级）每年 2 元，初小 1 元。

伪满教育经费主要是维系教师的工资。其他如基建，公务费等等寥寥无几。一些学校不得不借住庙宇。

民国十七年全县教育经费：奉天大洋 156 000 元。伪满大同元年全县教育经费是 52 304 元。其数目不足民国经费的三分之一，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对辑安教育事业的摧残。

（6）教员

伪满时期，校长由伪县政府教育股委任，教员则由校长委任，副校长一般由日本人担任。

伪满时期的教师职称分 3 级：教谕、教导和教辅，以教谕为最高。

据康德四年（1937 年）统计，全县有中学教员 7 名，女子师范讲习所 2 名，中等教育师范讲习所 2 名，计 11 名。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中学校长兼女子实务中学校长孟广居，日本教员森直行，朝鲜教员朴炳赫，中学教员还有智树三、生玉祥、徐振中、张金兰；女子实务中学教员张佩明、丛秀滋、郭殿甲、王玉琴。

康德四年（1937 年）全县有小学教员 120 名。

康德七年（1940 年）统计，全县有小学教员 199 人。其中有教谕 85 人，教导 58 人，教辅 56 人。其中女教师 82 人，教谕 17 人，教导 13 人，教辅 52 人。

中学教员的薪金，校长孟广居月薪 55 元，日本教员森直行 130 元，教员朴炳赫、智树三、生玉祥、张佩明、丛秀滋 50 元，徐振中、张金兰、郭殿甲 45 元，王玉琴 43 元。

小学教员工资分为 18 级，一级 150 元，2～8 级，各级递减 10 元，9～18 级，各级递减 5 元，我县小学教员工资属 17、18 两级，即 35 元、30 元，还有低于正式老师级别，最低 24 元。平均 26 元。

据伪满洲国政府规定，我县享受一级地区的冬季津贴，即相当俸给 1 成的金额。

（原文为卞明义整理）

我所亲历伪满辑安国高的奴化教育

伪满时期，通化省立辑安国民高等学校，是辑安县最高学府。伪满辑高前身是辑安农业学校，二年制，两个班级，校址在原城镇实验小学前楼。1940 年新建了两个班级的校舍，1941 年又扩建了两个班级的校舍，改农校两年制为四年制的伪辑高，我是由高小二年毕业报考被录取，1942 年春入学是辑安国高首届生。下面以我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来说说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真相。

（1）教师素质低下

第一任校长姓王，大个，50 多岁，一头银发，头戴协和帽，身穿协和服，是个大烟客。大约 1942 年被日本人挤走，不知去向。

第二任校长姓蒋，近 60 岁，大个，身材魁武，学识渊博。他反对学生劳动过多，想给学生多上点课，又左右不了大局。自己上书一封请调信就调走了。1945 年后就没有校长了。

佐佐木武夫，他有 1.6 米左右的个，矮粗胖，腋下有股浓狐臭味，是日本鹿儿岛农业大学毕业。性格暴躁，好找毛病打人。是辑安国高实际主事人。

张佩明是三等教谕，是旧中国沈阳五年制师范毕业高才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佐佐木训话他给当翻译，学生说他拍佐佐木的马屁。实际委曲了他。张老师授课，教学有方，备课充分。有一次讲国文，题目是“荒芜的花园”，内容说因修建者意见不一，只研究了方案，花园仍在继续荒芜。张佩明老师启示小学生说：“荒芜的花园如同旧中国”，看来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杨孝跃是教员，是奉天农学院附属农学讲习班一年毕业生。主讲农业、蔬菜、还讲过历史。那时的“本国”史内容为肃慎、挹娄、女真、渤海、辽、金等，而主要的中国历史则被列入世界史范畴，日本史则又是一门单独的课程，这种安排，就是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是很恶毒的奴化教育。他讲课一般，照本宣科，读完了，很少再做什么辅导。他知识浅，不敢深入为学生解疑。1945 年调走了换来一名姓邢的，大个，40 多岁，指导学生种一手好西瓜。

张泽芳是伪满吉林师范学院体育系三年毕业生，主教体育，讲体育卫生课，他从学生中选拔头排个为篮球队员。进行篮球训练，因战事被迫中断放弃了。

军事教官姓邓，上士军衔，组织学生搞军事拉练，在梨树园搞野营训练。1944 年佐佐木嫌邓教官雨天在教室里喊“立正”声大了，吵起来：佐佐木说我是天皇派来的！邓教官说我是皇帝派来的！佐佐木以主子口气说：天皇是父亲，皇帝是儿子。有一次他两手做出打太平鼓势，口里哼哼唱道：“荞麦开花一片白，芝麻开花节节高”，给学生的感觉他是个满军兵痞，有时他还能咏出“抗联”的词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学生又感到他有抗日意思，后来佐佐木竟把邓教官逼走了。1944 年又来一位退伍兵叫徐忠义。他教一、二年级列队、走走正步，走走队形，没讲什么军事课。

日本教辅卫守，在日本鹿儿岛农业学校二年毕业，不懂中国话，课文是中文，上课就叫学生读课文，他装腔作势，在桌间来回巡视。挑皮的学生，将“以滚镇之”，读成“以滚‘朝’之”，逗得全室同学大笑，他也跟着傻笑。他好色，偷报纸刊物卖钱逛妓院，后调长白县中学病死，骨灰被佐佐木运回，埋在梨树园后山坡。

海本是农校二年毕业留校生，朝鲜族人，家在楚山，日本名叫海本，充任助教。是比他主子日本鬼子还凶的二鬼子，好找事打学生。

张泽亮是总务会计，张泽芳胞弟。他揭发了卫守偷报纸书刊卖钱逛妓院的丑事，佐佐木找他茬，摔张泽亮的柔道，被张几拳打倒在地。佐佐木急眼了，说张反满抗日，要送张去宪兵队，张泽芳看事不妙，急上前将胞弟张泽亮，左右开弓打了几个嘴巴子，并向佐佐木行了九十度大礼，道歉，佐佐木气紫的脸才缓和下来，张氏兄弟才免遭大祸。

佐佐木老婆，也被佐佐木安插进辑安最高学府教音乐，她技艺不高，按风琴也不会打拍节。

（2）最高学府竟是农家大院

辑安最高学府连个化学、物理、地理、课都未曾讲过，代数只讲过一元二次和二元一次方程，几何只讲到平面几何，通过劳动训养奴才，竟成了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主要手段。教学仪器既没有显微

镜，也没有试验仪器，而是一些劳动工具，还有牛、羊、猪、鸡、兔、犬、以及蜜蜂、柞蚕。没有生物实验室，只有城北的 80 亩旱田，城南的 40 亩水田，和禹山两道大沟几百亩山场。山腰柞林茂密的柞蚕场，荒山幽谷是经学生栽植了黄花松、黑松、赤松的林场。山麓原有梨园，新发展的苹果园，校舍周边有苗圃、温床区、菜田、花坛，牛羊猪鸡舍，和饲料调剂室，农具仓库等，这么大的劳动场地，就靠 200 名左右，十几岁的小苦力，洒血流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所获的成果，都由辑安的侵略者日系官吏们分享了。每逢季节蔬菜上市的时候，均由“当番”（值班）学生分别摘采：西红柿、黄瓜、茄子、青椒、甜瓜、西瓜、以及鸡蛋、羊奶等用手推车推到城里，挨门挨户为日籍人送到家。先用手敲 3 下门用日语说声借光，待主妇开门露面时还要说午间好，然后才能把她所需的蔬菜双手送上，最后行六十度的礼，再说一声再见。学生仇视日本人，就采取了“暗抗”手段：每天值班生扫地擦地板时，都把时间拖天黑了，才报告值班老师来检查验收。等这位老师离开校门，这些扫地者，全涌进了西红柿地里专摘红的，连吃带拿，饭盒衣兜满载而归。柞蚕值班生我的组长王克文，他起早先到香瓜地里摘了甜瓜，用蚕筐带到蚕场里吃，趁蚕场上空有雾掩盖，点火烧蚕吃。畜牧值班生在饲料锅里煮鸡蛋吃。

（3）奴化青年的主要手段

在伪辑高读书还不如说是苦力。冬季大雪盖地，全校 4 个班的学生虽能全日上课，但牲畜要吃草，家禽要吃食，山场要人看，夏季水田要看水，放蚕要看蚕，这都要学生轮流值班。山场值班两个人整日不上课，牵着“比士”狗，沿着山场防火线巡视，防火、防盗。畜牧值班要干一个礼拜才换班。一、二、三、四年学生混编，由四年级生当组长，三年生当副组长，一组 7～8 人，每天喂食 3 次，包括推磨饲料，清除猪、鸡、兔舍粪便以及防疫消毒。这些活干完了才能回教室上课，就是放假了，远途学生走了，近途生照样轮流“值班”。有一次我在猪舍里打了几只麻雀，放在饲料桶里，被助教海本发现，打了我几个耳光。学校打骂学生是家常便饭。

大忙季节实行半日制，即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有时农活急需，变半日学习为整天劳动。全校 200 名左右学生，以城里宿舍为中心，

居东者为东部班，居西部者为西部班，寄宿生为宿舍班。每个班再分成几个组，每组五、六个人或八、九人。每逢劳动前，3 个班都要站队，听杨孝跃老师分配劳动任务和作技术要求，学生就整地、耙地、播种、追肥，什么活都干。1942 年春季伪辑高学生在后山亲手栽的落叶松，即现在烈士塔后山的落叶松林，已是 60 多年树令的大树了。学生们在劳动中，有的在太阳下晕倒，有的在山上植树被滚石打伤了腿脚，在阳岔烧炭过冰桥有的掉下了水，有的捞窑杆手脚被擦伤，鞋子衣服被拽破，有的生病也被迫出勤劳动，这种亡国奴劳动的滋味和受压迫的童工是一样的。

（4）出卖学生劳动满足私欲

1942 年～1945 年这 4 年日本人号称“大东亚圣战”步步吃紧，为了增加学校收入，每逢春天植树季节都出卖学生劳动给“营林署”造林。1942、1943 这两年竟把全校整个人马近百人拉去阳岔造林。当时我正是一、二年级学生，连续两年我都带自己的小行李，一把镐头，去阳岔村住在张庆余家。每天扛着小镐头，带上饭盒，直奔大赵家沟，拿足两人一天栽 300 株的任务数，直奔造林地。途经几里爬山路，步步高，越登山越高，阴坡沟底里的冰还没化，沟底吹上来的冷风，使人混身发寒。一组两人，：一人刨坑，一个栽，从山底往山上栽。有次下大雨，好多好多人聚在一间小窝棚里。听张佩明老师给学生讲乾隆爷下江南私访的故事。天晴了继续再干，天晌了栽到那就在那吃自带的盒饭。说是午休一个钟头。学生一般都牺牲了休息，去完成 300 株任务。据学校老师说每栽活一株，营林署付学校一分钱。学校就收入 6 000 圆。这些是学生血汗换来的钱。学校买了一批一批羊毛毡做成棉靴子，分赠给在辑安的侵略者日系官吏和学校的教职工了。

（5）战事学制大搞勤劳奉仕

1945 年，四年级学生分了好多组，分别去黄柏、榆林、头道、花甸等区为伪满兴农合作社调查种植蓖麻、线麻面积，当时说用“蓖麻油、线麻油”支援“圣战”。花甸组由张泽芳老师带队，我被编在这组里，自己带着小行李，住在花甸街的一个大院空房里，雇炊事员，单独立灶。我仅呆了一个礼拜就患了疟疾病。在当地朝鲜族私人诊所，大夫给我吃好药“金鸡纳霜”，吃了几天不好，张泽芳

老师就派朝鲜族同学李熙哲，日本名叫木村，从花甸徒步走，他背我趟过8次河，走了两天才回到家。

1945年8月是我们伪辑高四年级学生勤劳奉仕，做酒石酸的第二个年头。大家被分配去了榆林、黄柏、阳岔、花甸、台上、清河、热闹等地，为伪满兴农合作社制酒石酸。用它再深加工制成“酒石酸”，为日本海军中和海水食用。这次我被分配在阳岔组。用的是铁底大木槽锅，其下砌成台灶。内装10多担水，烧木柴煮葡萄蔓叶，烧开后将蔓叶捞出，再加兑一定比例的水。经过一夜冷却、深沉，第二天早晨将浮水抽干，垫布用硝灰起干，最后将其起出晒干，就制成酒石酸了。1945年“八·一五”光复当时，我们在阳岔村点，已制成了5大缸酒石酸了。

做酒石酸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农民负担也重。黄柏区每个农户按劳动力，都分配了几十斤数量的任务。两年的破坏性采收，竟把阳岔、大青沟、大荒沟、六叶、上下双安一带乃至全县，将所有山场的葡萄蔓全部掠光。天天见妇女儿童背、扛、拉来交葡萄蔓叶。付点钱有限。他们磨破了鞋，拽坏了衣服，叫苦连天，殖民地人民，只能忍气吞生过着亡国奴的日子。另外，战事还向学校征要兔毛。学校曾组织全校学生到后山林场打野兔两只、山猫一只。兔皮上缴支援“圣战”。

（6）亡国奴烧炭日本人取暖

1944年秋，树落叶之后，学校要去阳岔烧炭。先派了我们6～7人先到了阳岔，住在铁路工区大板房里，顿顿烀吃学校给带的大芋头，晚间点小油灯，整天往河南跑，在西向山坡上挖窑坑。几天之后大部队四年级全班40多人带着小行李、牙具都来了，由张佩明老师总指挥，整天上大山顶砍窑杆木。午前一趟，午后一趟。每人每次捞下山一、两根柞木，用锯截成1.2米长的窑杆。窑杆截够了，就开始装窑，将窑装满后，再上窑顶木，并把它平得像龟盖一样，最后一道工序，复黄泥捶盖，边复黄泥边夯实，夯实后就开始点火，烟薰窑杆木使其逐渐炭化，约半天后，就灭火了。经六、七天冷却，开窑出炭。我进去出炭，还是感觉烫热，干一会满身是汗，出了7个草包，约有六、七百斤炭。木炭都被佐佐木送给那些日本高官殖民者取暖了。

（7）为日籍高官当剑道陪练

1942 年从一年级中挑选了姜德华、王可宁、张泽源、吕懋尝、兰孝训、罗振荣、松本勇一、江源英雄、王勇士、王兴云、王明栋、张生有等 10 多名学生，由助教海本带领，每星期一、三、五放学后，去剑道场（伪满在县公署大门东，专门修建的剑道场房，即光复后的司法局）学剑道。实际是给日本高官当陪练。当时主要有副县长井东信夫，地政科长日丸，警务科长田中等人练。练剑道必须两人对练，找我们当陪练，主要是显示日本的侵略文化。练时只穿衬衣，光着脚，在地板上打练，练得满身大汗，有时连蹦带跳，跑得精疲力尽。

（8）打手板体罚学生

1942 年我入伪辑高头一年冬考后的一天，凡各学科考试不合格的都要打手板，打几板有别：佐佐木日语每手打 5 下、张佩明代数每手打 10 下，杨孝跃农学每手打 5 下、佐佐木老婆的音乐课，每手也打 5 下。全班 42 个同学都挨打了，高才生王可宁、姜德华、徐清丰、王勇士 4 个人打了一门课的，两门课不合格挨打的最多，3 门、4 门课不合格挨打的也不是少数。学生先把手伸直，手背放在桌上，垫桌上打。打我时，头一棒把无名指打抽筋了，第二捧打下来就将指甲打紫了，张佩明代数不合格的人最多，被打的人也最多。被打学生痛得搓手，手呈紫红色。佐佐木、张佩明、杨孝跃 3 个人同时整整打了一个头晌。教师打人的斥责声、被打学生的哭泣声、责打学生的手板声，竟把校务室变成了阴森的刑场。

（9）伪满古坟祭典活动

1938 年即伪康德五年，伪县公署制定了 35 000 元伪币建筑高句丽博物馆和纪念碑的预算。经过 5 年的策划和施工，于 1943 年即康德十年，在五盔坟后面建成了博物馆和纪念碑。为了充实宣传内容，学校从县图书馆借来辑安古墓画册，令学生们照摹。有的画太王碑，有的画将军坟，有的画古墓群，有的画壁画，我画的龟蛇斗。全班同学在课余画了好几天。5 月 5 日古坟祭这天佐佐木带了一、二年级全班学生参加了祭典。伪满中央政府、伪通化省政府、通化日报社记者、辑安县公署都有政要参加，还有日本考古学者、黄街长、工商界代表，中小学学生，周边群众，还有小商贩，约

500多人，热闹非凡，我们的宣传画充填了小博物馆。主持人宣布祭典开始，由日本老道，哼道词，伪满中央政府教育部大臣卢元善亲临现场祝词，还赋诗一首："东来吊古访丸都，大好山河满路途，世代变迁坟犹在，不知可得有灵无"（后来发表在伪满通化日报上，此词60年后由李庆家提供）。诸多日本考古学者讲了贺词。主要讲的是辑安古坟是"高句丽民族"的祖先，高句丽是一个民族，高句丽文化等，我年幼，不知高句丽民族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还买了一套太王碑、碑文、将军坟、壁画等照片，作为古坟祭纪念，一直保存今日。

（10）早会读国民训，天天训"国民"

早会就是天天早晨站队受训。在上正式课之前，学校全体师生都到校院，按班级分别站成整齐队形，由学生"周番长"喊口令：立正，半面向右转。全体师生面向日本东京，向日本裕仁天皇遥拜，脱帽曲身行90度大礼，再半面向左转，面向新京长春，向满洲帝国康德皇帝，弯身行90度大礼。唱国歌：天地内，有了亲满洲，亲满洲，顶天立地，无苦无忧，人民3 000万……。默祷。之后，"周番长"，双臂平举"国民训"，领读"国民训"，他每读一句，众学生随读一句。其大意为赞颂伪满帝国，日满亲善，八宏一宇，世界大同，国民应顺，永当奴隶。国民训天天必读。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日是伪康德八年12月8日，所以每月8日必读"宣战诏书"以作纪念。蒋校长和佐佐木并站讲台上，校长先用中国语读一遍，接着佐佐木再用日语读第二遍。为了表示敬重，宣读诏书者必需带白手套。有一次早操受训读诏书，蒋校长摸摸衣兜忘带白手套了，现打发松本勇一跑步去他家取，全校师生垂手立正，站了足有半小时，看上去竟把佐佐木气坏了，全场气氛非常肃穆，如同追悼会一般。取回白手套蒋校长带上才宣读诏书，佐佐木用日语宣读第二遍，早会延续了一个多小时，占去了第一课时。早会占课时是常事，佐佐木在早会上用日语讲战时报告，张佩明老师给翻译。新加坡陷落那次形势报告，日语讲，翻译翻，讲了一头晌，佐佐木不顾体弱同学在烈日暴晒，晕倒在地。严冬北风寒，不准带棉帽，立正站，学生手脚耳朵都冻得像猫咬般，佐佐木照样讲军国主义那一套。

（11）寄宿生挨打受气

辑安学生凡家住乡下的，外县的学生，为了求学生活，入学后都需寄宿。宿舍地址在城内现商业大楼东面，门里有大院，南墙根有木桩的高、中、低铁杠，供学生锻练用。院北有正房7大间砖瓦房，屋内南北大炕，脚底是学生小行李，脚下墙上有吊板，供学生放牙具脸盆用。室内没有什么取暖设备。后院一栋房，西头两间是厨房，挨厨房住户是杨孝跃、佐佐木各住一间，紧东头是沐浴室，仅供佐佐木夫妇俩沐浴用的，学生为他烧水，他（她）俩先洗完了再叫学生洗。4个班级共50名左右学生，就寄宿在如此一般简陋的宿舍里。杨孝跃老师管伙食账，每人每月伙食费为伪币9元。一天三餐基本上都是大豆楂粥和鸡刨豆腐。而且定量，够不够，一勺量（四两多），吃不饱自备炒面，少数富裕同学可以买助食充饥。中午大楂粥能看稠点，由厨房燕师傅和一名同学装好饭盒，再由魏学恩用手推车推到学校给寄宿生。那时，走途生、教职员工都带饭盒，中午全在校吃盒饭。佐佐木盒饭是细白的大米干饭、还有半个苹果，我的盒饭是粗红的高粱米小豆干饭，寄宿生盒饭是一勺大楂粥，佐佐木丧其人性的常骂道："中国人像牛一样，吃的多拉的多"。寄宿生住宿也不易，自己轮流烧饭，轮流打饭，饭摆好了还不能吃，得跪坐，室长喊口令："默祷"1分钟，然后齐声用日语说：请用膳。息灯前佐佐木还要亲自点名、正坐5分钟，即腚坐在小腿上5分钟，有的同学患大骨节症，跪坐一会要活动活动腿，一旦被佐佐木发现，全室同学都要挨罚，延长整个跪坐时间。每个学期伙食费（每月8元），开学时必须一次缴清，逾期者，必遭训打。同班同学刘惠良因拖欠了伙食费挨过佐佐木打。有的年龄小，体力不佳，忍受不了奴化教育，就不辞而别偷着遛了。三年级有个王景林同学，是岭后台上村人，自己偷跑了，佐佐木发觉后骑自行车没追着。全校四个班，每班定额录取60名，其实，哪个班级都缺额。我们四年级到1945年要毕业前只剩42名学生了。

（12）海本自惹众怒挨揍

海本是伪辑高前身农业学校二年级优才生，被佐佐木留校当助教的二鬼子。主要管的是实习作业，家禽畜牧，水旱田，蔬菜，为日本人送菜等，此人心黑手狠，打人不睁眼。我们组畜牧值班时，

不知王克文怎么搞的，把七、八斤的雷古红大白公鸡防疫时给灌死了，我是副组长，主张向海本报告，组长王克文不让，他个人买了一只不足3斤的小白公鸡给顶上了，几天后被海本发现了，把王克文和我打了一顿耳光子。1945 年祖国光复时，伪县公署政要们摇身一变，组织了“社会临时治安维持会”，等待国民党来接收，学校没散伙，仍处在维持阶段。有一天，王克文组织了七、八个同学，在河西桥头找到海本家，把海本揪出来好顿揍，用皮带打得妈妈叫，他跪地求饶，打得不能动弹。同学们听了都很高兴，都说王克文打得好，我听了拍手称快。海本当夜携妻偷跑过江，回对岸楚山郡老家了。

（原文为张思九供稿）

伪满辑安“国高”轶事

所谓“国高”，乃是“国民高等学校”的简称。伪满时期，凡初小皆曰“国民初级学校”，凡高小皆曰“国民优级学校”，凡中学皆曰“国民高等学校”。伪满当局，为什么搞了这套学制，当时，只闻伪县长陈天喜说过那是“国策”。

辑安“国高”，是 1942 年春，在二年制“农业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每年招收一期学生，学额为 50 人，到 1945 年招满了四期学生，约 200 人。施教的日本人或中国人，尽管使尽了奴化教育的伎俩，但这些学生多半还是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不管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都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民族之魂不可泯灭的历史见证。

我自 1940 年春到 1945 年冬，在辑安农业学校、国高读了整整 6 年书。在学习生活中有被奴役，被愚弄的风风雨雨；有复苏、警觉的涟漪；有抗争、搏击的波澜。回首往事，随笔录下，以备查考。

（1）德奎受辱

1940 年初冬的一天，下了一场夜雪。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学校，连手脚都没暖一暖就被赶到操场扫雪。那时，学生冬天也得穿“更生布”的学生制服，打着裹腿。瘦小的制服根本就套不上棉衣棉裤，而且，手不准戴手套，脚不准穿棉“靰鞡”，头上还得戴着

“战斗帽”，所以，冷冬数九，个个从脚跟到头发梢全是“一棉不挂”。在雪没脚脖的操场上，人人都冻得浑身打颤，手脚猫咬般疼痛，耳边发白，鼻尖发红。冻得实在受不住，时时有人躲到僻静处，搓搓手，跺跺脚苟且取暖。倒霉的被日本老师看见，轻者“混蛋”、“畜生”臭骂一顿；重者，一顿耳光、拳脚。

郑德奎同学，个头不高，人很机灵。他专往中国老师跟前凑，一面寻找话题同老师搭讪，一面跺脚。这样，尽管日本老师再凶，也不好在中国老师面前对跟老师说话的学生举手就打，张口就骂了。但是，在劫难逃，郑德奎对石老师的一句话：“胶皮袜子（人们当时对日货胶鞋的俗称）真会溜须，随冷随热，夏天它把脚烧得要死，冬天它把脚冻得要命。”却遭来一场是非。

一上午总算把操场的雪打扫干净，下午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进教室上课。按课程表是石老师的地理课。石老师的课讲得一般，但为人厚道，有一颗中国人的心，学生跟他接触，觉得暖意融融，所以都愿意听他的课。铃声响后，门口却闪进了教数学的张老师，上百只眼睛顿时困惑起来。张老师的课讲得很差，但是，他挖苦学生十分利害，一堂课没有十几个学生被他羞辱，就不算一堂课。学生给他送了个绰号“张疯子”。另外，他是日本老师训话时的义务翻译，总是“天皇陛下万岁”、“皇军武运长久”不离口，很会溜须拍马。所以，他成了不被学生欢迎的人物。

张老师开讲了，但没有讲数学。如果讲数学，学生还是能够认真听课，因为学生渴求数学知识。他不厌其烦地讲了一堂关公的刚，岳飞的柔。讲得嘴丫冒沫，口水四溅，十分卖力气。妄图使学生理解，关公的刚遭来杀身之祸，岳飞的柔也遭来杀身之祸，只有我刚柔并用，才有立锥之地。谁想学生并不买他的账，根本不理睬他的表白，有的低头看书，有的俯身写字，甚至有的竟打起鼾来。张老师真有些急了，猛敲一声教鞭，叫道：“你们看见没有？”（指关公、岳飞），从梦中惊醒的学生，顺嘴答道：“看见了！”张老师又马上逼问：“在哪儿看见的？”好多同学都被问得目瞪口呆。是啊！关公、岳飞的故事听了不少，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这两位千余年前的历史人物。突然，郑德奎被揪到讲台前，张老师指着他的鼻尖让他回答那种非理之问。正当同学们担忧郑德奎无法回答之际，郑德

奎不紧不慢说道:“我在庙里，看到关公，也看到了岳飞。”好个微妙的回答，人们正在为郑德奎松一口气的当儿，两个响亮的耳光，立刻使郑德奎白嫩的脸蛋隆起五条红的指印。大家有些迷惘了，谁也猜不透，这堂的课题究竟是什么?

下课铃声响了，张老师狠狠地说道:“告诉你们，胶皮袜子并不会留须，孔雀才会留又长又美的须。”说完悻悻闯出教室。郑德奎向围拢来的同学说:“上午我跟石老师说话，张老师就在旁边，那是言者无意，闻者有心而已。

张老师的点题，郑德奎的补充，我们明白了，原来这是一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闹剧。

(2) 俊杰辍学

挂锄季节，我们的劳动实习基本要按课程表进行，一般在隔日(即周二、周四、周六)下午，实习4个小时。这个季节的实习任务，大部是割草。在田间地头割草，一是给农作物通风;二是粪源，压绿肥。在幼树间割草，则是为了养树育林。

1942年一个周二的下午1点多钟，我们实习小组一行6人，拎着镰刀向割草的地段走去。赤日炎炎似火烧，每人头上虽然都顶着个大草帽，还是热得透不过气来，所以，谁也不吭声。我们组的割草地段是由梨树园到饲料房的水沟两旁。大概因为水分充足，蒿草长势茂盛。我们分3帮，正干得起劲，却突然传来佐佐木狠毒的叫骂声。

佐佐木何许人也?此公乃国高副校长，实际上乃是国高的“太上皇”。他什么时候闯到我们这里来了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6个人，谁也没有戒备。尽管我们小组的割草地段有十几棵李子，但是，早已果落枝空了，可佐佐木则不然，他把我们看成贼，跟踪盯梢而来。他隐匿在饲料房的后窗，隔窗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崔俊杰所分的任务，正是沟西侧李树下的那一段，所以，他就成了重点监视对象。当他割到第5棵树下，见地上有几个早已落地的大红袍李子，便顺手捡了起来。佐佐木见时机已到，便跳出窗外，跑到崔俊杰跟前，一把揪住崔俊杰的衣领，把崔俊杰拎到水沟东侧的车道上，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打得崔俊杰鼻口溅血。当崔俊杰矢口否认偷李子的时候，佐佐木更是暴跳如雷，一番残忍的柔道，把

崔俊杰摔得再也爬不起来了，他才扬长而去。

待佐佐木远远离去，我们才凑过去，扶起崔俊杰。我们留下几个继续完成割草任务。腾出二人护送崔俊杰回家。从此，他再也没来上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竟这样辍学了。

从小我就跟崔俊杰是同学，一直就读于东岗（后来改为葵亭）国民优级学校，1942 年春又一起考入国高。他读书勤奋，成绩优异，品行端正，为人厚道。他家住西岗，我家住东岗，岗东岗西，相离里许，是老邻居。他从小丧父，家境贫苦。在那种社会里，跟着寡母艰难度日就不容易，何况上学读书就更难上加难。他母亲原来是小脚，因为丈夫逝去，需要下田干活，把小脚放成了大脚。我常常看到她老人家象男人那样头上戴着狗皮大帽，脚下穿靰鞡头，冒着鹅毛大雪赶爬犁，迎着凛冽寒风运柴禾。所以，崔俊杰懂事很早，知道珍惜时间，从不贪玩，课后抓紧时间做功课，挤出时间帮母亲维持家业，没想到把母亲气得哭了半宿。他母亲是位刚强人，宁肯自己身子受苦，也不让儿子受委屈。从守寡那天起，就立下“孟母教子”之志，决心要使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同父母双全的孩子一样，读书知理，成家立业。

这次崔俊杰真的辍学了。母亲不仅没有哭，甚而没有生气。看来，她对这种民族压迫也是深恶痛绝的。

（3）大打出手

1942 年秋季开学，学校开设了音乐课。此举，并不是因为校方重视了美育，而是因为这年暑假佐佐木回国，领来了一位夫人没有工作，被佐佐木硬安插到学校当了音乐教员。

我们十分喜欢音乐，在没有开设音乐课之前，我们自己就学会了不少歌曲。在公开场合谁也不唱。但是，一到林场、农田里，就三五结伴或躲进绿树丛中小声哼着“五月的风”，或三三两两凑到大树荫下，悄悄地传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把它改为鸭绿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 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偷偷地抒发亡国之恨。

我们喜欢音乐，但对音乐课却没有半点感情。为什么会有这种畸形心理呢？不是因为佐佐木夫人性情凶狠，其实她也有女人温柔

的天性；也不是她面目丑陋，她虽然左眼皮上有一块不大不小的黑痣，但不影响她那端正的面容，而是因为她的音乐水平过于低劣。抚起琴来打单点，唱起歌来假嗓子，其学识充其量是个小学水平。她深怕我们瞧不起，在我们面前总是板着面孔，拿师娘的大架子。有时挤出一丝温文尔雅的微笑，但又十分做作。她的矫揉造作，引起我们许多猜测。佐佐木30多岁来辑安，还是个单身汉。36岁回国，找一个30多岁的配偶。尽管脸上敷层厚粉，但鱼尾纹仍很显眼。我们判断：她既不是女大学生，也不是自学成材，十有八九连中学都未读好，学识浅薄。

这样的人到学校来，也可愚弄我们青年学生。一股丧国之耻，民族之恨油然而生，音乐课就乱了套。十分自尊的夫人，布置我们抄五线谱，我们就整篇整篇画蝌蚪，千奇百怪，让人看来啼笑皆非；教我们齐唱，那就高的高来，低的低，尖的尖来，憨的憨，简直是噪音的大杂烩。我的同桌，4号徐清丰唱最最凶。佐佐木常常坐镇音乐课堂，进行弹压。虽然秩序稳定下来了，但是学习音乐的兴趣用镇压手段是提不起来的。期末测验，音乐成绩出奇地低下，全班不及格，出类拔萃的一号种子王可宁，才得了55分。

音乐成绩过低，大大地削了佐佐木的面子。不仅语文、数学、日语等主科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就是卫守（日本人，仅是农业学校毕业）教的作物课平均成绩还在70分以上。唯独佐佐木夫人教的音乐成绩不足30分。在全校教工中，佐佐木先生的爱妾经常坐冷板凳，那是够掉架的了。于是，一场大镇压爆发了。

放寒假的头一天下午，学校校务室戒备森严。左边桌子坐着军事教官，右边坐着班级主任，佐佐木坐在中间。桌案上都放着又宽又长富有弹力的大板子。三堂会审准备就序，学校的仆人拿着一张大名单，站在校务室门口，高声唱着：1号—王可宁，5板；2号—韩宝永，6板；3号—张泽源，7板；4号—徐清丰，8板；5号—高铮寰，9板……。每叫进一个，就是一阵板声，啪！啪！啪！……接着又是一阵阵呼叫声，哎！哎！哎呀！由下午1点开始到点灯时分，还是板声不止，叫声不息。号称满洲帝国通化省辑安县的最高学府，扯去“雅致文明”的面纱，露出警察署、看守所、宪兵队刑讯室的狰狞面孔。

（4）一枕黄粱

佐佐木一到辑安就做起黄粱美梦—以辑安最高学府作据点，为日籍的副县长、总务科长、警务科长一干人等建立一个任其享乐的“庄园”。

他在城后，禹山脚下，选中建校之地。由县公署出面组织全县民工，名曰“勤劳奉仕”盖起了一栋日本式的校舍。在校舍周围占地 20 余亩做校园，东南角有菜圃，东北角有鸡舍与猪舍，西北角有果园，西南角有花圃、鱼池。校园以北，占地 60 余亩为实习农田。农田以北，占地五、六百亩为实习林场。几乎把禹山之尾全占了，也没满足佐佐木的胃口。一天，佐佐木趁着暮色沉沉，路静人稀之际，让在林场西侧地界附近植树的学生从山根排到山腰，一人拔起一根桩向西跑出百米，再把界桩立上。仅十几分钟的功夫，就侵占领地王家山场一面坡。王家老太太，在学校校庆日，趁高宾贵客光临之机，曾拦县太爷驾告状，跪诉被害之情。可惜县长陈天喜不是青天。他原先仅是“国都”警事厅某科的一个小小的警官，只因镇压中国人有功，才得了这个肥缺。这样一个货色，能替中国人说话，奈何日本人吗？

蔬菜上市的时候，菜圃的当番（值日学生）者，要精选上等的西红柿、紫茄、青椒或大西瓜，用推车给副县长、总务科长、警务科长逐家逐户送去。鸡产的蛋，羊出的奶，也要由禽、畜舍当番，准时给他们送上门去。每到一家，必须先用食指轻轻扣门 3 声，并轻轻说声“借光”。一次不应两次，两次不应 3 次，直到门缝开处，露出半边主妇的面孔，学生才能从门缝递进柿子、茄子、西瓜、鸡蛋、羊奶等。然后鞠个 45 度的大躬，唱声“再见”的喏，才能向后转，齐步走。稍有疏失，必遭大祸。

每年秋季红薯（地瓜）熟了的时候，学校照例要举行掘薯大会。这天下午，在梨园里演出文娱节目，供县内各界头面人物的贵夫人、千金小姐欣赏，但必须是日本人。晌午，还有一顿丰盛的野餐。在他们大吃二喝的时候，我们学生当然要在酒席间穿梭着端饭送酒，殷勤备至。稍有不慎，就要遭到醉汉的羞辱。几个长得潇洒英俊的同学，有时也能得到标致小姐的飞眼和青睐，但谁也不去理睬这种“幸福”。本来青年男女的爱慕是不分民族的，但军国主义者所造

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了，在他们之间筑起一道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下午，金风送爽，头上梳着日式美发，身上穿着彩色缤纷的和服，脚上蹬着带丫口的白布袜和体面“足下”的贵妇、小姐，排着单行站在红薯垄头。枪声一响，她们挥舞着“高丽”锄头，开始掘薯竞赛。一小时过后，每人都能掘出一笼又光又大的红薯。然后他们一个个打着小汗伞，迈着小碎步，趾高气扬地走在前头，两个学生抬着一笼“胜利品”——红薯跟在后头。有的奔回家中，向丈夫夸耀佐佐木这位大管家的能干；有的丈夫外出，奔回空房，余兴未尽，就会揪着学生的大耳垂，掐着学生脸上的小酒窝，把学生当成小猕猴任其开心耍笑。一所育人的学校，竟成了日籍的达官贵人的庄园，物可心尽其用，人可以尽其驱使。

在满洲国日本小学的校长和兴安小学的主事，虽说职务不高，但是日本人，什么也拉不下他俩。堂堂的国高学校校长，就因为是中国人，什么也没有他的份。记得有一次，蒋校长的夫人要吃“小白菜蘸大酱”，大校长为 1 斤小白菜，把公文包倒空，悄声交给菜圃当番的学生，学生把间下来的喂鸡的小白菜悄声装公文包中下班时蒋校长从学生那里取回公文包，再悄声离去。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我们。一个个由打抱不平到立“雪国耻、报国仇”之志像星火燎原那样，我们学生团结起来了。于是，鸡舍里捡不到蛋了，羊圈里挤不出奶了，蕃茄地里摘不出红柿子，西瓜地里摘不到熟瓜了。谁当番谁看住鸡屁股，蛋刚落地，就下到煮秕谷的锅里，待到晌午美餐一顿；谁当番谁看住奶羊羊乳，乳刚挤出，就煮着喝了；连放柞蚕的学生，到谁的班，谁就把青蚕装满饭盒，带回家中炒作菜肴。一时间，弄得佐佐木等人防不胜防。柿子将要红就打上药，西瓜拳头大就号上号码，也无济于事。一向被他们视为可靠分子的朝鲜族学生吃得更凶，为了不留蛛丝马迹连蒂都“吞”了，为了来得“麻利快”，蛋和奶干脆生喝。佐佐木陷于学生的包围之中，十分狼狈。吃不到柿子、西瓜的副县长把佐佐木骂得狗血喷头，佐佐木只好谎报家禽遭瘟，瓜菜受灾的“军情”，以蒙混过关。

1944 年秋，佐佐木依照惯例开了掘薯大会。尊夫人、贵小姐站到红薯地头，看着蔓下垄台裂纹又多又大，心里美滋滋的。谁知枪声一响，她们掘一埯空一埯，裂纹下面尽是拳头大小的河卵石。

个个气急败坏地瞪着佐佐木，拂袖跺脚而去。佐佐木红着大饼子脸，仰天长叹：庄园之梦原来是一枕黄粱。

(5)嘲弄卫守

卫守先生是作物课的教师。他在日本鹿儿岛农业学校毕业，就跟佐佐木来到辑安国高当了教辅（三等教员）。因为他刚出校门，不象别的日本人那样凶狠，所以，我们不太恨他。只是由于他常识低下，又不正经、贪恋女色，常在学生面前出丑，我们就嘲弄嘲弄他，借以泄泄燃在我们心头上的民族之恨。

卫守先生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一个汉字也不识。可是，他得天天拿着汉语写就的作物课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给我们上课。每当学生提出疑问，他更是两张嘴唇打哆嗦说不出话来；两只手一门儿打颤拿不住书；两个脚跟嘟嘟发抖站不住讲台。看他的可怜相，我们有点同情他。但是，他在课堂上也有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一面。他让学生一段、一章章朗读课文，他在桌间来回窜着，还不断地点着头，看了这非驴非马的洋相，我们又觉得他面目可憎。卫守先生的作物课就是在这种尴尬状态中上的。

卫守为人好色，他看中了县公署的一个女打字员，便单相思起来。朝思暮想，竟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当他知道这个打字员是某学生的姐姐时，他就盯住了这个学生，常把人家拉一边，问这问那："你姐姐叫什么名字？""你姐姐多大年庚？"后来，竟赤裸裸地夸人家姐姐怎么好看，垂涎三尺的丑相表露得十分充分。这个学生，在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他的纠缠。这下，卫守可真中了邪，疯疯颠颠，丧魂落魄。冬季的一天，我和董永祯在菜窖里修理白菜。卫守不知什么时候钻窖里，硬拉着董永祯同他闲扯。他问："×××的姐姐美不美？""给我做媳妇行不行？"董永祯被逼无奈说道："行是行，但你得学会中国话，入中国籍做中国人。"他信以为真，马上就要董永祯教他怎么说媳妇这个词。董永祯教道："姑娘，老婆"。他学道："姑娘，老婆"。董永祯又教道："妈个疙瘩臼"。他"妈个疙瘩臼"，"妈个疙瘩臼"说个不停，深怕忘掉。就这样，董永祯骂个不停，他学个不停，还大感教话之恩，频频道谢不止。

卫守每月能开 22 元钱的工资，有一天就花个净光。他既没买吃，也没买穿，而是逛了妓院。不知日本妓院哪位漂亮的妓女迷住

了他，工资一到手，就一头扎进妓院住上3天3宿；待到囊空袋尽时，再被老婊子轰回单身宿舍，混在住宿学生一起，吃大馇子、咸萝卜条，煎熬二十七、八天，下月开支，再周而复始，循环一次。交了桃花运的人，能煎熬二十七、八天吗？有时，就偷学校的报纸，卖上三、五元，去妓院鬼混半宿。往往美梦还未做成，就被轰出。半夜踉跄而归，十分狼狈，有时，他还低声下气地向住宿学生借钱去会窑姐。借钱容易，还钱难，学生有意地把他堵到校务室寒碜他，他也是赖着不还。他逛妓院成癖，如果在学校找不到他，到妓院准能找到。有时他爬到妓女的被窝里，有时他蹲在妓院的门口。爬被窝就说明他又弄到了钱去享香房之福，蹲门口就说明身边分文无有去受相思之苦。学生要嘲弄他就特意到妓院去，大声同他寒暄："这不是卫守先生吗？"开始他把头扭到墙旮旯儿回避回避，后来他麻木了，竟自我解嘲道："老师又怎么样？老师也需要老婆！"龌龊之态，令人作呕。

（6）拳击佐佐木

辑安国高有张氏三兄弟。老大叫张泽芳。念中学时，功课第一，运动也第一，运动会上4×200米的接力，他总是第一棒。性情火爆，外向，在兴安小学当教员，跟日本主事吵架，怕报复，考入吉林高师体育系就读3年，毕业后，分配到辑安国高教体育、生理卫生等课程。老二叫张泽亮，在辑安农业学校念书时，学习成绩优异，年年考第一。体育运动上不太出名，但是，天天练拳。把成匹的烧纸钉在墙上，一天击碎一张。性格内向，言语很少。毕业后，留校做了会计，学校改为国高，也就当了国高的会计。老三叫张泽源。跟我是同期同班同学，他同两个哥比要逊色一些，学习虽然占优先，但升不上一把交椅，在班内也是排行老三。体格不算健康，十分爱好武打，只不过耍耍花架子。他们兄弟三人在学校，有教的有学的，还有办事的，三方呼应，大有鼎立之势。但是，处在矮檐下，焉敢不低头，对日本人，则要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前几年，张氏兄弟同佐佐木的关系，还算可以。后来，由于卫守偷报纸一案事发，张泽亮受了瓜田李下之嫌，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我在学校的6年间，校长先后换了3任。一任姓李，二任姓王，三任姓蒋。李、蒋两位校长，学历较高，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他

俩之所以能当上中学校长，全靠大学资格，没有什么根子，平常十分怕日本人。王校长则不然，高中水平，派头不小。从抚松转来，我们夹道欢迎。他穿着协和服,戴着协和帽，拎着文明棍，十分有派头。据说他专能对付日本人，在抚松与他同僚的日本人，不敢在他头上动土。他来校不久，就掌握了卫守先生的材料，特别是偷报纸嫖窑子的罪证。就狠狠地给了佐佐木一个大大的下马威。一天早晨，王校长态度严肃地走进了校务室。把协和帽啪一下往桌上一摔，把文明棍砰一声往墙角一扔。一阵敲山震虎之后，才开了早点。早点开得十分严肃，王校长十分权威地宣布今天停课，在教职工中进行校风整顿。8点钟教师向学生布置了好了自习任务，就都回到校务室，开始了校风整顿。王校长坐在主位的写字台上宣读洋洋万言的调查材料，张老师坐在一旁一句一字地翻成日语。足足讲了一个上午，把卫守的种种不轨行为揭露得淋漓尽致。要时间有时间，要地点有地点，人证物证俱在，没有反驳的余地。佐佐木如坐针毡，大饼子脸红一阵白一阵。下午，卫守跪在地上向中国人告起饶来。佐佐木深怕丑事张扬出去，传到上司那里，会因工作不得力而被撤换，也垂手立正，操着沙哑的嗓子，说着不熟练的汉语，向中国人赔起罪来。这是他们到东北第一次尝到中国人的厉害，第一次比人矮一头。

这次挨整，佐佐木并没有从心里认输，他怀疑整卫守的材料是张泽亮提供的，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事又凑巧，王校长干了一个学期，就调回了抚松。佐佐木马上直起腰来，对张泽亮施加压力，处处找小脚，豆腐里找骨头。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不知佐佐木晚上做了恶梦，还是预感大难临头，一进校务室就是一百个不痛快。一肚子不顺气，一个劲向张泽亮发难。他无缘无故骂张泽亮混蛋，张泽亮再也忍不下去了就还了口骂他畜生。于是，佐佐木上前就抓张泽亮的脖领，想摔张泽亮的柔道。张泽亮没有白练拳术，将身上向后一撤，胳膊向后一曲，迅雷不及掩耳地就向佐佐木胸脯上击了一拳。只一拳就把佐佐木打倒在地板上，捧着胸口直嚎叫。佐佐木叫唤够了，爬将起来，出其不意伸腿就扣张泽亮一“绊子”。谁知张泽亮一转身，就躲到佐佐木身后，朝屁股上又是一拳，只一拳就打他个“狗抢屎”，嘴丫淌出血来。佐佐木恼羞成怒，爬起来，

抹一下嘴巴上的血，没等他手伸到，张泽亮的铁拳早已击到佐佐木的腮帮子上。只一拳把他打得坐在地板上，捂着腮帮哼个不停，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张泽芳为了给他找个台阶下，闯进校务室，虚张声势，给了张泽亮两个耳光，接着把佐佐木扶起，替弟弟赔罪。然后，打开卫生箱，为佐佐木敷了药，并把他护送回家养伤消气。之后佐佐木果然“消”了气，无声无息。

佐佐木真的有肚量，宽容张泽亮吗？我们说是不会的，要是往常非请来宪兵不可，可是当时正值 1945 年春天，他也深知末日来临，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

（7）罢学、绝食

1945 年的春天，抗战即将胜利的音信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人们困乏的眼底不断闪烁着复苏的活力，菜色的面孔不时泛起红润，而日本人却是惶惶不可终日，不管是在学校里教书，还是在兴农株式会社里搞农技的，不管是在县公署耍笔杆子的，还是在协和会玩嘴皮子的，统统要停止工作参加在乡军人训练。佐佐木根本就不是当兵的材料，但在妇幼皆兵之时也就在劫难逃了。

国高里的局面，也是两种人心理。日籍教师不用说，他们白天被逼上教场刺杀，准备应征北上，晚间趴在妻子的怀里，偷偷地哭泣。华籍的教师，即使不是死心踏地的汉奸，可也是因为帮了奴化教育的忙而感到内疚，白天无精打采，晚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学生心里却是怒火中烧。所以，学校失去了平衡，只有以干活实习来维持着暂时的表面的平静。然而，老天也好象特意捉弄他们，汛期来得过早，春末夏初就是中雨、大雨下个不停。弄得活干不了，课上不成。一天，下了整日的滂沱大雨，学生躺在地板上睡大觉。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下去了，大家感到无聊，起来闹了个笑话，被杨老师发现了，杨老师平日围着日本老师屁股转惯了，养成惩治学生的癖性。刹时，小题大做，把这个说成是主谋，把那个说成是主犯。然后大施淫威拍案疾呼，板声大作。本来学生那时就是一点就着的干柴，杨老师不识时务之举，引起十几个优秀学生离校罢学。佐佐木拖着疲惫的身子教场归来，听来此事，连口水都没顾得喝，连夜安抚学生，动员归校。杨先生也一夜之间，满嘴起燎泡。

一波没平，一波又起。学生罢学之后，仅1个月，也就是6月下旬，在阳岔生产“酒石酸”的学生又绝起食来。

侵华日军在阳岔烧制酒石酸，是他们即将灭亡的一个征兆。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作战，节节败北，来不及驰进军港，上足淡水，供给舰上士兵食用，只好用酒石酸投进海水中，使其盐分沉淀而后食用。关东军责令兴农株式会社出面制做酒石酸。辑安兴农株式会社派一名股长田野率两名雇员到阳岔监造酒石酸。他们造酒石酸是掠夺性质的。把山葡萄连根割下，不管是茎、是叶、是果，一齐放到锅里，熬成酸汁，按比例配上石灰，凡阳岔周围的村村乡乡及河西村、黄柏村，良民村等，有一人算一人，一人100斤山葡萄出荷任务，谁完不成就要脑袋搬家。他们在阳岔车站门前山坡上，砌了4口大锅灶，征来四、五十名劳工，铡葡萄蔓，开灶升烟火，平静的山村小站，让他们闹得烟火滚滚。同时还要来13名勤劳奉仕的国高学生做技术指导，日夜兼制，以解脱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困境，挽救圣战的败局。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被他们奴化了四年的国高学生，并没有做驯服工具，使他们没有捞到任何救命稻草。在他们试制成功，就要开产的第一天，负责技术指导的13名国高学生，以伙食不佳，胃口不好为名绝了食，拒绝上工。一时厂内乱了套，3个日本人到这个炉前哇啦一阵，劳工摇头不懂，他们又到那个炉前哇啦一阵，劳工摇头不知；一会儿这锅葡萄浆熬过了火，一会儿那锅石灰配过了量；废了一锅又一锅，扔了一锅又一锅。一闹就是四、五天，闹得田野无奈调解了一下伙食，学生才又忍气复工。

学生虽然上了工，锅灶开了火，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停止。学生又在收山葡萄上做了手脚，使原料奇缺，产量不高。他们收时开空头支票，老百姓交来50斤，就给开上80斤的收据，一天就要掉秤两、三吨。堆积葡萄时，让出荷山葡萄的老乡往高处堆，并让他们多走几遍，把它踩实。一场雨后，葡萄堆上雾气腾腾，发起霉来。田野抓耳挠腮，为不能很好地替天皇效忠，不能尽快的为皇军效力而沮丧。我们心安理得，为能在日伪背后替抗战尽一点微薄之力而欢欣。

（原文为高铮寰供稿）

伪满商业

辑安县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设治。当时，人烟稀少，村屯寥落，交通落后。农民晨荷锄暮收犁，自产自食，商业不兴。某些有识之士曾指出：“发达辑安首建通商路”的主张。但由于财力拮据，只落为一种空想。以后随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出现了一些摊点、商贩，形成了部分雏形的农产品集散地和商业活动点。但惧盗匪残害，多择地而居，多则数十家，少则七、八户，以资守望。

辑安当时旱路受阻，却有天然的鸭绿江水上通道，上可通临江镇，下可达出海口安东（丹东市），是辑安县与外县进行商业联系的重要纽带。夏季，木筏，船舶，往来穿梭，昼夜不息；冬季，雪橇、大车，在冰上结帮成伙，络绎不绝。这样，沿岸便出现了一些大小不同的商品集散地。民国十九年（1930 年）主要有外岔沟、辑安、榆林江口、富有街、黄柏甸、三道沟等。岭后新开河流域和苇沙河流域出现了台上、沙宝甸、青沟门、热闹街等。其中以外岔沟为商业之冠，停舶的货船多时达 130 多只。街面商店鳞次栉比，繁华之处一里有余，大小商店 30 余家。其中较大的有公合永（杂货）、德盛春（杂货兼油房）、恒升源（杂货）、乾隆栈（杂货兼粮业）、福生厚（杂货兼粮业）、义发涌（杂货兼粮业）、瑞盛合（杂货）、福记栈（杂货）等 8 家。资金雄厚，购销额大，左右市场形势。

当时辑安县城远不及外岔沟繁荣，但也日见其盛。

民国二十年（1931 年）辑安县城商业情况表

商号名称	经营行业	从业人数
德发裕	日用杂货	20
王兴东	〃	10
同德厚	〃	7
同兴盛	〃	5
德兴裕	〃	7

福合东	〃	10
锦长春	中药业	2
延寿堂	〃	3
义盛药房	〃	1
赵家店	旅店	5
合计	10	70

全县共有杂货店、粮栈等200多家，其中药店51家，酒业3家，车栈30家，饭馆40家，医院2家，书店1家。其中不少商店资金薄，人员少，规模小，是小本买卖。辑安向外输出主要是粮食、人参及土特产品；往内输入主要是布匹，油盐等生活资料。

民国时期，辑安商业管理机构是商务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会所初设外岔沟。设正、副会长各一人，会董若干人，任期二年。后因会址距县城较远，办事诸多不便，经众协议，由外岔沟迁至县城，会址设人泉街。民国十九年9月，商会会长由焦景禹担任。商会主要是积极协助政府督检收税，协调商会之间的关系，排除纠纷，仲裁争端。商会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保护商户，免遭盗匪掠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因时局不稳，一些商号大都关闭，外岔沟、辑安县城也清冷萧条。伪康德六年（1939年）在鸭绿江下游建蝲蛄哨（水丰）水电站，水运线路被拦腰切断，不能通船。水没区开始大举动员迁民，外岔沟许多商户迁至县城、大路、凉水、岭后花甸子。有的迁至通化、桓仁等地。伪康德八年（1941年），外岔沟被水淹没。昔日的繁华闹市，成了一片汪洋。

由于铁路、公路的修建，促使辑安县城商业逐渐开始复兴。伪康德元年（1934年）通辑国道又称“特别治安道路”修成。同时又相继修成辑安至桓仁，辑安至濛江（靖宇）、桓仁至临江（经荒岔沟、青沟子）、财源至头道，县城至羊鱼头（上解放）、榆林至通化，欢喜岭至头道崴子等直营道路7条。伪康德六年(1939年)通辑铁路也建成通车。广联内地、购销两旺，使辑安商品流通大大加快，商业经营便日趋兴旺起来。伪康德七年（1940年），县城商户有140户，比“九·一八”事变时增加近3倍。在县城东门外建起了第一座两层楼的永安百货店。全县商号达390家，占地面积84 986

平方丈。其中经营杂货、粮栈、油坊的大商号就有68户。

伪康德四年（1937年）辑安商业情况表

商号所在地	商业种类	家数	资本总额
县城	杂货	25	12 500元
县城	杂货兼粮业	5	11 500元
县城	药铺	9	1 710元
县城	饭店	10	1 610元
外岔沟	杂货	12	2 500元
外岔沟	杂货兼粮业	7	32 300元
外岔沟	药铺	3	800元
外岔沟	饭店	12	990元
三道沟	杂货	17	4 760元
三道沟	杂货兼粮业	19	24 900元
三道沟	药铺	6	920元
三道沟	饭店	17	2 490元
黄柏甸子	杂货	8	5 500元
黄柏甸子	杂货兼粮业	8	16 400元
黄柏甸子	饭店	8	750元
黄柏甸子	药铺	3	600元
榆林江口	杂货	3	1 200元
榆林江口	杂货兼粮业	4	7 100元
榆林江口	药铺	1	100元
榆林江口	饭店	2	40元
榆树林子	杂货	4	5 400元
榆树林子	药铺	1	100元
榆树林子	饭店	2	50元
太平沟	杂货	2	2 000元
太平沟	药铺	1	200元
太平沟	饭店	1	30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为加紧搜刮战争物资，对辑安各种资源及农副产品进行疯狂掠夺，对人民的必需品供应严加控制，以便聚集巨大的物资财富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为此，在康德九年成立了小卖联盟和建立了配给店。小卖联盟就是向配给商店批发商品的机构。日本帝国主义把农民出荷交粮和配给布匹相挂钩，决定农民交多少粮给多少布匹。出荷粮由兴农合作社验等，粮食组合统一收购。农民一年辛苦，除地租、出荷，便一无所有。规定稻米必须全部出荷，一粒不留，少有隐留，便视为经济犯。警察、特务四处侦察，发现有吃大米的，就要毒刑拷打，没收粮食，按经济犯问罪。在粮食实行配给以后不久，又对棉布，豆油、火柴、食盐、煤油等生活必需品进行配给。在全县城乡设置私人商号发放这些物资。康德十年以后，对烧酒、卷烟、胶鞋等生活用品也实行配给。由于垄断粮食，实行配给，一些点心铺，饭馆得不到充足原料，大部分停业。城镇的居民和工人，起初配给苞米面，再往后给的就是橡子面了。

配给店县城有德生裕、福盛裕、德民裕3家。乡下每个村也有一到二家。

伪康德十二年（1945年）全县配给店情况表

所在地	商号名称	业主姓名	资金	作业人数	配给品种
县城	德生裕			25	粮米油盐火柴
县城	德发裕	王世景		60	粮米油盐火柴
县城	福盛裕	焦景禹		70	粮米油盐火柴
太王村	清芳泉	李清芳	35 000元	70	粮米油盐火柴
太王村	傅德祥	赵延佐	15 000元	3	粮米油盐火柴棉布
太王村	源裕涌	徐东平	12 000元	40	粮米油盐火柴棉布
太王村	瑞德祥	徐忍斋	800元	5	粮米油盐火柴棉布

阳岔村	富望德	赵天鉴			粮米油盐火柴棉布
阳岔村	尹家店	尹玉文			油盐火柴
黄柏甸子	专兴永	清芳泉支号		20	粮米油盐
黄柏甸子	文登祥	王景文		10	煤油火柴盐布
青沟子	唐家店	唐关喜			煤油火柴盐布
青沟子	冯家店	冯日彤			煤油火柴盐布
头道崴子	复增泰	侯际儒	3 000元	5	煤油火柴盐布
头道崴子	东兴顺	靳玉清		10	煤油火柴盐布
腰营村	源生东	刘树林		3	煤油火柴盐布
久财源子	双兴盛	楚会盛			煤油火柴盐布
霸王朝	德盛茂	高于盛		10	煤油火柴盐布
台上村	春阳商店	秦子阳	5 000元	3	煤油火柴盐布
台上村	日升祥	林彦三	20 000元	8	豆油棉布
双岔河	永聚福	巩尧宾	3 000元	9	煤油豆油盐面粉
大路	福聚昌	张言权	50 000元	3	面粉棉布
花甸子	志兴盛	唐才德	10 000元	8	煤油火柴盐
花甸子	协增利	刘汉臣	20 000元	10	豆油
凉水泉子	洪茂长	马郁亭	1 000元	5	煤油火柴盐布
榆树林子	永兴德	宫显道	250元		煤油火柴盐布
太平沟		修洪彬	1 000元		煤油火柴盐布
麻线沟		梁永亭			煤油火柴盐布
合计	28户				

城乡配给店对人民进行敲榨、欺骗和盘剥、牟取暴利。当时，除上层权势人物优先得到满足的配给品外，一般工人，居民只能听任克扣，叫苦不迭，怨声载道。由于商品不足，原料奇缺，买卖萎缩，商号倒闭，辑安商业经济出现一片萧条景象。县城商号仅有40 多户，比伪康德四年减少百余户。农村除配给店在风雨中支撑门面外，其余均关板散摊。

伪满洲国时期，辑安商业主要归县公署实业股后改为实业科管理。它是领导商会、督察市场的官方机构，总揽各种活动大权。警察署经济系对物价、卫生也实行监督检察。商会只是附属组织。伪大同二年（1933 年）8 月，商会会长为李温长、副会长焦景禹，会董 28 人，特别会董 4 人。会内设理事 2 人，文牍主任、会计员、书记员、库务调查员各一人。同时，在外岔沟、太平沟、富有村、榆林江口、三道沟、黄柏甸子等地设分事务所 7 处。共有会员 110 人，商会年经费 5 400 元。这些商会机构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主要俯首听命于伪实业科和伪警察署。

（关国清整理）

外岔沟街的兴衰

外岔沟街（外岔沟门子），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辑安（集安）设县时起，至康德六年（1939 年）秋末，为历史鼎盛繁荣时期。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 年）实行区村制，全县分为八区，外岔沟街地属第三区，设立区公所。民国二十年（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建立伪满洲国，于康德四年（1937 年）实行村屯制，将外岔沟街区公所改为村公所。康德六年秋季，水丰电站落成，外岔沟街全部水没。

外岔沟街位于鸭绿江畔、与朝鲜楚山郡隔江相望。水没前有390 户，近 5 000 人口，康德六年前它以水陆码头而著称，是当时辑安
县粮食、木材、土特产及其它物资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当时辑安县

第三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经济贸易主要利用鸭绿江的水运，直接与安东（丹东）、营口和朝鲜新义州通商。每日江畔有大量木筏和近百艘中、小船舶在此装卸各种货物。街内有四条主街：阜丰街、正达街、迎旭街、凝柴街，开设大小商铺 30 余家。清末政治机构设有巡检衙门。民国时期设有县佐衙门、斗秤局、船捐局、江中税局、渡口；伪满洲国时期设有区、村公所、警察署、缉私局、电话分局、邮电局、专卖分局、海关、采木公司、朝鲜人民会、商务分事务所、县立男女小学校两所、朝鲜族普通小学一所。可谓百业俱兴，市场繁荣。外岔沟街的繁华为当时辑安县之冠。

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辽宁省安东（丹东）丝绸业兴盛，凉水、外岔沟一带有 20%农户边种地边放养柞蚕、桑蚕，属辑安放养柞蚕、桑蚕较早地区之一，约有 120 年的历史。据调查，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外岔沟大商户洪茂长兼营收购蚕茧。每年从外岔沟运出茧三、四百笼。其中外岔沟每年能出蚕茧 80 余笼。除此产业外，还有 10%的农户养蜂，其中朝鲜族居民能占 50%，蜂每桶可产蜜 30 斤左右。商号洪茂长等 4 家大买卖经营园参，约四、五百块帘，那时帘产量仅有六、七斤、

1902 年至 1939 年期间，外岔沟街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比较兴旺。有铁匠炉、酿酒，油坊、磨米、织布、染场、皮铺、木匠铺和果品制做等个体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作坊，工具简陋，工艺落后，除雇用少量徒工外，大部分是自己家操作经营。

铁匠炉有王家炉、单家炉、张家炉等五家，均属自建，自家操作，手工锻造。产品主要是镐头、锄头、锄钩、镰刀、斧头、铡刀、刀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工具，以及牛马骡等牲畜用的掌片、掌钉，大车用的一些铁制辄具零件等。

酿酒有“富德厚”商号的烧锅，资金 5 千银两，雇用工人 20 余人，用玉米、高粱做原料生产白酒。

油坊 3 户，“洪茂长”商号兼油坊，资金 2 000 银两，雇用工人 10 人；“福源东”油坊，资金 1 000 银两，雇用工人 10 人；“德胜春”油坊，资金 1 000 银两，雇用工人 10 人，有半机械榨油机 1 台。

磨米 1 户，是金占宝（朝鲜族）开办的粳米所。用柴油机带动

磨米机，资金 1 000 余元（伪满时期的货币），雇用工人 3 人。

织布业，大多数是朝鲜族自家开的手工家织布。

染坊两户，其中福泉涌染坊，资金 400 余元，自家操作；另一户是冷家染坊，资金 300 余元，雇用工人 4 人。染料就地取材，主要用茶枝子、板栗锅子（板栗果皮）。为农家染制自织的粗白布（家织布），多是蓝地，白花纹。

皮铺两户，一户叫丛树松皮铺；另一个叫张延洪皮铺。加工猪皮、牛皮、马皮和兽皮，主要生产靰鞡、蹚蹚驴子和大车上的褡腰零用皮件和皮鞭、鞭梢等。

木匠铺两户，陈家木匠铺、赵家木匠铺。其中陈家铺，资金 100 余元，雇用工人 3 人。主要制作家具、寿材和大车等木制农具。

果匠铺有很多家，有回族标志的：倪家、哈家、金家、白家和刘家饭馆兼果匠铺；还有汉族标志的：兰芳、德兴源果匠铺。他们主要制作月饼、饼干、麻花和火勺等食品，批给旅店、杂货铺等经销。

外岔沟街其它手工业也比较多。如王殿军和胡宝山缝纫铺，主要加工制作各种衣料；李纸匠、孙纸匠和崔画匠，扎纸牛、纸马，画家谱等；还有王柳匠、华柳匠和朱柳匠，织簸箕编笸箩等；以及许瓦匠、张瓦匠，他们主要为农户打炕抹墙、修房盖房等，还有郎锡匠、许罗匠、贾锢漏匠和织袜子的等用技艺满足人们各种需要。

外岔沟，在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末，梅辑铁路和水丰电站未建前，这里水运交通十分方便，是辑安境内的商业枢纽。这里每年冬季从辑安的四、五、六区及桓仁、宽甸和通化等地运进大批粮食、木材、人参和蚕茧等及其它土特产品，到此地出售，再购买大批货物，如面粉、布匹、食盐、油类及日用品等运回本地销售。尤其夏秋季外岔沟街更显得繁华，不但大量马车在此停留，江中每天有大批木筏在筏窝子靠岸，还有几十艘大船在码头上装卸各种货物。各大商号收购的粮食、木材及土特产品等利用鸭绿江水运，送往安东（丹东）、营口和朝鲜新义州。这些大商号的商业资本来源，有的是从安东（丹东）资本家或巨商外借贸易资金，每年 6 月签订购买谷物合同，冬季将购买的各种谷物运到鸭绿江边外岔沟集散地，装船输出。另外，朝鲜新义洲方面的商人也大量投资，故每年夏季也

往朝鲜输出大量谷物，据记载，外岔沟每年向外输出粮食，有粳米220石，粳子250石，苞米520石，大豆15 200石，小豆200石。合计16 590石（每石为250公斤）。可见当时外岔沟街商品之丰富，财源之茂盛，买卖之兴隆。外岔沟成为辑安当时最大商埠。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至伪满洲国康德六年（1939年）前外岔沟街经营物资有“八大商号”：德盛春、福记栈、瑞盛合、乾隆栈、恒升源、福生厚、公合永、义发涌。资金少者为5 000银两，多者1万多银两，8家资金合计为6万5千银两，各大商号兼营的粮栈是他们资金主要来源。还有中小杂货商户十来个，即：德兴源、福源东、三省栈、聚源德、双合盛、裕泰丰、裕泰和、德聚福、福祥和、洪茂长、三合义；有饭馆10家，旅店6家。其中回族饭馆6家，汉族饭馆食品多是尖饼、豆腐和炒菜、烧酒之类。来往旅客主要是客商、车夫、船夫。木筏工人及运粮送货的装卸人员。主要街面两侧还设有很多布篷销售床，有摊床25户，理发店3家，澡堂1家。这些服务业随着市场活跃而兴起。

外岔沟街文化教育事业也较兴旺。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前，外岔沟镇没有正式学校，主要以私塾馆为办学形式。1908年2月，在外贫沟街开设了县立第四小学校，高小两个班级，初小两个班级，班级共4个.教师4人，学生148人。到民国十年（1919年）2月又增设了县立第五小学校（女校），教师2人，班级2个，招学生74人。康德三年（1936年）又设立了朝鲜族普通小学校。伪满洲国康德四年（1937年）7月，辑安县立外岔沟两级小学校，教师5人，高小1人，初小4人，学生数：高级42人，初级193人，经费2 473元。辑安县立外岔沟女子初级小学校，教师2人，初等两个班，学生70人，经费614元。后将外岔沟小学和外岔沟女子小学合并，改称为国民优级学校，教师15人，学生363人。当时学制和课程设置：优级高小二年，初小四年。高小课程：修身、国文、日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作文、手工、音乐、图画、体育共开设12科；初小课程：修身、国文、日语、算术、作文、习字、自然、图画、音乐、手工、体操共开设11科。尽管当时教育有了发展，但绝大多数农家子女仍念不起被拒之校门外。

当时，外岔沟街文化、体育也较为活跃。伪满洲国时期，外岔

沟街私人开一报馆兼营书刊杂志。主要服务于青年、店员及驻地机关职员等。每逢年节的高跷会和灯会也非常热闹兴隆。春节至正月十五日（或农历二月二日），农民有自发组织举办高跷会和灯会的风俗。高跷会扮演角色花样较多，有青蛇、白蛇、许仙、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等民间喜闻乐见的滑稽角色，还有尾随在高跷队后面或穿梭于中间跑旱船的。高跷队所到之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家家户户倾门而出，看热闹的人水泄不通。每天农历正月十五晚间举行灯会，高跷队举着荷花灯上街载歌载舞，青年提着用彩纸扎的各种花灯走门串户，欢声笑语，相互恭贺。大商户“公和永”组织自家店员举办踩花灯、耍狮子、狮子滚绣球等节目，以示买卖兴隆、财源茂盛之意。民间文艺也流行。外岔沟街设有两家说评书的，其中一家姓黄。评书表演者只持一木一扇，边说边演。街里有5人组成的喇叭队，一般人家遇有红白喜事，都要启用喇叭队。艺人根据办事内容，采取不同的曲调，调节气氛；喜事吹奏欢快的民间小调和喇叭曲；丧事则吹奏哀乐。乐器有长号、喇叭、铜钹、铜锣、皮鼓等。艺人多时各备一件，少时轮换吹奏。新踩高跷也多以喇叭伴奏。喇叭在民间享有盛名，深受群众喜爱。除此之外，外岔沟街每逢端午节、中秋节，还以学校为主召开运动会。机关职员、社会爱好者也应邀参加。主要比赛项目有跳高、跳远、摔跤、竞走，飞绳赛跑、吊瓶等。其中一种古老运动，大牛拉人赛，胜利者奖给一匹粗布或鞋之类的物品。康德四年（1937年）10月9日外岔沟街举行了秋季官民运动大会甚为隆重。直到外岔沟街全部水没后才逐渐衰落下去。

（原文为王学敏整理）

伪满辑安国际运输株式会社

国际运输株式会社，是日本人侵入我国东北时建立的一个统一运输组织。特别是东北各地的铁路修成后，它就成为负责地方和铁路往来运送货物的组织机构。这一组织机构，是掠夺我国丰富资源的工具。致使我国各地的宝贵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国去。在

日伪统治时期，凡有铁路和火车站的地方，就有这个组织。其机构上下一致，统一计划，统一管理。

辑安县当时也不例外，也成立了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地址在辑安县城东门里。租的房子，共4间办公室。

辑安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大掌柜的叫德永郁二，是日本人，他是这个会社的总管。二掌柜的叫广赖，也是日本人，负责管理或分配这个会社的马车。三掌柜的管理往来运输货物。

国际运输株式会社设有一个马车房厅，地址在现在辑安镇郊二道口西侧。共有马车十几辆，骡马 30 多匹。马车夫和其他工人共有 20 多人，都是中国人。

这个运输株式会社的行政人员，也都是中国人，有米坤、单兆祺、于瑞志等。这些人员，每日负责报表，计划和安排当日工作。

（原文为初吉安口述　刘可宾整理）

伪满时期青沟屯的三所学校

伪满洲国辑安青沟村（当时辖如今的清河镇、热闹乡）村公所、警察署都设在青沟村内。当时这个村设有3所学校，即：满（汉）校、韩（朝）校、日校。

满（汉）校

校址在今青沟村靠后岭的小河边，即村综合厂所在地。

这座小学校是清朝末年的私塾改的学堂，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废止。这座学校是辑安县内一所声望很高的学校，民众自卫军第十八路军司令部曾设在这里，司令林振清坐镇指挥了有名的长岗大捷；在这里曾召开三营八连到青沟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的欢迎大会；土改时三纵队四保临江的一保临江小荒沟战役胜利祝捷大会也在这里召开；党中央北方根据地慰问团到这慰问也在这里开的大会。甚至节日的纪念活动，平时唱戏、看电影都在这里进行。因此青沟子小学校是苇沙河与蚂蚁河一带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曾在这里读书、任教、工作过的知名人士有中共通化地委党校党史

教师高承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崔兆麟，集安县原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徐国盛、王成福，集安县纪检委书记韩文秀；随三纵队南下，现在广州部队任团职干部的王承福、郝忠年；集安县粮食局原党委书记李凤翔、副局长逄学文（逄焕金）；辽宁矿业学校的外语教授郝乃玉以及尹传家、尹传贤、尹传忠、赵壁，现中央党校党史教授于南（于昌文）、中国青年报社工作人员宁福田，解放后任辑安文教科科长于海川、李庆家，市人大原副主任冯士刚，市政协原副主席吴凤翔等，还有国民党辑安县党部要员郝乃刚等。

这所较有名气的学校，在日伪统治下，虽有极少数考上满飞（飞行员）、满铁（铁路学校）、矿业养生所（矿业学校）通化省重点高校二高、师道的，但毕竟是极少数，毕业后大都自谋职业。当时除青沟子是中心实小，热闹街是由一到四年级组成的民小，其他各屯堡都是单人班，最多不过两名教员，所以高小或三、四年级都考到青沟小学校立伙。当时升学率很低，主要原因是学校学习时间少，大部分时间是搞白滑石手工工艺雕刻。日伪政府宣扬“这是玉石雕刻工艺品，不但要送往新京，还到过东瀛，朝见过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其实是谣言。另外，让小学生采蕨菜、山芹菜、山葡萄、元枣子、蘑菇，剥葛条皮、桦树皮，捡橡子、山核桃，挖中草药等为大东亚圣战卖力。学生每天都得手提建国杖，作建国操，实际是搞军训。有个领队（教练）姓胡，是打骂学生的能手，学生送给他一个外号叫胡扒皮。另外，每天还要搞三遍防空演习。岭后片（半个县）的国兵每年在这里检查，有时县长和宪兵队亲自坐镇检查。满、韩学生常常打架，叫学生改日本名，问候时要说日语，遥拜时喊日语祝词。

韩（朝）校

校址在青沟村东门外后山根，今青沟小学附近。1947 年春被拆毁，校院改为耕地。原学校是一栋 7 间泥坯、明石、白灰墙瓦房，房内走廊各教室都是木质地板，玻璃窗，在当时是一流的洋房。

韩（朝）校的学生主要是警察署内韩人（朝鲜族人）的少爷小姐和石绵株式会社（公司）内职工子弟，其次是大川、三道崴子、小荒沟、青沟村街内等朝鲜族居民子弟，全部走读。“八·一五”光复，满洲国倒台，韩（朝）校也随着解散。当时这所学校的名字

叫“同济学校”。

解放后，1948年汉朝合校，在青沟校内仅有一名朝鲜语教员，学生不足10人。1949年后在小荒沟（今清河）建了一所朝鲜族学校，1958年在小荒沟再度汉朝合一。当时清河、大川、三道、前进、青沟等村，共有朝鲜族学生十几人。

日 校

校址在现今清河中心校内。校舍曾做过老辑安第二中学的食堂，是水泥墙面的瓦房，当时内部布置完全是日本式。学生来源于石绵株式会社的子女，也有少量青沟警察署内的日本人子弟。当时这所学校的教员是两名日本人，学生二、三十人。他们的服装整齐，用具统一。有时到汉校开会，排着整齐的队列，牵着狼狗。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侵略者投降，日校也同时停办。

这所日校校址前身也是一所学校，是日本人的都会学校，清末民初，日本人在这里名义上是搞传教，实际是收集情报，搞地质矿藏资料，同时还贩卖枪支、弹药、鸦片，网罗地方上层人士和土匪头子，乡民叫“领事馆”。他们也曾办了一所收汉民的学校，当时小荒沟人不多，大部分学生是大川、青沟子、三道崴子等村那些不愿念私塾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如青沟村尹家粉房的子弟尹传家、尹传贤，大川的刘增祥，三道崴子的大地主郝宗林等都在这里念过书。

（原文为宋翔霖整理）

重大惨案及事件

李汉臣事件

1937年10月，黄柏当地头面人物李汉臣把王凤阁抗日部队来募捐的军需品送到了队伍驻地，被日本宪兵队的狗腿子高矮子密告，以李汉臣“通匪”为名被抓进宪兵队。城里“公和顺”商号掌柜于增年托吕本经局长出面去宪兵队保释未成。宪兵队的小樾指导官提出：因为事关重大，要保释李汉臣，必须有百人作保。为此李汉臣的女婿徐景仁于11月初2的晚上在黄柏村组织了50多名保

人，次日赶到县城，去宪兵队保释李汉臣。结果这 50 多人全被宪兵队扣押，经过严刑逼供后，释放 23 人，余下 32 人仍被拘留，并将这些人列成名单，然后小樾指导官又决定要处死 10 名保人。当确定处死 10 名保人时，小樾指导官又发现错放了王富文而暴跳如雷，其属下无奈忙去土口子抓一过路行人顶替王富文，而后小樾指导官将保人名单的前九名列为处死对象。11 月初 4，被日军宪兵队押赴县城南门外河边上，用日本战刀砍头处死。宪兵队虽然杀死了 9 名保人，但并没释放李汉臣，后来此事在李汉臣的侄子满军鸭江军司令李寿山来辑安后与宪兵队交涉，李汉臣获得释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残害良民，在辑安县黄柏村制造的法西斯惨案。据查九名无辜受害者是于成顺、迟长安、李跃臣、迟贵、姜立德、姜瓦匠、刘老五、张怀远和王货郎。

（据《集安县志》）

安东救国会惨案

1935 年 9 月中旬，驻通化日本宪兵突然将伪安东省立通化师范学校校长和全部中国教师逮捕，理由是该校校长参加了天津组织的抗日救国会。这一事件最后扩展到伪安东省内各县。辑安县师中学校校长尹传家、教务主任王永林，教师丛秀芝也被逮捕。全省为此案受株连被捕的有 80 多人，其中被处死的有 20 余人。

（据《集安县志》）

黄街长烧民房

满洲国实行街村制后，麻线村为辑安街辖属范围，为今天的麻线、红星、建疆三村的辖区。

伪满归屯那年，快割地前后，黄街长坐着二马车，由挎着洋刀的警察、街丁陪伴来到麻线学校的操场上，给集合好的老百姓到学校开会，每户一人，少一户，这一牌得受牵连。这天早晨天刚放亮，牌长就到处找，找齐本牌的人，便站着队入会场。大伙都不知怎么

回事，互相小声议论。快晌天时，看二马车上下来个人：头戴礼帽，眼架眼镜，身穿协和服，罩着白手套的手上提着文明棍。全场鸦雀无声，平时在百姓面前吹胡子瞪眼的甲长、牌长，这时像老鼠见猫似的，甲长说："禀报街长大人，全麻线村的人……""他妈的！你说什么？""也是！禀报黄街长大人，全友好区的户主都到齐了，一家没漏，请大人训话。""这回还像个样！大伙听着，麻线改名叫友好区！归辑安街本街长管。"接着站到台上给大家训话："这次本街长到这来给乡民们传达县公署的命令：由现在开始限3个月的期限，都归到前有水后有山的千秋墓旁划定的围子里去住，盖上房，拉上街道。具体情况甲长、牌长都知道，在此本街长不再多言。这次归屯是为了孤立红军、高丽独立军等胡子，把他们饿死在山上，这叫坚壁清野。为此粮食也要全收回来，不准撂到地里。谁要违抗这两件事就按通匪论处！誰要敢违抗就点火烧谁的住房！到那时抓到警务所或是宪兵队皮肉受苦是小事，全家过不好八月节不说，还要牵连全牌全区的乡邻，后果不可想象。因为我是大伙的父母官，为此要想得周到嘛！"

从那以后，甲长、甲副、牌长、警察天天往围子里赶人，经常能看见烧房子的烟。在围子里有住马架子的，有住苞米仓底下的，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病也随着多起来！王振方他老伴追述当年情景，当时全家住在头道边壕沟门。大孩子王顺闹病，天气不好庄稼要抢收，房子还要张罗盖忙不过来。这里黄街长骑着大马，街丁、警察随后，到跟前先给了当家的两文明棍，说："老五，这不是我黄显德不讲仁义，是皇军官衙命令！你再不行动就得烧窝棚啦！"

街长走后，王家在邻居的开导下，连夜到朝鲜沿儿弄了些大米。挖了在街公所干事的王事务员门子，给黄街长送去了1斗大米。为了讨好王事务员又给了他一些，里外七、八十斤大米没啦。

好歹拖到庄稼抢收完，一天，大马驮着黄街长又来到老王家。"老王啊！这可不是我街长不讲道理情面啊！看来不点房子你是不能走，看还剩几家啦！这也是上指下派！快把家底搬出来。"当把破坛乱罐子拿出来，东西快搬完时，街长便命令街丁把住房烧毁。他们在围子里住马架子、苞米仓子底下，到第二年才住上简易的民房。

从这以后，王振方患腰腿痛病，到死那天也没治好！大儿子患

了肾炎终身未娶，40 多岁就死去了。二儿子因受风湿腿痛、骨质增生，一走三晃身体虚弱，也没有办上家口。王振方的老伴，也是那年冬因炕灶倒烟留下个咳嗽病，愈老愈重，到冬天咳嗽得下不来炕、出不去屋，晚上成宿地用枕头倚着坐在炕上，气还是不够用。

（原文为宋翔霖整理）

烧毁古建筑

1937 年，日军乘汽车从外岔沟去岭后过双岔河关帝庙时，见庙内地上有稻草，认为抗联战士在关帝庙住过，将庙五间正殿和两个角楼放火烧毁，只有一个钟鼓楼没被烧毁。1939 年 9 月，日军来到霸王朝村基督教堂，以基督教堂招待了抗日联军为由将教堂烧毁。

（摘自《调查报告》　文史委整理）

其　它

梅辑铁路修建史

概况

梅辑（集）线铁路，起自沈吉线梅河口车站，经柳河、三源浦、通化、铁厂、石湖、阳岔，最后到达终点辑安。该线还直达朝鲜。（辑安至鸭绿江国际桥梁 251 公里中国侧桥头，为该线之终点）。修建时全长 700 米，现终点为桥中心，即 251 公里 971.15 米，核新里程为 251 公里 274.8 米。修建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我国东北资源、连接“满鲜”的第四干线。

勘测与修建

1、线路部分：梅辑线铁路的勘测设计，是由满铁四平街建设事务所负责，分梅通、通辑两段。通辑段分两期进行勘测，第一期

为通化至黄柏间，于1936年10月初开始实测，同年12月24日测完。第二期为黄柏至辑安间，于1937年11月初开始实测，同年12月29日测完。

梅辑线铁路的修建，是按梅通、通辑分段分期施工的，由满铁铁道总局四平街建设事务所发包，由十几家日本包商具体施工，并有日伪军及铁路警备队分驻施工沿线进行“掩护”强修。梅通段于1936年2月开工，翌年10月31日完工。通辑段，通化至207公里处于1937年3月、207公里处至终点于1938年3月分别开工，全线于1939年9月30日完工。梅河口至通化段于1937年11月初，通化至辑安段于1939年10月初，分别正式交付运营。

1939年9月下旬，为了庆祝梅辑线正式通车，伪满洲帝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曾率领通化公署、辑安县公署和铁路沿线伪村长一行30余人，参加了在鸭绿江桥上举行的通车典礼仪式。张景惠拿铁路工人用的铁锤向铁道上敲了3下，以示完成接轨，宣布梅河口～辑安线铁路正式通车。

梅辑线铁路的修建，共投资26 578 378元（伪币），平均每公里105 595元。共占用土地20 937 302平方米，共有土石方5 245万立方米（断面方），每公里平均约2万立方米。此外，尚有道口土方11.9万立方米，共使用劳力约213万工天，每人平均完成2.6立方米。劳力都是由天津、山东等地骗招来的。每天出工长达14小时之多，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咸菜和盐豆，住的是席棚和布棚，穿的是麻袋片和水泥袋做的“衣服”。

梅辑线铁路除正线外，日本帝国主义为方便掠夺，于铁厂、果松、鸭园及东通化各设专用线一条，全长约16公里。其中，东通化线为二道江制铁所运送原材料，其它线均为运送煤炭及铁矿石之用。

梅辑线路设计为标准轨距1 435米，线路最小半径300米，最大限坡除通辑段上行（面向始点为上行）为25‰以外，其它为20‰。钢轨设计为32公斤/米，A型，直线处每根钢轨（10米计）下配置枕木15根。道床由轨底至路基面厚30厘米，就地取材，一般地段碎石、混砂均可。桥梁设计载重等级除拱桥为L～22以外，其它为L～20，桥梁与主流正交者设计椭圆桥墩，斜交者及主流经常变化的河川设计圆型桥墩，均为扩大基础。隧道为马蹄型、人工混

凝土铸造，其断面处于直线处，起拱点宽 4.9 米，从轨面算起的高度为 5.41 米。采用臂板信号机，电气路牌闭塞，联锁箱联锁，通信电线路标准 4.5 毫米铁线 8 条，3.5 毫米铜线 8 条。

2、桥隧部分：该线共建桥梁 139 座/4 761 米，隧道 8 座，总长 5 720 米。60 米以上大桥 23 座，3 078.5 米。梅通段于 1936 年施工，通辑段 130～207 公里，为 1937 年施工；207 公里至终点，为 1938 年施工。梅通段多数为上承钣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继续扩大，钢材极端缺乏，通辑段则多为钢筋混凝土 T 型梁及钢筋混凝土钣梁，于施工当时又将钢筋混凝土设计的钢筋混凝土变更无筋人工混凝土多孔拱桥。涵渠，中心管涵为最多，大部采用波型铁管。

第一老岭隧道以及第二老岭隧道为该线路最长的隧道，分别长 2 310 及 1 765 米，绕行山路 7 公里多，均为面向辑安下行，第二老岭隧道尚为复心曲线的环状层隧道，高低差达 109 米。208 公里夹板隧道通化口为一深谷，于陡立之山腰开洞，与 207 公里高桥衔接，各洞多为花岗岩、石灰岩，岩质较好。土口子隧道为风化的花岗岩及辉绿岩，岩质较弱。计长 445 米，入口起 345 米为 20‰上坡，其余为 3‰下坡，1938 年 5 月 6 日开挖导洞，10 月 25 日贯通，1939 年 7 月 13 日基本完成。第一老岭隧道于 1937 年 4 月开工，1939 年 3 月 31 日竣工，入口起为 3‰上坡，长 331.2 米，其余为 2‰下坡。

修建的缘起及目的

该线起源于“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东北交通委员会计划修建朝临线，即于沈吉朝阳镇车站出岔，经柳河、通化、鸭园，终点临江县城。又有所谓中日合办矿之计划，即先经辉南县杉松岗煤矿，经柳河、通化以达临江。上述计划虽未实现，但为修建梅辑线铁路却提供了选线基础。

该线是在日本强占我东北以后，于 1935 年 10 月 20 日，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第 5 次公布的以 8 500 万元（伪币）修建费蓄谋修建 7 条铁路中的两条。亦为满铁的所谓“第三次计划线”的一部。该线又是日本经朝鲜连络满蒙隐蔽的一条路线，起点通过四梅线可抵西满内蒙。北行通过平齐线与长滨呼应可达齐齐哈尔，进入滨洲

线，达到抵制苏联的目的。南行可经过通辽、承德与沈山并行进入关内，以达扩大侵略华北之目的。同时该线又可和沈丹、长图、朝开三线呼应，灵活进出于朝鲜和我国东北，即成为日本在执行“大陆政策”上，极为重要的军事侵略线路的中枢。而且日本修建该线的目的并不限于此，该地区尚为铁、煤、木材等重要矿产及林木资源聚集的宝库，所以，该线又是一条主要的吸血管路，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还于 1938 年配合铁路的修建，筹建了“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达到彻底盗运目的。

该线所经是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最活跃的地区，是动摇伪满洲国政府、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力量的根据地之一。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修建该线又是阴谋打击我抗日部队，维持其野蛮统治的一种手段。

抗日军民对筑路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杨靖宇司令的指挥下，经常出没于该筑路沿线，对筑路工程不断袭扰围歼，对日伪军、宪兵、铁路警护队和日本包商、勘测人员及其筑路设施给予沉重的打击。据日本官方缩小了的统计，从 1935 年 4 月，被我抗联和地方武装袭击的次数多达 196 次。

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1941 年 7 月，梅辑线东部山区连降大雨，鸭园东站附近的罗圈河水位暴涨，冲毁铁路，运输中断。此刻，通化工务区拨给鸭园保线工区一批抢险救灾物资，不料这些物品却被该工区日本工长相马偷偷卖掉了。中国工人对此十分气愤，便以写控告信和怠工等形式进行斗争，结果惹怒了日本工长相马，一次相马找茬毒打了工人邵希福，这更激起了邵希福的满腔仇恨，一天早晨，他以送礼为名，身藏菜刀，来到相马家叫开门后，出其不意，把相马连砍 18 刀，当即杀死，解了心头之恨。邵希福自杀身亡。

1945 年东北光复，日本人被赶走。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占领通化，给梅辑线铁路带来了严重的战争创伤。线路遭到彻底毁坏，尤其大中桥梁、隧道几乎全部倒塌不堪，梅河口至鸭园较为严重，鸭园到辑安间的大桥、隧道成了破坏的重点，运输中断，工人回家，整个梅辑线铁路运输，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1947 年 5 月，国民党被赶走，通化第二次解放。梅辑线路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同时也迎来了一个尽快抢修线路、支援解放战争的光荣任务。富有“二·七”革命光荣传统的铁路工人，在“修好线路，支援前线，消灭蒋匪，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梅辑（集）线铁路历经 8 个多月的抢修，于 1948 年 1 月 28 日胜利结束，使人民铁路又投入了支援东北全境解放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洪流中。

（通化铁路分局供稿）

伪满辑安机场与火车站

辑安飞机场，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将它忘却，因为它至今没有留下任何残骸和痕迹。但若和一些 70 多岁的老人谈起这事，都颇有感触。这是因为他们目有所睹，是历史的经历者。

飞机场的修建时间是 1935 年（康德二年），地址在二股流，现农场的一部分，共占有 600 亩土地。征集 1 万多劳工，整整修了两年的时间才竣工，正式通航。

机场四周是一片密集的柳林，临近没有人烟，在飞机场边上有一棵高大的杨树，树下一个岗楼。每逢来机之前，有一个中国人（姓名不详）骑自行车到机场，在树上升起一面红色的旗帜，这便是给空中发信号，接着在机场地面上铺起 7 米长的一幅大红面做地面信号。这样，飞机就可以降落了。

候机室设在镇内，现邮电局的东角，门口挂着 “东边道在满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牌子，工作人员只有 4 人。领导者是日本人。

机场有 3 道航线，可飞往通化、安东、桓仁。

飞机一次只能坐 4 个人，这架 30 年代的飞机小巧轻便，机身重量不重。

机场按人的体重规定票价。到通化，一个普通人体重的票价是 5 元多钱（日本金票），超体重可拿一倍的价钱。如“清芳泉”有个掌柜的，绰号“王胖子”体重 200 多斤，去通化一次，买飞机票花的钱等于两个人的票价。

辑安飞机场只有客机，每周一、三、五起飞一次。如有坐飞机出游办事的旅客，购票后，在候机室等候，待到飞机起飞之前，机场有专用二马车把旅客送到“二股流”飞机场。

在1940年（康德七年），曾降落过一次从日本东京飞来的一架专用飞机（飞机型号不详），午前降落，午后立即返航。这次随机来的人员，据说都是日本东京的要人。飞机降落后，有专车将这些日本重要人物送到辑安火车站后面的古墓，又把中国民工赶走，日本人把辑安古墓中的珍贵文物及珠宝掠夺一空，装上飞机，带回日本国。

在离辑安镇4公里许的东北角的大禹山下，有一个造型雄奇壮观，檐牙高啄的古风建筑，这便是辑安火车站。

车站的造型是采用古墓中壁画的图案设计建成。始建于1937年（康德四年）5月，与土口洞子路基同时动工，1939年（康德六年）5月竣工。同年6月6日正式卖票通车。开始通车时仅一节车厢，逐渐增加成4节车厢的混合列车。

东北铁路是东亚土木公司承包。辑安铁路段，从土口火车洞到辑安车站，这为一段。这一铁路段，由织田组承包。（日本人名叫织田）包工费总共日本金票5万元。

修这段路，都是按不同组织各有分工，齐头并作。铺路是神古级（日本人名叫神古），修车站领导人西岗（日本人），井上（日本人）专负责车站的木工和瓦工。土石方由义和祥（柜头名，头人是中国人）承包。土口洞领导人津志田（日本人），领导指挥地点各处都有。织田的大柜办公室设在太王老医院的东侧；土口子顶是津志田的办公室，上面还有修路的物资仓库。

承包分大柜二柜。总头织田是大柜，义和祥再从织田大柜手中包活，就为二柜。义和祥的工人最苦，活也最累，死人最多。他的人都是从关里招骗来的。招工时说，到东北生活好，天天吃大米、白面。半月一借资，一个月一开饷。当本人同意时，当时发给家属二、三十元生活费，每人照一寸半身照片一张，每人发一个劳动票（卡片，作为人身证明）。劳动票上填写姓名、性别、年龄、住所、发票单位及年月日。劳动票背面严格规定了几项注意事项，违者被监禁。当工人来到工地时，就把劳动票收回，防止工人持票逃跑。

结果天天吃的是窝窝头，咸盐豆子，工钱也最低。日本人对中国的工匠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待遇也截然不同。铁匠叫锻冶，打眼（凿岩工）放炮叫镐夫，推轱辘马子、挑土担的叫苦力。打眼、放炮和木铁匠人待遇高，每人每天壹元叁角钱，打眼、放炮吃的是百分之五十的细粮。铁匠人是百分之百的细粮。苦力天天吃粗粮，一天工钱是8角钱。

义和祥二柜手下有3个把头：袁把头、黄把头、焦把头（这几个把头都不知其名）。3个把头都有所分工，袁把头负责洞子外路基的土石方和阳岔下面路边的砬子；黄把头负责倒毛，将洞子里面的土、石用轱辘马子和土筐推挑出来；焦把头专管打眼放炮。把头还有公开享有的特权：从每个工人身上一天克扣5分钱。

辑安火车站，原荒无人烟，荒草一片，一个大土坡一直伸向大禹山脚下。在东南面，是一处面积很大的积水烂泥塘。工人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这半山坡上建起了火车站，在烂泥塘中建了一栋铁路警务队的住房。

火车站的建筑完全是砖（水泥砖）瓦、木石结构。候车室的明石都是打成的方面，完全用的是水泥块砌成。室内地面是方正的石块铺设，室内垂直的平面。外墙壁是斜坡直下，基础宽于上端。所需木料，除门窗所用的红松木料，不管是粗是细的，大的或小的，都刨成光滑的正园形，在每根木料结构的一端，按凸面的规格，刻成凹面压在上面，不用铁钉便可坚固。为了美观，椽头的脊端，都镶在脊檩中。检票口立有40多公分粗的四根立柱。细看，两端细中间突出，显得挺拔玉立。车站的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

建筑车站的工匠，除8个木匠是本地人外，大部分木匠、石匠、瓦匠和力工都是从大连和安东招来的。车站附近修的几栋家属房的工人也是从大连招进的，工头名叫陈世功，也是大连人。

在相距车站100米的东南角，同年也建成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住着铁路警务队。这里原是常年积水的烂泥塘。当时，在这烂泥塘中打房基础是非常困难的。用了100多根20多公分以上的粗细、4米长的黄花松，刷上臭油，排着打桩，在这个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房子。建房的匠人都是从长春招来的，一共50多人。

（原文为任所贵、阎洪礼口述　刘克嫔整理）

抗日斗争历史文献



中共满洲省委

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1931年9月19日）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件啊！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的政策，是不让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者染指满蒙的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

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而且仍在有加无减的继续着！

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已经被惊动世界的事实完全暴露无余了！谁也不应再相信国民党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了！不管国民党的哪一派，不管中国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不用投降帝国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满洲事件，他们一定要来高呼其“镇静”、“忍耐”、“慎重”的无耻口号，他们一定又要来欺骗民众，来依靠所谓“国际正义”！他们一定又来声嘶力竭的高喊：“目前唯一的问题仍然是剿共”来混乱群众的视线，他们一定又要利用这一事件来互相攻击，企图取

得“群众信仰”。但是，无论他们怎样来欺骗，无论他们再玩些什么新花样，过去的一切事实已经教训了每个群众，应当坚决的来反对来揭破这些无耻的欺骗！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才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

1、要关饷要饭吃！
2、要工钱要米贴！
3、反对抬高粮价！
4、反对拒用奉票！
5、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
6、反对携款潜逃，发还学生膳学费！
7、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
8、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
9、反对进攻红军！
10、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
11、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
12、发动游击战争！
13、反对白色恐怖——屠杀、逮捕、监禁！
14、反对军阀战争！
15、打倒外交协会！
16、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17、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

（1933年1月26日）

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此之外，更有发展和联合苏区，巩固红军，推翻国民党和扩大群众革命斗争，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罢工的斗争，目的是在吸收黄色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而把赤色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的任务。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关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的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人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这方面已有的极丰

富的经验，计算到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配置的特别情形，在执行这个策略时，对下列的情形应当严格的注意！”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然而，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的计算到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来与这资产阶级奋斗。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

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尽量扩展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基本的是藉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们党现在在满洲的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在数量上，工业、运输、小手工业内约六十万，乡村工人约一百二十万，在质量上主要的干部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奉天、大连、哈尔滨、抚顺等等，和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铁路、煤矿、兵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大产业工人，和大部的林木工人，是直接在日本的企业上作工，与乡村的关系密切），虽然它有一定的弱点（没有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和组织性较小等等），然而，无条件的它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基本还带着自发的性质。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罢工和武装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例如：按时发工资和发现洋，同等劳动同等工资，成年八小时工作日，青工六小时，并保留已有的工资标准，反对裁人和关厂，在裁人和关厂时，业主须付工人六个月工资，反对用白俄和日本工贼代替中国人，要求增加林木工人和雇农的工资，并且业主应当供给工人及其家属满意的住所。满洲国当局及业主须给失业工人免费的饭食、衣服、烧柴、住所；反对宪兵警察在兵工厂、作坊、矿井上的压迫，反对逮捕和屠杀工人，要求工人言论集会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工人拒绝运输和服务于日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工人劳动，并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尽量的把工人组织在上述的革命群众组织内，找出，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赤色工会、民众革命政权的骨干，并这样来保证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

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配合起来。

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须明了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

东三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的反对其队伍间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得不够（如说满洲有很多荒地，因此土地问题不紧张）以及对土地革命运动已达到程度估计得不够。必须计算到满洲作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程度比中国其他部分都大，并且它在中国是农村经济商品性最发达的一部，在乡村中，无论反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速度都更快。

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对组织满洲的农村工人特别注意，经过他们来实现我们在农民土地运动上的领导权。除了斗争没有方法挽救农民脱离饥饿贫困与死亡。党的任务在于提出最切实的要求和口号——譬如：百分之八十的收成归农民，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及军阀纳任何的捐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政府大批的屠杀农民，反对焚烧农民的住宅及抢劫农民的财产和牲畜，停止还高利贷，自由种高粱及农民所愿种的其它东西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对待奴隶的法律（禁止自由使用刀、锤、铲等家具和工具），并在这些口号的周围组织和联合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联系起来。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它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间的关系，经常的供给游击队以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

因水灾和战争而受害的饥民难民为数极多，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而他们正在为米、为高粱、为衣服、为烧柴、为住所而作着生死的斗争，那些能动员他们和组织他们与侵略者及剥削者斗争的口号，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和货物给饥民，没收民族叛徒的

财产给饥民，饥民自动的打开财主的米仓和高梁栈拿来吃，大家合力来抢财主的煤、木柴、衣服、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饥民难民建筑铁路、修飞机场、汽车路、工厂、制造厂等等，如作这个建筑工作时，则日本侵略者须给他们和铁路及工厂工人适合的工资，反对关饥民在收容所里等死，要求日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无代价的发米粮、衣服、煤、劈柴、住所等等，所有这些口号，我们党必须广泛的传播，他们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饥民会”、“饥民灾民联合会”等等。

对满洲国的军队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当兵就是可耻的民族叛徒！兵士们！满洲国军队中的弟兄们带枪到反日的游击队方面来，杀死你们的长官民族叛徒，暴动起来反对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而对反动军官所领导下的尚在斗争着的旧吉林军兵士们，可提出下列的要求和口号：兵士兄弟们组织兵士委员会来监督各种反帝团体为我们捐来的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进款和用途。不要压迫和杀害自已的弟兄——工人农民学生和饥民！和工农联合及友好，不服从反动长官的反革命命令，去投降和压迫工农！小心你们的长官和国民党党官的叛变！最后，兵士选举长官的口号要求小心仔细和有准备的提出来实行等等……便把他们夺取到革命方面来，并加紧武装革命与全副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对小资产阶级提出停止和减少各式各样的捐税（首先是盐税粮食税户口捐），无代价的退还当铺里的衣被器具，反对城市里戒严，要求言论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出反对关闭学校，反对屠杀学生和新闻记者，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学习的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式的教育计划，因为这是对学生的污辱和讽刺，反对孙文主义，因为它是流血的白色恐怖和卖国辱国的旗帜。不要忘记，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它的最初阶段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学生，在扩展群众反帝运动上能起很大作用。对高丽人（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中国人，而另一部分先进的工人农民经常的与中国劳动者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对蒙古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已定的使满洲及蒙古殖民地化的计划，而进一步进攻的最近和最先的对象）须提出特殊

的斗争的口号，即是一方面藉此可以揭穿和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内蒙自立，间岛自立区）的武装宣传，和它之利用及故意挑拨民族恶感及冲突，以利于自己的帝国主义强盗事业；另一方面组织和联络它们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它帝国主义。应当提出如下的口号：第一，一致抵抗日本国政府及满洲国政府的捐税和命令；第二，中韩蒙及其他劳动者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奸细——中韩蒙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第三，苏联的工农与中韩蒙民众的友谊联盟万岁。为朝鲜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大致是：朝鲜的农民们，日帝国主义抢去了你们的土地，并把你们从故乡赶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归还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不给中韩日地主缴租。为蒙古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组织游击队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热河和内蒙！中国革命，外蒙人民共和国及内蒙民众的友谊联盟万岁。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北方军阀的压迫，不给国民党及一切军阀纳税，不给本地王公督统纳税。反对喇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蒙古民众的民族关税叛徒政策。

计算满洲有一万到一万五千的日本工人，他们比中国工人及其本国日本工人都处于特权地位，并且顾及建立他们的革命斗争与日本国内斗争的联系，而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组织共同的罢工，在满洲的日本工人中间，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同时必须提出共同的要求，在满洲有建立工会组织之权。

根据上海所有的经验和满洲的事实，满洲反日会等等，能成为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同时必须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到我们的手里。满洲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提出那些是群众最感奋，和在各地都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口号，并把他们日常部分要求和斗争与我们党总的政治任务和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联系起来。此外，还必须慎重的估计到满洲的复杂国际关系与无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的正为着压迫和奴役满洲的中国和其他民众，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竞争着，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的哪怕是极小的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强盗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它有利于革命的群众运动。

党必须经常的和广泛的传播苏联的工农和中国工农友谊联盟的口号，以及中国民众和外蒙人民友谊联盟的口号，同时党必须在满洲的民众间作广泛的解释运动，来解释苏联所坚决执行的和平政策（特别是关于满洲事件）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党必须根据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一二八上海防守以及满洲游击运动的实际经验和朱霁青等将军——国民党张学良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等每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实，来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张学良及其它反革命的团体、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对于满洲事变投降叛卖政策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广泛的宣传苏维埃的中国在解决一般的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问题方面所得到的成绩，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对日宣战的问题，以便向广大的群众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它的英勇的红军是中国唯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军队。假如国民党不是四面围攻我们的苏区，那么我们的红军早已和全国反日游击队及义勇军在一起在第一道战线上直接的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参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并且要指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同任何的军队和队伍缔结作战的协定，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有两种条件：（一）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二）给他们自已领土内的民众以一般的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示威的自由）和武装民众的自由。这样，党不但能粉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而且会得到满洲民众对我们党广大的同情和拥护，并且真正准备满洲革命发展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灵活的完成上述的任务，我们党才能夺得和巩固自已在反日游击队内的领导，而且只有在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目前的反日游击运动，才能变成千百万武装民众的反日的及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才能造成真正的民众和真正由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城市贫民、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所选举出来的政权，有一定的适合的领土基础，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由最好的游击队所构成的民众革命军，并且只有在我们领导之下，满洲的反日游击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得到完全胜利。

此外，党必须在全中国这运动中灵活和勇敢的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以便把援助满洲游击运动的发起和领导权夺到我们手里，以便一方面揭穿国民党的手腕和欺骗，而另一方面利用这运动而公开的派革命分子和我们的人、钱，去帮助满洲的游击队，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党必须立刻在群众中广泛的进行一种运动来解释，组织所谓“北方独立国”，即是变相的满洲国。这运动的实质在于：藉此可动员广大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热河及内蒙古的全部领土，和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北部和全中国。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里，党应当发起一种运动和举动，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帮助满洲国的游击队。这运动不仅给满洲的游击队以有力的帮助，同样也会掀起和提高国民党中国里反帝运动的战斗精神和情绪，而也提高苏维埃中国里的红军兵士和劳动者的精神。募捐援助游击队，不应当只限于金钱，而应该普遍到各种东西——米粮、衣服等等。

（本文节选自《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党的具体任务

——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

（1933 年 5 月 15 日）

根据国际十二次全会所给予中国党的六大任务与中央给予满洲党的战斗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在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群众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为了使反日游击运动取得胜利，在目前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路线，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满洲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这是满洲党当前的中心任务。省委决定以下具体的任务，号召每个党员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努力。

（1）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

① 真正的聚集与联合一切反日的力量，正确与灵活的运用反日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首先应该把所有的组织，深入一切群众中与一切反日游击队中去。各级组织应该立即建立义勇军运动委员会，在各级组织领导之下进行义勇军的工作。义勇军运动委员会专

门的负责推动各级组织派调同志或群众到反日游击队中去工作，训练义勇军工作的干部派到义勇军中去，组织农民义勇军、工人义勇军、学生义勇军进行反日游击战争，保护群众的革命斗争。每个支部必须定出自己关于义勇军工作经常的计划，特别是在反日游击战争的区域有其重要的严重意义。组织义勇军工作的突击队，努力的向中心的反日游击队中突击与冲锋。

②具体的估计到各种游击队，社会成份及政治上的领导，以决定我们对他们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可能与某一部分游击队实行统一战线时，党独立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有其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的游击队还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象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游击队进行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有时经过上层统一战线来顺利的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可以与之进行反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１）坚决反日；（２）不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３）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的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③特别是发展中心城市与中心产业的反日反帝斗争。抓住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事实，与他们切身利益的要求联系起来，深入反帝反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吸引广大的工人、苦力、学生、城市贫民参加反日反帝的斗争，以没收日货，抵制日货，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奴隶教育，实行总同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来振奋和刺激一切反日游击队及所有的反日反帝的群众。目前群众反帝民族革命高潮日益高涨，然而中心城市与中心产业党部未能组织与领导群众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不抵抗主义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各级组织必须立刻出版群众的反日反帝的报纸、画报、墙报，系统的进行反日反帝的宣传鼓动工作，广泛地成立反日反帝的群众组织，适时的进行反日反帝的群众的游行示威。

④开展拥护义勇军，援助义勇军的运动，组织慰劳队，募捐队。

在反日游击战争的区域，党与赤色群众团体，必须发起群众的军民联欢大会，进行反日的民众与反日武装队伍大联欢运动。实际的帮助反日游击队作战，组织战时的侦察队，具体的解决游击队的给养、宿营等问题。号召群众自动起来，在实际方面援助反日游击队。总之党应该以最大的努力组织与发展群众民族革命的热情，坚决的反对过去对于援助与拥护义勇军运动的消极而不把它当作目前民族解放运动的群众的政治运动。

⑤百倍的扩大反日会的组织，应该组织工人反日会、农民反日会、学生反日会等各种反日会，形成真正最宽广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与最有群众基础的反日联合会的组织。实行在每个党、团支部、每个赤色小组都必须建立自己领导下的反日分会，几个中心城市地方党部，必须短期间内建立系统的有群众基础的反日联合总会。

⑥联合满洲境内少数民族共同反日的工作，省委以及吉东局、奉天特委几个中心地方党部，要在短期间内建立少数民族委员会，系统的进行少数民族的工作。要据中央关于韩国、蒙古民族所规定的口号，坚决的领导他们和中国民族在一块儿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领导中韩劳苦群众反对和揭破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国民党以及地主豪绅分裂中韩劳苦民众联合的政策与阴谋。同时在西线洮南坚持蒙古人反喇嘛王公实行民族自决、东满间岛一带号召韩国人民坚决反对朝鲜民会及其走狗组织实行民族自决。满洲境内朝鲜独立军，应该派大批同志进去夺取独立党他们所领导下的群众。日本工人与韩国工人的工作，责成各级党部切实的系统的去进行，使之与中国工人联合起来。韩国文的报纸，省委及地方党部应该设法系统的建立起来。并且责成东满、南满的同志要派得力可靠的忠实同志去开辟与建立工作，同时号召全党开展保护外蒙人民共和国的群众运动。

（2）真正的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① 切实的进行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无产阶级在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时“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威胁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中央来信），

同时要严格的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伴中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同上），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由地主资产阶级影响和领导下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

② 发展与扩大党独立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使赤色游击队真正成为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成为主要的力量。第一要看我们的赤色游击队是否能够真正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否能够团结与影响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是否能够坚决的执行党的反日反帝的纲领，坚决的领导与组织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第二、尽量的发展群众武装斗争，要会灵活的夺取与吸引正在斗争着的农民以及广泛的领导他们的武装斗争，正确的运用游击战术来开展反日的游击战争，发展满洲国的士兵运动，领导他们“反正”进行最广泛的哗变运动。

③ 发展反日罢工与工人的武装斗争。广大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的组织，要能抓紧群众最切身的要求，发展他们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提高斗争到直接反日罢工与武装斗争的阶段，无情的打击那些对于日常斗争机会主义估计不足，艰苦忍耐的进行厂内系统的活动，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决定铁路、矿山、轮船、兵工厂、市政、纱厂、烟厂、火磨、油坊要成为我们职工运动的主要营垒，建立在这些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党的支部与赤色工会、反日会、青年团的组织。目前要实际的布置反对裁人、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的斗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工人、强迫工作、不给工钱、强迫工人向日本军队警察行礼的这些斗争。失业工人的工作，目前再也不能一刻忍耐下去机会主义的消极，应该在全党受到不留情的打击，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人完全陷于失业、饥饿的状况，成为极严重的情形，党、团、职工会必须立即开始建立失业工人的工作，领导失业工人进行斗争，把他们的斗争导向抵制日货，没收日货，救济失业工人，一方面去组织与领导广大的失业工人参加民族革命战争。

在工人运动的策略，应该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斗争与下层统一战线为活动的基础，随时揭穿敌人分裂工人的阴谋（如以满洲工人反

对山东工人、河北工人、广东工人、以满洲工人中的极少数工贼走狗监视工人的行动等）与敌人的欺骗（如最近协和会在工人中的活动）以及不断的揭露国民党所有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武断宣传，站在工人共同利益的要求上与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上，组织与团结他们斗争。在反日游击区，必须利用公开的可能，建立工人最宽广的有群众基础的工会。

目前赤色工会组织与工作范围的狭小，全满不过二百人数目，赤色工会的会员比党团的组织还狭小到几十倍，全党忽视与不作工会的严重现象，还是普遍的存在着，这不能不是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重复与着重指出在目前反帝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央来信），因此在目前我们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是非常严重的。

④ 加紧领导农民的抗租、抗捐款、反对派草派粮、拉车拉夫、强占土地、强种鸦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的命令、法律，领导灾民难民的吃大户、抢粮、分粮、要救济的斗争，把农民灾民、难民的斗争，领导到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与武装斗争，导向游击战争阶段。反对那些空喊游击战争，而不艰苦的领导群众斗争，以及不使斗争提高等机会主义的表现。在斗争中注意武装他们与组织他们夺取武装，在这些基础上领导他们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广泛的建立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它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之间的关系，经常的供给游击队以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中央来信）。对农民协会、雇农工会、农村中的苦力工会等，应该切实的去组织他们。中国农民群众工作虽然在这个时期有相当的发展，然而还是十分的薄弱，不能适应目前高涨着的农民斗争与蓬勃发展着的反日游击运动。应该清楚的了解我们在反日游击运动中束手无策的现象，中国农民群众工作不发展是主要原因之一。各中心地方党部必须打破一切困难，组

织突击队，组织团等，向中心农村特别是游击战争开展的地方，中韩农民联合战线的形成，只有在共同利益要求的斗争上才有可能。

⑤ 加强满洲国的士兵运动，系统的领导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反正”哗变运动，在几个主要部队中建立起来系统的工作，建立党的支部，群众的士兵会、士兵反日会、兄弟团等组织。各级组织特别是几个中心城市与中心地方党部应立即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决定专门同志负责，有计划的系统的进行工作。坚决的执行士兵工作是每个同志的任务，而不只是作兵运同志几个人的工作。

日本士兵工作，一刻也不能容许机会主义的消极，必须打破一切困难，建立对日本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决定专门同志负责哈尔滨、奉天、大连、长春，必须建立外兵委员会，切实的去开辟工作。估计到日本十几万士兵在满洲进行残酷的战争，估计到日本士兵反战情绪的高涨，以及他们的生活痛苦，在战争中死伤的惨痛而引起日本士兵的自杀，是有十分有利的工作条件。

⑥ 反对国民党和消灭国民党在群众中散布的一些幻想，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假使不揭穿国民党的一些武断宣传，斩断群众对他们的丝毫幻想，假使对他们的失败主义、妥协投降以及他们的奸细作用与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事实在群众中不系统的揭露，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就成为不可能。虽然国民党在群众中影响大大的缩小，然而“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较弱等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它能使满洲的游击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前失败”(中央来信)。因此抓紧目前国民党的出卖投降事实，如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的出卖东北四省，出卖河北、平津以及唐聚五、李杜、马占山们的失败投降，尖锐与强烈的在群众中暴露是十二万分之必要的。

同时丝毫不要放松第三党、国家主义派、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应该不留情反对他们在群众中的活动，尖锐的指明他们更巧妙欺骗与走狗的作用，暴露他们无耻的行为。

（3）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与人民革命军。

① 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其成份必须是大部分的工农，保证党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骨干。建立人民革命军的政治

工作与政治部政治委员的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培养成为革命的铁军，保卫人民政权，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

② 在一定地方创造游击区，肃清游击区域内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其走狗，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充作反日军的军费，建立最广大的群众组织，实行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权。

③ 选举的民众政府，其成份只有工人、农民、士兵、城市贫民、学生、革命军官，这些反日的群众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它的任务应该是领导满洲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保护工农的利益，领导群众斗争，使阶级斗争发展成为土地革命，使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得到最后的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④ 为了使人民政权能够转变成为苏维埃工农专政的政权，它必须坚决的不和国民党国民政府发生任何关系，而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保证党与无产阶级及其工农成份占绝对的领导地位，同时必须坚决的参加与领导这个政权，藉人民政权来宽广的发展群众的阶级斗争与发展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组织。

（4）切实的开展维护苏联、维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群众运动：

在真正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及一切革命群众的斗争外，在实际的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上还必须坚决的进行以下群众的运动。

① 在拥护苏联方面：（1）广泛的宣传中国工农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联盟的口号，耐心的解释苏联和平政策与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事实尖锐的对立起来，深入开展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与苏工农生活的改善的宣传。（2）组织苏联之友、苏联参观团、苏联研究社等组织。（3）随时揭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阴谋，最近反苏联战争准备的加强，如英帝国主义唆使工程师破坏苏联的电气，英苏断绝通商，及德帝国主义法西斯蒂等露骨的反苏联的行动，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平津，与夺取中东路的问题，党团、赤色工会应该根据苏联的和平政策及苏联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发动群众的拥护苏联的行动。

② 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主面：（1）苏维埃的土地法、劳动法，应该普遍的深入群众中去，以成为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中深入土地革命的重要指针。红军苏维埃最近伟大的新的胜利，应该与反日反帝

民族解放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红军苏维埃的胜利，就是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苏维埃区域内工农获得解放的实际情形，必须广泛向群众宣传解释。红军苏维埃对日作战的宣言，以及最近红军苏维埃订立反日作战协约的宣言，要深入到兵营、学校、工厂、农村与一切反日军中去，和群众在一块儿讨论解释其主要的内容，组织红军之友，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在工厂支部中切实订出证调计划，组织苏区参观团，经过这些参观的群众报告苏区内具体的实际情形，募捐援助红军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切实具体的检查，根据执行情况，再定出自己经常的计划。

③ 严格的检查这个时期关于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的群众工作，是过于微弱，许多地方党部简直是机会主义的消极，这是最不容许的现象，这是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估计不足，对苏联红军胜利影响估计不足，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开展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群众运动，首先要和机会主义估计不足的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对于空喊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表现也要彻底肃清。

（5）发展党巩固党建立在反帝运动中强有力的领导。

① 党的政治影响不断增长，然而党的组织狭小，使党在执行政治任务方面，往往形成束手无策，因此扩大党的组织，顽强的进行征收运动，使党成为群众的党，在目前是党最严重任务之一。“八一”前，全满必须发展现有数目三倍以上的党员，改变党、民族与社会的成份，中国人占三分之二的数目，工人占五分之一，各级党及支部，要定出经常的征收计划，特别是反日战争区域，应该酌量情形进行公开的号召，号召工农反日士兵入党。

② 建立最中心的产业支部，首先要在铁路、矿山、轮船、市政、兵工厂形成最大的支部，成为我们党最大的战斗堡垒。夺取最大部队的反日游击队，党在里面建立起自己强有力的支部，成为领导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核心。

③ 建立模范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各级组织必须要能有很多的模范支部作为执行党的任务的柱石，这些模范支部必须能够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与健全支部的生活，使支部能按期开会，支部同志能经常为党工作等等。

④ 建立支部领导下的群众工作，严格的打击群众工作中的关

门主义，实现支部周围有反日会，工会、农民协会、雇农工会等组织，建立产业支部，各个同志必须加入工会。

⑤ 系统的提拔与培养干部，各级组织必须开办训练班、流动训练班，使列宁小组的生活等建立起来。每次工农斗争，每次作战中积极勇敢的分子，必须系统的提拔起来担任领导工作。坚决的打击只向省委要干部而自己忽视培养干部的作风。

⑥ 巩固党的领导，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出去，随时随地注意党内的暗探，特别注意党的秘密工作，一切机关深入到群众去，善于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研究每次破坏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近来珠河、海龙、吉林的破坏，必须引起全党对于组织上巩固的严重的注意。

⑦ 发挥同志的积极性，那首先就要倾听下级同志与支部同志的意见，坚决的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要切实去运用具体领导，与经常检查以及个别负责制。

⑧ 各级党部必须加强青年团的领导，建立党、团正确关系，反对忽视与取消青年团工作，领导青年团彻底转变自己的路线，使青年团成为当前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一切青年群众的领袖。

（6） 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与胜利的领导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的群众斗争。

目前满洲的客观条件，十分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发展，与开展胜利的群众斗争。几十万的反日队伍，是在那里英勇的斗争着，广大的劳动者、工人进行不断的残酷斗争，然而，我们不开展深入党内的两条战线斗争，我们便没有法子可以胜利领导满洲的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斗争。肃清目前我们所执行的“左”的破坏统一战线与左的关门主义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目前转变我们的工作之前提。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目前主要的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对于目前满洲战争形势估计不足，而表现悲观失望消沉，认为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可以降低党的口号，以至做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俘虏，放弃群众阶级斗争的领导，以及对于满洲的土地革命估计不足，或者可以不争取准备苏维埃运动胜利的前途。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以及机械的把满洲和中国中部、南部隔绝起来等。同时对于

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左的估计不足的观点也必须予以无情的打击，左倾盲动冒险，立三路线的残余，韩国同志派争时代的残余等，也必须予以彻底的肃清。至于那些认为中央的指示在三个月以前绝对的正确，现在完全不适用的观点，或者总的方面同意部分的不同意，这都是极有害的两面三刀具体表现，它可以助长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会妨害党的转变，会动摇国际与中央正确的路线，同样的应该受到最严重致命的打击。（本文节选自《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

抗日联军一军总司令杨靖宇

发布《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布告

为布告事，查日寇霸占我东三省，成立傀儡政府“满洲国”。复侵略我热河，吞食我华北，到处焚劫，残杀我国同胞。犹不满其兽欲，竟于七月七日捏造卢沟桥事件，企图由华北鲸吞我全国版图。足证日寇穷凶极恶，贪婪无厌。我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酷爱和平，善睦国交，无济于事。我民族要想生存，亦只有武装自卫别无它策。故我全国总动员，业已颁发，实行御侮，以谋生存。溯日我全国总动员令颁发后，所有陆海空军全体将士，无不义愤填胸，誓灭倭丑，为国增光。近日来，因我各路军奋勇杀敌之结果，无论华北、上海各方战线，大军一到勇如破竹，日寇死伤狼藉，步步败北，惨遭大败，日寇虽强，歼灭在迩，祖国光复，指日可待。我东北全体同胞，应在全国总动员之下，凡系中国人，生应抛弃过去旧仇宿怨，亲密联合，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奋斗，万勿丝毫受日寇挑拨离间，互相观望，有失机宜。特此布告，切切此布。

总司令　杨靖宇

大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1936年2月20日）

全中国同胞们！

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们！

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以“防洪自治”为借口，夺取黄河以北五省，更以“日华提携”欺世滥言，想要实现吞并我全中国，日本寇贼近年来更加紧向和平的苏联国屡屡挑战，又与意、德两国勾结，作对抗英、美、法的大战准备。日寇险狠，益见暴露。

日寇企图军事的冒险，必造成世界二次大战，使我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命财产做大的牺牲品，完全变做亡国奴牛马奴隶。

每一个有热血、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以外无生路。因此自去年秋天以来，全中国南北各地勃发抗日救国运动，中间经过虽有曲折，可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成为全中国同胞一致的思想行动了。

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为中华民族国家解放自由发展的关键。

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各军，各反日游击队，为收回东北领土，为保卫中华祖国，四年以来在全东北反日总会领导下与我各反日救国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作游击战争，誓必奋斗到底。现在随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因此，不但将我各军军队建制，名称的不同，完全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同时并宣布下列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紧密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

（二）凡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分性别，不分穷富，只要是抗日

救国，我东北抗日联军便与其行动一致，因此对于内外同胞暨南京政府内反日派别、在野政党、军政名流以至中国苏维埃红军最近抗日救国的一切主张均竭诚拥护。

（三）我们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并由公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四）凡被压迫民族，高丽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少民族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并愿与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友好提携，同时与目前在国际政策上对日寇立于反对地位，例如英、美、法等及其他反日国家，均为我联军所同情，互为赞助。

（五）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亲爱的同胞们！抗日武装同志们！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他并不是什么真正强盛的国家，而是一些少数人财政寡头、贵族、地主、军阀吮吸一切普通人类鲜血的寄生虫集团，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处在国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阶段，只有对自己本国内民众更加压迫、榨取，对国外进行强盗战争，以便市场抢夺，寄生虫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才能生活。它好比吗啡鬼，表面上蒙着红绿彩色的人造丝织物，遮盖自己的吗啡针眼，它又好比盲人骑瞎马，夜半走哈塘（陷坑），希图侥幸往前乱闯。

我们中国海内外同胞应一致团结起来，铲除穷凶极恶的寄生虫魔鬼——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我们从古今中外一切历史事变以及最近阿比西尼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例子来看，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久必能达到成功胜利。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938年11月5日）

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转：

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兵士们，政治工作人员们！

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及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与游击队，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日寇于民国二十年出兵占领我东北，去年又强夺我华北数省，并进兵华中华南，其目的在灭亡我全中国，把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变为日寇的奴隶。但是自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已非“九一八”时的中国了。由于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已结束了民族分裂与国内战争的局面，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地方政府都一致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日开始了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虽因敌我力量的悬殊，在十六个月的抗战中，我国遭受了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军事上的失利，特别是在武汉、广州失守后，一方面增加了某些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我民族的抗战力量更加团结，国共合作却更加亲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更加进步。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

东北四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东北三千万同胞是全体中华人民的一部分，我国全民族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日寇从内地各省驱逐出去，并且要把日寇从东北四省驱逐出去，以建立领土完整的、行政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国。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

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东北抗日联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

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节录）

（1940年4月）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队伍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止此。自从与上级机关中断了联系之后，我们在工作上还不断的遭到不可想象的重大损失，就是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我们很忧虑，万一再度长期断决了这种联络时，不知将来更要遭到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我们的报告分以下四项，其中有些不够和遗漏之处请你们直接问去的人，同时关于其他的秘密事项没有填报上去，也可问他．至于

有关去的同志的一切，另作书面介绍。

（一）第一路军发展的经过

1、简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为止，敌人三年间的讨伐告一段落。于一九三六年夏季，正式成立第一路军后，又用过去的一、二军的部队编成一、二、三、四、五、六师，两个军部的警卫团与各地分散活动的很多小部队。其活动区域广泛地延伸到奉天、吉林、间岛等各城市的附近长达数千里。自通化以西，大部分是过去的第一军部队的活动区域，自通化以东是过去的第二军活动的区域。从地区来讲各地山林队也在相当发展和扩大着。由于同年秋冬两季我抗日部队实力的扩大，敌人就实行了肃正工作和进攻中国，因而日满军等实行了分区的大讨伐。自辑安以西，敌人布置日贼第一师团约五千余名担当讨伐，辑安以东又布置了出征的满军约有十个旅团一万余名，配合当地各警察队（约有一千名）担任讨伐。他们计划三年内消灭我们，但其结果呢？我军各部队均获得了壮大与胜利，击破了敌人的讨伐，缴获了很多新式武器（轻机、重机、轻掷弹筒、重掷弹筒、迫击炮、三八步枪、短枪）。山林队方面，却多少受到一些损失溃散。同年，敌人虽尚未完成集团部落与集结部落制度，但粮食到处受到限制，同年中的战争，比较激烈，我方干部，也遭到损失。

第一路军副司令兼二军王军长，二军李主任（李学忠），一军一师长李红光，师长韩浩，都先后牺牲。一九三七年爆发了中日大战之后，西部（通化省）的日匪，全部开到关内去，东部的满军，也减少了一部分。于同年中，敌人继续向我军进攻，并积极的采用了集团部落，以及经济封锁等手段，斗争形势较前更尖锐化。但该年度里，我军却依然获得了顺利的发展，缴获各种的武器比之1936年大大增多，同年在该活动地区内，由于敌人完成了集团部落，和交通网的准备比以前更加敏速，因而我们的活动区域就被缩小。同年我方的一师李参谋长，二师曹师长（曹国安），四师周师长（周树东），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等同志相继牺牲。一九三八年春季，当东北西部负责同志，在辑安研究南满省委一路军的所有工作时，由于当时一军程斌叛变，被敌人利用等问题，把过去一路军所有的

干部和部队进行调动，因而西区部队的活动大大地变动了。在同年冬季敌人所谓三年间的最后讨伐的时节，我军全体干部和部队都自始自终发挥了英勇的精神，与敌战斗的次数亦相当的增多，打击了敌人讨伐，缴获了更多的胜利品。由于敌人完成了集团部落，就造成我军粮食、物质上的很多困难，因而队内物质生活就逐日恶化下去。再加之斗争更趋于尖锐，干部与部队均感缺乏。同时队内携械叛变事件，也不断地发生，因此被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各种秘密情况。同年中，我方的一军宋主任（宋铁岩），一军三师王师长、周政委，二师杨师长等同志，亦都先后牺牲。

由于缺乏干部与敌人交通网的发达，集团部落之完成等关系，我全军主要的活动地区不得不转移到辑安东部森林地带。

第二阶段：自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一路军主力开到森林地带以至现在，一路军主力开到森林地带之后，多数的部队，犹如被封锁在森林地区之中，这是该地区的住民，极其贫困的关系，另外，由于敌人实行了集团部落的影响 ，队内生活愈益恶化，队内思想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就不断地发生了叛变事件。一九三九年春季，我军主力在森林地带实行了过去二军旧游击区扩大的策略，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夏秋二季，集中一部分主力配合外蒙“诺门汗”战斗实行向敌进攻策略获得很大的成绩。在间岛一带，当时我军横断满鲜国境，对日贼进行不停的猛攻，使日贼前后受敌，被迫缔结了“诺门汗”战斗临时停战协议。整备了集团部落制度，交通网，粮谷增产，以及计划募兵，将“诺门罕”战争主力匪军之一部约一万余名，转派到我军活动地区，积极地向我军进攻。敌人更配备了数架缺乏战斗经验的飞机，终日轰炸、扫射、陆空呼应，一齐进攻我军，结果我方蒙受一部分损失。省委青年部刘同志牺牲后，队内的少数悲观动摇分子，由于不堪敌人不停息的向我进攻作战与粮食困难等艰苦情况，而背叛革命的罪恶分子续出不断，加以缺乏政治修养的主要干部，又干出了卑鄙的行为，尽管敌人向我们进行疯狂的进攻，但我们却仍然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打击了敌人一切的毒计。我们是愈打愈坚强的。

2、一路军的内部组织情况：

一路军的组织，有总司令直接指挥的警卫旅。在旅部中有旅长

与政委，旅长由朴参谋（朴得范）兼任；政委由韩参谋（韩仁和）兼任。在旅部下有一、二团。由于干部缺乏，第一团设一政委，第二团只设一团长。各团内俱有三个连，此外在旅部还设有一警卫连，在总司令部还有直接警卫连。这个组织经常是随从总司令部进行活动的，除警卫旅之外，还有一、二、三方面指挥部。

3、活动地区：

一九三六年秋季到达西部奉天、辽阳、海城、辑安、昌图、西安（现辽源）、西丰、开原、伊通、双阳等地区、东部到达了珲春、东宁、朝鲜的甲山、茂山等地区。自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逐渐由西部移向东部。而现在活动的地方为：通化、临江、长白、辉南、濛江、抚松、桦甸、敦化、延吉、汪清、额穆、永吉、宁安、和龙以及朝鲜北部的茂山等地区。

4、战术：

以过去我们地区的地形与民众情况为根据，利用大小部队的活动，广泛的配备各地的部队，侦察敌情和地形，征收军用各种应用物资，开辟地方民众组织工作。如以敌情、地形以及其他各种情况，适当的利用大小部队，粮食物资则利用地方组织关系，在这些有利条件下，采用隐蔽的方法，袭击敌人或对准敌之弱点向其进行突击的战术，或夜间由森林中向敌军宿营地加以袭击，或者对敌之营防防所、建筑物等警备薄弱处而加以进攻……的方针。近年来，军中各部队的主要战术，伏击与进攻集团部落、木材厂，小城市等，以解决粮食，物资以及扩充新队员等问题。

（二）敌人对群众和我军进行的进攻威吓欺骗政策

1、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政策（武力军事战）：

我军组织，自构成以来，敌人始终不懈地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我军。但是，由于我军全体同志用不屈不挠的精神，英勇向敌奋斗的结果，从几年间获得的实际成绩上来看，对我军不仅是丝毫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充实了我军的武器。回忆我军的开始，是没有任何装备的，只是以棍棒、洋炮、围枪等揭竿而起家，在战斗中、才逐渐改换为新式武装。现在我们还埋藏着数百支枪和机关枪、大炮各一门。敌人使用集中重点的战略，也就是说把它的大量的精锐兵力都来对付我军主力。

集中主力的大部队。主要战术是：一方面从前面猛攻，一方面从后面迂回包围，采取两面夹攻的方法。敌将我军活动地区的地形、气候及其他情况等调查好，充分准备冬季积极地进攻（夏季则防守老家，以便准备秋冬季的讨伐）。为了在冬季对我军进行进攻，在春夏两季就把部队配备到我军活动区域的周围，从各方面来调查我军的足迹和活动情况。敌兵力兵种等的组成，在过去（一九三七年前）是除日贼关东军、守备队与派遣师团之外，更以忠实的满匪充当之。但自一九三七年以后，就采用了各种满匪（警备旅、靖安军、警察队）代行日贼的任务，使其参加中日大战。其中也有些满匪是有战斗力的，同时利用我军的叛徒编成工作队。故其内容是很复杂的。

在经济上，由于日贼数年来对中国的长期战争，经济能力陷于崩溃的状态，对我抗日联军，最近大大地实行了经济封锁。以企图使我们由穷困疲备而归于自消自灭。他们残酷地烧毁了散居于我军活动地区及其接境区域内的人民房屋。积极的建设集团部落，确立保甲制度，设置警察侦探网。他们口头上虽然说什么强制保管粮食等，但实际上就是没收粮食。如果发现住民有对我军援助粮食者，则对其全家枭首示众；并且又强迫民众干所谓归顺工作。

敌人残暴地断绝我军的粮食与封锁生活的必需品。为禁止我军必须物资的买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子，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高抬物价或向食品中放毒的办法。

价格的提高情况是:一尺布需要满币一百二十元以上，一双穿不上五天的水袜子要六、七元，一斤白糖要一元二毛钱以上等。当我军进攻大小村落与小城市时，敌人首先就向某种粮食上放各种毒药（特别是白面、大米等），企图毒死我们。

敌人数年来虽在军事上遭到惨痛的失败教训，但仍然的以武力征服中国全体人民的抗战，凶残地对付我东北抗日联军。敌自瓦解了自卫军和救国军后，即利用内部分离政策进攻我军。大胆地进行试探性的利用，如对一师的程斌，企图获得特殊的收获。在发现了我军贮蓄的粮食和物资时，则全部抢走或烧掉。

在思想战、宣传战方面(对我军进行归顺工作和内部破坏工作)，狡猾的日贼对过去在我们领导下曾经参加过抗日运动的东北山林

队、不仅向他们进行宣传，而且还以创造人类的新生活与新社会等欺骗口号，改造他们的思想。

现在敌人所使用的思想、宣传战的方法、及其内容是：目前国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苏联内部紊乱，中国已成立起新政府，国共已分裂，东北抗日联军已瓦解……等等的谎话，企图在我军队员与干部思想上引起悲观失望，用以瓦解我军；并宣传日帝强大无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实力，以号召归顺。更利用少数投降的叛徒，来紊乱我军纯结的思想；或以利饵来动摇我军，或威迫和利用我军干部及队员的家属、亲朋等进行引诱劝说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经费，大大的动员无知的群众，在各处进行劝降活动；甚至利用物资和女人来引诱我们队内的落后分子脱离革命，他们抓住队内生活的困难与性的问题，为企图收买我们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队同志，如敌曾指派漂亮的妇女（十八九岁）以性交作引诱，或把男女性交的像片散布到我们活动区域内，诱惑我军的青年战士投降；或经常向我队内寄送已投降者单身象片，用作劝诱队内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们交通网断绝而不能进行联络的弱点，派工作员到我们各个部队中，制造某某部队已投降等谣言，动摇军心。

（三）我们的群众工作

1、在日贼方面，为了挽回其即将崩溃的统治，以及补偿其数年来的损失，准备世界大战，即以极其野蛮的残暴手段，掠夺拥有无限宝藏的东北地方（ 满洲）。不仅把东北全部资源攫在自己的魔爪下，近年来连属于几千万工农人民的资产——土地及其它都划为敌有。压迫我同胞——中国人民，像牛马一样从事于奴隶的劳役，最后开赴前线，用毒辣的手段置之于死地。虽然对此的愤怒和反抗之声到处可闻，而日贼却愈益达其残暴。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民众就逐渐自觉起来，各阶层前后的群众有的也转变了消极的态度，一步一步的走向斗争，以斗争中求生而迈向革命的大道。去年日满匪徒在全满警务厅长会议席上，报告了各地情况，从那个报告的情况看，所谓不稳与反满抗日检举事件逐日增多，检举次数总计为二千四百八十三件，被检举的人数计达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五人。这是敌人发表的数字，实际上的检举次数和人数，是不止此数的。从这点来看，就足以知道我东北人民对于反

日运动如何高涨的。

日贼的基本民族阶级等各种残暴的政策将随着日贼的经济没落程度而发生急剧的变化，万一发生其他新的战争时，则必然形成狂风烈火般的扩大趋势。特别是苏日战争起来后会给东北一切中韩人民一个很大的刺激和鼓舞的。如一九三八年夏季张鼓峰事件，一九三九年夏秋之交的“诺门汗”事件是其例。这两个事件的爆发，是极其剧烈的，当时大部分民众（满军官兵等）都怀着一种侥幸心。为了给日贼以更大的牺牲，我们赞成满军中某些人把家族安顿停当，广泛的参加我们的抗战。

我们的地方组织工作，一九三六年组成东满特委，盘石中心县委，更于通化、桓仁、兴京、抚松、长白等县以朝鲜北部的中心地区，都组成了部分的组织工作。

2、过去我们的民众组织工作：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3、现在的地方组织关系与我们将来的工作计划：

数年来各地的游击队与队内干部问题，是极其棘手的，同时，由于全党同志上下一致的轻视或放弃了地方工作，所以就大大便利了敌人的封锁政策，逮捕、屠杀等野蛮的行为。我们地方工作虽有形迹，但在南满省委下的组织，在城市中或大村落中都缺乏“可以自由开会，自由工作的模范支部”。这是一个遗憾。

虽建立了支部而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存在，并且大部分都是个人的领导关系，只起到一种购买物品关系等的作用，缺乏积极反日救国会的工作，处于忍受敌人暴政的状态. 如果说它是实情很为悲惨，一点也不算过火.

在今春南满省委的会议上，讨论了军、党关系的各种问题，在“我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向来轻视了地方民众工作的思想”这一点，已取得一致意见。为了打破这种错误观念，我们就决定：由现

在队内调出一批中、下级干部，组织地方工作与突击队，使他们完全断绝与部队的关系，专心一意地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过去的负责同志虽在口头或通信中报告说进行了工作，但没有任何实际活动，因而经过几年工作，依然毫无所获。现在多数的抗日群众未参加统一战线，就是由于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造成的。困此，我们有必要对一般广大的群众，进行反日求生的领导。

日贼对群众，是逐步的进行强盗、掠夺、奴隶劳役，募兵等暴政。他生怕给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就会使反日统一战线高涨，引起广大民众反日的运动，加以更大的镇压。

实际上在群众中未能实现这种运动和可能的组织工作，以及统一战线的计划，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

①由于过去强调军事主义的结果，只重视队内工作，常调动地方工作干部到队内，因而队内一般干部轻视或放弃地方工作，象过去二、三年中，一般上级干部都未注意这一问题，只是单纯地率领军队活动，并且注意其巩固与扩大，而对地方工作，则丝毫不关心，虽然用口头、文件以及决议布置到小部队，但实际上只是征收军需品，甚至无意之中也起了一些破坏作用（不注意秘密工作，一切都自由执行）。一切方面，都缺乏专门负责的地方工作干部，因而尽管小部队进行队外工作，但也领导不好。几年来都未曾收到良好的成绩。

②干部的困难：数年来由于游击战的激烈和敌人残酷的各种制度的加紧，使我们得不到干部的补充，因而现在队内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技术干部，各方面都陷于极度困难的状态中。只依目前所有的干部，已很难维持现状了。

现在队内的干部，全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如果把这些干部派到大小城市中去进行活动的话，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又因为住民证、保甲、户口制度的完备，使他们不可能在地方常住，万一要派他们去，再工作也只能起到仅从外面了解问题的作用。

敌人过去在我军活动的地区或已脱离活动的地区，都完成了集团部落的建设，但它还是不巩固的。因此，我军大部队在这样的地区，特别是在山林附近的大小村庄等处，还有便利活动的余地。但最近敌人已将这些村庄撤走，迫使我军转移到不利的地区去。

③敌人经常的对我军采用进攻、封锁、破坏等政策，广泛的从大小村庄中收买落后分子（投降者），暗查群众与我军的联络关系。如果发现对我军有联络者时，其当事者本人自不必说，就连本屯中的群众，也会一律地遭到逮捕和惨杀，则对所有该村群众进行拷问或威吓，用尽一切手段，调查我地方组织，予以破坏。

（四）我们目前工作和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

1、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后，上级机关并未能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于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极少数。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各二、三名，希望派来。

2、文件的问题：

自1936年后期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著的《为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文件以来，前后六、七年间没有收到任何文件。希望送来一九三五年以后所发行的文件各一份，并请将对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以及一般群众为对象的报纸，小册子等各发五份。中国八路军所发行的小册子——军用书籍（中文版）技术方面（炸药类）等各种书籍，亦希望尽量发给。

3、物质方面：

步枪、机关枪子弹，可由战斗中解决，现在感到缺乏的是匣枪子弹，现在所有的都是相当旧的不良子弹，但这些东西，虽在战斗中亦可得到若干解决，但希给我们一万发匣枪子弹，和匣枪发条二百个。因为目前匣枪倒相当多，但是发条都不能使用，因此希望发

给我们发条。另要求两架高射机枪，因我们曾向敌人夺取很多轻机枪，但是没有防御敌人从空中进攻的东西，所以去年冬季受到敌机相当的扫射。

我们在战争中获得数台无线电（其中有两台是远距离的，能收送中国以及远东方面，有三、四台是近距离的，可供我军相互间联络之用），希望派来能使用这些机器和能创造和使用防毒面具、炸药（炸交通建设物用）等的技术人员。

4、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这次由于长时间与上级机关失掉联系，结果给我们工作上造成很多重大损失。从这一经验上来看，我们也能断定今后不失掉联络。我想最好是由我们负一部分交通线的责任，另外请中央也负一部分责任。对于这点，就需要熟悉地区内地理的人，最好是由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选出。对中央所希望的是：因我们从敌军的报纸上看，知道在东北满洲地区有反日组织在秘密活动。我想这可能是由中央个别组织领导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是否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关系上取得联系和协助。

上述各项，一定会有不充分之处，好在是这次派去的同志，在本区内有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希望详细问他，再做研究。

（注：本文在编辑中调整了文内序号）

魏拯民同志在抗联一路军干部战士追悼杨靖宇大会上的讲话

（1940年3月15日）

杨总司令的牺牲，是我们长白山区根据地人民和第一路军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党的生活，他没有个人生活，我们一路军的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忘记杨总司令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的，这一笔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让敌人用血来偿还！同志们，革命的战士们！抬起头，挺起胸，握紧枪，为东北和全国人民报仇，为杨总司令报仇！

靖宇同志生前没有完成的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无愧于心地在靖宇同志墓前说："杨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在杨靖宇同志公祭安葬大会上中共中央代表致的悼词

（1958年2月23日）

今天，我们来为十八年前为国牺牲的杨靖宇同志安葬，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表示深切的悼念！

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一方面有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一方面有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非常艰难的。东北抗日联军当时面对着中国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到底，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在任何敌人面前，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的伟大精神。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共产党人和许多爱国志士流尽了他们的鲜血，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杨靖宇同志就是在斗争中英勇牺牲了的一个伟大的战士。我们今天来纪念杨靖宇同志，也就是纪念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了的一切革命战士。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一个部分。大家都记得，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了革命的时候，中国人民面前笼罩着一片黑暗。这时，只有中国共产党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率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卖国的，反人民的国民党统治把中国的事情越搞越糟。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实行武装侵占。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所谓不抵抗政策，听任日本侵略者占领整个东北，并且把它的侵

略势力向华北和全国发展。这时，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站到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并且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东北地区来工作，杨靖宇同志是其中的一个。杨靖宇同志和东北地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其他共产党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他们和东北各族人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并且团结了一切爱国的力量，在党中央领导下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给了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参加当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还有许多朝鲜同志。在共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后来又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在斗争中长期发展起来的友谊是最巩固的，最可宝贵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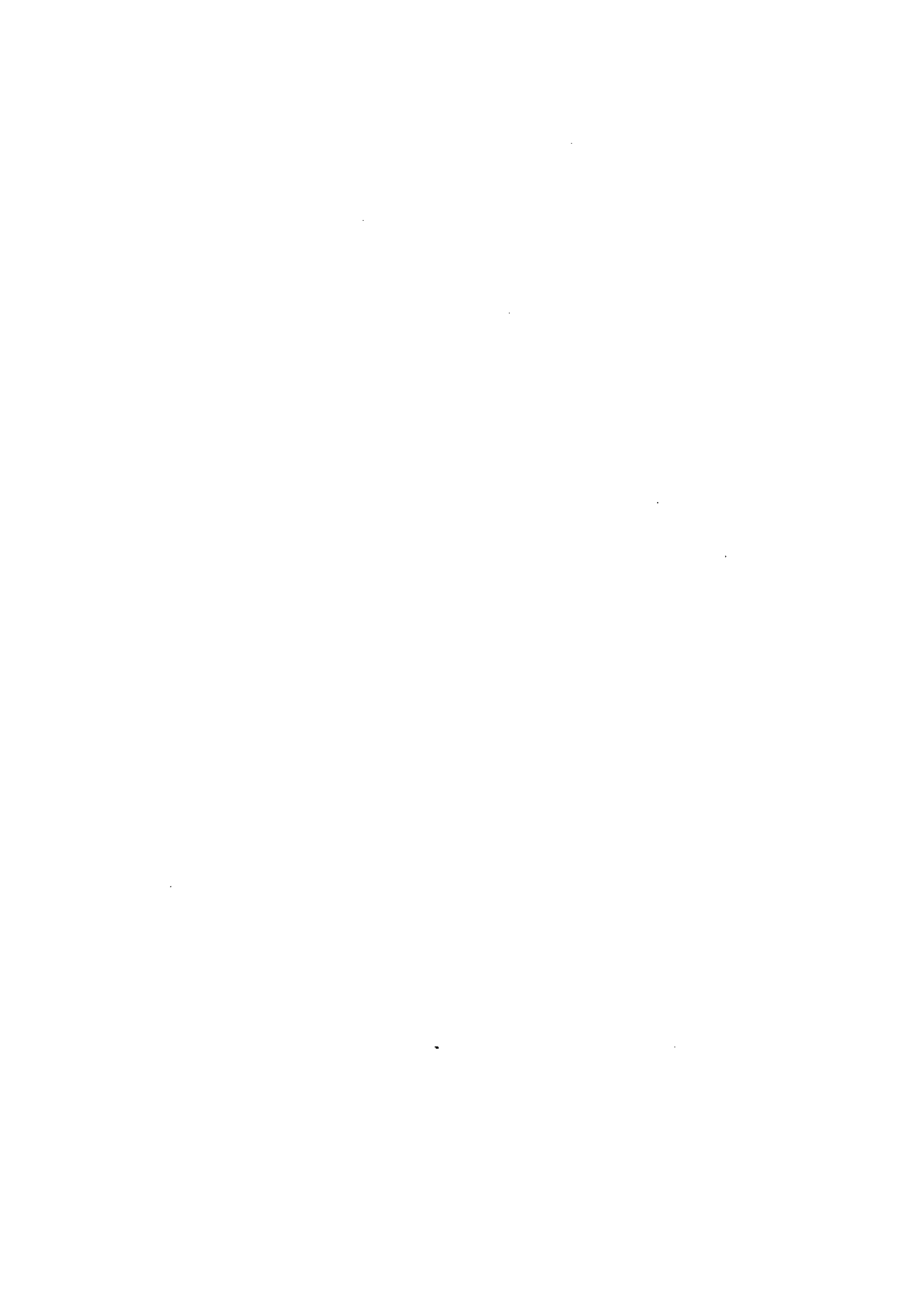
杨靖宇同志的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他热爱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群众，能够把各族人民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杨靖宇同志牺牲以后的十八年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六亿人民，不但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数的革命先烈在艰难的斗争中毫不踌躇地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这就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牺牲能够为后人开辟出一条通向无限幸福的大道。现在我们来纪念他们，就应当用同样的革命毅力，用同样的刻苦奋斗的精神来把我国的建设事业迅速地向前推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东北抗日联军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辑安抗日英雄人物



杨靖宇

杨靖宇（1905 - 194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主要负责人。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 年 2 月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里。8 岁进私塾读书，后在确山县高等小学、开封纺织染料工业学校读书。

杨靖宇同志在青年读书时就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7 年，他领导了确山县农民起义，并任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4 月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豫南农民起义，组织了 5 万农民武装围攻确山县城，打垮了北洋军阀第八军的一个旅，活捉了县长王少渠，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级人民政权—确山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7 月 15 日国民党武汉政府叛变革命，杨靖宇率部队转移到县东刘店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根据地。9 月 30 日他又领导了刘店秋收起义，重新组建中国共产党确山县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豫南游击队，任总指挥。曾指挥部队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进攻和地方顽固势力的骚扰。并控制了东至马乡、南至明港、西至县城、北至水屯 100 多里的大片地区，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来，又率部开辟了四望山革命根据地。1927 年秋末冬初杨靖宇调往河南省委工作，在此期间曾 3 次被捕入狱，均被党营救获释，随转上海。

1929 年，杨靖宇受党组织委派由上海调往东北工作。任抚顺煤矿我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1931 年，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调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代理军委书记，1932 年 11 月，受满洲省委委派到盘石、海龙等地视察工作，整顿党所创建的抗日游击队。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把盘石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把海龙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对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

领导，决定把杨靖宇留在海龙南满游击队，担任组织领导工作。

1933 年 1 月，杨靖宇同志担任了南满游击队政委，在此后 3 个月的时间内，由杨靖宇同志所领导的抗日队伍，先后粉碎了日军 4 次大讨伐，经历大小战斗 60 余次，还建立了以红石砬子和玻璃河套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 5 月，杨靖宇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杨靖宇同志坚决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先后联合了马团、赵旅、天虎等抗日军、山林队组成了"抗日军事委员会"。杨靖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从此，在杨靖宇同志的精心组织下，连续进行了袭击伊通县大兴川、伊通营城子、吉林七区和呼兰集场等城镇据点等战斗，均取得很大胜利。与此同时，积极开展瓦解敌军工作，联合抗日武装力量 3 000 余人，使游击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1933 年 9 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杨靖宇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任师长兼政委。日伪军极度恐惧和不安，组织 1.2 万日伪军对杨靖宇率领的抗日队伍进行新的大讨伐。杨靖宇留下一团、教导营和少年连，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盘石牵制打击敌人，亲自率精锐部队跨越辉发江南下打击敌人。到 1934 年春，杨靖宇率部接连组织了奇袭三源埔、智取凉水河子、攻占八道江等重大战斗，并组织部队多次进出辑安，开辟辑安游击区和密营区。不但壮大了自己，同时也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抗日士气，还争取了二十余支抗日军首领和山林队，于 1934 年农历正月初八，组成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被推举为总指挥，从而粉碎了日伪军的秋冬大讨伐，这一壮举震撼了日寇生命线——整个南满。同年 9 月，在召开的中共南满和共青团第一代表大会上，杨靖宇同志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决定建立统一的地方党组织中共南满地方临时委员会，杨靖宇同志任书记；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同志任军长兼政委。一军成立后，先后打下 60 多个大小城镇，把抗日游击斗争扩大到南满 30 余个县，把南满地区的抗日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南满人民革命军的壮大，日酋关东菱刈大将不安地叫嚷："共匪杨靖宇执拗反日造成皇军心腹大患，南满地区势必成为治安肃正的重点"。1935 年后，杨靖宇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六·二六"指

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迂回于通化、辑安、桓仁、新京、本溪、宽甸等广大游击区。时而袭击敌人的集团部落，时而破坏日伪工程工事，时而歼灭日伪军的据点，时而粉碎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先后组织了热水河子端邵本良伪军团部、辑安二道崴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智取太平沟伪警所、奇袭台上警察署、凤城梨树甸子大捷全歼邵本良部一个营等战役战斗。还创建了著名的辑安老岭抗日根据地。1936 年 7 月，杨靖宇同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同时兼任一军军长、政委。到 1938 年，先后组织指挥抗联一路军与日伪军进行较大战役战斗数十次，其中包括在辑安家什房子伏击"满洲剿匪之花"索旅三十二团、长岗全歼索旅的骑兵四十一团、夜袭阳岔 11、12 号铁路桥梁工事区及土口子、东岗日军工程工事区、攻打青沟子警察署等，打得日伪军焦头烂额。把整个南满抗日运动推向鼎盛时期。

1938 年 5 月，抗联一、二军于辑安老岭根据地再次会师。杨靖宇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岭高干会议。不久又召开第二次老岭紧急高干会议。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改编为 3 个方面军；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除留第一方面军继续留在老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外，抗联一路军其余主力撤进长白山区密林地带，继续同日寇开展英勇顽强的斗争。1940 年 2 月 23 日下午 4 时 43 分，杨靖宇于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只身与敌军顽强作战，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和第一路军转战东南满，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给日本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军事力量，震撼了整个日本关东军，彻底搅乱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侵占全中国、占领蒙古、进攻苏联称霸亚洲的美梦，在牵制日军入关，支援全国抗战，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事业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

杨靖宇将军虽然英年早逝，但他那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他那中华民族英雄的高大身躯将像长白山一样万世永存！

魏拯民

魏拯民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原名关有维，1909年生于山西屯留县。早年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平、安阳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4年冬被派到东满，他走遍了各根据地和游击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后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任政治委员，联合东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1935年夏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3月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治委员。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与抗联第一、第五军配合作战，扩大抗日游击区。同年7月后，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后任第一路军副司令，与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濛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日伪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1938年，魏拯民同志率抗联二军教导团、独立旅及一军二师一部与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军于5月11日在辑安老岭山区五道沟里会师，曾参加在辑安老岭根据地召开的中共南满省委与抗联第一路军负责干部联席会议（即著名的老岭会议）和老岭紧急高干会议（第二次老岭高干会议）。并同杨靖宇将军一起在辑安组织指挥了家什房等重要战斗。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魏拯民积劳成疾，行军作战中常常昏倒在地。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第一路军和省委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他拖着病体，率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安图伏击战、哈尔滨岭袭

击战等胜利。这年冬天，他病情加重，不能随军行动，只好到长白山区桦甸县牡丹岭抗联密营中休养。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常常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书写报告、总结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鼓励同志们要坚定胜利信心："敌人不能永远占领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要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他只能靠吃树皮、松子和蘑菇度日，加重了病情，于 1941 年 3 月 8 日在桦甸县牡丹岭四道沟密营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 32 岁。

杨俊恒

杨俊恒，1910 年生于吉林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过几年小学，后因贫困辍学回家。不久，参加东北军。在六七六团王树棠部下当兵，不久即被提拔为少尉排长。"九·一八"事变后，王树棠率部投降日寇。杨俊恒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暗中鼓动士兵进行抗日活动。这种行为得到营长苏剑飞的赞扬和支持。他们乘团长外出之机，率领爱国士兵，砸开军火库，取走枪支弹药，将队伍拉到哈尔滨参加了李杜等领导的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失守后，他们率领部队转战珠河、方正、五常等县。不久，在五常沟，与田霖领导的抗日队伍相逢，并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联合抗日队伍。

1935 年苏剑飞壮烈牺牲，杨俊恒继任大队长。从此，杨俊恒率领南满游击队活跃在濛江、金川、抚松一带。不久，南满第一游击队与军部会合，杨靖宇决定将南满第一游击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杨俊恒任团长。1936 年，杨靖宇率第一军主力再次到通化、辑安（今集安市）展开抗日游击战争，队伍发展迅速，因此，军部决定将第二教导团、第五团一部和游击大队等扩编为第三师，杨俊恒被任命为第三师参谋长。

为了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1936 年 11 月，决定由抗联三师西征。西征途中，杨俊恒身先士卒，多次粉碎日伪军围追堵截。但终因辽河未封冻，无法渡河，敌人封锁严密，不得不放弃西征计划，返回清原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活动。他不仅作战英勇，而且为了部队安全，每到一处，

他都不辞辛劳亲自查看地形，并经常与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

1937年9月16日，杨俊恒调军部，被任命为抗联一军参谋长，协助杨靖宇处理军务。此后杨俊恒长期随杨靖宇转战于辑安老岭山区，参与了一军多次军事行动的谋划和指挥；老岭高干会议期间被任命为三师师长。此后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辑安家什房子伏击战、长岗两次伏击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索旅战斗。不幸在长岗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李红光

李红光，1910年出生，朝鲜族人，原籍朝鲜京畿道龙岩郡。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在李红光9岁时，其父母就携其全家逃荒到了中国吉林一带，1926年定居在吉林省伊通县流沙嘴子屯。受压迫受奴役的困苦屈辱和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铸就了李红光反抗日本侵略，执著追求翻身解放的信念。

1930年3月，李红光在伊通县三道沟组建了劳农赤卫队并担任队长。赤卫队坚决打击亲日分子，严罚恶霸地主，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李红光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很快得到当地党组织的信任，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群众抗日斗争的领导，建立磐石中心县委，并建立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双（阳）伊（通）特别支部，李红光担任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李红光等组织专惩汉奸的“打狗队”，任队长。1932年2月，调任磐石中心县委委员，并担任磐石赤色游击队长。同年4月，亲自组织领导磐石“四·三”反日暴动。

1932年6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在磐石地区宣告成立，李红光在总队部工作。不久后该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1933年9月，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李红光任师参谋长，曾多次率部队进入辑安

活动，是东北人民革命军最早进入辑安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34年初，曾率部在辑安北部山区建立游击区和多处秘密营地。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李红光任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率领抗日武装坚持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1935年3月，李红光率部离开辑安、临江一带，进入宽甸、桓仁、兴京一带开辟游击区。5月11日，李红光率部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5月12日，25岁的抗日英雄李红光因伤势过重，在辽宁省新宾光荣牺牲。1946年，在李红光战斗过的南满地区，还以他的名字组建了李红光支队，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

宋铁岩

宋铁岩，原名孙萧先，字晓天，曾用名宋占祥、铁坚、铁英、孙克敏等。1909年12月6日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前搜登河村一个大家庭里。

他8岁在搜登河村姜家店私塾念书，12岁入大绥河高等小学。1925年秋，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升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老师谢雨天、楚图南等人的革命影响，进步很快，成为二师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发起创办了一个“秋声书社”，向同学们介绍进步书刊，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奋起救国。

1930年秋，宋铁岩从长春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去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北平革命互济会。1931年春，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先后担任北平互济会中国大学分会主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北平市大学学生联合会理事。

“九·一八”事变后，宋铁岩作为负责人率领北京学生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此后不久因南京政府慑于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不得不将他及同时被捕的代表释放。宋铁岩同志

又回到北平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932 年秋天，受党组织派遣，宋铁岩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1933 年初，打入东北军某部迫击炮连二排当兵。经过他们暗中开展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乘该连移防到磐石县烟筒山车站的有利时机，领导该连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支队伍后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宋铁岩同志任大队政委。

1933 年 9 月，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独立师，宋铁岩同志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 11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宋铁岩同志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5 年 2 月，回到军部领导政治工作，随杨靖宇同志率一军军部在辑安、通化、桓仁一带活动。

1936 年 2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成立，宋铁岩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并于 4 月初参加了辑安二道崴子战斗及凤城、梨树甸子歼灭邵本良部一个主力团等重要战斗。同年 7 月，宋铁岩同志率领一师西征，又参与指挥伏击日军金田中队等战斗，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

1936 年 9 月，宋铁岩因劳累过度，肺病加剧，遂带一部分队伍进入本溪游击根据地老和尚帽子山里密营休养。1937 年 2 月 11 日拂晓，密营被敌人发现并包围，宋铁岩同志在掩护部队撤离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7 岁。

伊俊山

伊俊山，原名伊绍宗，字少师，曾用名伊少。1908 年 11 月生于吉林省拉林东城子沟子沿屯（现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镇）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幼年丧母，先在本屯私塾读书，后入双城第三中学学习。1927 年入北平弘达学院补习。次年考入外交部俄专（后改为北平大学商学院），专攻俄语和经济学专业。后东渡日本，在东京铁道学校留学，1930 年归国，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参加反帝大同盟。

1933 年，返回东北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开始了戎马生涯。1934 年，他投奔抗日游击区。1935 年 2 月，伊俊山任第一师第三团政委，参加与指挥了进攻大甸子、双沟突围等大小战斗十余次，给敌人重大杀伤。

1937 年，伊俊山与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各军 760 余名指战员攻打伊兰县城，毙敌 3 000 余人，破坏了敌人的城防设施、银行，扩大了抗日联军的声威，推动了下江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动摇了伪警的军心，促使三道河子伪警大队和伪军第三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先后哗变，走上抗日道路。

1937 年 11 月下旬，魏拯民和伊俊山在濛江、抚松与日伪军冬季讨伐队相遇。他们昼伏夜行，抓住战机，控制制高点，歼敌百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两台发报机。

1938 年 5 月，伊俊山参加了在辑安（集安）老岭召开的抗联第一路军和中共南满省委负责干部会议。会上，他报告了北满、吉东抗日形势及第二军独立旅南征的情况。

1940 年，伊俊山调任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伊俊山先后担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民道科长、绥阳县县长、专员公署秘书室主任，牡丹江省建设厅秘书主任等职。

1953 年，伊俊山调冶金部黑色冶金设计公司任副经理。1958 年，伊俊山抱病出席公祭杨靖宇将军大会，1964 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病逝，终年 56 岁。

曹亚范

1911 年生，北京人。1928 年到吉林和龙任小学教员，1930 年参加了党领导的延边、和龙地区的“五州暴动”。1931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到中共东满特委工作，在延吉、汪清等地参加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斗争。1933 年 11 月任中共和龙县委书记，发展中共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 年 3 月任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5 月调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二

团政治委员，率部在敦化、蛟河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活动。1936 年 3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三师（后来的二军六师）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所部从安图转战至抚松、临江一带，取得松树镇、大洋岔、小汤河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游击区。同年 7 月被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1937 年二师师长曹国安牺牲后，曹亚范被调任东北抗联第一军二师师长，后率部转战长白山区，挫败日伪军多次讨伐。

1938 年 8 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一方面军指挥，率部在金川、临江、辑安、通化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曾取得袭击辑安二道阳岔和临江三岔子等战斗的胜利。1940 年 4 月 8 日带领部队外出筹粮时，在濛江龙泉镇西瓮圈被叛徒杀害，年仅 29 岁。

韩仁和

韩仁和， 1913 年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他高小毕业后到东北当兵。“九·一八”事变后，在伪吉林警备第五旅步兵第十四团迫击炮连任班长。1933 年端午节，随部队起义，任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班长，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 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部秘书。从此一直工作、战斗在杨靖宇将军的身边。1934 年 11 月任第一军军部秘书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1937 年他先后参加了歼灭敌水出大队、辑安二道崴子伏击战等多次战斗。1938 年任一路军及一军参谋，是杨靖宇将军得力助手，较长一段时间内，活动在通化、辑安、桓仁、新宾、宽甸一带。曾经参加袭击老岭铁路隧道工程、家什房子和长岗歼灭 “满洲剿匪之花”伪索玉山旅战斗及摸火堆等战斗。同年秋任警卫旅政治委员，随杨靖宇南北转战。1940 年，韩仁和率警卫旅转战京图（今长图）铁路以北的五常、宁安、东宁等地，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1941 年 3 月 13 日，韩仁和率 9 名战士在宁安县上湾沟与日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时年 28 岁。

刘仁凤

刘仁凤，原名刘云峰，1910 年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一个农民家庭。为了生活，随父闯关东迁到吉林省通化县新安堡小青沟（今光华同心村）定居务农。1934 年初，杨靖宇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部队，经常到刘云峰家乡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在抗联部队的影响下，他自发地拉起七、八十个农民组成抗日队伍加入了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杨靖宇将其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六团，并任命刘云峰为团长，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 年 3 月 20 日，刘仁凤率领百余名人民革命军战士到通化县西高丽城子组织群众，建立了农民反日会。在农村发展农民自卫军 170 余人，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6 年 2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刘仁凤同志仍任第一军第一师六团团长。1936 年 4 月 5 日，在杨靖宇率领和指挥下，刘仁凤带领六团，同军部共 400 余人，在辑安县二道崴子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大获全胜。

1936 年 6 月，抗联六团在辽宁桓仁县一带执行任务后，撤到辑安县财源马蹄村侍命，为筹集粮草，6 月 17 日晚，刘仁凤带着 30 余名战士连夜向头道区米架子屯范家（群众称土财主）大院督催粮草，晚上住仇家大院里。18 日凌晨 3 点多钟，天刚放亮，邵本良伪军和山林警察队七、八十人由告密者带路，包围了刘团长和抗联战士住的屋子。刘仁凤团长在突围时率先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他突围后见抗联战士还没有跟上来，就又返回接应，在接应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26 岁。除一名炊事员因在敌人合围之前起早挑水幸免于难，其余 29 名抗联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林振清

林振清，字羽忱，又名林羽秋，1888 年 1 月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百官屯，少年时曾读 3 年私塾。曾入奉天警察专习所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0 年，任西丰县省防军骑兵第一团少校团副。后调辑安县任公安局局长。1932 年 4 月，唐聚五举旗抗日，联络各县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辑安县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十八路军。在成立大会上，林振清被正式委任为第十八路军司令。同年 6 月 8 日，日军侵占辑安县城后，林振清曾两次率十八路军攻打辑安县城，并指挥十八路军进行山城子石灰窑、长岗等地反日军扫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年 10 月，林振清率领十八路军官兵奉命向抚松、濛江一带集结。但因唐聚五暗自进关，各路军大都星散。林振清等率部回到通化辑安交界的挠头一带坚持抗日斗争。12 月，伪辑安县公署派士绅诱降十八路军，林振清拒绝投降，隐退关内，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此后又先后任巴县和桓仁县公安局长，解放后善终于沈阳。

姚黎明

姚黎明，原名姚允章，别名姚介民、姚蕴芝、鲁荣。1913 年 7 月出生在山东省荣城县王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以后参加山东人民抗日军后方司令部胶东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部队工作。1941 年任荣城县政府经济建设科科员。

1942 年 2 月姚黎明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海外各界抗日同盟会安东（今丹东）分会主任委员。随后中共胶东区党委正式派姚黎明等人到安东市开展地下工作。他在安东伪区政府以伪职员身份做掩护，在安东、大连秘密发展会员，开展抗日活动。1943 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姚黎明来到辑安县（今集安市）开展抗日活动。

同年 10 月，胶东区党委为了指导辽东抗日工作，又成立了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定姚黎明为主任委员。1944 年 3 月，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委员会改为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总部设在安东。

1945 年 2 月，我党在七道沟成立辽东党支部。在召开的第一次支委会上，批准了姚黎明等 8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通化分支部，下设通化、辑安、七道沟、大连、沈阳 5 个党小组。姚黎明任辑安党小组长。此时，抗日同盟辑安分会正式成立，姚黎明兼任该分会主任委员，辑安区的党和抗盟工作，由他全面负责。

同月，姚黎明等购兑辑安兴亚饭庄，建立地下党秘密交通联络点，姚黎明机智勇敢，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多次躲过了敌人的盘问、搜询，并经常到七道沟、桦皮甸子、良民甸子、上套等地组织领导党的农村地下工作，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工作十分艰苦和危险。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0 月，上级决定由姚黎明带队接收辑安政权。当时通化兵力不足，大部队留下守城，他仅带 34 名干部战士和五十八团新收编的一个连（连长何学福，指导员是组织派去的李鹏飞）前往。

10 月 9 日晚上，因何学福叛变，姚黎明、李鹏飞、丁参谋长等 34 名干部被押。经通化专署营救，敌人将姚黎明、李鹏飞除外的其余干部战士全部释放。后见大势已去，也只好将姚黎明、李鹏飞放出。

11 月初，通化保安司令部祝顺鹏副司令和姚黎明等领导率队第二次武装接收辑安政权。11 月 20 日，成立了辑安县人民民主政府，通化地委和专署公布命令任姚黎明为辑安县长；同时是辑安县地下党负责人。

姚黎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集安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受到集安人民的拥戴和赞扬。

1949 年初，姚黎明调离辑安回安东工作。1977 年，于丹东市五龙背疗养院病逝，终年 64 岁。

叶景山

叶景山，字企人，又名叶蕴时。1910 年生于辑安县头道。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在唐聚五、王凤阁和抗日联军中担任重要职务。是辑安县（今集安市）知名的抗日烈士。

1932 年春，唐聚五在桓仁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前夕，委派叶景山进关网罗兵工人才。同年 10 月，被唐聚五任命为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通化兵工厂厂长。通化城失守后，轰轰烈烈的自卫军抗日运动进入低潮。第十八、十九路军均争取叶景山为本部的军械保障出力。叶景山当时提出的“当务之急不是兵工生产，而是重新集结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议得到王凤阁等首肯和重视，命其代表自卫军联络自卫军散部和绿林豪杰。第十八路军解散后，原大刀会为主的王殿阳团成为王凤阁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原第十九路军）独立团。叶也于此前后被王凤阁任命为团长，实际上是对外联络官。

叶景山长期奔走于朝鲜革命军（以下简称朝革）基层组织及抗日绿林武装之间。1934 年正月，他终于与朝鲜独立同盟革命军总司令杨池奉见了面，叶景山提出实现中朝抗日力量的联合、朝革武装内部统一以及争取中国政府支持等主张，使杨池奉迅速改变了对叶景山的不信任，表示愿意与王凤阁的义勇军合作，并希望叶景山能成为朝革的臂膀。叶景山欣然同意，遂被任命为朝革一师参谋长。

1934 年农历二月，叶景山与朝革的陈又欣（金东耳）夫妇代表朝革进关请愿，请中国政府派兵，与东北抗日武装里应外合。但未能如愿，于同年秋回到东北，其时朝革杨池奉已被日本奸细杀害。

叶景山一方面奉王凤阁之命，继续保持与各抗日武装联系，掌握各部动向；另一方面，应新产生的朝革总司令部的要求，利用叶与原司令杨池奉及其部下的良好关系和其作为中国同志帮助朝革进关请愿而在朝革中不断提高的威望，帮助朝革将因朝革活动陷入低潮而在各地潜伏的朝革武装统一起来。

1934 年 11 月，王殿阳牺牲后，王凤阁部与朝革武装处境愈加艰难，而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联前身）则愈发活跃。

东北人民革命军坚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逐渐使王凤阁和朝革都改变了与东北人民革命军若即若离、甚至保持距离、不相统属的状态，通过叶景山等人加强了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的联系，开始了部分军事上的合作。而叶景山也为此认识了东北人民革命军这个抗日的人民武装，向杨靖宇提出了加入抗联的意愿。考虑到叶景山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于 1935 年春夏期间，叶景山被抗联任命为团长（亦有被任命为参谋长的说法），负责与王凤阁和朝革武装的联系，集中精力推动抗联与王凤阁部、朝革武装的联合。

1935 年夏秋之际，日寇增派大批日伪军围剿东南满抗日武装，抗日斗争形势极其严峻。朝革鉴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迅速萎缩、内部派系纷杂和为防止被敌人进一步各个击破，极需强化内部的统一和扩大对外联合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叶景山利用其与朝革李如松、金东耳、崔宗仑、崔宗五、崔允龟等朝革各级领导人的亲密关系，在增强朝革内部团结和对外联合中发挥作用，特此提出与当时的抗日公开武装王凤阁部的军政联合和协同。为便于开展工作，朝革任命叶景山为促进结盟工作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是年 9 月，王凤阁与朝革负责人在辑安八区谈判商定，成立中朝两国抗日志士携手的、以驱逐日寇为宗旨的“中韩抗日同盟会”，分别设立军事、政治、保安委员会。其中王凤阁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朝革高而虚任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王凤阁、叶景山、崔宗仑、李仲侠、万兆荣、崔凤鸣、崔宗五、洪宇、李如松、崔允龟、尚鸿恩等 11 名首脑按序在会盟简章上签字并宣誓。抗联也派曹亚范进入同盟会，以加强协调和掌握情况。根据同盟会的决议，叶景山正式辞去朝革一师参谋长职务，就任朝革正领之职。

1935 年农历 10 月 13 日，他带 6 人执行任务时，在头道砬子沟与娄子沟交界的姜××家被敌人包围，14 日拂晓，他重伤后，在菜窖中被杀害，与战友李根荣一起被敌人铡下头颅，带回通化示众。

叶景山牺牲后，杨靖宇亲自派人前往祭奠。朝革也于 11 月 27 日送来悼念信：“……不意一朝凶信猝至，暴风乱雨，陨我良士；大厦方建，栋梁先折；千里将行，骥步遽蹶；三军挥泪，白日奄黑……，”表达了朝革对叶景山牺牲的巨大悲痛。

沈凤山

沈凤山是吉林省辑安县热闹村人，1923 年 12 月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38 年初，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师司令部参谋长、柳州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等职。1983 年 6 月离休，1984 年 11 月逝世。

1938 年初，年仅 15 岁的沈凤山在家乡热闹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一军部队。同年 3 月份，就参加了奇袭日伪老岭铁路工程和歼灭所谓“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的家什房子战斗和长岗战役等战斗。1938 年底，随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路军主力部队撤出辑安老岭区，向龙岗山脉的河里地区、濛江（靖宇）、桦甸县境内森林地带转移。先后参加了临江红土崖反击战，岔沟突围战，攻打了柳树河子、攻打木箕河伐木场和大蒲柴河等战斗。

1939 年冬，任直属警卫连副连长的沈凤山在抚松县境内受伤。部队摆脱敌人追击后，杨靖宇见他的伤势很重，行动不便，就命令他离开部队养伤。沈凤山说什么也不干，宁肯死也要随部队走，杨靖宇又劝他说：“凤山同志，等把伤养好了你再来找部队。”在杨靖宇和同志们的劝说下，沈凤山含着泪答应下来。杨靖宇临走前，对沈凤山说：“休息休息，就先往回走，把伤养好就回来。要是来不了，就在家乡做些群众工作。”就此，他就在附近隐蔽起来，同志们立即帮他搞好伪装，防止被敌人发现。杨靖宇率队走后不久，敌人的大队人马就追了过去。第二天，他强忍着脖子上的伤痛，冒着随时可能遭遇敌人或野兽袭击的危险，以惊人的毅力，孤身一人一气走了 19 天。快要走出林子时，他又放下了回家的念头，决定回老林子养好伤，再回去找部队。他在寻找可以隐蔽住下的地方时。在一个小窝棚里发现有两袋大米和一袋小米，还有一瓶豆油，他心知这里的主人肯定不是庄稼人，所以提高了警惕。日落西山时，终于等到了小窝棚的主人。沈凤山向他公开讲明自己是抗连战士，叫狗咬伤了，养好伤就走。那人说：“只要你不嫌弃，就只管住下。”

随后又开始劝他投降，并造谣说："杨司令前两天叫日本人抓去杀了头，跟他们干还有什么干头呢？"沈凤山假装不懂，吃过晚饭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饭后，他发现那人鬼鬼祟祟地说要回去一趟，沈凤山灵机一动，说："你昨天讲，投降真象你说的那样吗？"那人说："我说的话，不胡弄人。"沈凤山边说边接近了那个人，突然抽出枪来，厉声喝道："举起手来！"那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了实话，原来他是敌人的密探，专门搜集抗联情报的。沈凤山立刻一枪把他送上了西天，然后将死尸用雪埋上了。沈凤山将敌密探的窝棚里可用的东西搬进自己在远处搭起的一个小窝棚，开始在密林中养伤休养。伤养得差不多好了。他就决定重返部队。这样，他又开始在茫茫林海中穿行，昼行夜宿，饿了就吃草根、树皮，遇到敌人就机警地躲过去。就这样，一直走到树叶关门，才走到濛江（靖宇县）一带。才在历尽了近一年的艰辛后，终于回到抗联部队。

1940年夏天，沈凤山给赵政委当警卫员，在辉南县境内的高山密林一带活动。后来，又往东宁县、穆棱县境内的原始森林转移。就在这年冬天，沈凤山随所在抗联小部队，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转移到了苏联的边境。过境后被编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边境期间，他多次随抗联小部队回国侦察日伪军在国境线上的兵力、据点等，一直到苏联出兵东北，沈凤山才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

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还参加了解放华南的战斗。1950年，他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按照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命令，跨过了鸭绿江，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他戎马一生，多次立功受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力量。

（原文为李重勤整理）

徐　光

徐光，集安热闹大文字沟人，出生于1922年3月1日。原名徐宝仁，曾用名邢万祥。1938年2月，他继承其兄遗志（其兄徐宝全于1936年参加红军，同年牺牲于米架子）。16岁的徐光参加

了杨靖宇的抗联部队，在一路军警旅一团二中队当战士。

1938 年 3 月，抗联部队攻打梅集线铁路隧道，徐光积极要求参战。战斗中他随谢司务长砍断铁丝网，冲进日本守备队，从铺底下抓出一名日本军官，缴获一支手枪。抗联部队破坏了隧道，烧毁了物资仓库和住房，解放了一大批劳工。6 月初，他又参加了消灭“满洲剿匪之花”索旅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徐光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击毙好几个敌人，缴获了 5 支枪。6 月 19 日，徐光又参加了抗联一路军破袭阳岔铁路工区、土口子隧道等战斗。8 月，徐光参加了著名的长岗战役，一人抓了 10 个俘虏。

1938 年 8 月中旬，抗联第一路军成立少年铁血队后，徐光被编入一班。此后他随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向金川、濛江一带转移。其间，参加了著名岔沟突围战、桦甸柳树河子战斗。

1938 年底，根据总司令的部署，少年铁血队单独到长白山里“猫冬”被敌人发现。在与几百敌人作战时，徐光等十几名少年铁血队队员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最后成功地突破敌人的堵截，赶上了部队。1939 年，徐光参加了木箕河战斗、大蒲柴河战斗。

1940 年 2 月，杨靖宇司令牺牲了，部队严重受挫。徐光随徐哲部向东宁县前进，年末转入苏联边境。1941 年春，徐光随抗联部队从苏联边境回东北收集情况，同年 11 月又回到苏联边境。1942 年 8 月，在苏联伯力附近组成东北抗日教导旅，实行南北野营统一训练。旅下编四个步兵教导营和两个直属教导连，以抗联第一路军为基干编成教导第一营，徐光被编在教导一营二连任班长。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徐光回到东北，在蛟河新站任苏军司令部副司令、公安分局长。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9 月，他先后任齐齐哈尔公安三大队参谋、海拉尔铁路公安段副段长、段长等职。

建国后，徐光一直奋战在北疆铁路公安战线上，先后任满洲里公安办事处副主任和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科长、副处长、处长、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

（原文为李重勤提供）

抗日斗争大事记



1904年

8月　韩民在外岔沟勾串日商伊藤京重，带兵强号木植，激起中国木把义愤，为抗议其暴行，木把骤聚四、五百人，绑获肇事韩答500下，解送韩官严办；一面与日员照会拿禁伊藤，并派兵召回木把，县公署还拨出部分款项，抚慰木把，防止了矛盾进一步恶化。

1905年

5月　侵朝日军越境与侵占我外岔沟的俄军交战，俄军败退，日军侵占外岔沟。这是日俄战争期间，日俄最后一次在辑安发生的战斗。

夏　侵朝日军五十七联队联队长小泽德平率部进入辑安，看到好太王碑，如获至宝，欲取运回国，遭到县知事吴光国拒绝。

7月17日　因侵朝日军抢夺木排，200多名中国木把聚集在一起乘木排自致和保沿江而下，向融和保方面驶去。在关门砬子与号木日人接仗，毙日人6名，绑华人代办4名。县公署一面弹压木把，一面照会日本驻外岔沟兵站司令部，要求日方惩办强号木植者。经再三斡旋，县公署拨出罚银5 000元，平息该事件。

年末　日军退役中佐花板圆等人在我上羊鱼头地方占住民房，强行设立军用木材厂，强买强号木筏。县公署为此多次交涉未果。

年内　继1883年日本学者青江秀、横井中直、古森善臣、荻原严雄来辑安考察古迹以及1889年横井中直发表《高句丽古碑考》等文章之后的几年间，又有营政有、那珂通世、三宅米吉、前间恭作、太田亮、末松保和等纷纷前来考察古迹之后，本年又有鸟居龙藏、关野贞等也来辑安考察文物古迹。

1906年

3月27日　得知五、六百中国木把因日军在羊鱼头强设的木材厂低价强索、擅号大批木材聚集在一起，与日人辩理，县知事吴光国立即前往斡旋，日人以小岛大佐在安东木厂出有告示为由，拒绝加价。县知事设法稳住木把，谕饬木把先行解散。

4月27日　东边道派徐鼐来辑安处理日人在羊鱼头强设木材

厂一案。翌日，安东军用木材厂也派员及宪兵偕同察看。木把闻讯复又聚集。经谈判，日人同意赔偿3 000件木排，木把因为另外的3 000件木排损失而义愤难平。为防止矛盾激化，知事同意由县衙补偿损失，群情始解。

1908年

1月　前日军关东总督府通译官官谷俊介，在辑安租用民房，强设韩民辑安自治会，犯我主权。县知事率民抵制。后于6月1日奉奉天总督和奉天巡抚之命，将其驱逐出境。

年内　日本人鸟居龙藏、白乌库吉等多人再次进入辑安考察文物古迹，此后又一次形成考察高潮，其中部分学者受日本军部派遣参加明显具有政治性的考查，伪造和篡改历史，为日本吞并朝鲜和企图占领中国东北制造理论根据。

1917年

8月　朝鲜玉洞两名日本宪兵越境在黄柏甸子寻衅，被我船夫杀死。韩岸各宪兵守备队400多人过境，扬言要血洗黄柏。县警局为平息事件，将其请到县里。日军纠缠了3个月，才撤回朝鲜。

1918年

年内　日本人在辑安强设警察所。

1924年

1月30日（旧历）　辑安良民村农民隋殿德沿江道下行时，被日警枪杀。

1925年

1月9日　日驻朝巡警五、六十人越境，在榆林朱仙沟枪杀朝鲜族人1名，汉族人3名，经交涉未果。

3月3日　日驻朝鲜慈城巡警片冈酉松等三人及韩人八、九人越境进入石湖沟，打死李玉琢店内客人3人，伤1人。

1927年

4月中旬　日本在临江县设立领事馆、并派驻分馆主任的消息传出后，临江爆发了大规模的“拒日设领”运动。这一运动立即得到了辑安县人民的声援。下旬，辑安与临江两县成立“拒日设领”同盟，在全县范围内抵制日人、日货，并派出辑安人民“拒日设领”声援团。抵制日人、日货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28年春。

7月18日（旧历）　日本人福岛二一（系日本驻辽宁领事馆人员）豢养的李东秀匪团属下队长权东勋率7名韩人武装越境，将三区古马岭朝侨十长金东承殴打致伤，并勒索200元钱。据金东承称，古马岭百家长李东秀原系朝鲜独立党成员，上年福岛二一搜缴独立党时被收降。福岛二一为其收罗不法之徒20余人，专以搜捕独立党为名扰乱我方边境。该团伙曾经与1926年11月间抢劫古马岭商号“吉恒利”，枪杀商号赵执事及柜伙2人，携赃物回到韩岸楚山。

7月20日（旧历）　权东勋匪徒抢劫凉水泉子倒须沟于家铺后，窜向宽甸方向。

据载，该团伙及韩岸军警曾以此名义越境抢劫、杀掠百余次。

1928年

5月19日　有50多名“匪徒”袭击日驻韩林士警察所，毙日警1人，伤14人，绑走韩人5人，掠夺枪支弹药若干，逃进深山。日方疑是中国人所为。辑安县公署派荆悦彩等两名巡官前往调查，日人竟将其扣留，多次交涉才将人放回。当我方正调集军警搜索逃匪期间，日方忽于5月28日派出守备队50余人在白马浪和二马驹沟一带，将我边民薛家兄弟二人枪杀。

1931年

9月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2年

3月1日　伪满洲国成立，年号为大同元年。

3月下旬　辑安县公署、警察局、县公安大队、自卫团、大刀会筹备组建民众抗日自卫军。

4月21日　辽宁陆军步兵一团中校团副唐聚五等在桓仁县举行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大会；辑安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十八路军。

4月底　驻朝日军入侵外岔沟，被我民众自卫军击退，日军伤亡70余人。

5月上旬　驻县城的民众自卫军两个团与驻岭后的大刀会营换防。

5月25日　日军驻朝国境守备队若林大尉等，从安东乘船行至辑安、临江交界处时向我方挑衅，被我大刀会射杀。日军守备队遂越境对我辑安、临江两县进行报复扫荡，我边民死伤惨重，我方在交涉中据理力争，未果。

6月初　大刀会营调往外岔沟，留18名会员守卫县城。

6月7日　侵朝日军400余人越境，经下羊鱼头入侵辑安。次日开始攻城，守城的18名大刀会员与日军血战，14人壮烈牺牲，县城失守。此后，自卫军多次组织小股部队进城袭击敌人。

6月13日　驻青沟子民众自卫军向县城一带移动，准备收复县城。

6月17日　自卫军于凌晨3时发起总攻，因敌人火力较强，十八路军损伤严重，攻城失败。

6月19日　100余名日军进攻石灰窑，遭到我在半截沟和丸都山城城墙制高点的自卫军的阻击，日军败退。

7月19日　日军360余人分两路进入长岗，自卫军设伏歼敌100余人。不久，自卫军被日军包抄，不得不撤到岭后青沟子。

7月下旬　第十八路民众自卫军与外县自卫军协作，先后参加了两次临江战役。并在鸭绿江沿线多次打击敌人。

9月14日　十八路军第二次攻打县城，遭到日军火力阻击，近千名自卫军战士为国捐躯。

同月　辑安成立伪政权，刘天成任伪县长，日本人折田弥九郎

任参事官。

10 月 通化城失守。各路民众自卫军奉命转入濛江一带，后因总司令唐聚五离队进关，十八路军撤回红土崖一带，坚持斗争。

同月 伪辑安县长派乡绅诱降十八路军。部队在热闹街得知真相后相继解散；林振清拒降进关；王殿阳率大刀会及部分战士重返红土崖坚持武装斗争；田英杰带 300 名警察接受诱降；不久，原董团部分人马重整旗鼓，再次与日寇开展武装斗争（1934 年秋，该部被田英杰瓦解）。

1933 年

10 月 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前身）第一独立师派人进入原民众自卫军活动区域，联络抗日武装，首次有人员进入辑安。

1934 年

1 月 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独立师于 18 日攻入八道江后，部队开始进入辑安辖境三道沟一带活动。

2 月 独立师与 17 支抗日队伍代表在临江三岔子附近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后，部队再次进入三道沟活动，并逐渐深入到红土崖、石湖、热闹一带。

11 月上旬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其一师正式开始在辑安、临江一带建立游击区，陆续在三道沟、石湖、天桥龙爪沟一带建立了一批秘密营地。

1935 年

春 从辑安开往通化的警备道（公路）修成并开始通车。日伪两辆巡道汽车在大蚊子沟口王八炕一带，被南满人民革命军一支小分队截获击毁，敌人被我俘虏。从此，敌巡道车不再复出。

2 月 杨靖宇率领一军军部进入辑安，创建老岭根据地。

同月 一师离开辑安，向桓仁、宽甸一带挺进，开辟新游击区。

5 月 因一师师长李红光牺牲，杨靖宇率军直属队离开辑安赶赴宽甸、桓仁，命副师长韩浩任师长。

9 月 15 日 程斌、李敏焕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去河里（今

辉南县金川乡）参加韩浩师长追悼会，路过辑安。河里军部会议上，任命程斌为一师师长。

9 月 29 日，日本学者池内宏、梅原末治、水野清一、三上次男、滕田亮策、伊藤伊八、斋滕菊太朗、岗崎信夫等对国内城、丸都山城及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西大墓、四神墓、三室墓、环纺墓、牟头娄墓等进行实测、摄影、著录和挖掘。

9 月 30 日　程斌、李敏焕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河里返回桓仁途中，经辑安马蹄沟进入桓仁县境。

秋　杨靖宇将军率一军军部去那尔轰，与李学忠率二军西征队会师，途中在辑安马蹄沟南山坡被日军包围，杨靖宇率部连夜突出重围，并袭击久财源伪警察所。

10 月中旬　一军司令部直属队攻占辑安县榆树林子，缴获步枪 25 支及许多棉布，初步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10 月 23 日　一军第一师在辑安县三区三义甸子（转山子）附近与伪军交战，打死伪军 7 人。

11 月 1 日　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将士名义发表《告满洲国士兵及抗日官兵书》，号召伪军“掉转枪头……为光复我中华民族而战。”

11 月 2 日　一军军部 300 名战士，在辑安县二道崴子鹿圈沟袭击王殿忠的伪军混成二旅，后因日军援军赶到而撤退。

同年　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扩编为两个师、1 个独立团、1 个少年营、1 个警卫营；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同年　抗联某部刘金铎连长率部在老岭南坡榆树林子治安村葫芦头子、大小天桥沟一带进行抗日活动。

年内　日本学者池内宏、对冉牟墓葬、环纹墓、折天井墓，进行实测和著录、盗掘。

同年，日本人斋滕菊太郎、七田忠治等对四神墓进行勘测、盗掘中，壁画遭到严重破坏。

1936 年

1 月　因王春富告密，抗联刘金铎连长和爱人金××，以及两

名警卫员，在闫家街沟里窑棚窝子被榆树林子伪警察署杀害。

2 月 15 日　一军一师六团和部分抗日义勇军，在辑安县八区高力河子旧狐圈子（今集安头道镇团结村五队）与伪军混成旅骑兵一连交火 2 个小时。

2 月 27 日　杨靖宇率抗联第一军军直部队，在热水河子，端了东边道少将“讨伐”司令邵本良的一个团部，之后，回到辑安一带。

3 月末　一军第二教导团政委周建华，游击大队长王仁斋，奉杨靖宇之命，率部进入辑安县二道崴子一带。

4 月 3 日　杨靖宇率一军司令部及一师六团等 400 余人，开始在辑安县境内高力河子（今团结村）南沟里一带活动。

4 月 4 日　抗联获悉伪奉天骑兵教导团来辑安“讨伐”，杨靖宇率一军司令部及一师六团 400 余人进入二道崴子阵地潜伏。于次日上午 10 时左右，全歼伪奉天骑兵教导团。

4 月 7 日　日伪军开始“追剿”杨靖宇带领的抗联第一军部队，并在辑安县头道区头道阳岔同我军激战 3 小时。

4 月 9 日　杨靖宇所率一军直属队在辑安县头道区头道阳岔白砬子，被日伪军包围。伪第一军管区立即派伪军参谋长满良、顾问武田乘飞机赶到现场指挥围剿。当夜，杨靖宇率部巧妙突出重围，转移到大东岔休整。

4 月 12 日　杨靖宇率领部队，攻占了台上伪警察署。并于次日袭击了花甸子警察所。得知邵本良伪军追击上来，杨靖宇率部诱敌，伪装撤退，在凤城梨树甸子的夹砬子设下伏兵，一举全歼了“追剿”的邵本良伪军。

5 月　在兴京县（今新宾）草岔沟以原第二教导团为主体，正式建立一军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

5 月 16 日　抗联在金川县河里地方会家沟密营召开了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一、二军高级干部会议，即河里会议。会上将抗日联军第一、二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把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救国青年团。

会议还决定，将中共东、南满特委组成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

委书记。

6 月 28 日　一军一师为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的联系再次进行西征。

杨靖宇令二师向长白山挺进，吸引敌军，自己率领军部主力，返回辑安、宽甸一带，进行游击战，掩护一师西征。

9 月　抗联第一军主力部队，再次袭击辑安台上伪警察署。

抗联派遣一军共青团书记李某带领十几名战士在辑安县的刀尖岭、摇钱树岭一带开展活动。

同月　敌人加大在桓仁、宽甸一带武装围剿抗联的力度，程斌率一师撤回辑安根据地休整。

11 月　一军司令部在桓仁县外三堡召开三师主要领导会议，部署三师西征。

12 月　三师西征部队，经过清原、铁岭，跨过南满铁路，到达辽河东岸。由于河未封冻和敌人堵截，西征军被迫绕道返回清原。

年内　日本学者有光教一、三上次男、藤田亮策、七田忠志、池内宏等再次进入辑安“考察”古迹。其中对千秋墓进行盗掘和勘测。

1937 年

1 月　一师由辑安再次挺进宽甸、桓仁一带。

同月　一军司令部转入外线作战，留下独立营政委陈秀明、蔡指导员、姜指导员、于指导员等分别带领 10 余名抗联战士留在东岔村等各主要密营，为进一步扩大老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工作。

3 月　一军主力部队再次从宽甸回到辑安，找到小李子率领的小分队，并在摇钱树、刀尖岭一带休整。

4 月 9 日　梅辑铁路之通化至辑安段（亦称通辑铁路）开工。

夏　抗联第二军先遣团“毕团”来辑安，并同一军军部汇合，不久，随一军军部去桓仁县前后夹道子开了四、五天军事会议后，又回到辑安，并留在辑安活动。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7 月 8 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

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 月 25 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马上参加抗日联军”，为“回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

8 月 20 日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他们“一致携手夹攻日寇”。

9 月 16 日　三师参谋长杨俊恒调总司令部工作。不久就任抗联一军参谋长。

同月　一军军部经桓仁回到辑安，同抗联第二军“毕团”会师。

年内，日本人池内宏等进入角觝、舞踊墓、临江墓、西大墓等进行勘查、盗掘和著录，西大墓等遭到严重破坏。

同年，日本人黑田源次打开马槽墓门，对该墓进行盗掘，壁画遭受严重破坏。

1938 年

1 月　杨靖宇率领一军直属队，从桓仁县再度北上，在辑安老岭山区摇钱树岭四方顶子打破敌人包围，并在山上度过春节。此后开始加紧破坏修建中的通辑线铁路工程，以阻止日寇掠夺资源，粉碎日伪军事“讨伐”。

3 月　杨靖宇将军在辑安老岭抗日根据地某山沟密营召开了追悼方志敏烈士大会，利用追悼方志敏烈士，对抗联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3 月 13 日　杨靖宇率一军直属队袭击通辑铁路老岭隧道工程现场。

3 月 14 日　袭击通辑铁路老岭隧道工程的部队在老岭隧道工程西南的十七道沟，与前来追击的日军角田部队（驻六道沟）及警察 120 余人交战，后我抗联部队主动撤走，回到蚂蚁河、大东岔抗日根据地一带休整。

3 月 18 日抗联一军一部 300 人， 在老岭隧道西方的 1285 高地，再次与日军角田部队交战，击毙日军士兵 1 名，击伤数名。

同月　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二军军部、六师、独立旅以及

一军二师一部，由金川一带向辑安挺进。

4月　抗联一军直属队于常家店伏击自榆树林子移往岭北双岔河伪东大营的伪团部，全歼敌一个连。

4月26日　抗联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部200人在通化哈塘沟与通化省警务厅的警察大队交战后，进入辑安境内。

4月28日　杨靖宇率一军直属队袭击辑安县太平沟伪警察分所。

5月4日　晚九时，抗联二军及一军二师一部，约300人，袭击了辑安县二区双岔河伪警察所和自卫团，缴获步枪34支。

5月9日　抗联二军及一军二师一部约300人，攻入辑安县第五区大青沟村，获得粮食若干。之后回到老岭根据地。

同日，抗联一军一部200余人袭击辑安西北小青沟东亚土木会社的坑木采伐现场，解放被强征的劳工26名。

5月11日　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二军军部、六师、独立旅及一军二师一部，在辑安县老岭山区与一军队伍会师。并开始在五道沟沟里召开为期10天的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即辑安老岭高干会议。

会后，召开了第一路军干部战士千人大会，正式成立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

6月6日　按照伏击索旅的作战计划，魏拯民率领二军一部夜袭辑安县文字沟围子。

6月7日　杨靖宇率领一军军直部队约250人，在家什房子沟口的公路两侧设伏击阵地，待机截击敌人。

6月10日　为调动热闹伪军出动，一军一支小部队，在小青沟（今绿水河处）成功截击伪辑安县公署警务科吉川组运输车队为驻热闹街索旅第三十二团送给养的汽车。

6月12日　伪军索旅三十二团第一营两个连进入家什房子我军埋伏阵地，抗联全歼了伪索旅20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30多支，匣枪10支，望远镜2架。

6月19日　近午夜，杨靖宇率一军教导团及二师共700多人，同时分别袭击了通辑线铁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第十一、第十二老岭河桥梁工地以及阳岔工程分区日本今井组宿舍，击毙敌人9名

（其中日人 8 名），俘虏日本工程师竹内、小林等人，解放中国劳工 700 多人。

6 月 24 日 23 时，杨靖宇指挥一军教导团，再次袭击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东岗工程分区和伪骑兵第五团团部。解放了被抓去的中国劳工 250 人；击毙东岗工程分区日军警备长铃木横田等数人。

6 月 27 日　抗联一军一师师长程斌，在本溪叛变投敌，一军全部机密被泄露，一师在和尚帽子和老土顶子根据地遭到破坏。

7 月上旬　杨靖宇利用敌热闹驻军向双岔河围剿之机，借敌电话调动敌人，在榆林五道沟俘敌两个连。

7 月中旬　敌索旅得知杨司令驻在马蹄沟一带，即调兵遣将前往围剿。杨司令命二师八团在马蹄村外设伏，自己率队偷袭韭菜园警察署，这次战斗重创蒙古骑兵队，并焚毁财源警察署。

7 月中旬　鉴于程斌叛变后的军事形势，杨靖宇和魏拯民紧急召开老岭高干会议。决定将第一路军改编为 3 个方面军和 1 个警卫旅。主力部队向东北山区转移；一方面军在辑安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日军力量。

7 月 29 日　抗联第一路军司令部约 150 人，在辑安县阳岔双安屯村，截击老岭工程工地的日本敌保卫队卡车 1 辆，毙、伤、俘敌 12 人。

同月　抗联第一路军一方面军，在杨俊恒和伊俊山指挥下，攻克辑安县大碑街（现太王碑一带），获得许多物资。

8 月 1 日　杨靖宇率一路军主力部队，在八宝沟（今长岗村）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军事行动计划。

8 月 2 日　得知伪军索旅四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余部进山“讨伐”。杨靖宇立即部署部队在长岗石庙伏击敌人，经过激战，我军全歼伪索旅骑兵四十一团和步兵三十二团残部。一军参谋长、三师师长杨俊恒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8 月　叛徒程斌率领日伪军和警察队进入辑安，围剿抗联，破坏抗日根据地，一直持续到 9 月底.

8 月 11 日　杨靖宇率部袭击辑安县大东岔和梨树沟敌据点，缴获大量粮食。

同日　抗联一军陈秀明率领百人，夜袭辑安县活龙盖敌据点和

专卖局，俘敌16人，缴获军服、鞋帽、白面和豆油等许多物品。

8月14日　杨靖宇率部60人，在辑安县小爷岭截击敌汽车4辆，俘敌7人。

8月15日　抗联一军一部100余人，在蔡指导员率领下，夜袭辑安县荒崴子部落，烧毁伪军兵舍一栋，获一批粮食和军用物品。

中旬　抗联一路军在蚂蚁河上游六道阳岔（今集安市清河镇东岔沟里）组建少年铁血队，高玉信任队长，王传圣任指导员。

8月19日　为教训青沟子伪警察署，抗联毕团长带领200多名战士，佯攻东岔伪警察分所，毕团随后攻占青沟子西南炮台，包围了青沟子伪警察署。伪警察署长派警士杨景义出来谈判，答应为我军解决棉布、鞋和粮食等条件。

第二天，伪通化省在青沟子增派特设警察队32人，青沟子伪警察署拒不兑现原定条件。几天后，抗联再次袭击青沟子伪警察署，击毙了伪省特设警察队长于万海，敌人伤亡惨重。

8月30日　陈秀明率领一军一部50名，袭击辑安县二道坎子敌据点，烧毁炮台一座。

同日　姜队长率领一军几十名战士，袭击辑安县太平沟据点，烧毁炮台四座和伪军兵舍28间，缴获电话机1台。

9月14日　杨靖宇部队约300人，在辑安县城西北青沟子一带击溃伪军警，缴获一批粮食和物资。与前来增援的伪军激战4个小时，敌人溃败。

9月18日　蔡指导员率领一军50名战士，袭击辑安县太平沟据点。

9月24日　杨靖宇将军率军部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400多人，从老岭抗日根据地出发经东岔，转向天桥沟、老土顶子一带活动；二军部队撤出辑安，转入长白一带（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活动。

10月初　杨靖宇将军率一军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向东北部濛江、桦甸森林地带转移，在红土崖一带受阻，部队回师天桥沟，经虾蟆沟渡浑江离开辑安，踏上了新的征程。根据老岭高干紧急会议决定，曹亚范、伊俊山率抗联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留在辑安游击区，开展抗日斗争。

10月底　程斌带领伪警察大队离开辑安，专司寻找杨靖宇和

警卫旅；接着又进入临江、三岔子、新开岭等地进行围剿。

12 月　曹亚范率第一方面军乘敌不备经八道江、通化，后转入濛江境内，与杨靖宇会师。不久，由伊俊山率一部留在通化县青沟子一带活动，曹亚范率一方面军 200 余人主力部队返回辑安。

1939 年

1 月　曹亚范率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袭击辑安县二道阳岔、新开岭和刀尖岭等敌人据点。伊俊山率队回到辑安与曹亚范所率主力部队会合。

2 月 9 日　一方面军参谋长尹夏太在驻辑安伪通化省“长岛工作班”和辑安的“宣抚委员会”的政治诱降下，携械向榆树林子伪警察署投敌叛变，给坚持在辑安抗日活动的一方面军带来很大威胁。

同月　为粉碎日伪军“围剿”的威胁和政治诱降，坚持辑安老岭山区的抗日游击斗争，曹亚范率部袭击了花甸子、土城子伪警察所。

3 月 15 日　曹亚范指挥一方面军袭击了在辑安县凉水石青沟村东沟日军曾原部队，激战 3 小时，击毙敌步兵上尉吉田林一郎等 3 人，打伤 6 人。

4 月　通化地区开始全面实施 1939 年《治安肃正计划》，一方面军在辑安的抗日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

同月　一方面军再次袭击辑安县台上警察署。

5 月 9 日　杨靖宇将军给曹亚范写信，指出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勉励一方面军坚持鸭绿江沿岸和辑安等山区的斗争。

同月　抗联一方面军，在曹亚范的指挥下，袭击了横路警察所后，一方面军北上河里地区，准备与杨靖宇会师。

同月　杨靖宇率军部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 250 多人，袭击辉南韩家屯据点后，转战于西部山区，迂回到金川河里地区与北上的一方面军会师。

8 月　一方面军曹亚范率部袭击辑安县麻线沟、活龙盖和榆树林、江口警察分所，解除了伪警全部武装，缴获许多物资。

10 月底　曹亚范率部袭击辑安县黄柏警察分所。

12 月　曹亚范率部在辑安县榆树林子南岭与敌交战。

1940 年

2 月　曹亚范率一方面军主力向濛江、抚松方向转移。留下部分小分队继续在辑安打击敌人。

年内，日本派专机，护送一些日本人到辑安火车站后古墓，驱使中国民工打开墓门后，赶走中国民工。墓内文物被掠夺一空，装上飞机于当日下午飞回日本。

1941 年

3 月　抗联一方面军部队撤离辑安向森林地带转移。

1942 年

2 月　中共胶东区党委派姚黎明等“海外各界抗日动员委员会”会员赴东北，以伪职员的身份，在大连、安东秘密发展会员和开展地下抗日救国活动。

1943 年

2 月初　根据上级党组织“深入东北地区东边道一带开展活动”的指示，姚黎明来到辑安县桦皮甸子“定居”，以良民甸子为中心开展工作。

3 月　姚黎明同从大栗子铁矿逃出来的原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被服厂 3 名工人一起开展活动，后来又吸收周毅、王发祥等加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0 月　随着形势的发展，胶东区党委成立 “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隶属“海外各界抗日活动委员会”领导。指定姚黎明为该组织主任委员。

1944 年

3 月　胶东区党委为加强对“辽东各界同胞抗日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将该组织改为“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以下简称辽盟)，并将会址移到东北，总部设在辑安。

8 月　胶东区党委派辽盟会员刘仁宏、王锡礼护送中共党员罗衡（张致清）到通化七道沟领导辽盟工作。任命姚黎明为辽盟主任委员，罗衡为组织委员，李剑云为宣传委员。

9 月　姚黎明开始在辑安良民甸子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0 月初　在七道沟铁矿秘密召开辽盟第一次工作会议，罗衡传达了胶东区党委的指示，并接受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刘仁宏入党；确定了今后“积蓄力量，待机暴动，迎接反攻”的工作任务。

12 月　根据上级指示，李鹏飞、李剑云兑购了辑安县城东门外的 “兴亚饭庄”，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

1945 年

2 月　胶东区党委特派员刘芝祥（方志舟）到通化七道沟铁矿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共辽东特别支部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通化分支部委员会，下设五个党小组。姚黎明任辑安党小组组长，会议还决定罗衡、刘仁宏到辑安县良民甸子和大连两地指导建党工作。

同月　在辑安兴亚饭庄召开了中共辽东特支通化分支部扩大会议，研究辽盟的建党工作。

同月　在通化官道岭石灰窑召开了中共通化分支部会议，整顿干部中出现的骄傲情绪和自由主义现象，并确定了七道沟、八宝、辑安为主要暴动点。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16 日　罗衡、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李鹏飞五人在辑安兴亚饭庄，召开中共通化分支部紧急会议，集中讨论日寇投降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并作了“建立武装、接受伪政权、与苏联红军联系取得帮助”等决定。

8 月 22 日　姚黎明、李剑云、刘仁宏去通化与苏联红军上校司令官莫洛道夫接触，并得到部分武器。

9 月初　正式成立了辽东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姚黎明任司令，罗衡任政委，并发表了《告同胞书》。

10 月初　姚黎明被任命为辑安县长，并率五十八团二连接收辑安。因伪警察出身的二连连长何学福叛变，姚县长等 34 名干部战士被扣押。

11 月　祝顺鹏副司令员率教导团一部来辑安接收伪政权。并于 11 月 10 日正式成立辑安县民主政府，开始领导全县人民减租减息，除奸反霸斗争。

附　　录

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与金川河里会议

从 1934 年 11 月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总结工作，明确形势和任务，中共南满省委于 1936 年 7 月在金川河里后方基地的会家沟（现通化县新乡）密营里召开了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做出了《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接着又召开了南满党及一、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即著名的金川河里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杨靖宇、魏拯民、李东光（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湘俊（东南满特委书记）、刘佐建（南满特委青年团代表）、徐哲（军医处长）、董海峰（政治部主任）、安昌勋（教导团政委）、王仁斋（三师师长）、马处长（名不详），少年营张政委等 15 人，会议总共开了 10 余天，即从 7 月 4 日至 7 月中旬结束。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重大决策

第一、这次代表大会，认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前夜。这种革命已在较小的范围内开始了，整个世界革命斗争形势正在迅速向前发展着。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占领了中国广大领土，实行残酷统治，使中国成千上万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权利，没有任何自由，这就引起了全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全国人民不但是工农兵、学生、小资产阶级反对日帝，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地主资产阶级亦仇恨日帝。成千上万的起来直接或间接的参加反日民族战争，有全国人民总动员反对日寇的可能。党中央公开指出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适合中国目前政治环境和群众的要求，全党同志应为这一伟大正确策略胜利而斗争。东北的抗日斗争正在日益深入和扩大，抗联一、二军活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比任何地方更加

发展。为了不久将来更大战争的胜利，顺利地冲破敌人“讨伐”政策起见，必须更加改善战术，使党和队伍千百倍的扩大巩固起来，这就是目前我们中心任务之中心环节。

第二、决议总结了南满党的工作，指出：自南满党一大以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各地工作均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地方党组织扩大五分之一，成立了5个新县任内的党支部，开始了伪军工作和中心城市工作，军队数量增多，新成立一个师，军部扩大5倍；一师扩大2倍，二师扩大1倍，游击战术和战斗力大提高，武器增加，轻重机枪增加6倍，火炮增加了3倍，有四分之三的队伍换上了三八式的新式手枪，游击区域扩大，在新游击区的15个县内，领导和编制了许多武装抗日军，党直接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已成为南满反日战争中最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形成了中心的领导力量。决议同时还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最主要的是对中央1月27日来信（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不十分深刻，因此犯忽左忽右的错误。

第三、决议最后规定了南满的战斗任务：其一、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巩固扩大东北抗日联军。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扩大游击区，组织和动员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抗联。其二、加强各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应想一切办法到矿山、铁路去开展工作，加强领导、发动、组织武装农民与日伪军进行斗争，鼓励与领导广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斗争。在城市工作上抓住群众对日伪统治的一切不满情况，发动与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其三、加强伪军中的士兵工作，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方法，组织满军哗变。其四、加强党的领导，同一切左右倾作坚决斗争。肃清奸细、叛徒，以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

会议宣布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并把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救国青年团。

由于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定了贯彻实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二）金川河里会议，组成了抗联第一路军

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形势，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讨伐”，有必要把活动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二军统一组织起

来，以便集中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打击日本侵略者，基于这种需要，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根据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精神，亲自率领一个连共60余人，从东满出发，历经艰险，于6月末到金川河里地区和杨靖宇及一军军部会师，并于7月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接着又同杨靖宇一起主持召开了东满党及一、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在河里会议上，魏拯民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央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组织四个省委及编成路军的指示，讨论了全国抗战日益迫切的形势和一、二军的任务，以及党的整个工作问题，决定将抗联一、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路军领导第一、二两个军，共六个师，即第一军一、二、三师，第二军的一、二、三师改为四、五、六师，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副司令王德泰。同时决定将东满、南满两个省委合并组成东南满省委（也称南满省委），领导第一路军，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委员有杨靖宇、王德泰、宋铁岩、李东光、李学忠、金××、孙英治（省委青年部长）、曹亚范、王仁斋、石光、韩仁和、陈翰章、王润成、伊俊山、吕伯岐、金光、周树东等人。

成立抗联第一路军时，抗联第一路军的总人数约3 000人，其编制是：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安光勋，秘书长韩仁和，军需处长严弼顺，军医处长徐哲，第一教导团团长许国有，政委安昌勋，政治部主任黄海峰。保卫团大约有300人。

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参谋长李敏焕，保卫连五团划归三师后留下八、九连，亦归师部直接领导。第三团团长伊俊山，政治部主任李铁秀，第四团团长隋祥泰，第六团团长刘仁风，政委李哲秀。

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曹国安，参谋长李希敏，政治部组织科长宋茂璇。二师下辖一个团和少年营。第八团团长玄继善（另名玄基昌）政委赵忠才；少年营营长王某，政委李真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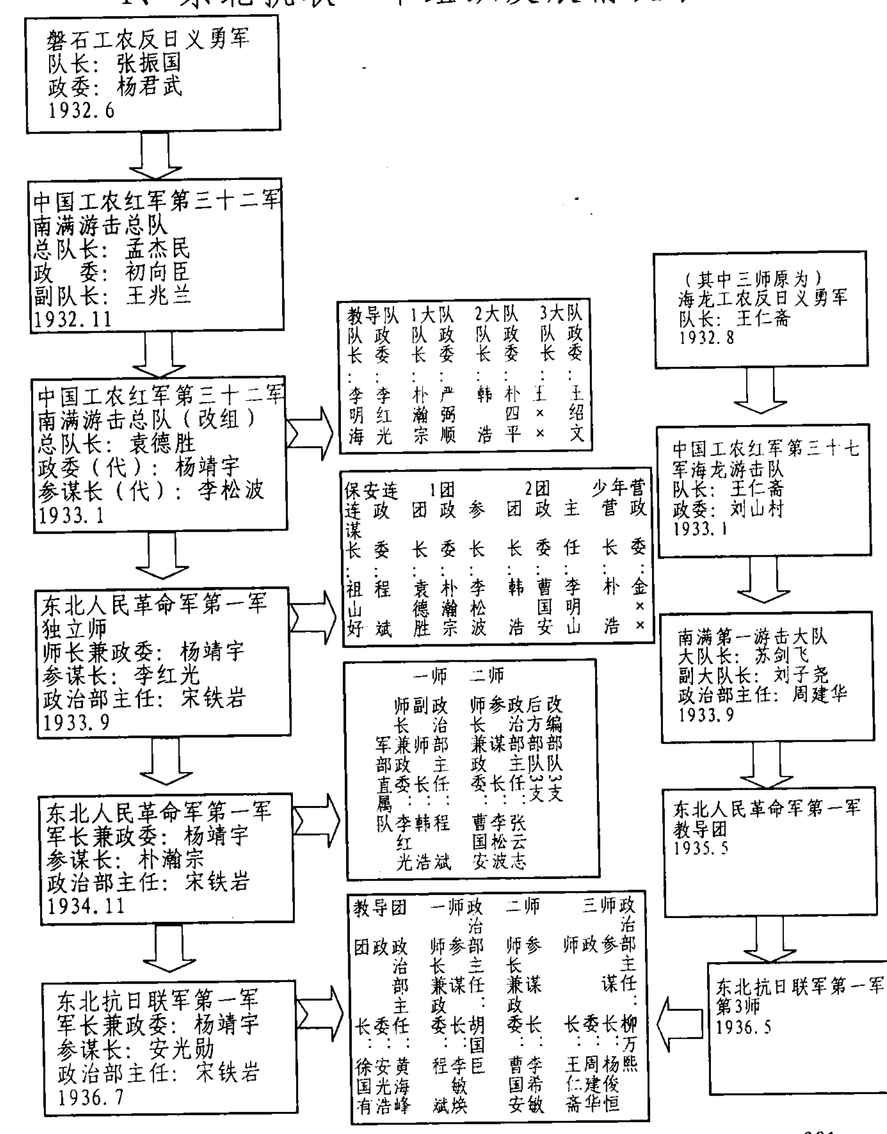
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健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三师下辖两个团，五团和七团。

一军除上述3个师以外，还有归后方领导的游击队和地方上的部队，青年义勇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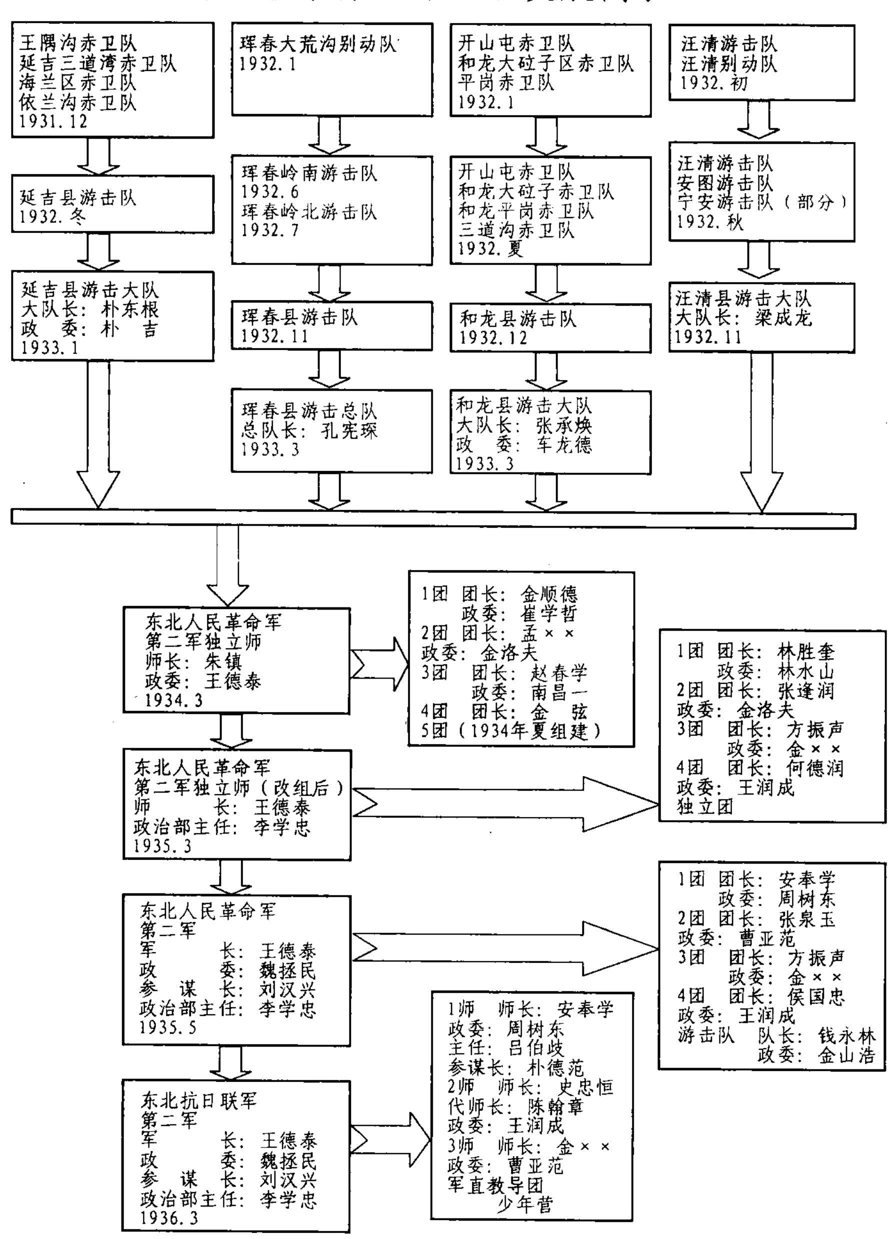
抗联一路军组成之后，其游击活动方针和任务更加明确，不仅便于军事领导，也易于调集部队进攻敌人或牵制敌人，有利于对军队内部文化、政治生活的领导和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便于团结联军以外的各义勇军，山林队协同作战。河里会议后，活动在通化周围及沈吉、安沈铁路一带的许多抗日军，都相继加入了抗联第一路军行列，在较有计划的密切配合下，在吉林南部和辽宁东部的广大区域里，更加有利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和第一路军（前期、后期）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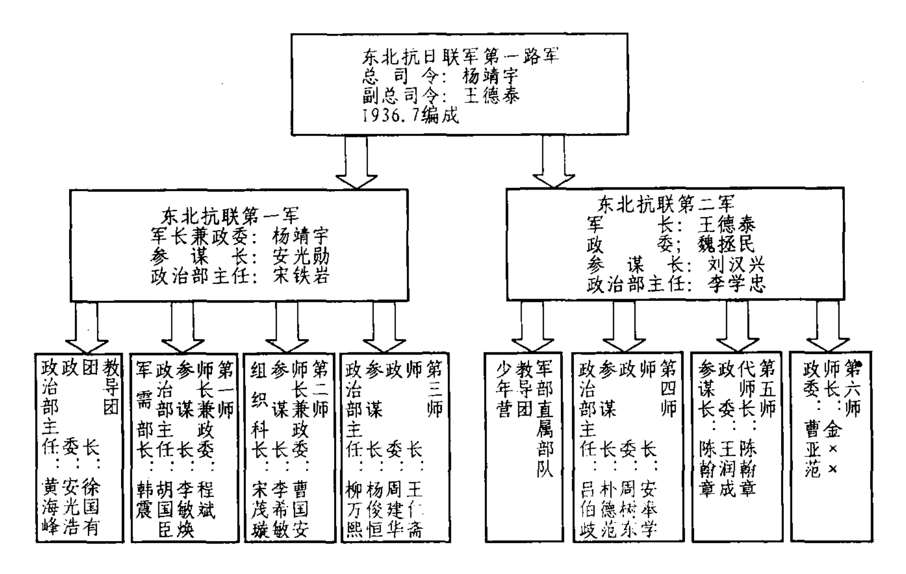
1、东北抗联一军组织发展情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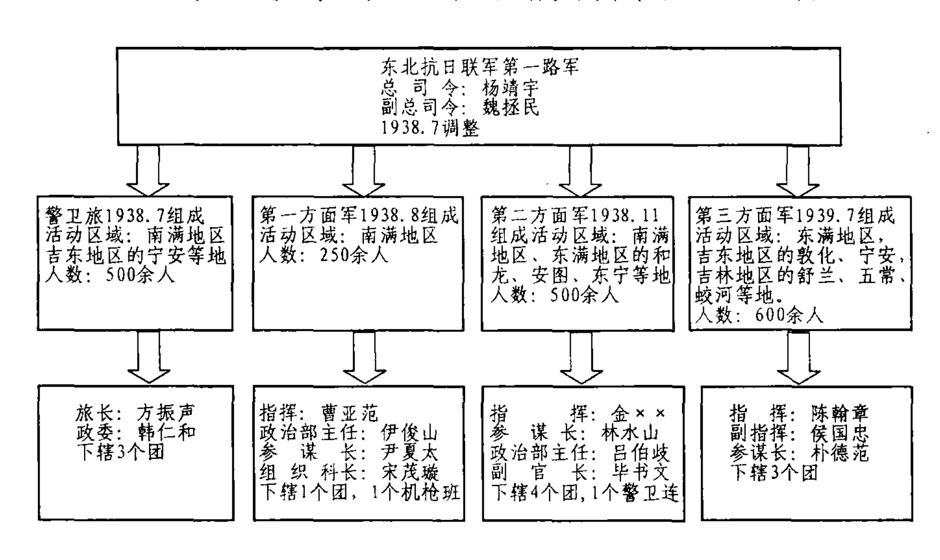
2、东北抗联第二军组织发展简表



3、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编制简表（前期）



4、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编制简表（后期）



集安抗战牺牲部分烈士名单

集安抗战牺牲部分烈士名单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时间	牺牲地点时间	所在部队
窦学文	男	汉	1920	天桥村	1937.5	39.10 高力河	抗日联军战士
徐宝全	男	汉	1921	文字沟	1937.9	39.10 高力河	抗日联军战士
徐进发	男	汉	1922	文字沟	1938.3	39.10 米架子	抗日联军战士
张瑞祥	男	汉	1921.8	文字沟	1938.5	39.10 高力河	抗日联军战士
赵良成	男	汉	1921	热 闹	1938.5	39.10 米架子	抗日联军战士
孙志久	男	汉	1920	热 闹	1938.7	39.10 米架子	抗日联军战士
王殿军	男	汉	1918.6	东 岔	1938.6	43 靖宇	抗日联军战士
王焕顺	男	汉	1919.2	矿 山	1938.6	43.10 靖宇	抗日联军战士
李友道	男	汉	1918.12	头 道	1933.10	35.9 台上	抗联独立营副连长
刘学成	男	汉	1918.6	头 道	1934.3	1935 台上	抗联独立营战士
李春生	男	汉	1920	团 结	1938.10	38.5 花甸柞树	抗联独立营战士
杨成志	男	汉	1916.9	头 道	1935.4	36.8 热闹砬子沟	抗联独立营战士
叶景山	男	满	1911.12	龙 岗	1931.9	1935.10 娄子沟	抗联团参谋长
杨作仓	男	汉	1921	团 结	1935.3	1937 热闹关木墙子	抗联六团战士
张守清	男	汉	1915.11	霸 王	1935.8	1937.5 靖宇	抗联班长
姜国敏	男	汉	1917.7	财 源	1935	1936.8 清原	抗联六团战士
周井礼	男	汉	1921	财 源	1938.2	1940 靖宇	抗联六团战士
黄文林	男	汉	1913	哈 塘	1938.9	1942.3 失踪	抗联五团班长
李宝平	男	汉	1912.7	东 岔	1938.6	1943 靖宇县	抗联警卫团二中队战士
汤树珍	男	汉	1918.2	兴安村	1936.7	1936.10 通化大泉眼	维持会长
王德山	男	汉		兴安村	1936.7	1936.11 通化大泉眼	维持会长
孟庆祥	男	汉	1919	东 明	1937	1938	抗联警备工团战士
杨风山	男	汉	1879	荒崴子	1931 年 12 月	1932 辑安县城	大刀会首领
修本福	男	汉	1894	腰 营	1933.3	1937 靖宇	抗联战士
陈宝山	男	汉	1914	腰 营	1934	1941	抗联五团战士
宋连江	男	汉	1921.9	老 岭	1936.5	1938.3 辑安	抗联一军战士
李华春	男	汉	1922--10	老 岭	1936.5	1938.3 辑安	抗联一军战士

侯宝珠	男	汉	1915	复兴村	1938.6	1943 高力河	抗联一路军战士
杨树堂	男	汉	1919	太平村	1938	1942	抗联指导员
张云起	男	汉	1916	柞　树	1935.5	1940	抗联战士
毕玉亭	男	汉	1917	钓　鱼	1937.3	1938 桓仁	抗联五团战士
王云桂	男	汉	1920	土　城	1938.3	1939.2 靖宇	抗联六团战士
王云廷	男	汉	1922	土　城	1938.6	1940 靖宇	抗联六团战士
李永珠	男	汉	1922.5	钓　鱼	1938.6	1940 宽甸	抗联五团战士
李井泉	男	汉	1917.2	钓　鱼	1937.9	1940.9	抗联五团战士
杨俊恒	男	汉		吉林省	1934.9	1938 辑安长岗	抗联一军参谋长
刘仁凤	男	汉		山东海阳	1934.11	1936 辑安米架子	抗联一军六团团长
刘金铎	男	汉				1936 治安	抗联一路军连长
摘自集安档案馆							

中韩抗日同盟会部分史料

编者按：我们从《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出版）中，摘录了有关中韩抗日同盟会在集安成立的史料如下，以供读者及有关方面研究时参考。作者是日本人，由于立场所关，对中韩抗日活动极尽污蔑之词，希读者注意。

以前朝鲜革命军曾和反满抗日匪唐聚武合作过，唐聚武被消灭后，也常常企图与其它匪团合作。

但自昭和十年（1935）秋季大讨伐开始以来，朝鲜革命军的自我消亡倾向便日趋严重，已不能作为独立的匪团抵抗住这种大讨伐，因而具体地解决团结其它匪团以提高战斗力的问题，便成为迫切的需要。

昭和十年九月二十日，东边道的反满抗匪巨头王凤阁和朝鲜革命军第二方面司令韩剑秋，在辑安县第八区会晤，决定组织中韩抗日同盟会。

中韩抗日同盟会成立宣言（原文如下）：

“我中国的弱点是从前清时代以来缺少精神上的团结。数十年前在世界上还被夸耀为光辉国体，但近年来外患日甚国家正处于危难关头。中华民国自建立就未成为完整的国家，其中东三省被强占，新建立了满洲国。目前日本在这个王道乐土肆意杀人放火，就是连三尺的儿童都能看穿的阴谋。回顾东三省，是我国资源富饶之地，民食丰富，治安良好，然而现在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遭受着极大的痛苦。现况已到再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因此，我们毅然站出来，以求得生活上的安全。

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有领导的团体，即具有二十年经验和实力的朝鲜革命军同自卫军司令王凤阁互相合作，共同团结一切中韩同志，齐心协力地为排除困难，恢复国家而奋斗，以争取中华民族幸福和朝鲜独立。为了这种团结，不论贫富尊卑阶级，不分民族贵贱，凡抗日同志加入本团体为会员者一律欢迎，我们将破坏日满军事行动和政治措施，采用新的政治手段，建立中韩两国的新政权。如上述，本同盟会的纲领是坚定的。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以争取中华民族幸福和朝鲜独立。

卖国贼要彻底消灭，同志之间要团结，务期成功，这是我们的宗旨。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

中韩抗日同盟中华执行委员会（章）

此后，他们在辑安通化县境，几次会晤协商，议定了中韩抗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及组织细则。根据纲领及细则，同盟会的目的是：

“本同盟会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失地，争取朝鲜独立为目的。”为此而制定的政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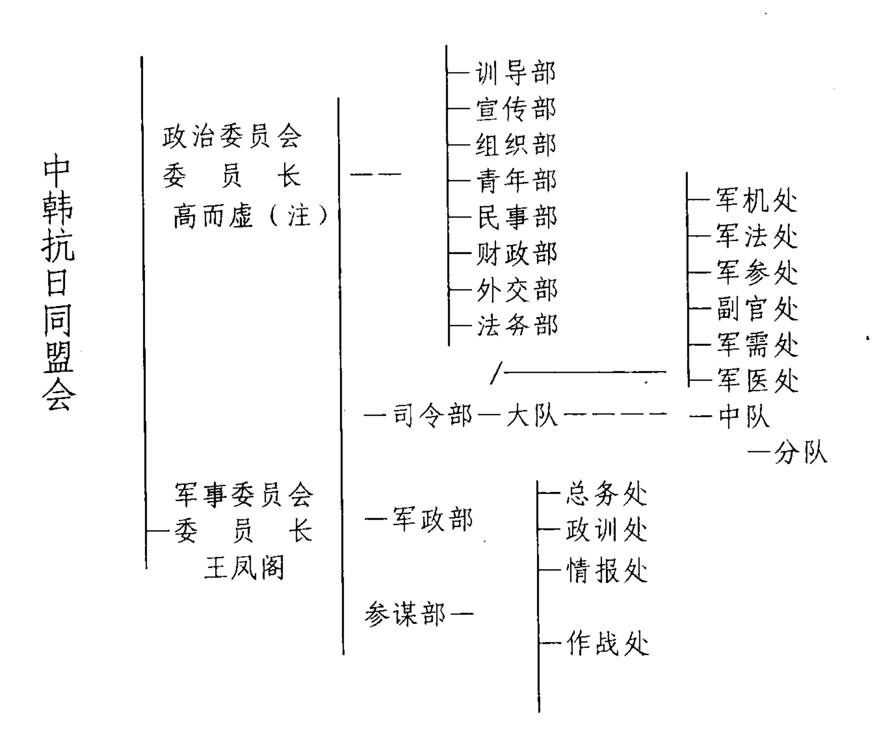
1、“本同盟会要与世界各民族的抗日团体保持联系。”

2、“本同盟会以军事手段破坏日满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措施，同时以行政手段建立中韩两国的新政权。”

3、关于会员则规定："中韩两国抗日同胞皆可为会员。"

4、关于同盟会的财政规定为："本会成立之后，本会一切财务开支均由各区村的中韩群众负担。但没收走狗财产时应充当本会经费。"

又根据组织细则，该同盟会的机构如下表：



如上所述，中韩抗日同盟会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但因正逢冬季，匪团活动进入低潮，加之面临不断的冬季讨伐，还未见到积极的具体活动。

朝鲜革命军第一卫队长金光秋归顺时陈述说：

" 中韩抗日同盟军事委员长是王凤阁，总司令是韩剑秋，兵力一千一百五十人。即由王凤阁匪八百人，韩剑秋部下一百人，其它归顺土匪二百五十人所组成。……"（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通化县公署警察局）

在其它日常生活方面：

“朝鲜革命军及王凤阁匪，由于去年（昭和十年）中韩抗日同盟会组成以来，经常联合共同行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住宿也不分朝鲜、满洲农民的家了。”（奉天地方警务统制联络委员会昭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此外，关于朝鲜革命军的武器弹药，则：

“去年中韩抗日同盟委员会成立后，韩剑秋直接向王凤阁交涉，得到很多武器弹药，因而并不感到什么不足。

尤其关于弹药，据说王凤阁在他的根据地通化县第三区挠头安装了制造弹药的机器。现正根据需要进行制造。（金光秋的陈述，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通化县公署警务局）

从上面可以看到，作为同盟会本身虽然还没有开始积极的活动，但是两军间已结成极亲密的互相协作的关系，这是需要注意的。

再来看一看红军和同盟会的关系。昭和九年十二月通化中心县委成立后，该地的红军势力有了发展，到昭和十年二月袭击朝鲜东兴地方后，朝鲜革命军和红军便逐渐接近，终于缔结作战协议。

以后两者之间一直处于不即不离的关系，也未见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向来与红军处于冤家对头的同盟会的主体王凤阁自今年（昭和十一年）春季接近红军以来，红军和同盟会，以及和朝鲜革命军之间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划时代发展的可能性。例如，最近一、二情报说：

“红军第六团长、教导连长等召集中韩抗日同盟委员会干部，协议决定如下：

（1）加强中韩抗日同盟委员会；

（2）彻底解除日满军警的武装；

（3）在这种情况下各队应迅速支持；

（4）分配缴获的武器；

（5）确定根据地，经常转移，集散；

（6）破坏烧毁大字炮台。”（通化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午七时，桓仁县警备队友林大尉以下（从略），分乘三辆卡车从桓仁县城出发，回兵营途中，在上午十一时左右，正经桓仁县第十区缺石岭时，突然受到来自该山区高地的红军杨司令、及朝鲜革命军四中队长金见杰率领的联合匪徒约二百人的袭击"（奉天地方警务统制联络委员会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高而虚系朝鲜革命军政府首领（朝鲜革命军系梁瑞风、金浩石等创建，前身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特务队）。据叛徒金光秋供词说，朝鲜革命军当时有三个师。"第一师司令韩剑秋以下约一百人，服装类似满军，步枪有六十支（种类不一），每一支一百五十发子弹。手枪四十支，每支二百发子弹。第二师司令崔昌岗以下约八十人。第三师是赵化善以下约七十人，都穿着与满军类似的服装。"（通化县公署警务局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昭和十一年度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节录）

（1936 年 7 月）

按：这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1936 年 9 月制定的围剿抗日联军行动纲领，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的阴险、残忍和毒辣，也可看出抗日联军英勇顽强及辉煌战果。

第一、一般纲要

（一）根据昭和十一年度（一九三六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将第二期之治安肃正主要地区定为满洲国之东部地区，特别是东边道及东部三角地带，以及滨江、三江两省之松花江地区。

以下所指各项，主要是以上述各地区内之治安肃正工作为中心，但其他地区亦应按此进行各种工作，以期彻底进行治安肃正工作。

（二）第二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的纲领是，（在前半期（大体上以青纱帐起的八、九两个月）将重点放在治本、思想工作上，有计划

的分地区的加强进行掌握群众、分离匪民、建设治安设施等工作，为后半期（大体上以落叶初冬之十、十一两个月）的彻底治标工作作好准备。在后半期则以治标工作为主，展开果敢而适当的讨伐，逮捕等，消灭匪徒之行动，同时要使治本、思想工作紧紧配合进行，以期彻底搞好治本工作。

（三）治安肃正工作的方法，虽仍然根据过去方式但特别要警惕被动地追随匪贼的行动。要自主积极地确定肃正地区，彻底消灭匪贼；特别是共匪的活动地及盘踞地，将尽全力把治标、治本及思想各项工作结合在一起，以期扩大持久的成果。各地区之治安肃正工作方针要在长期打算的观点上来确定，不要为人事的移动而发生无意义的变更。

第二、治标工作

（一）第二期治标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在于歼灭在满洲国东部地区的匪贼，特别是歼灭共匪。

（二）各地区防卫司令官为歼灭其地区内之匪贼，特别是歼灭共匪，兵力要巧妙、积极、勇敢，要有坚持、持久的行动和与宪 警灵活的配合动作，以期治标工作之彻底。

（三）军政部最高顾问要与各地区防卫司令官商讨，除使在该防卫地区内之满军，受该防卫司令官指挥外，应尽可能将多数满洲军向北部东边道方面集中，并与第一、第二独立各队司令官商讨由其直接指导该满军，独立的担任桦甸、安图两县之南部及东边道（抚松、濛江、辉南、金川、柳河、长白、临江、通化、辑安各县）的治标工作。

（四）各兵团要作好各省县境附近的治安肃正工作，特别是治标工作，尤其是在下列地区各有关团长应相互间周密的商定，使讨伐的时期、用兵、治本工作等均在一个方针下进行。在各有关兵团长商定之后，对在该方面活动之部队，暂时由一名高能职位者，先任将领，统一指挥。

（五）东北、东、中、东南等各地区防卫司令官，除上述地区之外，特别要使下列各县的治本工作，大体上能紧密结合于治标工作进行，并使其彻底。为此尽可能每一县要固定配备一个部队，以其达到与行政机关及民众的一致结合，使治安肃正各种工作收到大

的效果。

东北防卫地区：依兰（除牡丹江以西）勃利、佳木斯、富锦、宝清各县。

东防卫地区：地区之全部。

中防卫地区：方正、苇河、延寿、珠河、宾县、五常各县、双城县东部。

东南防卫地区：舒兰、额穆、敦化、各县、延吉、和龙两县之西部，永吉县之东部、安图、桦甸县之北部。

南防卫地区：本溪、兴京、桓仁、宽甸、凤城、安东各县，辽阳县东部，抚顺县南部。

上述县以外的各县应根据各县之治安肃正工作情况，治安良好的地区，则应彻底地实行治标工作。

（六）第二期之治标工作纲领如下：

前半期：

须支援与指导进行治安肃正的各县，进行治本工作，特别是促进、加强、建立集团部落，设定无人区，以及警察 、道路、通信网等设施，以图治标治本两项工作之合一。并掌握群众，组织以县为主体的固定密探网，完成彻底的治标工作的准备工作。

后半期：

根据前半期的工作，进行积极果敢的大讨伐与逮捕。为了此项讨伐，就要作出使匪贼无存在之余地的措施，扑灭匪贼之山寨，组织集团部落，制定无人区，分离匪民。要依靠以上这些工作，使匪贼孤立起来，然后再用讨伐给以歼灭。同时亦要运用盘查、逮捕等工作，剿灭潜伏逃亡之匪徒。为此就应自前半期，使匪势变成被动，在大讨伐中则要讲究防止匪贼有计划的分散与逃走等方法，以便于歼灭匪贼。

各地区讨伐开始时期，预定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末，此后则要为三期治标工作作好准备。

第三、治本工作

（一）治本工作是第二期工作之中心，必须发挥其全部力量进行工作，故应根据关东军作战命令第七七八号附件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度关东治安肃正计划大纲，彻底进行。

（二）第二期治本工作纲领，应根据各地地区治安情况不同，其宗旨亦有不同。但在治安尚未恢复的地方，则不能与治标工作分离，故治标、治本两工作应毫无间隙地结合起来，使各有关兵团、机关结成一体共同努力，以适当、正确的做法彻底完成此两项工作。

在前期的治本工作，主要是为后半期的治标工作打下基础做好各种设施；而后半期则要跟上并适合治标工作，以期治本工作之彻底，来完成治安肃正工作。

（三）第二期治本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匪民分离，掌握群众（组织自卫团，组织省、县所实施之固定密保网）。有计划的组成集团村落，设定无人区，完备警备道路、通信网等。各兵团要根据过去县所实行的前项治本工作之成果及治安情况，应更进一步的予以指导与援助，为使治标、治本两项工作一致，发挥其最大效果而努力。

（[日]关作命第八五三号附件）

抗联第一路军袭击通辑铁路工程日志（摘译）

译者按：此资料是从满铁 1942 年 11 月编辑的《通辑线建设工事志》摘译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继安奉铁路和吉会铁路之后，于 1937 年 4 月到 1939 年 9 月修筑了从通化至辑安（今集安）过江与朝鲜的满浦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在通辑铁路修建的过程中，我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从 1937 年开工起就频繁袭击破坏该路工程，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哀叹通辑铁路工程是“满铁的铁道建设史上未曾见到的悲惨事件”。

这份资料为《通辑线建设工事志》第十一章《警备及匪害》中的内容。是按日伪原档翻译的，观点反动，并极力夸大抗日联军损失缩小日伪军损失，译者未作批判，仅供研究者参考。使用时请查对原文。

第一节　沿线的警备并匪害情况

昭和十三、十四的两年间，通辑线建设工程期间的匪情极为严重，加上重叠的山峦地带，给警备带来很多困难。沿线的匪团大部是共匪，以杨靖宇为首领的约六百人的集团最顽固且极凶暴，由于他们无休止地疯狂干扰工程，以致使工程遭到数十次袭击，受害很大。主要的有几次：昭和十三年三月匪袭距通化七十一公里的老岭隧道西口供应仓库、宿舍及东亚土木会社的隧道口现场。在这次袭击中，漆畑警备助理下几名壮烈战死。其后，匪势愈增，到六月又袭击阳岔分区及今井组并东亚土木会社，更乘势袭击辑安工程区及满军步兵第九团团部，牺牲了许多人（如另表），以致造成不得不停工两个月的严重情况。

因此急忙从其它线路向此处增员，以及采取紧急召募警备员增加枪支弹药及警犬、警鸽的配备等一切手段，以增强警备力量继续施工；但凶恶成性的匪团还企图进行顽固地干扰，七月又袭击了满铁会社的卡车，出现了九名（满军五名、满铁方面四名）的牺牲者，其活动依然极其猖獗。但警卫工作人员的斗志越来越高，积极加强和各种机关的联系，搜集情报，继续在工程现场、宿舍严格警戒，全力以赴，保证工程继续进行。

另一方面由于东边道讨伐司令部的讨伐，逐渐恢复了治安，从而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昭和十四年七月，受日本守备队保护的地方的治安，有了进一步好转，既或是目前极为困难，估计工程到九月末也会顺利竣工。

此期间沿线 9 警备的配置及匪袭时的情况如下（即第二节，编者注）：

第二节　警备的配置

距通化 15 公里	水洞		
通化宪兵队			4 名
第 15 团第 4 连	步兵上尉	水上齐以下	112 名
通化警卫队	警长	久保田美敏以下	2 名
老岭工程区	警备员	四元贤以下	5 名
距通化 27 公里	铁厂		
通化警护队	巡警	周学孔以下	1 名
老岭工程区	警备班长	酒井寅市以下	6 名
距通化 42 公里	果松		
马荠部队	长田中尉以下		35 名
老岭工程区	警备班长	形太之助以下	8 名
距通化 56 公里	石湖		
通化警护队	警长	岩本富士夫以下	2 名
老岭工程区	警备员	上鹤纯吉以下	8 名
距通化 69 公里	老岭		
骑兵 25 团 1 连		杨青山中尉以下	11 名
警备班长		丹治正治以下	16 名
距通化 84 公里	黄柏		
骑兵第 25 团	骑兵上尉	牛天放以下	62 名
骑兵第 25 团	骑兵准尉	唐书春以下	15 名
老岭工程区	警备员	野田志清以下	29 名
距通化 115 公里	辑安		
骑兵第 5 团			
辑安工程区	警备班长	前田清以下	24 名

第三节　事故及受害情况

（1）昭和十二年九月六日十七时

距通化四十三公里的六道沟东方六公里

通化县警务局西鸠指导官以下四十三名及驻五道沟十五名协力与共产匪约一百三十名交战，进行一个多小时将其击退，匪遗尸四十五具（明显的有夸大了抗联的损失）。

（2）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六时铁厂

六道沟警察署小南岔分驻所长以下十一名在扫荡铁厂附近时，与系统不明的匪十余名遭遇交战。匪遗失一具，缴获匪枪一支，子弹十三发。

（3）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距通化一一五公里的辑安北约十三公里

背景不明的匪约三十名出现在上述地点，掠夺许多衣服、物品等，从住宿在该地旅馆的某些鲜人掠去四十余元逃走。

（4）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距通化七十一公里的老岭隧道西口

通辑线从离通化六十公里附近至辑安间，是重叠的山岳地带，反满抗日匪的活动极为猖獗，不断派便衣在老岭工程区努力搜集情报。黄昏时分，突然有共匪约二百人（估计匪首是×××或裴团长），分别袭击了东亚土木会社的现场、十一道沟发电厂所及十二道沟供应仓库。袭击十二道沟供应仓库的匪团约百余人，主力包围了旁边栅栏，并越过供应仓库的警戒线，接近正门，其余匪破坏铁丝网，从而重重包围供应建筑物。

正站岗的满人警备员唐连仲、李清山一面紧急射击，一面急报。久保调度员立刻急报老岭守备老岭工区，在漆代千松警备助理的指挥下亥浅松核警备员和久保直左卫门调度协力应战，因寡不敌众，遂壮烈战死。

匪团之一部约三十余袭击十一道沟发电所及机器房，但在宫光电气助理以下全体充分准备，与其应战，终于击退。

在第一老岭遂道西口东亚土木会社现场，匪团一部约一百余人，对后山一带的宿舍，采取了乌黑队形，正等待开始攻击。当听到十二道沟供应仓库方面枪声后，即从各方面蜂拥而入，极为惨暴。一部分人员打开一条血路逃入第一老岭遂道内，其他人在匪团凶恶袭击下全部殉职。

满铁方面被害者

战死	警 备 补	职员	漆 千 代 松
战死	警备班长	雇员	核 浅 松
战死	技 术 员	雇员	久保直左卫门
被俘	警 备 员	雇员	任 殿 清

东亚土木会社方面：

战死	山 田 芳松	山田右西卫	柴田太十郎
负伤	河岛仙太郎	神 田 重治	
绑架	松 田 伊作	此外劳工 100 余（松田被放回）	

满铁方面损失物品：

建 筑 物	13，391 元（日）
机 器 设 备	7，850 元（日）
电气设施	627 元（日）
供应物资材料	16，370 元（日）
合　　计	38，236 元（日）

包工的东亚土木会社方面：

临时设备	1，7393 元（日）
机器、工具类、储存材料	32，479 元（日）
事物所及食品	3，065 元（日）
粮食及被服杂货	26，825 元（日）
职员及家属物品	22，860 元（日）
其它损失和现金	15，050 元（日）
合计	117，682 元（日）

（5）昭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十七时

距通化七十一公里老岭西南方约十公里的十七道沟

驻六道沟的角田部队接到第一老岭隧道西口被匪袭的报告，会同警察队一百二十名急赴现场，激战四个多小时将匪击退。此次战斗满警二名战死，今桥义太郎（步兵一等兵）光荣负伤。

敌匪也有相当损失，遗尸三具。

（6）昭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十三时距通化七十一公里第一老岭西方约八公里的 1285 高地。

角田部队在上述地点与匪团约三百名交战四小时，匪团退走。

此次战斗步兵下士狩野率雄光荣战死，步兵上等兵矶盛吉负伤。

（7）昭和十三年四月一日二十一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沟站北方三公里的水洞

系统不明的共匪约二百名，除每人有步枪外，还配有机枪二挺，袭击该部落，让六十九名居民搬运掠夺的衣服、食品等，然后向东方临江县方面逃走。损失有，谷类653石，盐二百一十斤，水袜子一百八十双，国币一百七十元及其它。

（8）昭和十三年四月九日二十三时

距通化二十七公里铁厂站北方约六公里的头道沟门

出现不明匪十名，抢夺米面及高粱等向东方山中逃走。

（9）昭和十三年四月十日午前一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站北方约三公里的水洞沟

匪首王伪等联合共匪约三百名，有轻机枪八挺，来掠夺苞米一百七十五斤和衣服、食品很多，向北方高地逃走。靖安军出动讨伐。

（10）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十一时

距通化五十六公里石湖站西方约十八公里的四平街

从 555 高地附近南下的共匪约二百名与出动讨伐该匪的通化县警察讨伐队二百零五名，在上述地点附近激战十余小时之后，将其击退。

此次战斗讨伐队战死一名，敌匪损失不详。

（11）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

距通化一0一公里阳岔西北方约七公里的小青沟

匪首不明的共匪约二百名，袭击东亚土木会社坑木采伐场，掠夺衣服、食品，绑去劳工十六名，当晚潜伏在该地附近，于第二天（十日）早晨向北方逃走。但十日晚再次出现在小青沟，向劳工强要去日式带腰胶皮鞋和绑腿一百付之后，向北方天桥沟方面逃走。满军骑兵第五团及警察队接到匪情报后出发去讨伐。

（12）昭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十七时

距通化四十二公里果松站东方约八公里的白砬子沟

二名持手枪的土匪，打死在该地耕种的农民一人，抢去马二匹

逃往东方山中。

（13）昭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十三时

距通化八十一公里老岭西南方约十公里的1500高地

蒙江县警察游击队与匪首毕团长率领的共匪约二百名遭遇，交战后在西方将该匪击退。双方损失不详。

（14）昭和十三年六月七日二时

距通化八十一公里老岭西方约十八公里的大蚊子沟

匪首不明的共匪三百名袭来，该村警察及自卫团奋力击退，但因弹药殆尽，匪团遂侵入部落内，掠去很多食品，于午前四时左右向东南方天桥沟方面逃走。接到匪情后，辑安县城立即编成讨伐队向天桥沟出动。

（15）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距通化七十一公里老岭西南方约十五公里的天桥沟

因为有情报说，盘踞在天桥沟附近的背景不详匪二百名，企图于六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袭击第一老岭隧道西口，所以在沿线实行戒严，借以非常警戒。

（16）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距通化七十一公里的老岭西南方山中

盘踞在上述地区一带的共匪匪首是李、毕、王等联合的约六百名，其中半数以上是鲜人。鉴于他们目前食物缺乏，相当困难的情况，在沿线实行严重警戒。

(17)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二十三时

距通化一0一公里阳岔工程分区的今井组宿舍

盘踞在老岭西南方（阳岔西方）地区一带的共匪约三百名突然袭击上述地点，分区人员和该地满军十名及今井组组员共同协力，激战约四小时，将其击退。

此次战斗双方损失，我方无，估计敌死三名，负伤多名。

（18）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二十三时左右

距通化一0六公里附近的第十一、十二、老岭河桥梁

与袭击阳岔同时，共匪多人（数不详）袭来，牺牲如下：战死日人六名（其中女一名），鲜人包工头一名。

今井组办公室被绑去日人九名，后放回五名，惨杀二名；绑去

鲜人一名，满人八十名，另外，房屋、大楼、建筑物及物品损失甚大。

（19）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二十三时

距通化一0九公里附近的土口子隧道东亚土木会社值班室

与匪袭阳岔同时，共匪约一百五十名袭击上述地点，遭受到很大损失。

一名日人负伤，一名鲜人被绑架，值班室全部烧毁。

（20）昭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

距通化一0九公里附近的土口子隧道现场

约三百名共匪来此，绑去东亚土木会社日人一名及鲜人劳工二百五十名。

（21）昭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三时

距通化一一五公里的东岗辑安工区及满军团部

进入六月以来，土口子隧道附近一带，因为匪情险恶，辑安工程区派许多便衣到各处，积极收集情报，各警备机关增配人员，从而在严重警戒中继续进行作业。

二十四日二十三时五十分左右，听到由土口子隧道方面枪声大作，辑安工程区人员立即进行紧急准备，决定铃木义雄、横田一警备员并细谷常雄、山村政太警备员担任外部联络，收容工区外居信的家属，出工区后开始和各方面通消息。但是电讯被破坏了。

零点二十分细谷、山村两警备员无事完成任务回来，但横田、铃木两警备未归，大家都很担心。

忽然，第一、第二了望楼因为突然受到来自工区东北方高地的猛烈射击，立即与其应战，在这里猛烈地展开了攻击战。

骑兵第五团也已受到匪袭，听到像由北方传来的枪声很大。敌人逐渐增援兵力，在离工区东方一百米的第2东岗桥梁附近，切断了路基，高地架设轻机枪，顽强地攻击，一队是从第三了望楼正门南下，一队是迂回到东岗派出所及第二了望楼正门，急速 射击，进而肉搏。

工区人员在匪团重围中沉着勇敢地应战，经过三小时才逐渐将他们击退。

原来出发去联络的铃木、横田两警备员仍未归。

于是，编成以警备员为主体的搜查班，进行搜索，结果，在通往工区北方一百多米的老岭的路上，发现两名战死者的尸体，立刻收容到工区。

两名战死者是从工区出发之后与匪团遭遇应战，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最后壮烈殉职的。

匪团对骑兵第五团的袭击是相当猛烈的，但马团长部下非常善战，将其击退。

此次战斗，我方射击实际耗弹一千九百七十发，可见经历了一场苦战。

损失：

战死　警备班长　雇员　铃木义雄

战死　警备班长　雇员　横田一

估计敌匪死三，负伤十四到十五名。

获悉匪团袭击的步兵第一团，由望月上尉率二百名出动支援，追击匪团。

（22）昭和十三年七月五日九时

距通化四十公里果松站东南方约九公里的602高地附近。

满洲矿山株式会社的卡车从七道江出发到作业场，在602高地附近受到背景不详匪约八十名的袭击，死伤及下落不明者如下：

矿山会社方面战死七名（日人四名，鲜人一名，满人二名），负伤五名（日人一名，鲜人一名，劳工三名）

（23）昭和十三年七月七日午前零时

距通化三十四公里附近的五道沟部落

接到不明匪二十余名袭来的报告，果松的守备队立即出动装甲列车将其击退，但该匪逃走前放火烧掉民房十一户，又掠夺牛马五头，打伤自卫团一名。

通化的山本部队也出动到该地。

（24）昭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十一时三分

距通化八十五公里的大青沟

老岭附近一带进入七月以来，匪情日益险恶，局面异常紧张。

鉴于六月连续几次蒙受其暴行，出现许多牺牲，故增加了警备人员，更加密切了各有关机关的联络，工作人员以决死的精神，在

非常警戒下继续进行建设工程。于七月二十九日十一时三十分上述地点受到了共产匪匪首杨司令部下约一百五十余名的袭击。

（25）七月二十九日九时三十分

汽车司机雇员黑河内省一郎驾驶卡车去辑安—老岭间建设工程连络，搭乘卡车的有辑安工程区机械助理心得、雇员运尾完善、技术员雇员城鸠正行、土木雇员室井重吉、老岭工程区调度员森圭及担任警备的警备员雇员岩田忠平、品川清治、齐藤德次郎、相马清见共九名从辑安工区出发向老岭方向驶去。

途中十点三十分左右在大荒沟顺便搭乘满军军官一名，士兵三名，十一时到达大青沟工程分区，森调度员下车，立刻向老岭出发，十一时三分左右迫近距通化八十五公里附近老岭—大青沟间，突然受到从山上下来的共产匪杨司令的部下一百五十余名包围袭击。但因该处被搬运电线杆的马车数台堵住了道路，加上路窄坡陡，故来不及躲避，于是决定立即下车，以警备员为主，协力奋战，但是寡不敌众，终于三名殉职，两名下落不明（内一名殉职，尸体在八月六日十四时从大青沟—老岭间距通化八十五公里附近遇难现场的深山树丛中发现，一名于八月三日十八分安全生还到大青沟分区），重伤一名。

受到袭击后，岩田警备掩护黑河内、运尾、城鸠、室井，收容在东面山上部落民家，因匪团紧迫忽然出现险情，将四人转移退至后面森林里，依托该房附屋和匪团交战，第一批装上的子弹打完，正装第二批子弹时，从附近草丛中出现一名匪贼，正要袭击岩田警备的时候，岩田用枪殴打该匪头部，将其打昏倒下。忽然，这时岩田被流弹打伤头部，不省人事，因此，共匪更加嚣张，继续对黑河内司机猛烈攻击，品川、齐藤两警备也身中数弹，壮烈殉职，运尾、城鸠技术员也负重伤倒下，时值十二点二十五分左右。

而且，匪团将受难的全体人员的武器、被服、贵重物品及室井土木工随身携带和发给大青沟分区人员七月份工资全部掠夺之后，十二点三十分左右向干沟子方向逃走。

受难者的收容：

大青沟受难者中没见室井土木工相马警备，并专门搜查附近一带，始终未发现，十五时暂且中止，撤回大青沟分区。

十五时十五分，辑安工程区山下警备员将经过临时处置的负伤者运送到辑安县城内医院治疗，运尾技术员、岩田警备员因重伤生命危在旦夕，但是手术后情况良好，城鸠技术是轻伤（关部擦伤）。殉职者的尸体收容在辑安工程区。

从老岭工区东口出动满军二十四名，区警备员六名，从本口出动满军二十五名，警备员五名共同救援，十七时将满军军官以下的战死伤者收容后回到东口。

因为老岭一辑安电话不通，十五点四十五分组成了电话线路修理班（班员六名，警备员四名，护士一名）向大青沟出发，修理好途中被砍断的电杆和割断的电话线几处之后，十七点三十分回到老岭工程区。再说是从袭击现场的山中发现了下落不明的室 井重吉的尸体（八月六日十四时）。相马清见警备员被释放，八月三日二十一时回辑安工程区。

满铁方面被害者有：

战死	从右肩胛下部穿过左乳房枪伤	技术员雇员	黑河内省一郎
战死	从背部穿进咽喉下部枪伤	警备长雇员	品川清治
战死	穿过右胸部枪伤	警备长雇员	齐腾德次郎
战死	穿头部枪伤	技术员雇员	室井重吉
重伤	穿右膝和胸部枪伤	警备顾员	运尾定喜
重伤	头部枪伤及头盖骨骨折	警备顾员	岩田忠平
轻伤	头部枪弹擦伤	技术员雇员	城鸠正行

物资损失总额　1，333 元（日元）

包工方面损失　　5000 元

烧毁卡车一台

满军方面：

战死	兽医上尉	陶桂余
战死	上 等 兵	王相林
战死	二 等 兵	高仁富

（26）昭和十三年八月二日二十二时

距通化九十二公里附近的岗组现场

不明匪约一百名袭击第六、第七老岭河桥梁冈组现场的劳工棚，掠夺衣服、食物（三百元），绑去劳工二十五名而逃走。

（27）昭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时

距通化一0一公里阳岔西方约十一公里附近

东亚土木会社去搬运采伐木材的卡车四台，遭到不明匪六十余名袭击，绑去车上司机四名，助手二名，但后来两名助手逃回。

（28）昭和十三年八月二日四时

距通化一一五公里辑安西北方约十四公里的新开河岭附近

满军索旅与匪首杨靖宇司令率领的共匪联合部队约三百名遭遇，激战四小时之后将其击退，但此次战斗发生地日系干部以下牺牲者很多 。

索旅战死二十五名，负伤四十八名，十四名下落不明；匪团死者约三十，负伤五十名。

（29）昭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二十四时

今井组现场

在六月十九日第十一、第十二、老岭河桥梁地今井组值班室袭击之时被绑去的小林等于九月十八日返回辑安东岗。

（30）昭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零时

距通化二十七公里铁厂站东方约八公里的挂重岭

满军中津中尉以下一百名接到的匪首保中国率领二十名匪团盘踞的报告后出动讨伐，十三日三时左右在上述地点附近与匪团遭遇，交战约三十分，将其击退到东方。

此次战斗敌我损失，我方无；匪贼方面捕获二名，缴获帐蓬二顶，酒一斗，面粉一袋，烟草两箱。

（31）昭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二十时

距通化一一五公里辑安西北约三十公里的青沟子

接到共匪团杨司令以下约三百袭来，掠夺粮食之后，烧毁民房半数的报告，满军及台上游击队急赴现场，在附近和该匪交战约四小时，将其击退到西方。

此次战斗敌我损失：

我方战死警士一名，下落不明一人，火烧伤四名，烧毁民房二三八间；估计匪贼方面战死二十，负伤甚多。

（32）昭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十八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北方约五公里的小杨子沟

接到有不明匪约八十名，盘踞在小杨沟中的情报后，驻热河水河子的满军王中尉以下约一百名，出动讨伐并扫荡了附近，但该匪经西葫芦、西岔向旱葱方面逃走，因未见匪影于十九时无事而回。

通化东边道讨伐司令部及日军山本部队，接到盘踞在小杨子沟中的杨匪三百名继续向北方三道沟方面移动的报告后，出动了装甲车到该地附近。翌日（20 日）十三时左右，满军讨伐队在青沟子附近与该匪三百余名遭遇交战，将其击退到南方。

（33）昭和十三年十月六日零时

距通化四十二公里果松东南方二公里的六道沟附近

杨司令率领共匪约三百名，利用月明之机，突然分三队来袭击六道沟及七道沟两部落，在六道沟驻屯的警备社员，很快说察知匪袭，急报有关机关，和该地驻屯的日军一起在加藤准尉指挥下，奋战击退匪团。袭至寨墙十米，由于我方有所防备被击退到西方。

此次匪袭彼我损失：

满铁会社方面：电杆被砍断二根；绑去吉川组劳工二十五名，掠去白面二十袋，高粱四袋，其它衣物甚多；绑去今井组劳工五名；绑去谷组鲜人一名，夺走手枪一支，烧毁卡车一台。

警察方面：一名警士战死，四名警士、九名自卫团员被绑架、烧毁警察分所房屋一栋。

共匪方面战死 3 名，负伤者甚多。

（34）昭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二时

距通化四十二公里果松西方约八公里的大西岔

杨匪约三百名继续被满军讨伐队追击，向南跑中突然袭击了大西岔部落。该地驻屯的满军及警察与之交战约一小时将其击退。

此次匪袭损失：

俘去警士三名，自卫团一名负伤，夺去满军武器：步枪七支，子弹二百五十发，手枪一支。

（35）昭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七时

距通化一百一十五公里辑安西方约二十五公里的衿沟岗

满军赵明、马玉两讨伐队发现一山寨，缴获步枪子弹七十二发、月饼三十斤，猪肉四十斤及其它。

（36）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九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北方约十二公里的九六六高地

游击在水洞站一带的杨岳部队，在九六六高地附近，与不明共匪三十名遭遇，交战约三十分，该匪团向北方溃逃。杨部队正继续追击中。此次战斗敌我损失：

估计共匪方面负伤甚多。

（37）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

通化至水洞间十三点八公里附近

横断该处的不明共匪二百名砍倒电杆，切断电线，破坏了通讯。

因通化山本部队以装甲列车警戒线路，又掩护建设的各部队追击匪团，因此，满铁现场工作人员即时赶赴现场，努力恢复作业。

此事件使从通化发的旅客列车晚点三十分发车。

（38）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北方约十三公里的1168高地

谷峙部队从该地到东北方向杨匪别动队约二百名交战数刻，在西方将其击退，还在附近扫荡时消灭山塞一座。

此次战斗彼我损失：

我方战死一，冻伤六；共匪遗弃尸体八具，负伤不详，缴获步枪一支，粮食若干。

（39）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距通化一一0公里东岗西南约十五公里的门庄盆

赵明部队正队长以下二十五名去双岔河附近扫荡，前进到门庄盆，奇袭了正潜伏在上述地点的内崔匪部下约十名。打死一人，俘匪男三名，女一名，小孩一名，缴获手枪一支。

（40）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三时

距通化北约13公里大龙爪沟。

通化县新安屯警察署长以下三十名在扫荡大龙爪沟一带时，与共匪约二十名遭遇，交战约一小时，在四方顶子方面将其击退。

共匪方面遗尸一具，缴获手枪一支，弹药盒一个。

（41）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北方约十三公里的1168高地

谷崎部队游击队在1168高地与约一百五十名的匪团交战约两小时，将匪团击溃向东南方向逃走。

此次战斗敌我损失：

我方战死三名；共匪遗尸二具，估计受伤的很多，缴获步枪一支，子弹五十二发。

（42）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十八时

距通化七十一公里老岭西南八公里的大壶沟山

中川游击队由飞机引导，在大壶沟山北方二公里的高地上，发现共匪约一百名准备宿营，与其激战三小时，使之溃乱。

此次战斗敌我损失：

共匪方面遗尸体五具，十名负伤、俘虏二名，缴获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二十发，帐蓬四顶，被服及其它杂品。

我方战死士兵三名，日系小深田中尉以下七名负伤。

（43）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十四时

距通化五十六公里的石湖南方面地区

中川游击队扫荡了上述地区。逮捕匪鲜人一名，缴获手榴弹一枚，背包二个，弹药及其它。

（44）昭和十四年一月十六日十五时

距通化十五公里水洞南方约十八公里的娄子沟

陈明部队在上述地点与匪首不详的共匪约一百名交战一小时，使其溃散。

共匪遗弃尸体二具，逮捕一名（东北 抗日联军第二团第三连连长王某负重伤），缴获品很多。

（45）昭和十四年二月九日

距通化一一五公里辑安西方的榆树林子警察署

共匪第一方面军（匪首曹亚范）参谋长尹夏太与部下一名一起归顺了榆树林子警察署。

交出轻机枪一挺，机枪子弹二一五发，手枪二支，手枪子弹五十六发，手榴弹二枚，望远镜一个。

（46）昭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十六时

距通化一一五公里辑安南方三十公里的石青沟东方。

谷麟部与曹匪之一部约八十名激战三小时，将其击溃，向北方逃走。此战斗匪方遗弃尸体八具，打伤匪相当多，数不详。

我方除现日系步兵上尉吉田林一郎战死外，还有满军士兵二

名，负伤六名的损失。

（47）昭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距通化一0五公里的小青沟

曹匪约一百五十名袭击小青沟，从今井组现场掠夺白米二十包，苞米十二袋，被褥，、衣物等，绑架劳工头七名，鲜人七名而逃走。

（48）昭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十三时

距通化一0五公里小青沟西北方五百米的1004高地

满军金子队及警察队发现袭击今井组的杨匪在1004高地上，与警察游击队及富森工作队别动队协力经过两天的攻击之后，使其向1068高地溃逃，烧毁山寨三座。但在此次战斗中，警察游击队战死二名，负伤六名，别动队战死二名，负伤四名。

（49）昭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零时三十分

辑安西北四十公里的土窑子部落

曹匪五十余名袭来，绑去警察署署长、自卫团五、部落民三十人，掠夺许多物品后向南方逃走。

（50）昭和十四年五月六日十时

果松东方约三十五公里辑安县第四区的1135高地担任掩护关东军测量队的田中队铃木下士以下九名在1135高地与持有轻机枪的共匪约一百五十名遭遇交战，但在此次战斗中发生了田中队铃木下士以下九名、测量队四名的战死者。

（51）昭和十四年七月二日八时

黄柏站东北方十四公里的下套部落

出现不详匪约二十名打死该部落民五人而逃走。

所属单位	殉职人员姓名	年月日	部队名	资格	摘要
军	狩野幸雄 陶桂余 王相林 高仁富	昭和 13.3.18 昭和 13.3.17 〃 〃	角田部队 满军 满军 满军	步兵下士 兽医上尉 上等兵 二等兵	
满铁会社	漆田千代松 戌亥浅松 久保直左卫门 铃木义雄 横田一 黑河内省一郎 品川清治 齐藤德次郎 室井重吉 乔世国	昭和 13.3.13 〃 〃 昭和 13.6.25 〃 昭和 13.7.29 〃 〃 〃 昭和 13.10.28		警备助理 警备班长 调度员 警备班长 〃 技术员 警备班长 〃 技术没 临时雇员	
东亚土木会社	山田芳松 山田卫西部 柴田太十郎	昭和 13.7.29			组员家属

第四节　匪害调查

由于匪贼袭击造成的损失额及满铁会社的赔偿额

包工者	工区别	包工损失额	满铁赔偿额	记事
		（日元）	（日元）	昭和13年3月13日
东亚土木	第五工区	125，091.15	93，335.00	
〃	〃	56，754.75		上述追加
〃	第九工区	42，843.89	30，363.00	昭和13年6月19日 〃 〃 6月24日
冈　组	第七工区	21，974.90	13，192.00	〃 〃 6月19日
今井组	第八工区	160，729.15	108，215.00	〃 〃 6月19日
吉川组	运　输	29，000.00	11，450.00	〃 〃 3月13日 〃 〃 6月8日
计		436，367.14	256，555.00	

（上表系几次大的损失总额，至于每次被我抗联袭击后所给予日伪的打击造成的损失总的统计，原文没有。但各工区几次较大的损失具体统计较详，因用处不大，故未译—译者注）

第五工区逃亡劳工的损失

（此表仅是一个工区的劳工逃亡统计表—译者）

（摘自1942年11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通辑线建设工事志》第330—340页）

种类	召募地点	称呼	数量	单价	金额	记事
鲜人坑夫	朝鲜海州召募	人	18	（日元）20.30	（日元）365.40	未收回募金
满人坑夫	承德召募	人	87	20.80	1，809.60	〃
满人劳工	本溪湖方面召募	人	256	19.50	4，992.00	〃
〃	天津召募	〃	108	41.00	4，428.00	〃
〃	四平街方面召募	〃	854	19.50	16，653.00	〃
〃	天津召募		408	41.00	16，728.00	〃
合计			1731		44，976.00	〃

有关程斌叛变的历史资料

按：程斌原是抗联一军一师师长，于1938年叛变投敌。任日伪军围剿抗联的讨伐队大队长，对抗日斗争造成极大破坏。全国解放后被捕获处决。此材料仅供研究东北抗日斗争史工作者参考。同时，也可揭示出叛徒的丑恶嘴脸和可耻下场。

（一）程斌历史

程斌的简历

程斌1911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盘石县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参加了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第四小队队长，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政治委员。1934年任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1934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38年6月末程斌叛变后，曾先后任日寇伪通化富森工作队讨伐大队副大队长，森林警察大队长等职。1945年他又投靠蒋介石，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纵队少将大队长，副师长及五十三军军部高级参谋。

解放后，他匿居北京，隐瞒罪恶历史，混入我华北军区军械处工作。1951年，被我专政机关逮捕归案，同年5月12日被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程斌叛变过程

1937年抗联一军一师西征失利后，重返桓仁县老秃顶子一带活动。1938年春，一师进入本溪县和尚帽子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抗联一师在程斌的领导下仍同日寇进行顽强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此时，日寇调集大批人马，以黑崎讨伐队为主对一师进行疯狂的“讨伐”和“围剿”，同时在政治上加紧实施“保甲制度”和“集团部落”，基本上切断了抗联同当地群众的联系，致使

一师给养发生了很大困难。程斌便带一师向东南方向，宽甸一带转移。在宽甸一带深山里，日寇加紧扫荡，形势更加严峻，更无法开展活动。随后程斌又带领全师重返本溪老和尚帽子根据地。

1937年12月和翌年2月，原一师军需部长胡国臣和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被捕叛变投敌。为效忠日寇，叛徒胡国臣、安光勋向日寇献策：程斌对母亲很孝，可秘密逮捕程母和哥哥，迫使程斌归顺。随后，长岛工作班特务沈亚东探知程斌家属住址，将程之母、兄（程恩）抓来，监禁了程母。此时，日寇派随李万荣投降的叛徒韩荣好带程斌之兄前去劝降，程恩见到程斌后按日寇的要求劝程斌投降，并问程斌要不要母亲，日寇还派密探给程斌带来了叛徒胡国臣、安光勋的劝降信。1938年6月29日，日寇长岛工作班87人黑崎讨伐游击队80人以及碱厂警察署增田警尉25人在碱厂孙李沟里（短脖子沟）包围了程斌带领的一师主力部队。在这诱降阴谋的面前，程斌竟然置党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答应了日寇的一切要求。随之下令让部队下山投降，并枪杀了反对他投降的三团政委李茨苏，于当日裹胁一师师部及保卫连61人向长岛工作班投降，程斌还派人上山通知一师其余人员随他投敌，结果三团，六团的少部分人陆续下山投敌。总计这次随程斌投敌的一师人员达115人，向日寇缴械步兵炮一门，轻机枪五挺，自动步枪两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 000余发。

1938年7月31日上午，在日寇的策划下，程斌等叛变投敌的115人在本溪县附近的本溪湖小学举行归顺仪式，程斌代表“归顺者”感谢“皇军”的宽容，表示“益感皇恩之可戴，悔前非而归顺”。愿随长岛工作班从事工作，以对付其它“匪团”并誓赎前罪，无再为匪之虞目，充分暴露了程斌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可耻叛徒嘴脸。

程斌等115人投敌后，其中年高体弱35人被日寇处理回家了，程斌等80人被编入长岛工作班。在本溪经过20多天的整训后，即开赴通化庙沟，驻南营进行改编和训练，并正式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程斌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同年8月，通化省警务厅该厅警务科长富森熊次郎接任长岛玉次郎的职务，将长岛工作班改称富森工作队，富森工作队的主力是程斌大队。富森工作队的主要成员是日本侵略者和抗联的叛徒，它直属于通化省警务厅领

导，设有富森工作队本部、富森工作队程斌大队、富森工作队别动队和富森工作队北方工作班。

（二）归顺式及供词

关于投降匪归顺认许者归顺式之件

报　告（通　报）

本警司第 87 号之 7 康德五年八月四日

康德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归顺之九省以下十名及康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一日归顺之匪首程斌以下一百一十五名，七月三十一日于本溪湖日本小学校校庭举行归顺式，对于归顺者之处置如附纸，仅此报告（通报）。

记：

（1）日时：康德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时；

（2）场所：本溪湖日本小学校校庭；

归顺或次第。

（1）一同着席；

（2）开会之词；

（3）国旗敬礼；

（4）归顺者检点及认许证授以予；

（5）县长训示；

（6）副县长训示；

（7）来宾训示：板井部队长，来岗部队长福本部队长，警务司长代理，奉天警务厅代理，本溪湖宪兵分遣队长；

（8）归顺者代表宣誓；

（9）国旗敬礼；

（10）闭会之词；

（11）退场。

1、入党之原因及动机：

程斌于民国二十年于长春中学毕业后，吉林师范入学准备中，同年九月十八日满洲事变暴发后，因各校停办入学陷于不可能之中，乃于家闲居。有乐光者自盘石党部来伊组织反日会，宣传日本占领满洲成为殖民地化，此际吾等若不一致团结驱逐日本，将为亡国奴者不待言。乃被劝诱而加入反日宣传会，于同二十一年加盟反日会，假反满抗日救国之名义，受共产思想之训练，抱过激思想，遂于1931年以至于伊通县三道河入党而为中共盘石党员矣。

2、入党后之经历：

（1）一九三二年春以盘石党刘某之劝诱加盟盘石党伊通县支部青年团，同年秋伊通红军第三十二军游击队编成，为同队长袁德胜之部下，任命为第四小队长，同年冬于伊通县三道沟暴发之事件左小指负伤，后归家治疗。

（2）一九三二年负伤痊愈之后，于盘天生玻璃河套归队，为政治保安之队员。

（3）一九三三年九一八纪念日，红军三十二军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被任命为政治保安连政治委员。行动于盘石伊通县内。

（4）一九三四年被命为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行动于柳河、金川、通化地区。

（5）同年秋被命为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6）一九三五年秋就任师长于临江、通化、辑安、桓仁、宽甸、本溪、凤城县地区行动以至于今。

3、行动概况：

一九三四年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与第一师之队一同行动于临江、辑安县地区，至一九三五年开拓新根据地而入本溪县，同年秋为司令，自本溪、风城、宽甸、辑安等县一带活动。一九三六年夏，依杨军长之命转进三角地带，行动于岫岩、海城、盖平、辽阳各县，为日满军警峻烈讨伐，受莫大损失而窜遁入本溪县。同年冬复行动

于三角地带，约一个月，后复向本溪县移动，而后横行于本溪、宽甸、凤城各县。

4、归顺之原因及动机：

为现地日满军不断治安工作所畏服，依长岛工作班及黑崎游击队之协同工作，使匪团发生自溃作用部内动摇。由伊通县偕同程斌之母及兄，而诱使程斌与其家族会面。为黑崎游击队及长岛工作班所包围，训谕其解除武装无条件投降。彼深悔一往之外，愿为王道政治之良民，遂投降矣。

5、对于归顺之所见：

调查之结果，其家族亲戚等，于满洲国王道政治之下劝励生业，深知生命财产等受完全之保护，益感皇恩之可戴，悔前非而归。归顺后，一部归农。一部随长岛工作班（宪兵）从事工作。以对付其他匪团誓赎前罪，无再为匪之虞目。认为有使其彻底王道之趣者，认识满洲国之现况，对其他匪贼讲求分解之方策。

6、投降匪之所持枪器数：

平射地步兵炮一门，同弹丸 31，轻机枪 5、同弹丸 1605，自动短枪 2、同弹丸 150，小枪 95、同弹丸 2758，手枪 82、同弹丸 1721。

番号：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师。

归顺中示年、月、日场所康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本溪县，四区碱厂（下略）。

程斌供词（摘要）

（前 7～9 略）

10、军党部的组织建制

军党部

政治委员	杨靖宇
委　　员	安光勋
委　　员	韩　某
委　　员	胡国臣

11、师党部

书　　记　　　程　斌
宣　　传　　　李向前
组　　织　　　李春光

12、行军宿营的部署

（1） 行军：行军时，派出 5 名或 3 名尖兵，二人侦察道路左右两旁，一人侦察正面前进。在密林地带或不可能透视的地带行军，尖兵班首先使二人进入搜查地，尖兵与本队的距离相隔 500 米，其他则采取伏击、掩护射击的体势。

（2）宿营：昼夜休息之际，变开帐篷宿营，选择：

① 敌人发现困难，我方容易透视的地点；

② 发现敌人易于立即配置到有利阵地的地点；

③ 便于供饮水的地点；

白天则将步哨配置到便于展望的地点，夜间每排的距离约 200 米，以便敌人袭击时互相援助，或防御包围的危险。通达露营地点的通路则设双岗，情况特别紧张时，则派小队步哨，进行警戒，以备意外的急变，为监督岗哨的勤务，每一小时，各排长以下的干部巡查一次岗哨。

13、募兵要点

1934 年左右，在金、柳、桓、兴等地区行动之际，由地点党部募兵，经选拔入队，因本溪、宽甸地区没有地方党部，袭击村落或使政治委员潜入村落，担任反日宣传讲演，征募希望自动参加的人，近年，伴随集团部落的组成和保甲制度的实行，户口调查严密起来，以致不能接近居民，募集队员颇感困难，依靠绑架带走，进行政治训练强迫劝诱。

14、武器、子弹、衣服、粮食的补充方法

（1）利用地方的经济人采购；

（2）由军部补充；

（3）袭击日满军警取得；

①利用地方经济人采购：

利用沈阳、辽阳的经济人，通过本溪桥头取得。人名、住址、另述之。

②由军需补充：

由军部军需部长胡国臣担任，胡国臣被捕后，已中断。

③袭击日满军警取得：

试举最近主要的：

A、1937 年 11 月凤城县第三区，袭击满军补充团，夺取十一式轻机枪一架，三八式步枪八支，毛瑟枪一支，子弹一千二百发。

B、1937 年 12 月，在宽甸县毛甸子，袭击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七九式步枪五挺，子弹四百五十粒，衣服五套。

C、1938 年 3 月 30 日在本溪第三区赛马西北地区，奇袭福本部队中村队，夺取三八式步枪三支，军刀一把，手枪一支，子弹六百发，军衣四套。

D、1938 年 4 月 13 日在本溪县大青沟，袭击奉天省警察讨伐队，夺取平射步兵炮一门，子弹 32 粒，轻机枪一架，七九式步枪十七支，毛瑟手枪二支，子弹四千余发，军衣二十套。

最近粮食的补充，由于治本工作彻底，抗联失掉了和村民接触的机会，因而村民没有自动提供的，差不多是依靠袭击村落来补充，或埋伏在交通路上，夺取补充之。

15、程斌所采取的战术

（1）埋伏：利用敌人的交通要道上的树木或其它地物，使部队潜伏，当敌人完全进入埋伏线时，指挥所在展望所的位置开炮为号，开始一齐射击，不逸失其机，乘敌人动摇之机，进行突击，然后予以缴械。

（2）伪装战法：完全出敌人之不意，伪装日满军警讨伐队，接近敌人，予以奇袭，如战斗有利，则将部队分为两队，伪装讨伐队对共匪的战斗，冲出包围线，或使村民，侦察员报告日满军警，俟应援部队出动后，进行游击。

（3）逆袭，以少数部队引诱敌人部队，使之进入埋伏圈内，然后在左右掩护下，予以逆袭。

（4）诱敌战斗法：使一部分部队攻击甲地，使乙地敌人出动应援，在途中向其奇袭，然后缴械。

（5）反冲锋（反突击）：经长时间的战斗，敌人精神疲劳，全无战意时，则召集部队讲话鼓励，振奋士气，以一部分惑乱敌人的注意，另以主力突击，使敌人毁灭。这种战法，消耗子弹少，善能战胜敌人。

（6）扰乱敌人：夜间派小队经敌人驻扎地点，使之在敌人宿营地附近射击袭击，令敌人应战，不给予休息机会，改变次日的战斗计划，减少战斗。

（7）奇袭：当敌人大部队休息和露营时，利用地形，地物或夜间，接近目标，猛烈急袭，给敌人以损害。

16、通讯联络方法

（1）通讯联络方法：

在桓仁县第六区外三保太平沟，设立通所，由胡军需部长当其衔，担任军部、南满省委间的联 系，而胡军需部长去年十二月战败被捕，自此联系断绝。

（2）通讯联络员：

从队员中选拔机警的交通员，以文书联络，其主要事宜，则以口头联络。

17、外围团体的情况：

（1）去年春季，当南满省委根据地在桓仁县第六区外三保时，曾有本溪县铺石河反日会，由该省组织部老纪领导，会员有邓有才等 20 人，不久以后，编入后方部队。

（2）截至 1936 年秋季，在桓仁县第六区外三保，曾有人民革命政府组织，主席为张荣，自卫科有于某，外交科有张文凤。是年冬季，被逮捕枪决。

以后，由于集家法彻底，匪民分离益甚，以致各地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等失掉领导者，遂自然解放。为此，北方党部曾研究其恢复方法，但今年春季，南满省委遭到彻底覆灭，失掉了骨干，因此，上下均迫不得已解散。

18、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编制，装备、干部名、人员。

（1）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是合编原东北人民革命军，朝鲜革命党、义勇军、抗日军，自卫队等各种抗日联军而成，取消其原有名称，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军第×师第×团第×连。

（2）最高指挥部是中国国防政府，在原则上，接受行动地区省委的领导，但有如第一路军的行动地区，其省委等地方党部均全部毁灭，现存东满特委，在有这样的地方党部之地，除以全付力量保护支援外，并以军部最高之首脑人物杨 靖宇为顾问或委员，领导地方党部。

（3）第一路军在原则上，设总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军需部、总军医处、总务处、总交通处等，但因日满之军警例年讨伐，损失了重要干部，无从补充，因此根据总司令的命令，遇必要时，则临时由军队职员兼任。

（4）第一路军之下有第一军、第二军，各军有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军医处、总务处。

（5）各军以下由三个师组成，现有第一师至第六师。各师设政治部、参谋部、副官部。

（6）各师有三个团。团配备政治主任或政治委员或设政治指导员一人。

（7）各团有三个连，一个连分三排，因最近补充人员困难，这是非正规的编制。

最近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编制表，如另表。

19、红军的行动方针

（1）第一军军部直辖部队，自 1936 年 9 月，曾在桓仁县第六区外三保、宽甸县天桥沟一带扎寨，准备粮食过冬，进行军部内部的政治军事训练，因该年冬季被讨伐队出动破坏，以至向辑安县地区移动。

（2）第一军第一师，1936 年根据应进出本、凤、宽县，更向三角地带扩大行动区域的指令，该年夏冬两季曾两次进出。但因日满军警讨伐，以败走。后以本溪铺石河为根据地，在该地附近行动，去年虽曾伺机再起，因部队编制或本人患病，遂未得到机会，直到

今年。

（3）第二师以金川、濛江、抚松县山地为根据地，同第二军一致行动。

（4）第一军第三师，昭和十二年（1937 年）春季结冰期，应编成骑兵队，以约 200 人的兵力，从兴京、清原县，通过铁岭县境，渡辽河，出阜新县，进出热河，与该地匪团联系，奠定根据地。

20、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行动地区

第一军部：南满桓仁、宽甸、辑安、通化县一带。

第二军部：东满、抚松、濛江县一带。

第一师：本溪、凤城、桓仁、兴京县。

第二师：临江、金川县。

第三师：清原、铁岭、兴京县。

第十一师：本溪、宽甸、兴京县。

马指导员：宽甸八面峪一带。

张指导员：辑安东西刀尖岭。

田指导员：前后夹道子一带。

李指导员：老秃顶子窟窿榆树（本队归顺）。

孟指导员：兴京、桓仁县境（本队归顺）。

权指导员：桓仁、通化县境。

21、程匪在东边道的行动概况

1933 年春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师部队共同在桓仁、临江、辑安地区行动。1934 年为开辟新根据地，进入本溪县，是年秋，任司令，在本溪县、凤城县、辑安县活动。1936 年夏，根据杨军长的命令，转进三角地带，到达岫岩、海城、盖平、辽阳，但因日满军警讨伐峻烈，受到很大损失，遂归返本溪县，是年冬在三角地带，行动月余，又归还本溪县后，在本溪、宽甸、桓仁县境内行动。

22、南满省委

今年春季，南满省委受到检举镇压，以致覆灭，因没有统治人才，竟迫不得已覆灭，截至今年春季，构成如下：（下略）

（三）程斌叛变后的罪行

程斌叛变后，由于他对杨靖宇的战略战术和抗联一军的军事设施和军需供应等机密熟悉并全部泄露给敌人，这样就造成了对杨靖宇及其领导下的抗联部队极大的威胁和危害。

1938年8月，开赴辑安，讨伐杨靖宇及抗联一军部队。8月至9月在辑安县二道沟等地，围剿抗联曹亚范部，10月被南满地区讨伐司令部长官野副昌德调到临江，在野副昌德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参加围剿扬靖宇率领的军部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接着在临江、三岔子、新开岭等地围剿杨靖宇部，并搜获我抗联储存的2000多斤苞米。在野富昌德亲自部署下，在黑外岔沟铁桶包围战中，充作尖兵队，被视为“王牌”到阵前喊话，企图瓦解抗联军心。杨靖宇部队从黑外岔沟突围后，程斌为效忠日寇，取得主子信任，紧追不舍，于11月在辉南县的干饭盆袭击抗联部队。接着，在濛江（靖宇）的那尔轰袭击抗联部队打死抗联战士3人。而后，在盘石县黑石镇打死抗联1人，至1939年春，在桦甸、金川等地围剿抗联部队打死抗联战士11人，搜捕7人，其中两人被程斌打死。1939年7月，在辉南县五分所打死抗联战士6人，8月在金川县的大李房子、小金川、蛤蟆塘等地围剿抗联部队，打死抗联战士4人，打伤7人，俘虏1人。

1939年9月在临江县新开岭和濛江县头道老爷府打死抗联2人，打伤7人。同月在濛江县那尔轰西北岔围攻抗联部队，打死抗联战士4人，12月在濛江县的青岗打死抗联战士4人，在濛江、辉南县境的四方顶子等地打死抗联人员9人，并在龙泉镇“围剿”杨靖宇部。

1940年1月9日杨靖宇率领部队激战濛江县错草顶子，程斌率队紧紧抓住不放，并联系日本马大队和申讨大队前堵后追，一日之内五易其城，抗联战士被程斌大队打死9名。1月20日程斌与申大队在马架子合围杨靖宇，打死抗联战士7人，打伤20名。1月28日，程斌在濛江辉南界山马屁股山与曲焕文大队、申麟书大队、日军小滨部队围攻杨靖宇，因天降大雾，地面不见人影，杨靖

宇及其部队与五路敌人遭遇，失利甚重，程斌唆使部下对抗联军战士指名道姓地进行所谓宣传和诱降，机枪连长宫明义经受不住诱惑，战后携枪叛变投敌。此战役，杨靖宇失去了主力部队机枪连。1 月 30 日，程斌又与申麟书大队、曲焕文大队尾随杨靖宇，在辉南县平尚战斗中打死抗联战士 7 名。2 月 2 日，抗联一路军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携机密文件和枪支投敌叛变，程斌欣喜若狂，主动承当尖兵，与日寇的小滨部队、桑文海讨伐大队、范文谕讨伐大队、森林警察队于拂晓前由张秀峰引路，包围杨靖宇住地，突然袭击抗联。杨靖宇及其部队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损失严重。这次战斗后，杨靖宇身边只剩 30 名战士。2 月 4 日杨靖宇部队仅剩 15 名战士，程斌率队紧追不舍。于新开河处与阻击掩护的抗联小分队激战一天，被抗联小分队打死打伤多人。2 月 15 日，程斌与崔胄峰、唐振东 3 个讨伐队 60 余人在新开河木场附近追击杨靖宇。杨靖宇只身一人，临危不惧，巧妙还击，打死日军 1 人，打伤 5 人。最后左臂负伤，借敌阵混乱之机隐没林中，程斌等讨伐队划着火柴，沿着杨靖宇的血迹和脚印追赶到凌晨两点，把 600 多人的讨伐队拖得只剩 50 人，不得不丧气而归。2 月 23 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三道崴子遭敌包围，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程斌毫无廉耻地说："这一下，我的饭碗没有了！"

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特将程斌从前线调到濛江县城，叫他认打死的是否是杨靖宇。经他确认后，日寇将杨靖宇头割下。程斌全队参加了日寇在濛江举行的讨伐杨靖宇胜利"庆功"大会。

1940 年 4 月，程斌大队被调往牡丹江一带"讨伐"我抗联部队。1941 年 8 月程斌大队又调到热河省增援日寇扫荡，驻守在安匠屯一带，帮助日寇"归屯并户"，实行"三光"政策，杀害百姓，烧毁民房，制造无人区。在董各庄，程斌大队有 80 多人向八路军十团集体投降。因此，程斌有嫌遂被调回伪通化省任临江森林警察大队长。1942 年程斌又调任热河省警察大队长，升任警政大队长。程斌率 3 个中队驻在鹰首营子一带集团部落，封锁八路军，并经常带队扫荡我松树岭、将军关、兴城镇等地区，围攻我抗日部队。

1944 年 9 月，伪通化警务厅辖内各警察大队都进入冀热边区

的长城外一带，同八路军作战。统一改称“一心讨伐大队”，总指挥设在河北省遵化县城，共有 12 个警察大队。

1945 年 8 月 13 日，程斌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后，他伙同曲焕文、吴太福等手下人发动哗变，将一心警察大队内全部日本人 80 多全部逮捕处死，而后严密控制队伍，静观其变。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宣布投降。我八路军第 15 分区警卫团杨政委在驻地与程斌商谈受降问题上，程斌一面与杨政委虚与委蛇，一面将杨政委扣押，以致后来杨政委死于狱中。

在日寇投降后，程斌同陈天喜商量今后怎么办？几经策划，程斌决定投靠国民党。1945 年 9 月，程斌率部正式投靠国民党军队，所部被改编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陈天喜任司令，程斌任副司令。驻守在遵化县城。程斌令其部下拆房扒庙，修筑工事，与我八路军顽抗四个多月。在程斌指挥下，仅在我军进攻遵化的一次战斗中就打死打伤我军一个营之多，并在城内残杀区村干部，无辜百姓 20 多人，将尸体扔进井里。后来，我军攻下遵化城，程斌率残部在飞机掩护下逃到唐山，被陈明仁将其全部收编为六师，程斌任上校副师长，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进犯，攻打新民、彰武等县。

1946 年 6 月 6 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正式生效后，程斌背信弃义，指挥部下 1700 余人于 6 月 7 日向我军占领的法库县进犯，俘虏我方人员 30 余人，当日午前占领法库县城。进城后，凶狠的杀害我工作人员。因程斌占领法库有功，而被提升为少将副师长。当我三人调查小组前往法库了解真相时，程斌设下多方障碍，并伪造 6 月 6 日侵占法库假象，他收买一个作风败坏的女人（一个姓夏的天主教徒）与两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发生肉体关系，使其两人伪证程斌确实 6 月 6 日占领法库，以逃脱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另外，程斌还伪造我方文件，蒙蔽三人调查小组，组织特务化装成老百姓向三人调查小组控告我军，制造混乱破坏调查正常进行，还布置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招待员名义监视我方代表行动，在调查中，对我方百般刁难。同时，接受国民党东北行辕密令，阴谋准备 100 多名蒋军士兵装成八路军，待与三人小组谈判失败后，乘三人小组返回沈阳之机，在途中将调查人员全部杀死，烧毁汽车，企图嫁祸于我方，掩盖程斌非法侵占法库的罪行。

1948 年 2 月，程斌被调任蒋军 53 军任上校高级参谋。同年 11 月，沈阳被我军解放，程斌见蒋政权已在垮台中，遂带其母亲及妻子及两个儿子乘飞机逃往北京匿居，暗中继续同国民党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办公厅主任陈天喜勾结，妄图在长沙继续为蒋政权效力。

北京解放后，程斌隐瞒其罪恶历史，伪装进步，于 1949 年 2 月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军械处工作。

1951 年 4 月 28 日，程斌在北京东单牌楼胡同十一号住处被我方逮捕归案，经北京公安局核准批复，将其解至热河省。同年 5 月 12 日，被我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处决于承德市。

（文内序号在编辑中根据需要作了调整）

后 记

《集安抗日斗争史料》一书，在全市广大文史工作者及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终于出版发行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

编撰《集安抗日斗争史料》一书，是集安市政协历届班子的共识，过去史学工作者虽然做了大量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但都没有形成一本系统的文献。市政协本届班子之所以把它列入年度重要工作日程，是考虑到集安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理应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挖掘、抢救并整理出版。为使《集安抗日斗争史料》丛书能够收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的更好效果，编委会和编撰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翻阅了临近省、市县志和史料丛书，集合并借鉴了多位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对有关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反复校对核实，做到了史学性、真实性、合理性、通俗性相统一。纵观全书，可以说《集安抗日斗争史料》是一本有品位、有质量、有特色的地方文史资料。它高度浓缩并且真实地再现了集安人民在抗日斗争时期血泪斑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历史画面，较好地体现了“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严肃认真”的编辑意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50多幅照片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因此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收藏价值看，都将无疑地大大增加本书的“含金量”。由此可见，《集安抗日斗争史料》是一本具有史料价值、图文并茂、使人受益的好书，它在教育人民，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朋友，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本书从2007年6月份开始运作，到11月份完稿，共用6个月时间。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水平有限，会有不少不足之处，希望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待再版时修订。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集安市政协，向为顺利编写出版这本书而提供大力支持、热情帮助的社会各界和有关单位，向呕心沥血、付出艰辛努力的有关领导和编委会的全体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集安市政协副主席　周　均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集安抗日斗争史料》
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集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集安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内部资料准印证 0501009

2007 年 12 月印刷